

维系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关键人物

——刍议朱子和朱子理学

朱 清

(福建省闽学研究会,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 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和理学即“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理学的构建, 挽救儒学于命悬一丝之际。朱子理学的感召有四点: 一是阐发了儒学精髓, 续接儒学传统; 二是体现了“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理性; 三是回应了社会关切, 强调社会教化; 四是浓烈的家国情怀, 锻造民族精神。

关键词: 朱熹; 朱子理学; 新儒学; 中华文明; 儒学传统

中国发展史告诉人们,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 各种学说兼容并蓄的华夏传统文化, 在其漫长的演进中铸就了中华民族及其伟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指出: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千年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衰”。感悟这两句话, 可以看到维系中华文明古往今来、从未中断的一位关键人物, 该人物即南宋思想家朱熹。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和理学即“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世尊朱子。1999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夷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 称朱子理学为“后孔子主义”。

一个伟大思想家, 既从自己的角度诠释世界, 也给人们提供思想空间。福建是朱子故里和理学的发祥地。近年来,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热潮涌动, 海内外各界人士来闽“走朱子之路”络绎不绝。人们沿着朱子的人生轨迹, 探究理学实质和发展脉络, 以激发对当代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思考。

我以自己的理解, 谈四个问题。

一、儒学的创立与磨难

因朱子继承孔子, 就得先说孔子和儒学。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他是 2500 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也称东周时期的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在孔子之前, 汉字中已有“儒”字, 与“柔”字相通, 含思想教化之意。上古社会称知识渊博、传播诗书礼乐的人为儒者, 也指管教育的官员, 后以孔子为宗师形成儒家学派, 封建王朝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可见儒家学说与教育、教师渊源深远。再看, “儒”字左边是“人”, 右边是需要的“需”, 可见儒家求真务实, 非“书呆子”; 创立儒学本为解人之需, 非清谈和迂腐。

孔子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家庭, 其家境中落, 贴近社会底层, 体察百姓疾苦。他自强好学, 通晓经济, 曾经从政, 一度官至代理宰相。他以道德和礼教济世安邦, 关照民生, 却触犯了贵族的利

益，最终被当权者弃至不用，还险些丧命。然而，孔子信念坚定，创办私学、著书立说、周游列国，矢志宣扬自己的政见。他特别重视教育，以期通过培养人才实现“天下大同”。他为中华文化留下一笔丰厚遗产，就是他率领弟子，采集东周前的民间诗歌 300 余首，编成《诗经》；将尧舜以来历代明君的言论和事迹，编成《尚书》；还修订记载诸侯国重要事件的资料，写成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取名《春秋》。此外，还编修《礼记》和《易经》。《礼记》阐述国家典章制度及个人行为准则；《易经》描述阴阳交替现象以揭示大自然及万物的变化规律。这五部儒家典籍在西汉时期合称《五经》。

纵观思想史，宗师的学说大多因其弟子的出类拔萃而得以传承开来。传说孔子学生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不少人成为东周各国的高官。孔子去世后，他同弟子的对话由其弟子们整理成书，取名《论语》。该书集中体现了孔子在政治、伦理及教育等方面的主张，后人评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此后，记载孔子后传弟子孟轲语录的《孟子》一书问世，这也是儒学重要著作。但西汉立《五经》时没把《论语》和《孟子》列入，是个缺憾。1300 年后，朱子集注《四书》，选入《论语》《孟子》，摆在《五经》之上，凸显其重要价值。

《五经》内容宏富，算是原始儒学，参透着孔子思想，最突出的亮点是其政治主张与教育原则。政治上，孔子反对暴政苛政，提倡用道德、秩序与制度治理国家和处理社会关系，核心是“仁”，宣扬“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和“与人为善”。仁即德，仁政即德政。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体现博爱精神。孔子亦讲法治，呼吁“克己复礼”。“礼”含秩序与制度，要求人们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但孔子强调“以德为先”。孔子还认为，“仁政”的根基在教育，其要义是“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教无类”有两种解释，一指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反映了“仁”的要求；二指教育应当覆盖到全社会，提高了全民道德素质，才能使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安定有序。

“学而优则仕”也有两说，一说要举荐学问好的人为官，才能国强民乐，若官吏不学无术，国家和社会就有祸患；再一说读书人要有好品行，能够勇担社会道义，为国为民效力。上述主张，彰显了“民本”理念和“济世”精神。孔子的这些思想为后人所传承。

然而，儒学的发展并不顺畅。孔子著《春秋》时逢战国纷乱，思想领域“百家争鸣”，儒学也仅一家之说，并不吃香，最受当权者待见的是善通权变的“纵横家”。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鄙视儒家宣扬“仁说”，以致酿成“焚书坑儒”悲剧。结果秦朝维持不到 15 年就被推翻，其如此短命让世人醒悟到儒学的价值。汉朝立国 66 年后，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第一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走进古代政治舞台中央，顺应了当时社会安定和发展的需要。汉武帝掌权 54 年，是西汉至宋末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开启了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个盛世。汉代江山存续 426 年，时间之长为封建社会历代之最。儒学治国亦为后世的国家治理和民族融合提供了经验。检视整个中国王朝史，南宋后执政时间最长、最稳的是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间，分别为 61 年和 60 年，这也恰是朱子理学即“新儒学”影响和地位的最高峰时期，相随的是“康乾盛世”。此中道理，很值得寻味。

西汉后期开始，儒学出现危机。一方面，《五经》庞杂，流传了千余年仍未形成理论体系。孔子之后“儒分八派”，主要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突出“仁说”，宣扬“民为贵”“得民心者得天下”，对后世影响很大，被认作儒学正统，遂称“孔孟之道”；荀子重“礼”，崇“刑法”，德治偏弱，故无成主流。不同时期的儒学，也争论不休。西汉太学里专设的五经博士，各凭己见批注五经，致使经学支离，对诸多章句解释不一，庶民百姓更是费解，此时的儒学已难前进。另一方面，东汉以来西

方佛教传入中国，“唐僧取经”家喻户晓；其围绕“四谛”构建的“来世”之说，风靡中原。一说“苦谛”，指人人有痛苦，与生俱来，不可回避；二说“集谛”，指人生痛苦原因要从自身寻找；三说“灭谛”，指能够解脱痛苦，人死后可去极乐世界；四说“道谛”，指欲达理想境界，必须内省修行方能实现，修行不好到不了极乐世界，反要下到地狱。这套理论强调因果报应，逻辑性强，传入中国后混合了本土习俗及鬼神观念，给乱世中的思想迷茫者提供了精神依附。同时期，中国本土上融合阴阳五行说与神仙方术的原始道教，为抗衡佛教也在朝野上下迅速发展，拥有不少信徒。佛道两教、主要是佛教的兴起，动摇了儒学的官方地位和社会基础。到北宋末年，中原社会严重内忧外患，在多重侵害面前，儒学已无法回答社会问题，也无力应对佛教挑战，已然奄奄一息。从这段儒学史看，理论的不完备势必妨碍其与时俱进，也就难以聚合人心和保持活力；理论上的混乱，还会致使民众精神分裂，国之魂散而无所归依。

庆幸的是，朱子理学的构建，挽儒学于命悬一丝之际。这也是中华之幸。

二、朱子的生平与高尚人格

一个人的生平反映其生活的时代背景，由此看清该人物的思想发端和历史作用。

朱子生活在距今800多年前。其父朱松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北宋末取进士，因赴任福建政和县尉，举家入闽。朱子出生于南宋初建炎四年九月（1130年10月），诞生地在闽中尤溪；他于庆元六年三月（1200年4月）在闽北建阳逝世，享年七十一。其一生长成、为学、从政、从教及著书立说等大多时光在福建度过，其间居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市）近50年。

朱子身世坎坷，饱受忧患。北宋末年，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罔顾民生，造成社会剧烈动荡，东北金国乘机入侵中原。官僚腐败致民心尽失、国力衰弱，数十万宋军挡不住6万金兵。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宋都开封，掳走钦宗皇帝和太上皇徽宗，史称“靖康之难”，北宋亡。康王赵构（徽宗第九子）继帝位称高宗，取年号建炎，退至江南，史称南宋。但金兵继续南侵，到处哀鸿遍野。

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金兵从江西攻闽北，在建州府公干的朱松无奈弃职，携家眷返政和县在一所寺院里避难；次年五月，浙江中部叛军亦骚扰闽北，朱家再迁尤溪，寓居好友郑安道家中。该年九月朱子于郑氏寓馆呱呱落地时，朱松赋诗曰“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儒冠？”意思说，在此乱世之际，武力胜过道义，学问再好也无用，这孩儿的前途，除了出征助战，恐无他路。古语说“乱世出英雄”，但对百姓而言，乱世带来的是灾难。幼年朱子常随父母辗转逃亡，儿时便尝乱世之苦，致他后来构建理学尤为重视治乱。

绍兴九年（1139），高宗以称臣、纳贡和割让半壁江山换取与金国“议和”，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更可悲是，朝廷苟且偏安，不顾山河破碎，不图卧薪尝胆，只把江南当“温柔乡”，沉湎于纵欲寡欢。儒者朱松焚心疾首，训诲儿子研读经书，寻思报国，不做亡国奴。颠沛流离中成长的少年朱子，深感官僚腐败、民族矛盾和国家分裂造成的人间苦痛，立志学孔孟，为国谋中兴。

朱子14岁那年父亲病故，他遵父遗命，奉母亲迁居崇安五夫（今五夫镇），投靠父亲旧交刘子羽。刘子羽是抗金名将，因反对议和辞官返乡，朱子拜其为义父，并师从当地名儒刘子翬、刘勉之和胡宪，后又师从理学隐士李侗。这段经历对他一生的励精为学和立业报国产生重大影响。他19岁取进士，24岁走上仕途，先后出任福建同安县主簿、江西南康军知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福建漳州知州、湖南潭州（今长沙）知州兼湖南路安抚使；65岁那年，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侍

讲，为宁宗皇帝进讲帝王之学。

为官任上，朱子仁政爱民，政绩凸显；且秉公进谏、义无反顾，7次向朝廷上封事，呈奏状100多份，或献策救亡，或弹劾贪官。侍讲期间，他怒怼朝廷的乱作为，面斥宁宗治政昏庸、不思进取，劝其正心修身、整肃朝纲，却因谏获罪，被革职差遣，逐出京城。随之而来的是庆元二年（1196）的“伪学逆党”案，当权者列朱子为“党魁”，毁其著作，对其同道之士或罢职或拘捕或流放，史称“庆元党禁”。朱子对政治迫害拼死抗争，临终前仍抱病修订《楚辞集注》，以颂扬屈原为绝唱，发出护国济民的最后呐喊。

日月同昭的是，朱子毕生从教，放射出照耀中华的思想光芒。他登科进士后，就在家乡五夫收徒开讲，直至终老建阳考亭，为官期间也没中止办学；无论任职何地，都把振兴教育作为要务。朱子办学授徒同构建理学互推并进，其巨著《四书集注》影响了南宋以来八百多年的中国乃至世界。

三、理学构建与新儒学

至北宋，儒学陷于绝境，岌岌可危。此际，一批有使命感的儒家追随者为匡扶社稷，展开了更新儒学的艰辛探索。这种探索始于北宋，成于南宋，最终形成朱子理学，使儒学起死回生。朱子理学成就了“新儒学”。

“理学”的构建，有各种解读。学术界将其列为哲学范畴，含理气论、宇宙论、心性论、格致论等等，当代学者仍在此中深入发掘阐释。但其更重于实用，旨在“揭示儒学义理”。“义理”这个词最早被儒家引用时，出自《易经》。“义”指《易经》中的八卦及其衍生出六十四卦的各卦名的含义，“理”指对各卦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注释。宋代儒者使用“理学”之名，其意是揭示儒学的本质，以纠正杂乱无章和变味的曲解。换言之，理学是“揭示和发展儒学原理的学说”。

宋代以来，探索儒学“义理”者被称为“理学家”。北宋就涌现出其开创性学派，主要有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等三大学派；至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融汇了各派的思想精华，通过对《四书章句》的注释形成缜密完整的朱子理学体系。该体系主承“二程”的洛学，故朱子理学又称“程朱理学”。

理学对儒学，既继承又更新，突出在“规律”“准则”“治乱”。它以揭示宇宙和万物生长的规律为依据，订立社会行为准则，以化解社会矛盾，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此更新具有警示意义，告诫人们不可违背规律行事，不可是非不分、肆意妄为。它在宇宙观层面阐发“天人合一”“理一分殊”的原理，更从解决问题入手，提出“三纲五常”“存理遏欲”“至善新民”“贵和尚中”等行为准则。这些原理和准则，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执政者与民众关系，乃至国与国的关系都至关重要。

领悟理学，要特别一说“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是理学阐发的首要准则，起于董仲舒，完备于朱子。董仲舒将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观，延伸和区分为“三纲”与“五常”。孟子则概括为“五伦”，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长幼有序”是从兄弟关系推广而来。朱子进而把“三纲五常”合并连称，亦赞“五伦”，并立为道德规范，提到“天理”高度。朱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及兄弟姐妹之间要各居其位、各得其所、各负其责，各有其样，朋友之间以信义为重；仁义礼智信应成为所有人的遵循，方可“平天下”。

朱子倡导“三纲五常”，也是对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主要是针对朝廷说的。进入封建社会后，君王更替频繁，其导火索大多缘自朝中伦理失范，如宦官篡位、后妃干政、外戚弄权、太子逼宫、及藩王拥兵自重，为抢夺皇位弑父、杀兄等等。汉末曹操挟天子令天下，国分为三作乱至魏晋南北朝；唐朝李世民“玄武门兵变”，残杀太子和多位王子及至满门抄斩；时下，外戚韩侂胄把持朝廷，横行霸道。伦理乱象倾轧政权，威胁国家治理。此类事件，轮番上演，国无宁日，涂炭生灵。所以朱子的“三纲五常”，重在整肃朝纲。如何整？关键在皇帝。因此，朱子把“正君心”作为头等大事。

朱子对“三纲五常”或“五伦”的阐释，也是辩证的。在强调“纲”的权威性之外，还有两层意思，一说“纲”也具有表率性。指君王、父辈、丈夫、长者应对社会和家庭履行道义上的主要责任，并非只是从属者的单向服从；二说“五常”是“三纲”的前提。“仁”是仁慈，其为核心，故排首位，用爱心包容一切；义是正义，无论扶正压邪，都应挺身而出；礼是礼貌，用相应的礼仪接人待物；智是理智，分辨善恶、是非分明，用“善”的标准指导行为；信是诚信，遵守承诺，说到做到。“五常”的作用是调整和规范“三纲”，就是说，如果君王、父辈、丈夫、长者的行为不符合“五常”，也是不道德的，正如《论语》所说的“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各种社会关系都应当遵行“五常”或“五伦”。因维护公道而违抗君命的称为“替天行道”，“大义灭亲”应受褒扬。所以“三纲五常”为一体，不能分割。讲“三纲”时，只讲服从，或不讲“五常”，都是对理学的误解。

当然，“三纲五常”有助于国家的稳定有序，但也具有负面影响。如统治者用它强化了专制，社会上的“男尊女卑”劣习得以加持，等等，这些都是理学的历史局限性。其根本原因出自封建宗法制度，只能随着社会民主的发展而清除。今日人们不能因其存在糟粕而一概否定“三纲五常”。尤其“五常”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正能量。

四、理学的感召及深远影响

《四书集注》阐释义理，具有莫大的感召力。南宋以来，朱子理学以“新儒学”的面貌，重返政治舞台中心地位。

理学的感召有四点：一是阐发了儒学精髓。主要对《五经》去芜存菁。朱子从《五经》的《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两篇，加上《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他认为《四书》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其他著述只作参考。朱子以毕生精力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解释儒学义理，并作了序定。就是，首先读《大学》，把握“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揽人的德行，乃“定规模”；二读《论语》，领会孔子对“仁”的教诲，以通达儒家本性，乃“立根本”；三读《孟子》，感悟存心养性才能增进“民本”和“仁义”的自觉，提升精神人格，发出浩然正气，乃“观发越”；最后读《中庸》，掌握中和思想，择善持节，不偏不倚，使人性本原复归天理，乃“求精微”。其中《大学》的“三纲领”最为重要，意思说，成人之学或一个人所具备的成熟心智应该是，把自身的“性善”品德发扬出来，还要推及到民众中去，使人们普遍获得思想和行为的自新，并且要将这些光明的德行不断完善和推向极致。此境界阐明了儒家做人的基本态度及其入世担当的理想追求。“八条目”的前五条讲涵养自身，指践行理想追求的基本条件和功夫途径；后三条讲服务社会，指实现“天下大同”的方向使命和目标结果，儒学的其他论说都是对“三纲领”的发挥。这就把“义理”挖掘出来，并使之系统成型。

理学立此道德高地，其感召能量远超佛教的“来世之说”。二是体现了“海纳百川”。朱子注《四书》，既守儒学正统，又融百家之说，很注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阐释“理一分殊”和“天人合一”，就分别采纳了佛教的“月印万川”之说和道教的“太极”与“阴阳五行”之说，引入对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思考，使儒学得以丰富，也易为大众接受。其中对“月印万川”的借寓很是生动，此句出自佛教禅宗，说天上月亮只有一个，而它映照在各处江湖上却可见到千万个。各处所见的月亮，形态有不同，但都是同一个月亮的折射。朱子用月亮折射的现象比喻“理”是自然万物生长的总规律，必然要反映在各类事物发展的具体法则中；办好任何天下事既要讲求特殊性，从其所处环境的实际出发，也要遵循事物发展的总规律，二者均不可违背。有人称理学是“儒释道合流”。总之，理学首开人类思想学说“大包容”之先河，对中国数百年来官方哲学同宗教观念保持总体和谐起到糅合作用。三是回应了社会关切。南宋初，动乱与屈辱交织，民心渴望振兴旧邦、抗侵雪耻和重整伦理、政治清明。朱子为之疾呼“存天理、灭人欲”。此处“天理”即“五常”，“人欲”指贪婪，此“人欲”不是指人们生活中包括饮食男女的正常需要。这里的“灭”指克制和遏制。朱子对该“人欲”有专门解释，他说：“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意思是，人心如水，性本善；情又如同水的平顺流动，这是在善的范畴；倘若水在流动中掀起了波澜，就会导致破堤决口。人的“情”一旦形成“波澜”，就会越轨变成“欲”，就容易出问题，由此而带来灾难。朱子说的“人欲”，当时还主要是指权贵阶层逐利忘义、奢靡过度。所以他每次入朝进讲，必劝皇帝正心修身、整肃朝纲，以期遏制官场腐败。他把“克欲”推至社会教化，但重点在于遏制当权者的贪腐，抓住了解决社会矛盾的症结。虽说“正君心”“肃朝纲”和“存理克欲”不可能在封建制度下真正落实，但对官僚们逾越“仁政”底线也具有戒惧作用，使其压榨百姓约束，这也符合民众的利益。四是浓烈的家国情怀。经历秦以后中国千余年的合分聚散，理学家们着眼于家国一体利益攸关，其维护国家一统的意识比之战国时期的先儒们更有质的提升。北宋至南宋，国亡家毁世道不堪，岳飞抗侵受景仰，秦侏卖国遭唾骂，反映了民心向背。朱子著《家训》，内容囊括理学体系，是为社会全员而作，并非专对朱氏家人，其开篇即言国家大义，首句“君之所贵者，仁也”，指明君要仁政爱民；第二句“臣之所贵者，忠也”，指好官要忠君爱国。朱子上朝呼吁“正君心”，明知引火烧身，但为国救亡，凛然趋之。元明清到如今，理学锻造的全民反分裂意志，对捍卫中国统一产生深远影响。

朱子在晚年还写下著名的《玉山讲义》。绍熙五年（1194）他从京城辞官回乡途径江西玉山，应邀在当地讲学，讲稿取名《玉山讲义》。在这份讲义中，他把大半生研习理学的体会概括为六点。一是“性即理”。说人的本性乃天然存在，与客观规律的理即“仁”或“善”相通，此是“天人合一”的本意。二是“仁包四性”。说仁涵盖义礼智信等四性，是性本善的核心。综上两点，指出人性依附于大自然，自然界给万物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条件，这就是善。人也是大自然的产物，行“仁义礼智信”之善乃天经地义。三是“仁体义用”。说仁存于心，为自体，是内心的体认；义礼智信形于外，要把仁付诸于实践。四是“性一气殊”。说人性本善，但每个人的气禀不同；气禀指环境熏陶和行为养成，气禀的不同反映出人的行善差异及人心善恶上的区别。所以，有人修成圣人，有人为不肖之徒。五是“存理灭欲”。说把人性的善发扬出来，遏制住贪婪和过度的自私，以符合仁的要求。六是“尊德性、道问学”。说做人行善，要将道德修行与丰富学识相统一，使读书与实践相辅相成。以上六点可称理学的浓缩版和入门的钥匙。

朱子去世后，其理学思想被历代朝廷奉为儒学正统，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除了谥号封爵、配祀孔庙之外，宋仁宗于1212年诏《四书集注》列为国学；宋理宗于1227年诏理学“有补于治道”“历万世而无弊”；元仁宗于1313年诏《四书》为科举取士标准，《四书集注》为解释《四书》依据，该规定沿袭至清末科举废止。清康熙于1712年诏编撰《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称朱子“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应该说，康熙的“续绝学”评价很中肯，若无理学接续，儒学就戛然而止了。

当代有学者提出“没有孔子就没有朱子，没有朱子也没有孔子”，我认为这个观点是辩证和唯物的。若无孔子创立儒学，断无后来朱子的“新儒学”；若无朱子传承发展了儒学，那今日的人们也就无从知晓历史上的孔子，或弄清那位孔子究竟说了些什么。

更应当思考的是，如果古代中国走向佛教立国而非“新儒学”治国，今日的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何在？若非理学的滋养，今日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所谓“国学”将是什么模样和根植于何处？今日人们对擘画了中华文明史上那场浴火重生的朱子和理学家们是否应当礼敬？我们要尊重历史，感恩理学构建的以“仁”为核心、融治国和修身于一体的实用哲学，为中华传统文化植入了优秀的文化基因。当代哲学家冯友兰评价朱子“是一位第一流的哲学家”，他说，几世纪来，朱子始终是“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人物”，其在“中国哲学体系的领袖地位”虽曾遭到各种挑战，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没有其他任何学派能够取代。著名学者钱穆则断言：“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

我认为，从《四书集注》问世到清末帝国落幕，朱子理学坚实地维系着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及其文化认同，这是中华文明不中断的重要因素。弄清理学与儒学、朱子与孔子及其彼此间的关系，对于务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

南宋之后，朱子理学在历史转圜中兴衰流变，其思想精华对近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朱子是古代人物，其思想必然带有封建意识形态的烙印，应当剔除；但重要的是弘扬他和先贤们创造的中华文明。

现今，历史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014年，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宣读了朱子当年在福建任漳州知州时为当地白云岩书院题写的门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说的是读书人要两袖清风，胸怀天下，时刻不忘国家兴亡和社稷民生。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谨记此联此意，要心胸开阔、志存高远，为国为民敢于担当。我以为，赋予朱子文化以新时代内涵，仍可作为今日人们振兴中华、奉献人类的精神指引和一面明镜。

朱子四礼关系观念新论

——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中心

王志阳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仪礼经传通解》是朱子晚年主持的大型礼书, 是朱子礼学思想的最后代表作品, 故《仪礼经传通解》当是考察朱子礼学思想的最重要作品。《周礼》《仪礼》、大小戴《礼记》经传地位由《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体系所决定, 其根源则在于《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目的。

关键词: 经与传; 《仪礼经传通解》; 编撰体系; 编撰目的

引论

面对朱子关于四礼之间关系的问题, 学者各抒己见, 尚未定论, 如认为“朱熹的《礼学》以《仪礼》为经, 以《礼记》为传, 以《周礼》为纲领。把《仪礼》作为整个《礼》学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义理, 经传既相分, 又相合”^①。有的则认为“朱子礼学思想是倾向于以《仪礼》为基础的修身之学, 而非以《周礼》为依归的制度之学”^②。

这些观点从论者各自视角阐述了其见解, 虽然言之有据, 且论证过程严谨有序, 但是朱子一生讲学时间长, 学术生命长, 著作等身, 其礼学观点随着学力的变化而呈现变化发展的轨迹。正如钱穆所说:“读朱子书, 当知须注意两事: 一须注意其立言先后, 乃可明白其思想之转变。一须注意其立言异同, 乃可明白其言之或彼或此, 各有所指, 与其融和会通之所在。”^③而现有研究者却忽略了朱子立言先后的思想变化, 导致了其研究观点有失偏颇,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支撑观点的论据往往是朱子与弟子、友人讲学、通信等间接论据, 这些证据虽真实有效, 且反映了朱子在不同时期的礼学思想, 但是在论证朱子有关四礼关系的思想时, 以上学者忽视了这些证据材料的时间局限性。其二, 以《通解》编撰过程中朱子所持的相关设想的言论来作为依据, 存有忽视文本研究的倾向, 难免先入为主的嫌疑, 且得出具有臆断成分的结论。^④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根源是研究者对

基金项目: 武夷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仪礼经传通解》与朱子学派礼学思想衍变过程及其影响研究 (YJ201707)

作者简介: 王志阳, 男,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讲师, 文学博士。

① 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460页。

② 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湖南大学, 2009年, 第57页。

③ 钱穆:《朱子学提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 第116-117页。

④ 蔡方鹿在论述有关朱子礼学思想时直接以《朱子语类》《晦庵先生朱文公集》的材料为依据, 而没有深入《通解》的内部结构来分析, 由此导致了其论证固然严密, 但是难以真实反映朱子编撰《通解》时的真实想法。殷慧的论证过程中所用的论据也与蔡氏相类似, 缺少深入《通解》内部结构来具体考察朱子的礼学思想, 虽可以获得一定成就, 但是终究没有获得朱子礼学思想的全貌。参见《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第434-460页。《朱熹礼学思想研究》, 第92-137页。

文献的时间性和观点可靠性未进行实质考证。

关于朱子所持四礼关系的思想，研究者历来所据文献主要有三方面：《朱子语类》《朱文公集》及《通解》。对于上述三种材料的权威性，古人虽未有全面的论述，但亦有精到评论。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类后序》关于《语类》与其他著作权威性的认识有精到见解，他说：

《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学者类而求之，斯得之矣。^①

李性传的观点虽是针对两组关系而发，即《朱子语类》与《四书》《朱子语类》与朱子其他专著的关系，李性传对《朱子语类》与朱子其他专著的关系言之甚明，而《朱子语类》与《四书》关系，亦是遵循以成书时间先后为判断材料的依据，因为据王懋竑《朱子年谱》，朱子三十四岁完成首部四书学作品，至六十一岁在漳州首次刊印《四书章句集注》，绍兴四年六十四岁时又将修订本在南康刊出，直至去世前三天尚在修改《大学诚意章》，^②其成书远比《朱子语类》来得晚。因此，以观点形成时间为判断材料权威性的依据便是李性传处理文献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我们完全可以“类而求之”，将其推广到朱子的各种文献中，即朱子作品只是代表其成书时的学术思想，而其学术思想是后出转精，当以后成之书者为是，此为不刊之论。^③

综上所述，朱子各种观点出现差异之时，当以其观点形成时间为判断依据。为此，我们可以确定本文所引用的主要文献之间的关系：《通解》成书晚于《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中的绝大多数文献，而《朱子语类》中有少数文献当是晚于《通解》朱子编定部分，可以作为本文研究的有益补充，而《通解》的编撰原因和编撰体例的形成过程可于《朱子语类》《文集》中求解。至于具体文献的采纳与辨析则需要依据其具体时间和文献的证据力来做最后确认。因此，为了避免陷于已有研究中存在证据不足的局限性和主观臆测的弊端，我们将以《通解》所呈现的有关四礼的直接材料为证据来考察朱子关于四礼关系的内在思想理论体系，其他资料均作为佐证。

一、《仪礼经传通解》文本实况：朱子四礼关系思想力证

经，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④而记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⑤，传是“阐述经义的文字”^⑥。经与传注之间从定名时刻起，天生就具有主从关系，其材料在经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注定存在主次之分，由传注来解释经文。朱子本人对经与传注之间的关系虽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在长年讲学中，朱子不断阐述其对经与传注之间关系的见解，《朱子语类》载：

“《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

① [宋]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类后序》，[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56页。

② 据《朱熹年谱》载：“三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而当月“甲子，先生卒”。[清]王懋竑：《朱熹年谱》，何忠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5-266页。

③ 朱子年青之时出入佛道，但是他于绍兴二十八年见李延平，并由此全身心进入儒学。据王懋竑《朱熹年谱》卷一引述赵师夏《跋延平答问》曰：“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问学，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自此之后，朱子从未离开过儒学，由此形成的学术思想日益精密当无可怀疑。参见《朱熹年谱》，第15页。

④ 辞海编撰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3043页。

⑤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王辉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04页。

⑥ 夏征农：《辞海·语词分册：音序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479页。

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文蔚问：“补得如何？”曰：“他亦学《礼记》下言语，只是解他《仪礼》。”^①

本条陈文蔚戊申以后所闻录（1188）。朱子对经与传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直接的概括，即《仪礼》是经，《礼记》是传，传的功能是用于解释经。而经与传、注之间的关系，朱子在《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中有直接的阐述，他说：

李本云：公尝谓：“世之学者，好以新意传注诸经，而常力诋先儒。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其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其语在《诗谱后序》。又谓：“前儒注诸经，唯其所得之多，故能独出诸家而行于后世。”^②

此文所言的传注并非解经的专有文体，但是据许慎《说文解字》载：“又文书亦谓之传。《司关》注云：‘传，如今移过所文书是也。’引伸传递之义，则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而传注、流传皆是也。”^③朱子此处所用正是传注的引申义。虽然此处是朱子转引自欧阳修的观点，但朱子直接引用此文献且无任何补充说明，当可确定朱子本人观点亦是如此，即传注是用于解释经文。以上经与传注观念成为朱子编撰《通解》处理四礼关系的标准。

但是上引陈文蔚所载内容虽是朱子编撰《通解》之前的主观设想，纯属空想或者提纲式规划而已，并未涉及文献具体内容，而《朱子语类》与《晦庵先生朱文公集》的这些内容却往往被当成《仪礼》与《礼记》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最终结论，并由此左右了现代学者《通解》研究思路，主要原因正如叶纯芳所言：

他们讨论的主要根据是朱子的《文集》与《语录》，除了有关片面结构的讨论之外，几乎完全看不到对《仪礼经传通解》具体内容的分析，尽管他们众口一词地认为《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最重要的礼学著作。究其原因，除了学术界向来缺乏分析像《仪礼经传通解》这种经学著作的有效方法，文献本身的问题无疑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④

叶纯芳概括了当前学术界研究朱子礼学思想的瓶颈，即研究朱子礼学思想都是以《文集》或《语类》等外围材料来论述朱子礼学思想，难以深入朱子礼学思想的核心领域，而其内在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缺少分析《通解》的有效研究方法；一是缺乏文献。

在朱子时代，《周礼》《仪礼》、大小戴《礼记》均是官方经学。我们把四礼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内容，这主要居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四礼之间的地位问题，尤其是《仪礼》与大小戴《礼记》之间的关系是朱子时代学术热点问题，也是朱子编撰《通解》所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另一方面，四礼在《通解》中的地位问题亦是当前学术界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尚未达成共识。^⑤由此，考察四礼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本文的第一要务。

四礼在《通解》中的地位问题，孙致文已有深入研究，现将其重要成果全引如下，一来不掩其

①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99页。

②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31页。

③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八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7页。

④ 叶纯芳：《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导言》，杨复再：《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1年，第2页。

⑤ 蔡方鹿认为“朱熹一生重视考礼，以为治国立教、民间礼俗提供依据。在这个过程中，他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领”，这是典型的采用朱子本人《语类》《乞修三礼劄子》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具体深入研究《仪礼经传通解》的孙致文则总结其中的新体例：“在《通解》所建立新的经、传结构中可发现，为了组成新的篇章，朱子改变了传统的经传关系。为了组成新的‘经’，朱子的作法有：（一）移经补经；（二）升记补经；（三）升注补经；（四）掇拾古籍以补经。为了产生组成的‘传’，作法则有：（一）退经为传；（二）升注、疏补传；（三）掇拾古籍以补传；（四）拟古补传。‘拟古补传’则又有：刘敞补传、朱子补传两类。”参见：《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453页。《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4年，第98页。

成果,二来有助于我们后文的论述有序展开。他说:

在《通解》所建立新的经、传结构中可发现,为了组成新的篇章,朱子改变了传统的经传关系。为了组成新的“经”,朱子的作法有:(一)移经补经;(二)升记补经;(三)升注补经;(四)掇拾古籍以补经。为了产生组成的“传”,作法则又有:(一)退经为传;(二)升注、疏补传;(三)掇拾古籍以补传;(四)拟古补传。“拟古补传”则又有:刘敞补传、朱子补传两类。^①

孙致文对以上原则均作了具体论述,并总结朱子编撰《通解》的新成就是“一方面,传统‘经、记、传’的功能,被朱子援用至《通解》;但另一方面,朱子又打破传统典籍原有的‘经、传、记’的属性。因此,在《仪礼经传通解》一名之下,朱子创造了新的经、传、记篇章。”^②在佩服孙致文博士精细研究之余,我们发现孙致文博士虽把《通解》编排四礼的经传关系乃至四礼与其他古籍的材料关系的具体方法概括得极为完整,却缺少系统考察朱子有关经传关系的思想,使其论述过程失之于零散与琐碎,并丧失了进一步考察朱子礼学思想的机会。因此,本文将四礼关系问题为重点展开论述。我们将在孙致文博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通解》朱子编撰部分所呈现的四礼关系为依据,以解开朱子礼学思想。至于四礼与其他典籍的关系,则留待下节再行考论。

正是居于以上原因,我们虽无意于把《通解》当成朱子礼学思想的唯一载体,但是《通解》代表了朱子礼学思想定型后的产品则是毋庸置疑的。以《仪礼》与《礼记》之间关系为例,前文已经有引朱子观点即《仪礼》为经,《礼记》为传。但是在《通解》中却并非每条材料均是以此为原则进行修订,而是各自按照五礼实行过程来进行材料的编撰。为了避免脱离中心论题,我们把《通解》中各条材料的具体组织原则与方法置于后文,本部分重点考察《仪礼》、大小戴《礼记》、《周礼》之间是否存在所谓的经与传注之间的主从关系问题。

研究朱子礼学思想的现有成果虽有细节上的差异,但是其观点均是一致的,即朱子的礼学思想是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③他们所引材料均是源自《文集》与《语类》,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全篇幅引用并一一分析,而是引用他们共同引证的材料。除前文所引《朱子语类》卷八十五陈文蔚所闻录“《仪礼》是经条”外,还有《乞修三礼劄子》,即“《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④。两则材料均被用于论证朱子是以《仪礼》为经,《周礼》《礼记》则是辅助《仪礼》的材料。这几乎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朱子礼学的学者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的基础正如叶纯芳的分析,均是脱离《通解》的实际编撰情况。据我们在引论部分所辨析的材料证据力原则,这些均属于编撰《通解》之前设想的观点,不足以代表朱子礼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只有深入到《通解》的内部体系,才可以看到四礼之间确切的关系。王贻梁在《〈仪礼经传通解〉与朱熹的礼学思想体系》中说:

在论述三《礼》关系时,朱熹反复强调的是:《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看似颇为全面地织成了三《礼》关系新的体系网,但实际上,朱熹始终是以《仪礼》为第一位的,《周礼》置居其次,《礼记》排在第三……因此,朱熹的三《礼》关系体系,应该是以《仪礼》为纲,《周礼》为辅,《礼记》为传。^⑤

①《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第98页。

②《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第106页。

③各方观点的具体表述虽有差异,但是他们的核心思想均是如此,如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等。参见《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453页。《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第245页。

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687页。

⑤王贻梁:《〈仪礼经传通解〉与朱熹的礼学思想体系》,朱杰人:《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

王貽梁通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的《通解》而深入到《通解》的内在编撰体系,其结论初步超越了围绕《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的现有成果的束缚,触及《通解》的内在思想体系,而王氏更为大胆的观点是“《礼记》从一诞生起,就不是专为《仪礼》配套的。汉初戴德、戴圣兄弟把有关礼制的文献收集起来,分别编成大戴《礼记》与《礼记》,与其他任何一部礼经都没有从属关系”^①。他是从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二书成书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入手论证四礼之间关系,而对四礼在《通解》中的地位则持相对稳当的看法,即“《仪礼》为纲,《周礼》为辅,《礼记》为传”。我们赞同王氏的结论,但其处于开拓者地位,尚属拓荒阶段,其论证过程则有待商榷,如《仪礼》《礼记》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已经确定了其经与传注的关系。^②由此可见,《仪礼》《礼记》之间的关系脱离了《通解》的特定环境,他们在经学史上存在经与传注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成立。因此,讨论朱子的四礼关系思想,我们不能脱离《通解》的编撰体系来凭空臆想四礼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仪礼经传通解》编撰体系:礼学材料经传地位确立条件

《通解》是朱子晚年未完成的作品,也是朱子礼学思想最为成熟的代表作品,其所呈现的经传关系是由礼学材料本身于《通解》编撰体系中的功能所确立的。

诸多论者经过研究肯定《仪礼》是被朱子当做礼经来看待,但是在《通解》中具体情形如何,则因研究者尚未深入研究《通解》而被概述论之,尚缺少具体分析论证过程。孙致文博士对此有独到的看法,他说:

今日所见《通解》的编排法,虽然仍秉持以《礼记》阐释《仪礼》的理念,并以“《冠义》附于《士冠礼》之后”的类型排纂;但配附时,《礼记》原篇已被拆散……《通解》中的《冠义》篇,仅次于新编次后的《士冠礼》篇;确实具有“以传配经”的面貌。然而《通解》《冠义》一篇于篇首,先低一字以“传曰”起始,引用《礼记·郊特牲》一段文句,其后正文又由多种典籍相关文句组成……由此结构看来,《通解》中的《冠义》篇,不但具有《士冠礼》的传得性质;另一方面,《冠义》又自有经、传之分。在引录格式上,新产生的《冠义》篇,与由《仪礼·士冠礼》分章编次而成的《士冠礼》篇,齐头等高。这似乎又模糊了《通解》中《士冠礼》《冠义》两篇之间经、传的关系。^③

我们于此详细引录了孙致文的观点,他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研究者历来忽视的重大问题,即《通解》的具体编撰过程与朱子编撰前对礼书的设想之间存在极其巨大的差异。虽然孙致文博士只是举《冠义》与《士冠礼》之间的经传关系,但是我们认为孙致文博士的观点在《通解》中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证据材料,完全可以成立,而令人可惜的是孙致文博士受朱子编撰《通解》前与其友人书信或者讲学中所言《通解》有经、传之别的内容体系影响,仍旧在《通解》中硬是划分出其所认

① 《〈仪礼经传通解〉与朱熹的礼学思想体系》,《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第296页。

② 《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班固自注:“后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又孔颖达疏《礼记》曰:“郑君《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又案《儒林传》云:‘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孟卿,东海人,事萧奋,以授戴德、戴圣。’《六艺论》云:‘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此所传皆《仪礼》也。《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参见[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9页;[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③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第95页。

为的经、传关系的各篇,^①其依据标准是“从《通解》结构看来,‘上、下’表示两篇具有‘经’‘传’的关系”^②，“凡于篇次标以‘下’字者,即属该篇次‘上’的‘传’。其他各篇(包括各篇次‘上’,及未分上下者)即属于经”^③。孙致文博士由以上的分析得出其结论:

《通解》自有一套经、传的认定,而非只是简单地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④。

综观其论证过程,看似论证严密,结论合理,但是孙致文在此当中虽然贯穿了其经传区别的原则,即“原先‘传’‘记’都是记事立论的著作,以区别于周公所著的典章制度。汉代以后为了推尊圣人,因此以‘经’称圣人的著作;并称阐述‘经’的所见所闻‘传’。由此,经、传又具有主从关系。赵翼《陔余丛考》‘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⑤只是他疏忽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通解》中虽有以上这种通篇内容分为上下之间关系的差异,但是更多篇章的情况并无如此区别,如属于《家礼》的《内则第五》《内治第六》《五宗第七》《亲属记第八》;属于《乡礼》的《投壶礼第十一》;属于《学礼》的《弟子职第十八》《少仪第十九》《曲礼第二十》《臣礼第二十一》《诗乐第二十四》《礼乐记第二十五》《书数第二十六》(今缺)《学记第二十七》《大学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第三十》《践阼第三十一》《五学第三十二》共18篇之多,占到《篇第目录序题》中所提及的42篇的四成多。据孙致文博士的观点,这些将近一半之多的篇目均是经文,而他们又均没有传,与这些篇目中属于讲究礼义内容的篇章如《亲属记第八》《礼乐记第二十五》《学记的第二十七》等,和孙致文所言的讲究礼仪的经文之间又形成鲜明的反差。如此多的例外,已然导致孙致文所总结出来的原则形同虚设,不具有普适性功能。

孙致文的论证材料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却存在有如此多的反例,那么孙致文的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由前文所引孙致文的观点及其论证材料,再次分析其论证过程,我们发现孙氏的论证过程存在明显脱节和臆测成分,即“这似乎模糊了《通解》中〈士冠礼〉与〈冠义〉两篇之间经、传的关系”与朱子标明“上、下”的篇章之间的经传关系,孙致文仍旧缺少深入《通解》内在结构加以分析的过程,导致了例外的篇章与其总结的规律适用的篇章之间大体相当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孙致文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即《通解》的篇与篇之间并不存在经传关系,而是各篇文献本身就是具有经传关系的集合体。只有如此才可以解决孙致文前文所怀疑的内容,即《士冠礼》与《冠义》等标明“上”“下”的篇章之间的关系不是经、传关系,而是各自均为经传的集合体,并无从属关系,他们是从不同角度说明同一礼仪的姊妹篇而已。

至于经传关系的内容是否完全消失了呢?显然不是。正如孙致文前文所述,《士冠礼》《冠义》中均有经、传。这可推及《通解》全文。这绝非我们主观臆断的结论,而是由朱子的礼学观念推导而得的结论。这便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观念。《朱子语类》载:

胡兄问礼。曰:“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

① 孙致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全列出其所认为具有经、传关系的各篇,我们将其内容转引对照如下:《士冠礼》与《冠义》;《士昏礼》与《昏义》;《士相见礼》与《士相见义》;《乡饮酒礼》与《乡饮酒义》;《乡射礼》与《乡射义》;《学制》与《学义》;《钟律》与《钟律义》;《燕礼》与《燕义》;《大射礼》与《大射义》;《聘礼》与《聘义》;《公食大夫礼》与《公食大夫义》;《诸侯相朝礼》与《诸侯相朝义》;《觐礼》与《朝事义》;《历数》与《卜筮》;《夏小正》与《月令》;《乐制》与《乐记》。案:除了此处的《钟律义》落下一个字外,本文已全引其经与传关系的各篇篇名,其中前者为经,后者为传。参见《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第97-98页。

②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第97页。

③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第98页。

④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第98页。

⑤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第91页。

尔。孔子从先进，恐已有此意。”^①

此条为沈憺戊午（1198）以后所闻。这条记载历来均被当成是朱子礼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即朱子的礼学思想是要随时代变化而更新礼仪。可惜的是诸多学者对此条内容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没有深入研究其背后的重要问题，即朱子设想如何来落实礼仪的时时更新问题。事实上，朱子对随时代更新具体礼仪的方法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即仿古礼制作的本义来制定新的礼仪。他说：

古礼于今实难行。尝谓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番，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尽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②

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缛，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习熟，不待家至户晓，皆如饥食而渴饮，略不见其为难。本朝陆农师之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求其义。岂知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并存，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所谓“三千三百”者，较然可知，故于此论说其义，皆有据依。若是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二存者，如何悬空于上面说义！是说得甚么义？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着实，方可推明其义。若错综得实，其义亦不待说耳自明矣。^③

前条为黄义刚癸丑（1193）以后所闻录，后条为叶贺孙辛亥（1191）所闻录。前者说不必尽如古人之礼，只要模仿古代礼仪的大义来整理后世礼仪。后者认为不必在意古代礼仪内在的礼义，而只要专注于古代礼仪就可以了。这两条语录的礼学思想正好相反，但是令人深思的是这两条完全相反的观点却在《朱子语类》中编排在相邻位置，我们虽无足够文献来断定这是宋人对朱子礼学思想的理解结果，但是这两条语录的排列位置客观上帮助我们看清朱子礼学思想的不同侧面，而这两个侧面正好和谐地共存于《通解》当中。前条是重视各种礼义，后者则是重视古代礼仪。两者均服务于《通解》的编撰目的。朱子编撰《通解》的目的完全体现在前引《乞修三礼劄子》中，即一是要恢复《仪礼》的经学地位，二是要扭转因当时不了解礼仪的内在礼义而造成无从得知礼仪的产生根源的困境。与此编撰目的相对应的体例安排便是《通解》前有礼仪，后有礼义。事实上，这两者才完全构成一个完整礼学体系，而非传统经学中的经与传注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解》中的礼仪是朱子尊重古代礼仪而避免悬空谈礼义思想的体现，而后者则是发明古代礼仪的内在礼义，从而为现实制定实用礼仪提供理论指导，达到其所要求的“放古之大意”。这两者相结合的目的并非如传统经学所言经与传之间的关系，更非经与传归属与地位的问题，而是着力于礼学的实用目的而做此体例安排。因此，我们解决了孙致文博士所概括的规则之外所存大量例外现象的问题，并把《通解》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而非人为割裂《通解》内在结构而臆测其中的规律。

正是《通解》中的经与传关系已非传统经学的经与传的关系，而是每篇之内均存有经传关系。篇与篇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传统经学中经与传的关系，而是由其礼学的实用目的来进行编排，如上文所说的“上、下”篇之间的关系。至于无古代礼仪的篇章则直接以古人说礼而留下的礼义为篇章而服务于制作礼仪的现实目的。至于《通解》中的每篇文章内的经传材料来源问题，另文详细讨论。

三、四礼无经传关系成因：《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目的

四礼的经传地位由服务于《通解》的编撰体系而确立，实则根源于《通解》的编撰目的。《通

①《朱子语类》，第2877-2878页。

②《朱子语类》，第2877页。

③《朱子语类》，第2877页。

解》的编撰目的在朱子《乞修三礼劄子》中已言之凿凿，而其距离《通解》的正式编撰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当为可信。这个编撰目的决定了《通解》的编撰体系是以追溯礼仪来源及礼仪内涵为目的，而这必然决定了各种礼学材料依据其内容而确立各自的经传地位。

首先，《仪礼》的残缺不全使得朱子不得不大量补充大小戴《礼记》《周礼》中的文献进入《通解》的经文范围。

朱子编撰《通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礼乐崩坏。《乞修三礼劄子》曰：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辑，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①

正因礼乐崩坏，且现存并无完整的礼书，而三礼则仅为“颇存”而已，尚有缺失，由此才使得朱子要编撰《通解》一书。至于三礼中的《周礼》《仪礼》、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则是决定了其具体安排编撰内容而已，其最为重要的原因依旧是三礼资料不全。以朱子最为重视的《仪礼》一经为例，朱子念念不忘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五十六篇本。《朱子语类》载：

先王之礼，今存者无几。汉初自有文字，都无人收拾。河间献王既得雅乐，又有礼书五十六篇，惜乎不见于后世。是当时儒者专门名家，自一经之外，都不暇讲，况在上又无兴礼乐之主。故胡氏说道，使河间献王为君，董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则汉之礼乐必兴。这三个差除，岂不甚盛。^②

朱子对五六十篇本的《礼书》甚为在意。不仅此处有“惜乎不见于后世”之念，更是因此书之失传，而言及现有《仪礼》之内容的不足问题。《朱子语类》载：

上古礼书极多，如河间献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后来藏在秘府。郑玄辈尚及见之。今注疏中有引援处，后来遂失不传。可惜！可惜！《仪礼》古亦多，今所余十七篇，但多士礼耳。^③

此为沈僩戊午（1198）以后所闻。因对五十六篇本的礼书的遗失存有强烈的可惜之情，而现存《仪礼》则仅有十七篇，且多士礼，并不完整。与此同时，朱子对《仪礼》的内容性质亦不甚满意。《朱子语类》载：

陈振叔亦尽得。其说《仪礼》云：“此乃是仪，更须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类，是说大经处。这是礼，须自有个文字。”^④

此文为叶贺孙辛亥（1191）以后所闻。朱子完全同意了陈振叔的观点，《仪礼》是仪，只记载行礼的威仪而已，并非完整的礼书。所以非常有必要在《仪礼》基础上对其进行修订，补充“大经处”的文字。清儒皮锡瑞非常敏感地发现了朱子上述所言内容，他在《经学通论》引用了上述内容之后注曰：

《仪礼经传通解》有《王朝礼》即是说大经之文字。制度虽不可略，然不如冠昏丧祭之礼可以通行。^⑤

皮锡瑞的观点已经点出了《仪礼》所缺少的内容之一是《王朝礼》中的制度。但是《王朝礼》只是皮锡瑞氏所举的一个例子，还不足以完全概括朱子上文引陈振叔的观点，即《仪礼》仅是仪，缺少与仪相配合的大经文字。至于“大经”文字的具体内容，皮锡瑞举《王朝礼》已经看到了朱子编撰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687页。

②《朱子语类》，第2898页。

③《朱子语类》，第2899页。

④《朱子语类》，第2900页。

⑤中华书局本《经学通论》为“《礼仪经传通解》”当误，现径改。[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第13页。

《通解》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仪礼》的不足之处了，则皮锡瑞隐含的另一层意思便是《通解》现有内容在《仪礼》篇目之外的内容均可以当作朱子所要补充的“大经处”。这绝非我们的主观臆断，因为上文沈憺所载朱子观点所言内容是可惜现有《仪礼》为士礼，未涉及天子、诸侯、大夫等各层人士的活动内容，而与之相关的《通解》补充的内容亦正是吸收了《周礼》、大小戴《礼记》中的此部分内容，另外，我们在《通解》朱子编撰部分亦可看到《仪礼》固有篇目内容很少添加其他内容，更多的是增加《仪礼》原本所没有的内容。

与《仪礼》中的内容属于威仪不同，《周礼》、大小戴《礼记》中则有许多皮锡瑞氏所言的“制度”文字，尤其是《周礼》，而我们前文所言的小学制度等内容亦可在《礼记》中找到内容，如《大学》《中庸》等篇目。

因此，《仪礼》缺少了《王朝礼》等内容促使朱子采纳了《周礼》、大小戴《礼记》等内容，而其内容进入了经的范畴则属水到渠成之事了。

其次，《仪礼》的经记合体的形式决定了《仪礼》与《周礼》《礼记》在具体编撰过程中礼学资料的地位平等性。

《仪礼》一书原名为《礼记》，后因大小戴《礼记》被命名为《礼记》，故《仪礼》的《礼记》一名为大小戴《礼记》所夺，此为经学史的常识，无需我们置喙。细考《仪礼》亦可发现其文中有经有记，单《仪礼》一经已有经与记的区分，而朱子在编撰《通解》的过程中有拆分《仪礼》的记文，或者提升《仪礼》的记文为经的情况，如前文孙致文所言“升记补经”便涵盖了此种情形。

在上述过程中，朱子已经打破了其本人在《朱子语类》及《乞修三礼劄子》中所言的原则，即打破了《仪礼》整体文献为经的原则了。朱子之所以能够打破《仪礼》为一整体文献的情况的依据是他认为《仪礼》中的文字并非全是孔子所为。《朱子语类》载：

子升问：“《仪礼》《传》《记》是谁作？”曰：“《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

子升云：“今《礼书》更附入，后世变礼亦好。”曰：“有此意”。^①

此条为钱木之丁巳（1197）所闻。朱子于此处语录虽未言及所说内容，但是我们细考《仪礼》可知，《仪礼》经文有传的篇章仅有《丧服》，而记文则是各篇内容均有，既然传与记的内容为子夏与子夏以后人作，则其文献的地位当然与《周礼》、《礼记》文献相差无几了。

由此可见，在朱子的文献思想中，《仪礼》中的文献并非均属经文，仅属保存礼学内容的典籍之一而已。因此，《通解》移动《仪礼》中的内容构成新的文献，由此而形成了《周礼》《仪礼》、大小戴《礼记》在实际编撰过程中均是拆分再次重构的情况，^②并由此构成《通解》的礼学资料库。

当然，《仪礼》是“古全书”^③，所拆分的内容较少，基本保留了现有《仪礼》的篇目的主体内容，只是移动了其记文的位置而已。虽然少，但是这仅意味着朱子较为认可《仪礼》的固有内容较为适合《通解》礼学体系而已，并不是代表《仪礼》为经的地位，因为《周礼》《礼记》经过拆分之后亦构成了《通解》的经文与传文等多处文献的内容，并未与《仪礼》中的材料使用方法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异。

①《朱子语类》，第2899页。

②拆分《周礼》一事是朱子早已言之。《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四有言：“《周礼》自是全书。如今礼书欲编入，又恐分拆了。《周礼》殊未有所处。”朱子在此虽担忧分拆了《周礼》，但是我们细考《通解·王朝礼》可见，《周礼》被逐条拆分，成为《通解》各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于本非属于一书的《礼记》，朱子更是在《朱子语类》中多处言及可以拆分了。如《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四云：“若《曲礼》《玉藻》诸篇皆战国士人及汉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内则》是成书要好。”则朱子从《礼记》本文则认为诸多篇章本属战国时人及汉儒汇编古代礼学资料而成，拆分其内容则更无任何障碍了。细考《通解》中的内容亦可佐证我们的判断。参见《朱子语类》，第2888页。

③《朱子语类》，第2888页。

再次,《周礼》《礼记》文献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与《仪礼》之间地位的不确定性。

《乞修三礼劄子》中所言《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的单纯情况并未发生,因为朱子在《乞修三礼劄子》中所言内容均以《仪礼》《周礼》、大小戴《礼记》为整体来看待,但是我们从上文《仪礼》的情形已经可清晰了解到其文本已经分为了经文和传记两部分内容了,而朱子在处理记文时又移动其位置,并有提升为经文的情况,而比《仪礼》更显复杂的是《周礼》《礼记》的文本情况。朱子认为《周礼》的内容并非单纯为礼学资料,而仅是礼之条目。《朱子语类》载:

“《周礼》自是全书。如今《礼书》欲编入,又恐分拆了《周礼》,殊未有所处。”因说:“《周礼》只是说礼之条目,其间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则’‘三易’‘三兆’之类,须各自别有书。”^①

此条由木之所闻录。朱子认为《周礼》只是说礼的“条目”,与《乞修三礼劄子》中所言“纲目”大体相同,但是《周礼》中又有其他非礼学的资料,如“八法八则”“三易三兆”的内容,亦符合《周礼》的实际情形,而朱子此条文献前半部分担忧拆分《周礼》,后半部分则言及《周礼》非全部礼学资料,则已经为《通解》后来采纳《周礼》中的礼学资料的方法埋下了伏笔,即删除《周礼》中与礼学无关的资料,而礼学资料则依据《周礼》各官职务内容进行归类于《通解》文献中。当然,我们并未从《朱子语类》《晦庵集》中看到朱子有此方法的论述,但是我们在《通解》中随处可见《周礼》的资料以各官的职责为单位进行划分,如《王制之丙王礼》《王制之丁王事》、《王制之戊设官》等。

《周礼》尚属全书,而《礼记》则是直到汉代才成书,其中的内容驳杂程度为三礼学之最,朱子对《礼记》的文献情形甚为清楚。《朱子语类》载:

问礼书。曰:“惟《仪礼》是古全书。若《曲礼》《玉藻》诸篇皆战国士人及汉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内则》是成书。要好,自将说礼物处,如《内则》《王制》诸篇附《仪礼》成一书,如中间却将《曲礼》《玉藻》又附在末后;不说礼物处,如《孔子闲居》《孔子燕居》《表記》《缙衣》《儒行》诸篇,却自成一书。《乐记》文章颇粹,怕不是汉儒做,自与《史记》、《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语》中说话犹得……”^②

此条为叶贺孙辛亥(1191)以后所闻。此条文献中所言内容,所谓“附《仪礼》成一书”“又附在末”仅是概括言之,且具有空想成分,因为我们现在以上述内容按之《通解》朱子编撰部分可知,并无全文附之于后的情形。但是此条文献仍旧具有极高价值,因为朱子在此把《礼记》中的内容分为了三种,其情况的复杂程度已远超过了《周礼》《仪礼》的情况了。由此形成了大小戴《礼记》在《通解》的编撰过程中被分割为经与传记各部分内容均有的情形,而这与《周礼》《仪礼》的情形亦无实质性的差异了。

^①《朱子语类》,第2889页。

^②《朱子语类》,第2888页。

朱子学研究的新视野

——德国“朱熹与朱子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瑞荻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2018 年 7 月 13 至 15 日, “朱熹与朱子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召开。30 多名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朱熹及其历史世界”“朱熹思想之溯源”“义理的诠释与运用”“朱子学的传播和流变”等讨论主题展开讨论, 涉及经学、史学、文献学、哲学、礼学、文学等研究领域, 实现了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关于朱子学的对话与沟通。

关键词: 朱子学; 思想渊源; 义理诠释; 传播流变

2018 年 7 月 13 至 15 日, “朱熹与朱子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欧洲儒学学会、中国朱子学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由德国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德国儒学学会协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剑桥大学、特里尔大学等单位的近 30 名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本次盛会。与会学者讨论了许多具体的问题, 涉及经学、史学、文献学、哲学、礼学、文学等研究领域, 实现了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关于朱子学的对话与沟通。总而言之, 会议可以分为“朱熹及其历史世界”“朱熹思想之溯源”“义理的诠释与运用”“朱子学的传播和流变”四个讨论主题。

一、朱熹及其历史世界

朱熹生活在南宋, 通过不同学科视角与方法去还原朱熹所处的历史环境, 以及在此环境之中的活动与交游情况, 有助于我们更加正确、全面、深入地了解朱子的思想。还原的工作首先面临的的就是材料的准确性与适用性问题, 这就突显出文献学对于朱子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极尽考证之功, 一举厘清张栻《太极图解序》及《后序》之版本源流, 指出《朱子全书》中所收录《后序》的舛误根源在于宋刻《元公周先生廉溪集》, 并利用已发现的文献对两篇序文做了版本学与校勘学上的再现, 颇具学术价值。

朱熹对当时礼制的变革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杨华教授探讨了朱熹对宋代乡饮酒礼中宾、主、僎、介之座位与秩序的改革, 认为这一变革反映了宋代地方按察使的职能衰变过程, 也是南宋添差之类冗官骤增以后, 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折射。厦门大学哲

学系的和溪博士后对朱子《家礼》的婚服进行了详尽考证，认为宋代男子婚服应为公服，女子则着红色大袖衫，红色长裙，同色盖头，而命妇会在礼服外加佩霞帔，霞帔同衣色，体现了宋代服饰与前代不同的审美风格。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的BANWO Adetoro博士则通过《家礼》探讨朱熹的伦理学，分析了朱熹对于女性及其在家庭中角色的看法，认为他所制定的《家礼》对正统儒家的规范和准则进行了改良，以此寻求一种道德培养与全面教育的家庭生活。

与师友门人的交游，也是朱熹历史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德国明斯特大学汉学系的于宏教授分析了朱熹为门人所拟定的《策问》《白鹿书堂策问》和《策试榜谕》的特点，并分析了朱熹有关策试之论述，认为策问是朱熹对儒家学说在社会教育与国家官员培养选拔上的具体表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黎江南博士研究了朱熹与陈亮关于《抱膝吟》的往来信札，认为朱熹对于诸葛亮与“抱膝”的态度在“王霸义利之辨”后发生转变，他以此区分自己与陈亮的差别，在社会关系、学术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将陈亮排斥在“吾道”之外。

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朱人求教授综合考察了宋代酒制、《朱子家礼》与朱熹的交游诗，还原了一个理性与诗性交融的朱熹形象。他指出，礼与酒、诗与酒、道与诗酒的关系反复碰撞，经过激情、诗性、醉狂、想象与生命的交融，最终形成了朱子既具理性精神、又富有生命情感的浪漫主义诗酒情怀。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思羽博士则从朱熹对诗说纠结反复的态度出发，指出其相互抵牾的说词来源于情与理、诗与思之间所具有的逻辑冲突。他将朱熹的诗歌创作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以此挖掘朱子思想由外物转化为内心的历程，呈现出朱子理性道德与感性审美相互融合的精神境界。

二、朱熹思想之溯源

朱子学综罗百代而呈现出万千气象，因而对朱熹思想的溯源工作是朱子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武汉大学的张昭炜教授关注朱熹的“主静”思想，认为“主静”思想大体上有七个来源，分别是《太极图说》、道南指诀、《周易参同契》、屈原的《远游》、孟子的养夜气、《易传》的洗心退藏以及佛教的天台止观法。

“道统”的建构问题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苏费翔教授对这一建构过程进行了讨论。他从书院记与祠堂记的角度，对张栻的“道统”思想、其与书院的关系以及其与朱熹“道统”观念互动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苏费翔教授认为，张栻比朱熹更早将“道统”和周敦颐的思想放在“书院记”中，他以“仁”为本的道统思想与朱熹以“中”与“心”为本的说法相异，朱熹是沿用了张栻所发明的做法而加以发展。台湾清华大学的林保全教授则以王安石和程颐的经筵理论为中心，认为王安石赋予经筵具有议论时政功能，程颐则主张经筵应该是辅养帝王成就君德的场域，而朱熹承继了二者的观点，有意识地将经筵称为“帝学”或“帝王之学”而推重之，并将其纳入到自身构建的“道统”视野之下，使得道统论述与建构上原本就存在的“道统”与“治统”（道学统绪与帝王之位）的关系更加复杂。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翟奎凤教授着眼于朱熹的“鬼神观”，他考察了北宋儒者周敦颐、张载、程颐、谢良佐对“神”“鬼神”的议论以及朱熹的引述与解释，认为朱子鬼神观之形成正是建立在与这些前辈的深入对话的基础上，继而由陈淳进一步发挥与诠释。由于朱子的巨大影响，北宋大儒的这些言论在人们的反复引述中获得了经典性。

《太极解义》在朱熹的思想历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为他提供了实现后期学术更为

宏大发展的基础，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殷慧教授认为，朱子的太极诠释主要借助了《系辞》和《中庸》，带有很强的综合创新的特色，这与同时代人关于太极的经典诠释形成了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朱陆之辨以及朱熹晚年，影响十分深远。

三、义理的诠释与运用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有许多关键的概念和命题，后世学者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知识背景以及不同的问题和语境之下，所做出的诠释各不相同。而在多样的诠释之中，同时蕴涵着当下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正是基于诠释与运用的交互关系，许多新认识和新思想得以开出，朱子学研究得以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

“格物”是《大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朱熹在此字义和义理上花费了很大功夫。南昌大学的田炳郁教授考察了朝鲜中期学者权得己（1570-1622）和朴知诚（1573-1635）对“物格”解释的论辩，他们把“格”“至”“到”统统解释为“至极”，并认为字面解释其实省略了“思索”的具体活动。田炳郁教授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有助于了解朱子格物说的训诂、语法上的基本立场，而且有助于了解朱子学说的认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金刚助理研究员所关注的是朱熹的自然哲学，他提出，朱子对生活世界的解释是从其哲学基本原理出发，而不是从现象本身出发，我们不能仅以今天的科学观判断朱子观点正确与否，应当看到他的解释与其哲学逻辑的关联，看到他论述背后的理性精神。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BRYS Waldemar 关注到英语学术界对朱熹之“理”存在“一理论”（One Li Thesis）与“双重本体论”（Two-levels Ontology）的解读，“一理论”认为“理”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衡地遍布于万物之中，“双重本体论”则分出“具体之理”和“普遍之理”的概念，他认为二者均不能得到文本的支持，而应从“实在论”出发才能更好地解释“理”的概念。

爱沙尼亚孔子学院的朱璐教授在正义、公私、义利关系等关涉社会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经济制度的命题中讨论朱子的正义思想，认为朱子的“德性正义”来源于“天理”，并主张通过“正君心”达到符合天命人心的“政治正义”，倡导复古井田、创立社仓以践行“经济正义”。剑桥大学的乔毅博士围绕《朱子语类》中朱子论“弘毅”的内容进行考察，主要探讨了朱子所谓“包容之中，又为判别”的思想。他认为，这一思想作为儒家思想普遍性的体现，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兼具宽广与批判的普遍价值。

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张喜雯教授基于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继续深入思考，认为“内圣”之学在逻辑上不必然开展出“外王”之道，但是“外王”却不能没有“内圣”作为基础，他认为，宋代理学社群“道德理想”之共识的缺失，或许能为今日世界“民主制度之吊诡”提供一个合理的解答。

四、朱子学的传播与流变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朱子学的传播与流变，朱子后学、东亚朱子学、朱子学全球化等主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王宇教授认为宋元朱子后学将“亲相授受”的师承模式等同于道统的传承，

因而形成了对本师的造神运动，造成朱熹在朱子学内部地位的持续下降，最终导致元代朱子学的式微与没落。他所研究的史伯璿（1299–1345）本人正是这种现象的批判者和预言者。台湾清华大学华文文学研究所的丁威仁教授由朱子心、性、情三分的诗歌本源论、格物涵养内外二元的创作论、内圣外王的功能论与讽诵涵泳的批评论四大系统范畴出发，讨论明初诗家如何继承朱子的诗学理论，藉此呈现朱子诗学对于明初（主要是洪武至建文时期）诗学的影响。伦敦大学的 BUSKUEHL Christian 则在朱熹用“气”之聚散来解释生死的理论中看到了一个道德疑问，即其无法论证对已故先祖恪守孝道的必要性。他认为，这个问题使得新儒家学者们对“气”的理解与佛教的轮回思想非常相似，模糊了儒家和佛教之间的界限，最终在明代末期彻底改变新儒家思想的方向，朱熹的理论也由此走向歧途。苏黎世大学的 WINTER Marc 教授通过清代学者戴震对朱熹的批评以及方东树对戴震的批判，探索了清代中晚期儒家内部争论的核心问题。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文碧方教授认为，朱子学是朝鲜儒者进行讨论与辩难的存有论前提，同时也轨约着他们言说与义理的脉络。他考察了朝鲜儒者“四七之辩”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李退溪与奇高峰的辩论，第二阶段是李栗谷与成牛溪的辩论，李退溪认为“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成牛溪以朱子的“人心道心”为其辩护，而奇高峰与李栗谷皆基于朱子理气论，以四端七情为理气之合。朝鲜儒者的论辩方式使朱子学日趋精微，从而将朱子学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日本京都大学的李静博士选取朝鲜王朝的代表儒者宋时烈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典型知识人不干斋·巴鼻庵作为比较对象，讨论了朱子学对前近代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她认为，宋时烈等朝鲜重臣面对清朝这一“他者”时以“小中华”自居并积极主张“北伐”，不干斋·巴鼻庵在基督教这一“他者”传来时选择先改信后弃教，均是受到朱子学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目前学界尚未注意到此点，值得深入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以新助理教授以卜道成（Joseph Percy Bruce）、陈荣捷（Wing-tsit Chan）与维腾伯尔尼（Allen Wittenborn）对朱熹“理”概念的英译为例，透过叔本华把语言学习视为想象新概念场域的论点，讨论这些译者如何在翻译朱熹思想的活动中想象与创造新知识，如何借朱熹思想与西方传统的跨文化对话来开创性地发展朱子学并将其影响力全球化，更在此间逐步转变中西思想中主要知识范式（如经学或 philosophy）的想象与定义方式。

会议结束后，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中国朱子学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携手成立了“特里尔大学朱子学研究中心”，并进行了简短的挂牌仪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朱人求教授、和溪博士后代表中国朱子学会给中心赠书，朱子学会顾问朱杰人教授为中心赠送朱子画像和《朱子家训》、朱子诗词书法。台湾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朱高正先生在闭幕会上致辞，他说：“朱子诞生 888 周年，马克思诞生 200 周年，在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大学成立朱子学研究中心，意义非凡，预告新儒学与马克思先进经济社会学说的融合，将揭开中华文明成功进入第三周期的序幕，奠定中华民族再度全面复兴的基础！”这是中国朱子学会在海外正式成立的第一所朱子学研究中心，是为朱子学研究走向世界而搭建的第一个国际平台。因此，本次会议展现了朱子学研究的诸多面向，呈现出俱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特点，为进一步加强中西方优秀文化的相互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通过中外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朱子学研究将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

“朱子学的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冯 兵

(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福建 泉州 361021)

摘 要: 2017 年 12 月 15 日—18 日, “朱子学的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厦门市筭筭书院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与会学者就朱子学与经学、朱子学与四书学、朱子学的义理新探索、朱子学的海外传承与研究等主题展开了精彩热烈的发言与讨论。

关键词: 朱子学; 经学; 四书学; 义理新探索; 海外传承

2017 年 12 月 15 日—18 日, “朱子学的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由华侨大学与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 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以及福建省闽学会、厦门筭筭书院合作承办, 在厦门市筭筭书院学术交流中心顺利召开。

开幕式上, 福建省闽学会会长兼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福建论坛》杂志主编黎昕教授针对目前朱子学的研究现状做了简要勾勒, 认为今天的朱子学研究论题愈发多元而且深入, 在朱熹的经学、四书学、海外传播等领域都有较多的创发。随后的分组讨论中, 与会学者也纷纷就朱子学与经学、朱子学与四书学、朱子学的义理新探索、朱子学的海外传承与研究等主题展开了精彩热烈的发言与讨论。

关于朱子学的海外传承与研究, 来自德国特里尔大学 (Universität Trier) 的苏费翔 (Christian Soffel) 教授分析了欧洲学者从 17 到 19 世纪对宋明道学家的看法与其中的种种变化及其现代价值。同时介绍了 *confucianism*、*neo-confucianism* 等词语的来源与早期的用法。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的潘朝阳教授则介绍了台湾的朱子学及其现代问题, 潘教授先说明清康熙以后在台湾建立的朱子儒学教化内容, 继而论述了 1949 年之后当代新儒家在台湾的儒学包括朱子儒学研究的思想高度, 认为在今天的台湾面临着上下双重隔离的危机或困境。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方旭东教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史甄陶教授分别对日本学者佐藤一斋以及韩国儒者朴文镐的朱子学思想展开了细致的梳理, 对与会者有关日韩朱子学历史发展的了解大有裨益。其中方旭东指出,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代表性的儒学者佐藤一斋之学深受朱子学的影响, 其《孟子栏外书》实可以为今人了解明清尤其是中晚明的四书学提供一个重要指引。史甄陶以韩国十八世纪著名的“湖洛论争”中属于韩元震一系的儒者朴文镐的“性”论为主要研究对象, 认为朴文镐不仅有自己的性论体系, 同时也将诠释的触角延伸到《五经》的领域, 一方面补充朱熹解《经》不足之处, 同时也提出了与朱熹不同的观点, 而“性四层论”则是其性论的核心, 显示出他重视现实经验却鲜少从宇宙论或心性论角度论证的特点。

作者简介: 冯兵, 男, 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 博导, 哲学博士, 厦门工学院国学院兼职教授。

本次会议的主题中较为引人注意的，还有新加坡学者林纬毅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海波教授、广西财经学院的陈林教授和聊城大学的延玥博士从不同视角对朱子“中和”问题的集中讨论。高海波与陈林分别就朱子“中和”新旧说中的已发未发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工夫论转向问题展开了探讨。陈林认为朱子的“中和”新旧说中存在着体用论的有无与变化问题，高海波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两说中均涉体用，只是性质有所不同。林纬毅和延玥则对朱子“中和”说的现代启示与价值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林教授对朱子“中和”新旧说要义的总结得到了在座学者的称许。他指出，朱子中和旧说内容的要点有：一、就天命流行之体不息之迹说未发已发；二、以未发为性、已发为心；三、致察操存天理本真以致中和。朱子中和新说大抵有以下两点要义：就喜怒哀乐之情说未发已发，而由心之寂然现性之浑然；静养动察是朱子中和新说的工夫论。

此外，厦门大学哲学系的乐爱国教授、南昌大学哲学系的许家星教授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翟奎凤教授围绕朱子的“四书”学做了集中探讨。其中，许家星指出，朱子《四书集注》确立了新的经典范式，其改注大致有两类。而朱子既引其文复改其说之作法，既反映了朱子与二程学派之异同，亦体现了其经典诠释述作兼具、汉宋一体的综合性与创新性，展现了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内在一体性。乐爱国则对朱熹《论语集注》中关于“自行束修以上”一句的诠释及意义进行分析，指出：对于《论语》所谓“束修”，朱熹在以往儒家从“礼”的层面进行诠释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理，把“束修”诠释为“心”，表达为心意，又阐发了朱子所论“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的待人之道。翟奎凤以朱子学为中心讨论了宋儒对《大学》篇中“至善”问题的思考，认为朱子将“至善”看作了“事理当然之极”，是“极好”“十分好”。而朱子论“至善”强调的是具体实践和修身工夫，是“至善”的具体展现和落实。

在第一组下午的讨论中，学者们对朱子学的讨论多从比较的视阈展开。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肖永明教授以《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为题，指出：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对朱熹、张栻二人来说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但朱子门人后学们基于其道统观念，则分外强调朱熹的主导作用。随着朱子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一叙述逐渐为更多士人所接受，遂演变为历史“事实”。而对“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林乐昌教授以程朱批评性诠释为中心考察了理学中的“清虚一大”之辨，其着重从字义简释、纲领参照、概念辨异、误释原因等方面进行再诠释。林教授认为“清虚一大”概念彰显了张载致力于为儒家建构形上学和本体论的努力，其辩涉及程朱对张载太虚本体论和天道生成论的误释，以及张载与程朱在一系列理学概念理解乃至思想体系建构上的分歧。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丁四新教授则讨论了朱子道统说的新建构，并为之与刘向的德运说进行比较，认为朱子不但最大限度地疏通和扩展了儒家道统说的经典根源，将《四书》《五经》都涵盖在这一统系之下，而且着重依据《周易》，在借鉴刘向改造德运说的基础上彻底完成了从王朝受命的德运说到道德主义的道统说之重构和转变，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士人人格的建设开拓和贯注了崭新的精神。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的沈顺福教授讨论了程朱理学的异同，认为二者的共同处在于将理视为某种超越于经验的、绝对的存在。它是某类事物的所以然者或自性。不同处在于：二程之理只有公理、天理。它不仅是宇宙之理，也是万物之理，即万物有了同一个天

理。朱熹则认为宇宙不仅有天理、公道，而且每类事物包括无生意的种类都有自己的理，世上不仅有公理，而且有不同的别理。厦门大学哲学系的谢晓东教授则从孟子与墨家人物夷之思想中的实践理性困境论及朱熹对孟子关于墨家爱无差等的“二本”之批评的诠释，认为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夷之实际上是西方古典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西季威克面临着同样的实践理性的困境：即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自爱之间的冲突。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制度建构。

其他相对比较集中的论题还有关于朱子门人的讨论，如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曾振宇教授认为陈淳对朱熹思想既有绍承也有所发明：在理气关系上，朱子晚年的观点是“理在气先”，但陈淳强调“理不外乎气”、理气无先后；在天理与四德、五常关系上，程朱和陈淳都认为“性即理”，也都从天理高度论说仁；程朱提出“仁包四德”，陈淳别出心裁地论证“五常一体”、五常互包，进而证明仁是“天理自然流行”，等等。江西师范大学的邓庆平教授强调朱子门人在朱子学的发展这一思想史进程中，站在包含实践、心智与语言三个层面在内的广义知识论立场来看，朱子门人的学术思想活动本身就是朱子学的重要表达方式。

而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朱人求教授对《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意义的探讨，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傅小凡教授所论《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的合理性辩护》一文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朱人求认为《朱子家礼》中不仅充满了现实的人文关切及时代精神，亦充分体现了哲学的终极关怀、“宗教”的终极关怀以及儒家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傅小凡指出，朱熹从三个方面对重建家族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其一，从天人一体的本体论高度，论证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其二，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以事天的虔诚与恭敬孝敬家长，从而为家族建设提供情感依据；其三，从生死观的角度讨论孝亲的合理性，以及重建家族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的终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冯琳教授与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王凯立则都基于朱子知行观展开了分析。冯琳认为船山对朱子的知行观有继承，但在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上有一定的分歧。朱子对从格物到致知的具体过程的分析不很缜密，船山则更注重格物之后的细密工夫，他辩证性地将朱子道德外在性和阳明道德内在性批判性地吸收，丰富和发展了“格物致知”的内涵。王凯立则由朱子的“知行”论及“自欺”，认为朱熹的自欺观揭示了作为具体存在的人在“心具众理”与“心之所发”之间的矛盾，而这二元性结构进一步折射出朱熹哲学中理气二元的世界格局。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的《朱子伪像考》一文对朱子画像研究、流布的情况做了梳理，并对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各种朱子像进行了辨析，为我们了解朱子的图像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金刚博士从祖宗、变法、道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探讨朱熹的“本朝史观”，指出：在朱熹看来，只有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学术的基础上，只有通过道学知识分子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的努力，才有可能在本朝重新回复三代。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潘立勇教授则分析了朱子理学美学对宋代美学的意义和影响，强调理学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种本体化、思辨化、伦理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重要环节；朱子理学美学则是其集大成者，对宋代“经辞道”三家并列的美学格局的确定及宋代的美学思想发展有着重大和深刻的影响。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的杨少涵教授指出，朱子哲学的义理架构是理气二分、性情对言、心统性情。

(下转第64页)

金门一个科举世家的姻亲调查

——琼林蔡献臣家族姻亲考论

王石堆 魏宁楠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金门县琼林村蔡氏家族是一个科举世家。这个家族的科举兴起在明嘉靖后期, 鼎盛在隆、万年间, 中心人物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的蔡献臣。献臣祖蔡标, 嘉靖举人; 父蔡贵易, 隆庆进士; 族兄蔡守愚, 万历进士; 子学光, 天启恩贡。蔡献臣有子四人、女两人, 除献臣次子蔡甘姻亲不可确考之外, 包括献臣在内六人的姻亲(亲翁、婚姻对象的兄弟)均可考。两世六人的姻亲都是出身进士, 大多是浯洲(今金门)及同安城人, 稍远的两家, 一是本郡泉州, 一是邻郡漳州。所有的婚姻对象都是熟悉的人家, 亲翁多为(蔡贵易、蔡献臣)进士同年, 只有两家是前后榜进士。蔡献臣家族在选择婚配对象的科举门第相当谨严, 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持世家的香火不断。虽然经过改朝换代及清初严酷的迁界, 琼林蔡氏作为一个科举世家, 仍然傲然雄视浯洲一岛。

关键词: 科举世家; 金门县; 琼林村; 蔡献臣; 姻亲

金门县琼林村为蔡氏聚居地。其地原名平林, 据传, 明熹宗问蔡献臣居何地, 献臣答: 同安县浯洲平林。熹宗为了奖掖蔡氏, 赐名琼林; 琼林之名沿用至今, 里人无不以为荣。琼林蔡氏, 其先于五代自河南迁入浯洲。南宋, 有十七郎者迁徙至平林(琼林), 是为琼林蔡氏始祖。传至十五世蔡标, 于嘉靖三十年(1551)辛卯科乡试中式, 成为琼林第一位科举人物。蔡标子十六世蔡贵易(1538-1599),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乡试, 隆庆二年(1568)进士, 为琼林蔡氏第一位进士。十七世, 贵易族侄蔡守愚(1552-1621), 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 贵易子蔡献臣, 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十八世, 献臣子蔡学光, 天启间授恩贡。自十五世蔡标中举, 至十八世蔡学光授恩贡, 前后四世。入清之后, 琼林蔡氏科名依然甚盛, 蔚然科举世家。

本文试对琼林蔡氏这一科举世家的姻亲作一调查, 集中在蔡献臣及其子女两世。本文考论蔡献臣姻亲, 指的是献臣本人及子女婚姻关系中配偶的父母、兄弟。包括: 蔡献臣岳翁池浴德、内弟池显京、池显方, 长子谦光妇翁漳浦林汝韶, 三子学光妇翁晋江丁哲初, 四子蔡孚光妇翁金门张廷拱, 长女夫君晋江丁哲初之弟亨中, 次女夫君陈基虞之子元鏞。献臣父、祖辈的姻亲, 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项目基金: 福建省社科重点项目《明清金门作家系列研究》(FJ2016A029)

作者简介: 王石堆(台籍), 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2 级博士生;

魏宁楠, 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6 级博士生。

一、蔡献臣妇翁池浴德

蔡献臣（1562-1640），字体国，号虚台，蔡标孙、贵易子。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式，次年成进士，授刑曹，渐迁湖广按察使，罢归；起为浙江海道，升浙江督学、光禄少卿。卒，赠少司寇。有《清白堂稿》等。

据[道光]《浯洲琼林蔡氏族谱》，蔡献臣娶池氏（同安）。池氏之父为池浴德（1539-1617）^①，浴德，字仕爵，号明洲。嘉靖四十三年（1564），浴德与献臣父蔡贵易同举乡试。同乡同年，池蔡两人或在此时已经意气相投。次年，乙丑科明德成进士，贵易晚一科，即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门当户对，后来献臣娶池氏女，颇为顺理成章。

池，殷氏封西平浞池，以居为姓。后徙闽长溪（今福建霞浦）小金村。永乐间，池兆铭从征沙县，叙功，升永宁卫中左所（厦门岛），实授总旗；浴德曾祖池宗宝，因家中左所；祖池旻，豁达好施；父池杨，笃学力仁，人称长者，赠吏部文选郎中。

池浴德，十岁能属文，十四岁与里中角艺，二十六举于乡，二十七成进士，授浙江处州遂昌知县。“民有讼，一毫纸缓不输官，只袖米半升往返，民称‘池半升’。”^②擢南官考功，转北吏部稽勋司。万历八年（1580）大计，转郎中，后晋奉常奉使还家，遂家居三十七载。常训子孙云：“毋滥交，毋惹事，毋衣罗绮，毋想膏粱，毋恃贵凌人，毋挟长加少。”又云：“读书岂必尽取科第？时时照管这念头。毋负天地祖宗，便为肖子。我受大父勤俭清白之训，佩之终身，愿儿曹如我之佩大父，可矣。”^③

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池浴德年六十，蔡献臣为作《奉常池明洲妇翁六袞寿序》，此序叙浴德历南北铨部：“江陵（张居正）方操权，绳天下士，喜成饰、怒成瘡，视尚书郎吏耳。而翁独岳岳其间，不少徇。同舍月峰孙公、心吾吕公，皆名下士，谋断规随，以故所推毂尽贤豪长者，而尚书间有承望十九不能得之于翁，则为危词以动之，翁不顾也，江陵目摄者数矣。时翁母太夫人春秋高，则力请侍母以避钳，不能得，而例擢为奉常。于是以册封藩府行，遂得告矣。逾年，江陵败，而言者犹不尽谅翁，而翁亦若无意于世者，居海上垂二十年矣。不履城市，不谒公府，闭门摊书，蒔花养鱼，课子孙读而已。”张居正用事，池浴德不依附；张居正败，浴德却受到攻击。浴德归家二十年，蔡献臣说：“方今东苦倭、北苦虏、西南苦播獠，主上拊脾而需人，翁高卧庸隐乎？”^④国家正在危难之际，亟需用人，岳翁不出奈苍生何，激励岳翁东山再起。

浴德卒，蔡献臣作《祭池明洲岳翁太常文》：“维予先子，乡举同年。气谊之期，遂结姻亲。小子侍公，盖自御轮。四十年来，教诲敦温。出山之日，跋涉相存。贻我德音，琅琅如新。”^⑤

池浴德著有《空臆录》《怀绰集》《居室集》，多理学及经世济世语。诗深厚如初、盛唐。

浴德弟浴沂（1542-1634），字士洁，号三洲^⑥。万历元年（1573），以第三名入泮，后游国学，

① 蔡献臣《池岳母傅宜人七十偕寿序》：“岁壬子，宜人年登七帙，而岳翁奉常公七十有四。”（《清白堂稿》卷六）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年七十四，逆推，池显京生于嘉靖十八年（1539）。蔡主宾《蔡献臣年谱》考订池浴德卒于万历三十六（1618）戊午，误。池显方《告叔父鹭洲文》：“丁巳冬告别父奉常公。”（《晃岩集》卷二十）明确说，浴德卒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池显方《先奉常明洲府君行略》：“嘉靖己亥十一月初九夕，先宜人梦青龙绕室，越日而府君诞……年七十九犹上夔蹠。”（《晃岩集》卷二十）池显方《先妣慈惠林太孺人行状》：“丁巳违太府君。”（《晃岩集》卷二十）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亥生，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七十九。

② 池显方：《先奉常明洲府君行略》，《晃岩集》卷二十。

③ 池显方：《先奉常明洲府君行略》，《晃岩集》卷二十。

④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六。

⑤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六。

⑥ “三洲”，池显方《告叔父鹭洲文》作“鹭洲”，详《晃岩集》卷二十。

卒年九十三。蔡献臣为作《太学生池三洲翁既配李氏墓志铭》云：“蔡子曰：奉常公，吾妇翁也。吾弱冠事三洲公，五十年余矣。故知翁最详。慨今之为贵介者，作气势，图富厚。视翁之不骄不侈、不竞不贪，何悬殊也。”^①浴沂子显究，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浴德堂弟浴云，字仕卿，号龙洲，浴德父池杨之弟池彬之子。二十一岁为诸生，初试不售，筑室五老山中，希迹城市。能诗，好谈黄老之言。卒，年仅三十四。

浴德有四子：显京（嫡配傅氏生），怀庆府同知；显方（庶林氏生），举人；显章（庶黄氏生），庠生；显广（黄氏生）。

浴德嫡妇傅氏（1643-1624），年十九适浴德。女适蔡献臣，浴德对献臣极为推赏：“每见婿光禄寺少卿蔡君献臣、孙婿贡士李君曾震，语儿孙云：‘若辈居官，志节能如蔡，笃孝读书能如李，余无虑矣。’”^②傅氏七十，蔡献臣作寿文云：“盖奉常公登第五十年矣，子姓繁衍，科第蝉联，池于今为邑乔木，则贤内助有力焉。”^③文作于万历四十年（1612）；是岁，浴德已有子、女各三人；长子池显京已成举人；弟浴沂子显究，举人，故曰“科举蝉联”；女婿蔡献臣已成进士。傅氏一族，在同安县中名声甚籍。

二、蔡献臣内弟池显京、显方

池显京（1563-?）^④，字致夫，号念苍，浴德嫡配傅氏所生。蔡献臣与显京同年生，献臣月份稍大，故称显京为内弟。显京自幼与蔡献臣为文友。万历十九年（1591），显京移居郡城泉州，万历三十七年（1609）成举人，时已四十七岁。显京授和州知州，忤巡按，劾罢。起补湖州通判，转怀庆同知。后以督运，因兵事阻艰稽期，削籍；染眼疾，寓建州年余，归家一年，卒。“显京善文章，精草隶，画犹绝伦。晚喜禅学。三任皆腴地，而袖风载月以归。”^⑤弟显方赞曰：“以诗画为游戏，以蛮素为散花。宁违众而不露知解，宁弃官而不媚奸邪。”^⑥

池显京著有《迈征堂诗义》，蔡献臣序之：

曩余馆于妇翁池奉常所，则辱与内弟致夫游。致夫髫年白晰，怀负奇气，自谓一日千里也。乃余以瓦缶先鸣，而致夫久困诸生。己酉，与史世声挟策成均，遭余金焦间。致夫一别，遂空冀北，偕史君登名于京兆，士之遇不遇固有时哉，然其酝酿綦厚矣。庚戌，罢公车，益发愤其所为业。坊贾有行其《诗义》者，致夫持以示余。忆余谈诗欲如画家白描山水，不着一色相。而致夫以醲艳胜，中无遗思，外无遗境，韩子所谓正而葩者，盖庶几焉。抑余闻王摩诘诗中画、画中诗。致夫博学多能，工草隶、善绘事，则其《诗义》得无肖之然乎？致夫有弟直夫，壮志隳材，一试辄冠，近艺十余首附焉。二难竞爽，谁为横敌者？夫弓冶之子，必为箕裘。奉常翁日操觚以课，积制义，至累帙而犹矻矻不自休，则二子之贤所从来矣，堂名“迈征”有以也。^⑦显京有堂名“迈征”。显京举子业攻《诗经》，所作制义文，名《迈征堂诗义》；此集附弟显方近艺十余首。蔡献臣此文作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即显京乡试中式、次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春试落

①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五。

② 池显方：《先嫡妣慈懿傅宜人》，《晃岩集》卷二十。

③ 蔡献臣：《池岳母傅宜人七十偕寿序》，《清白堂稿》卷六。

④ 蔡献臣：《寿内弟池致夫和州守六十》，此诗作于天启二年（1622），年六十。逆推，显京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

⑤ [道光]《厦门志》卷十二《列传·宦迹》。

⑥ 池晃方：《晃岩集》卷十六。

⑦ 蔡献臣：《迈征堂诗义》，《清白堂稿》卷五。

第归，发愤所作。献臣为显京制义作序，而兼及其诗。蔡献臣论诗主“不着一色相”的“白描”，而显京诗却“以醜艳胜”，而且“无遗思”“无遗境”，尽情表达，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显京善绘事，能诗能画，或臻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蔡献臣又说，“其《诗义》得无肖之然乎”？显京的《诗义》或许更有文学色彩也未可知。此文提到显京兄弟制义文的家学，以为得之于其父池浴德的教诲。蔡献臣早岁馆于池浴德家，既受池翁之教，又日与显京相切磨，受池家沾润，他的制义与池家也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由此也看出蔡贵易对蔡、池联姻的用心。

蔡献臣与池显京多有倡酬。万历四十年（1612）秋，池显京上公车，蔡献臣作《送内弟池致夫孝廉计偕》：“公车诏下集群英，书剑秋风万里行。勿为望云怀远道，正看射策谒承明。兴文健笔人皆辟，入画青山神更精。此去冲天须努力，椿萱垂白仁成名。”^①蔡献臣对池氏上公车寄予厚望，而显京却再次落第而归。上文我们说过，显京移居郡城，万历四十八年（1620），显京、显方兄弟邀献臣游泉州清源洞，献臣作《池致夫直夫邀游清源洞》诗^②。天启二年（1622），显京年六十，时任和州郡守，献臣作《寿内弟池致夫和州守六十》：“两翁同擢桂，吾复托松萝。总角文为友，浮名鬓共皤。产疑因宦减，庆喜积余多。六十犹强健，飞腾意若何。”^③“两翁”，献臣父蔡易贵及显京父池浴德，嘉靖四十三年（1564）同举于乡，故曰“同擢桂”。“托松萝”，献臣娶池氏女为妇。献臣馆于池家，与显京为文友，又先后走向仕途，如今都已皤然老翁了。显京出仕，家产没有倍加，反而还减少，积善之家有余庆。显京虽然已经六十了，但身体正健，飞黄腾达只是待时日罢了。

显京尚未飞腾，已先得罪当道；罢归后，补为郡贰。崇祯四年（1631），显京因督运削籍罢归，患眼疾，居建州，献臣作五古《池致夫侨寓建州寄此招之》：

官休谁先后，行年与我齐。长才惜未展，彭泽已云迟。但愁宦囊薄，入外室谪时。况复异乡县，一杯难共持。不如还故庐，荒径藉撑支。一经诒孙子，同气足怡怡。画诗老益工，乐此勿为疲。^④

显京削籍，没有直接返回泉州郡城或同安城，却寓居建州，蔡献臣作此诗招之回里。显京削籍或碍于面子，不愿回里，献臣说，我也是休官回的，我休官还在你之前呢！咱们同年生，你应该也是了解的。你一个人独在异乡，咱们一起把杯都很难，还不如回到故庐吧！你精通一经，不如借此机会传诸子孙；你是我内弟，也可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杜甫老来诗律转细，你的诗画越老越工。家有亲情、老有诗画，乐此不彼可也。显京可能受到此诗感染或其他原因，真的回到家乡，可惜过了一年，就告别人世了。

池显方（1588-？），字直夫，号玉屏子，显京弟。卒于鼎革之后。显方长身玉立，秀致云流，在海隅穷岛中可谓鹤立鸡群。十五岁，入郡学。天启四年（1624）举应天试，上春官，不第。参禅乐道，结庐玉屏端山。曾与钟惺、谭元春唱和，海内名辈董其昌、汤显祖、何乔远、曹学佺、张燮、黄道周皆折节与之交，尤与同里蔡复一称莫逆。显方有庵名“淡远”。

显方，庶出。母林氏（1573-1639），世醇朴业农，居同安苕溪村（在今厦门市集美区后溪）。浴德有二妾，另一姓黄，“恃宠颇阴鸷，虑吾母有子而胜己”^⑤。林氏孕，黄氏千方百计欲灭其于腹中；献臣生，又屡屡折磨之，几不成活，幸而无恙。崇祯九年（1536），显方本欲出仕，闻边警，母

①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②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③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④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⑤ 池显方：《先妣慈惠林太孺人行状》，《晃岩集》卷二十。

林氏不欲其北上，有“要子不要官之语”；“常命曰：‘我从千万辛苦而生子，子当千万苦而读书。’不孝方思及此语，惭愧欲死。”^①显方庶出，母林氏千辛万苦生他养他。显方孩童时期，日子肯定没有嫡出的兄长显京好过。显方经过自己的刻苦和努力，终于有了出头的日子。

池显方有《玉屏集》《南参集》《淡远诗集》《晃岩集》。《玉屏集》，何乔远、蔡复一为之序；《淡远诗集》，张燮先有一序，蔡献臣又序之；《晃岩集》，曹荃为之序。诸集今存者唯有《晃岩集》。《晃岩集》保留池显方部分与蔡献臣游乐、唱和赠答的作品。池显方居鹭岛，不时邀蔡献臣往游。蔡献臣集有《池直夫内弟邀登洪济山绝顶夜宿留云洞阻雨未遂观日》《春日游玉屏山绝顶》诸诗；池显方卜居晃岩，蔡献臣等见访，显方作《蔡体国陈应萃苏松侯叶国文诸先生访晃岩承国文惠诗步韵赋谢》。

天启三年（1623），蔡献臣从家乡往京城，时池显京为和阳（即历阳，属安徽）郡守，池显方与献臣同行往和阳省兄，蔡献臣便道访显京之后，与显方留别，作《和阳别内弟池直夫》，诗云：

羨尔多奇复爱奇，春风匹马漫相随。离家愁见他乡月，揽胜悠然独往时。禅理自从前世悟，诗篇肯许众人知。损箴唱后重斟酌，赋就扬雄奏汉墀。^②

他乡遇故人，自然多了一分亲切的情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诗突出显方理禅爱诗，足见对内弟了解之深。显方《历阳别蔡体国》二首云：

强出非君意，此情惟我知。每谭游地好，聊慰望云思。江北路初起，天涯雾正垂。长安风景好，第一在趋时。

在家犹隔水，一路喜同云。车马共无憾，文章独得闻。鸦声随各去，雁影自江分。尚有三千里，予归不待君。^③

蔡献臣与池显方都是同安人，蔡献臣祖居浯洲，至其父守易已经迁居县城；显方家在鹭岛，虽在同邑仍隔一水，会面也不是那么容易。蔡献臣出山，非其本意，显方非常理解。显方说，你此行出山，在京城做官，第一义在合时，不要随便拂逆当局之意。从海隅到江北，路程遥远，一路上同车同席，俩人谈诗作文，十分愉快。此地一别，你北上，不久我也南归，又是相隔三千里之遥。蔡献臣为池显方《淡远诗集》作序，略云：

内弟池直夫束发称诗，则何稚孝、蔡敬夫二先生序其《玉屏集》矣。已行《南参集》，今兹《淡远集》成，而张绍和弁之，且谓予宜有言也。予知直夫禅，又知其举子业。直夫长身玉立，秀致云流，其于禅乘笃好而深会之，盖天性然矣。而制举文字，则入之深、出之浅，当意得时光芒万丈，吾券其必前矛南官，然在直夫则禅心诗肠涌溢之余耳。今第论其所为诗，直夫初入门，辄沉酣汉魏柴桑言，故寒山之率、长吉之奇、白苏之疏散，时错落毫楮间，而或疑其出入于袁、钟诸才人蹊径。盖任其才之所至，道其中所欲言，非有意慕效之也。比修业东山，益有味于陶之冲淡闲远，一切尘坩不留肺腑，故题其庵曰“淡远”，而诗亦以名。其得于抱膝长吟之外者深矣。予非知诗者，将何以进直夫？夫冲淡闲远，固禅性得之，然乃枯槁遗世者之所为，即和靖诸什亦以无怀、葛天自赞。直夫妙龄壮志，方当对大廷而履亨衢以虞賡、周卷黼藻明盛，予固有取乎敬夫“温柔敦厚之旨”；此非敬夫之言也，盖尼父论诗之准也。^④

池显方作诗很早，《淡远诗集》已经是他的第三部诗集了，可以说其诗的风格特点已经形成。显方学

① 池显方：《先妣兹惠林太孺人行状》，《晃岩集》卷二十。

②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③ 池显方《晃岩集》卷四。

④ 蔡献臣：《池直夫淡远诗序》，《清白堂稿》卷四。

诗的范围很广，汉魏诸家、陶渊明、白居易、寒山、李贺、苏轼，有人还说他出入当代的公安三袁、竟陵钟惺之流。蔡献臣说，池显方才大，意之所之，道其所欲言，言其所欲言，非有意欣慕仿效。自己无意出仕，居于山中，则其诗“味于陶之冲淡闲远”，故其室名“淡远”，其集亦中“淡远”。此前种种议论揣测，则可以休矣。蔡献臣对这种诗风，在艺术上是欣赏的，在内容方面，陶渊明的遗世、“枯槁遗世者之所为”的想法，则不甚可取。池显方正值妙年，应当心存壮志，劝勉鼓励，“一切尘坌不留肺腑”，并不是一件好事。

蔡献臣与内弟池显方关系甚密，情谊甚笃。蔡献臣的子弟也与池显方有着良好的关系，就辈分而言，显方称他们为侄。《晃岩集》中有多篇诗文是为蔡侄所作。献臣长子谦光，有《干云斋诗初集》，显方为之序，见《晃岩集》卷十一；次子甘，有《恢斋近草》，显方为之序，见《晃岩集》卷十二；四子孚光，建一榭成，池显方命之曰“苍眺”，并作《蔡四甥拟一榭余易为台名苍眺既成登而乐之》，诗云：“易榭为台余意生，兼参子见更天成。初期俯荔绿红色，今尽吞溪潮汐声。园内众芳无暇接，墙阴一岫不能争。立身尚有尤高处，祖父南方两斗精。”^①尾联点“台”字，希冀孚光立身立志高远，以承继祖、父勋业。

在诸姻亲中，池浴德父子至为重要，对蔡献臣父子的影响也最大。故以上两节，我们也用了较多的文字加以述论。

三、蔡献臣长子蔡谦光妇翁金门林士章

献臣长子蔡谦光（1585—1636），字哀卿，号六吉。谦光屡试闽闾、南雍、北雍，皆不利。归筑室同安城南郊，名“干云斋”，攻诗书画。有《干云斋诗初集》，池显方为之序。

《浯江琼林蔡氏族谱》云：“（蔡谦光）妣林氏探花大学士林讳焊公之女，继娶博氏。”^②按：[光绪]《金门志》：“林焊，字实甫，号鹤台；欧陇人。将生之前，瓯陇湖中鸣沸三日夜。由龙溪籍，举万历壬子乡贡。丙辰成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历国子监司业，迁祭酒监……（崇祯七年）拜内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康熙]《龙溪县志》卷八《林焊传》不言林焊原籍。^③窃以为《金门志》可信，林焊原籍浯洲，以龙溪籍中举、成进士，情形有类于同为浯洲原籍而以龙溪籍试而成进士的蒋孟育。

《清白堂稿》有《送少宗伯林鹤台应召》一诗，云：“彤廷第唱五云浮，讲席谈经沃紫旒。自是孔门肩一脉，故教庙貌巩千秋。圣朝特简宁枚卜，名世应期分必投。匡救久宜将顺并。苍生翘望济川舟。”^④说明蔡献臣与林焊有交集。然此诗不称林焊为姻亲，蔡献臣所作有关其他姻亲的诗文，或诗文题、或诗文之中大多都表达得很清楚，文题如《寿宪副陈宾门亲翁七十序》《祷祭文七十七祭少参林光璧亲翁文》《会祭大宗伯林璧东姻翁文》《祭张辅吾中丞亲翁文》《祭左司寇丁哲初亲翁文》。诗文中之例如《寿张尚宰廷尉六十》：“稚儿未树托丈峰，多藉提携迪其愚。”^⑤《答丁哲初吏部》：“先君之棠阴犹存，老母之扳舆为便。始愿不及，众论谓奇。皆我亲翁鉴衡无私，葑菲罔弃”^⑥

再说，林焊成进士之年，迟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这一年谦光已经三十岁，按照蔡献臣为儿

① 池显方《晃岩集》卷五。

② [道光]《浯江琼林蔡氏族谱》，新加坡德华印刷厂重印本，1992年，第298页。

③ [光绪]《金门志》卷十，第259—260页。

④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⑤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⑥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一。

女选择配偶的标准，其姻亲的科举功名、地位的要求较高，在林焯成就功名之前，蔡献臣选择林焯之家的可能性很小。

那么，姻亲林氏是哪家？蔡谦光娶的是哪家之女？蔡献臣《祭少参林光璧亲翁文》云：

呜呼！余之识君在癸巳，余之从君在丙申，余之姻君在庚子，余之违君在丁未。十五载间，谊缔秦晋，气结金兰，别未几耳，来有日也，而君何以死？即死矣，而何以痛发于背。呜呼。君遽止此乎？将君之春秋故及此乎？抑以南计之役愤激而及此乎？谓春秋及之，则君德厚而气庞，人皆卜其峻树而远绵者，故不止此也。谓有激而然，则君糈粹而识超。矧公论大明，赐环方新，亦不必为赴湘吊屈之举甚明也。而君何以死？何以痛发于背？呜呼。君宗伯公子也，门第故甲于漳。而君束发务途途为挹损，约束僮指无世俗豪贵之态，此其风味加人数等矣。君起家名进士，自理楚以至郎南铨，藩两浙，即儆兵西辅，未数月乎，不吐不茹，不刚不柔，御民吏悉忠爱，接僚友披衷赤，而冰蘖雅操，二十年一日也。^①

光璧，即林汝韶。汝韶（？-1607），字君纶，号光璧，福建漳浦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历浙江参议、广东徽宁兵备。后移居漳州城北长桥土城。蔡献臣这篇祭文说，他和汝韶认识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与林家缔为婚姻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庚子，而汝韶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汝韶见识超越，忠爱吏民。“翁女辱赐予伯子谦光，俾委禽焉。于是备闻刘安人之贤也。光璧翁德器才局，雅负公望，乃治水两浙，备兵西辅，駸駸大用矣。而误中考功法以谪，主爵者起翁大行，方图以公论伸翁，而年不竟施，位未配德，君子惜焉。”^②此文明确说，谦光娶汝韶之女为妇。汝韶为宗伯林士章次子，门第甲于漳州一地。汝韶父林士章（？-1611），字德斐，号璧东。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廷试一甲第三名。官终南礼部尚书。“璧东先生，以鼎甲国师跻大宗伯，为隆、万间名臣。”^③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士章卒，蔡献臣作《会祭大宗伯林璧东姻翁文》，有云：“某等臭味，令子贶之姻盟。闻讣伤心，泪如泉迸。”^④

蔡献臣长子娶漳浦林士章女为妇，可成定论；《浯江琼林蔡氏族谱》误为林焯之女。林士章与林焯廷试同为二甲第三名，疑《族谱》在传钞过程中，“林”字之后名字缺漏，焯浯洲人，与士章又同以漳州籍取得功名，钞者臆补。

蔡献臣次子蔡甘，字稼卿，一字雨卿，号雨人；原名定光，字静卿，号岂夫。有《恢斋近草》，池显方为之序。[道光]《浯江琼林蔡氏族谱》仅记其娶陈氏、张氏，余不详。蔡献臣《林母刘氏七帙寿序》：“忆长安杯酒时，翁尝津津安人壶范。陈景山宪伯亦翁姻也，戏谓光璧自癖誉内耳。”^⑤此处称陈景山亦翁姻，疑陈景山为甘岳翁，俟考。

四、蔡献臣三子蔡学光妇翁晋江丁哲初

献臣三子蔡学光（1597-？），字敬卿，号壮如。生员，起北京监生，授恩贡。

[道光]《浯江琼林蔡氏族谱》云：“（蔡学光）娶丁讳哲初之女。”^⑥按：丁启浚（1569-1636），字哲初，一字亨文，日造子，德化籍，晋江人。启浚母，为明代著名散文家王慎中女。启浚万历十

①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六。

② 蔡献臣：《林母刘氏七秩寿序》，《清白堂稿》卷六。

③ 蔡献臣：《林母刘氏七秩寿序》，《清白堂稿》卷六。

④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六。

⑤ 蔡献臣：《林母刘氏七秩寿序》，《清白堂稿》卷六。

⑥ [道光]《浯江琼林蔡氏族谱》，新加坡德华印刷厂重印本，1992年，第299页。

六年（1588）举人，与献臣同榜；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晚献臣一科。由司理晋吏部郎中，又升南京太常少卿，刑部侍郎。有《平圃文集》《平圃诗集》。蔡献臣曾对丁启浚说：“予与公同举于乡，而学儿幸馆贰室，公教诲之如子。”^①

崇祯九年（1636）启浚卒，献臣为作祭文，略云：

自予之戊秋附公骥也，五十年年兄弟也；自予女女公之弟亨中，而公之女为予学儿妇也，四十年姻兄弟也。肝胆相照，休戚相关，盖居然异姓骨肉矣。呜呼。公天下之大用人也，亦天下之得全人也。颖敏原自性生，文章得之家学，科第捷拾地芥，才猷蔚为国桢。故司理楚浙则为名祥刑，入郎铨属则为名吏部，卿寺两都则为名九列，晋贰司寇则逆党之狱，召问多称上意，且宦途称重要者，惟铨与宪，而公柄六选，署中丞台，则人才之登进，纪纲之振飭，表表朝绅间矣。会意有不可，则再请以归。而两台之疏荐，卿贰之延推，往往必首公矣。^②

蔡献臣自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与丁启浚同榜至丁氏卒，结识称兄弟已经约五十年；自女适启浚弟启中、次子娶启浚女为妇，结为姻亲约四十年。如果考究一下这两桩婚事，似乎辈分有混乱之嫌，学光与女兄，一娶启浚之女，一嫁启浚之弟。不过，这正好也说明蔡献臣与丁家关系之至密。

丁启浚能诗，与曹学佺、张燮等多有酬倡，钱谦益选其诗入《列朝诗集》。万历三十九年（1611），蔡献臣年五十，丁启浚有诗寿献臣，献臣作《丁亨文吏部诗赠五十初度依韵赋谢》答之。启浚家居八年之后，五十岁时复出，蔡献臣作《喜丁亨文吏部召起考功》诗贺之：

三春瑞色霭温陵，传道天书再下征。八载南山供隐豹。今朝北阙羨迁莺。官当水镜明秋日，人是玉壶映井冰。圣代进贤如转石，看君启事几同升。^③

然而，丁亨文对朝廷新命却一再拖延，未及时赴阙，“亨文八载家居，两疏请告，即朝命再临，犹逡巡不欲赴”^④，于是，蔡献臣借祝寿之机勉励他：

高卧泉山历几春，青编绿鬓彩衣新。况当启事承恩日，正是揽揆降岳辰。吾道拔茅三画泰，人情引领一朝伸。愿言趣驾还鹓列，帝眷仙郎待秉钧。^⑤

蔡献臣说，你已经高卧林泉好几年，在家尽人子之孝道。正值你生辰，帝命新下，你也应当慎重考虑，作为老友，催促你尽快前往吏部任职。万历四十三年（1615），丁启浚升职，蔡献臣作《赠丁亨文选郎初度时新膺铨命》，一是祝贺，二还是勉励，毕竟吏部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官。万历四十五年（1617），蔡献臣与丁启浚于钱塘江上相逢，有诗记其事：

塔边雨色夜霏微，江上逢君似令威。共话青灯惊曲折，何知骢马巧依违。时传启事声名重，门有树人桃李菲。暂到故园非稳卧，五云行见简书飞。^⑥

此时丁启浚次短暂归家，蔡献臣称赞他在吏部声名已重，选用人材已见成效。蔡献臣说你这次归家是“暂到”，而不是归隐，因为丁氏已有高卧林泉长达八年之久的“前科”，故特别提醒他。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丁启浚邀蔡献臣游泉州巢云、弥陀二岩，蔡献臣有感于时事的危迫，因此对丁氏寄予厚望：

伊我出门去，丰膳靡中厨。怪我竭归来，招邀陟彼岵。多士峰峻嶒，弥陀径盘纡。源山多

① 蔡献臣：《少司寇丁哲初公六十一初度序》，《清白堂稿》卷六。

② 蔡献臣：《祭左司寇丁哲初亲翁文》，《清白堂稿》卷十六。

③ 蔡献臣：《喜丁亨文吏部召起考功》，《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④ 蔡献臣：《祭亲姆丁太孺人文》，《清白堂稿》卷十七。

⑤ 蔡献臣：《寿丁亨文吏部兼趣还朝》，《清白堂稿》卷十二。

⑥ 蔡献臣：《浙江驿舟中共丁亨文馆卿夜话》，《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干涉爱此悬瀑俱。树古成幽谷，石巉须人扶。坐久快心赏，夕阳啼鹧鸪。中席发长叹，一叹征东卒。征调十万余，军需从何出。奴酋怀逆久，养虎未伏锁。再叹庙堂上，莫适任主持。权豪纷争胜，苞苴倍曩时。大厦汔将颠，一木岂能支。君具济世才，行当起东山。予母日薄西，偕隐固所安。黄昏且分手，冲飈送归鞍。明朝各异县，相思访考盘。^①

观察蔡献臣的诗文，他对游览似没有同时代人的闽人如谢肇淛、张燮、曹学佺、池显方有很大的兴致。巢云、弥陀二岩是泉州清源山两处名胜，亲翁所邀，也趁兴一游，蔡献臣此时已经接近六十，登山略显吃力，须有人扶，又不断休息。出游本来是轻松愉快的，但是此时辽事已经吃紧，征调士卒，军需无出，将帅不和，权势纷争，俩亲翁忧心忡忡，蔡献臣希望丁启浚出山，为国分忧，同时苦于己母日薄西山，不能为国家效力。蔡献臣与丁启浚，既是亲翁，又是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

五、蔡献臣四子蔡稣光妇翁金门张廷拱

献臣四子蔡稣光，稣光，原名孚光，字中卿，号诤虎。贡士。

[道光]《浯江琼林蔡氏族谱》云：“（蔡稣光）娶大同巡抚张讳廷拱之女。”^②张廷拱（？-1633），字尚宰，号辅吾，同安县大嶝岛（1915年金门建县，属金门县；今属厦门市翔安区）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怀宁知县，改丰城知县、迁安知县。天启年间，任祠祭司郎中，削职归。崇祯初复职，升佾都御史巡视大同。崇祯六年（1633），蔡献臣《祭张辅吾中丞亲翁文》：“献臣言念交谊，而稣儿叨爱东床，尊酒瘠牲，声悲涕殒。”^③稣儿，即稣光，廷拱生前，很疼爱此婿。

亲翁张廷拱一家居住的大嶝岛，在蔡献臣笔下是这样的：“同安之东南皆海也，其中岛屿浮空，地大而人稠者，莫如浯洲、嘉禾，次则大嶝。予故家浯，而嘉所尝游也，独大嶝无缘而至焉。间往来香岩之巔，望一山隐隐烟水中，若隔衣带，非汐尽不可揭而涉也。闻其地种种多奇，四方莽苍间，各有怪石镇之，似虎者、似蛇者、似豕者、似虾蟆者、似明珠者。而太武横亘于其外似屏，意必有高人秀士出于其间，而予未之见也。”^④蔡献臣世代居浯洲，至其父蔡贵易才迁同安城，然而他描写海及海岛的作品并不是太多，此文说同安县所属有好些海岛，大嶝是仅次于浯洲、嘉禾的另一个较大的岛，遗憾的是到现在自己还没去过。不过按照舆地形胜分析，此地必有高人秀士出于其间。蔡献臣没有明说，实际上张家就是可能出高人秀士的家族，蔡献臣与张姓结为婚姻，似乎这也是考虑的一个因素。

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张廷拱举乡试之，至其卒，蔡张两家结为兰契前后近四十年。张廷拱举乡试次年，上春官失利，再过一年，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蔡献臣与友人搜集张廷拱制义文，编就《就正草》梓行，同安县知县洪世俊为之序，蔡献臣再题之，云：“既而张君不偶于戍闾，归游，余及当世欢甚。间得从当世兄，尽发其制举义，相与评隲叹赏。大都张君为人光明洞达，爽朗疏畅，文亦如之，而思出青天，调遏行云，至其所匠心处，居然前辈矩矱也。于是刻成，而洪令公弁之，张君又欲予有言也。”^⑤一般说来，成进士归来，后人为了仿效，故刻其制义以行之，很正常；而张廷拱

① 蔡献臣：《丁亨文奉常邀饮巢云弥陀二岩有感时事》，《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② [道光]《浯江琼林蔡氏族谱》，新加坡德华印刷厂重印本，1992年，第299页。

③ 蔡献臣：《祭张辅吾中丞亲翁文》，《清白堂稿》卷十六。

④ 蔡献臣：《贺张南阳荣寿序》，《清白堂稿》卷六。

⑤ 蔡献臣：《题张尚宰〈就正草〉》，《清白堂稿》卷五。

下第落拓，其制义仍然敝帚自珍，甚至视之如瑰宝，说明廷拱制义的确出色，为人所重，其制义大抵如其人，“光明洞达，爽朗舒畅”。蔡献臣对制义文的评判鉴定，非常在行，辛丑，张廷拱果然上榜。

张廷拱成进士，授怀宁（今属安徽）知县，蔡献臣作《送张尚宰进士令怀宁怀宁随名同安》诗送之：

君是同安人，去馆同安绶。山川虽悠隔，斯民三代后。何问鹰与鸾，要使真诚透。相识从公车，意气非邂逅。岁寒芜市酒，一曲沾衣袖。骅骝聘逸足，千里岂驰骤。愿言慎厥初，积久香名茂。君看循良宰，半居汉廷右。^①

怀安县隋代为同安郡地，故蔡献臣戏曰：你这个同安人，去那个“同安”挂个官印。整首诗充满了鼓励和期望的热情，相信张廷拱可以成为一位循良的好县官。

崇祯二年（1629），池显方购同安县东山蔡复一旧馆，迎时年八十三岁的陈止止来馆讲法。陈止止，俗名贞言，字正智，别号仰石，泉州人；精于禅学，借儒申经。后池显方将陈止止讲经内容整理为《东山法语》，蔡献臣为之序。蔡献臣“数与尚宰大理过从问几杖，因得聆先生怪命之谈，尽津津有省焉”^②。池显方为蔡献臣内弟，加上张廷拱，三人彼此沾亲故，彼此也都热衷禅学。

崇祯九年（1536）九月八日，蔡献臣同张廷拱过僧舍，有诗云：“咫尺灵山意未疏，秋深重扣老休居。登高悔却忘扶杖，迷径行来几舍舆。小阁池清坐日暮，夜松涛涌醒钟初。诸天共话惊河汉，闲读曹溪一卷书。”^③他们同访僧舍，同悟禅理，两亲翁其乐融融。这一年，张廷拱年六十，蔡献臣作诗寿之：

忆昔如故倾盖日，公偕计吏我为郎。交臂剧谈必见慷，把酒论文许穿扬。从兹以来三十载，皇路翱翔共颀颀。丈夫矢志扶社稷，牛李蜀朔嗤宋唐。我思亲闾乞故里，公陟廷尉称大卿。平停高议汉廷右，咫尺薇垣践台斗。白衣苍狗古已然，翻云覆雨何不有。涂中我甘曳尾龟，使出公亦中谗口。归来相视心莫逆，探奇三山访休老。世事羊肠何足云，但戒括囊保无咎。令子弱冠上公车，伯仲联翩向天衢。稚儿未树托丈峰，多藉提携迪其愚。今公献岁登六十，齿发精神壮不如。我嗟迟暮成老丑，止有棋酒未全疏。生憎宦海风波恶，惟诞先登拍手呼。况复沧桑须臾改，劝公满酌春屠苏。圣主神明自天启，伫看阙下来锋车。^④

蔡、张相识三十年，张廷拱发展相当不赖，已陟大卿，然而仕途险恶，翻云覆雨，你我相继为谗言所中，归来依旧称莫逆。蔡献臣说令公子弱龄乡试中式上春官，兄弟俩一飞冲天；小儿有福，托庇于翁仗羽翼之下。今亲姻年六十，拍手为之称诞；现今新主登基，等待亲翁的好消息！蔡献臣说，我如今虽然已成丑老，但是酒棋仍然尚可，献臣善饮善弈，至老不衰，在老亲翁面前自矜，爽朗可亲。

六、蔡献臣长女适晋江丁哲初弟亨中

本节第四小节考论蔡献臣次子蔡学光时，已提及长女适丁启浚之弟丁亨中之事。

万历四十年（1612），长女卒，蔡献臣有文祭之，云：

呜呼，痛哉！一岁之中，既丧吾妇，复丧吾女。妇犹有孙，女乃无儿，痛哉！汝母首举汝，祖父、祖母咸喜。吾无女兄弟，及汝长，四德悉备，母曰：孙女犹吾女也。爱之甚，既相攸于

①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② 蔡献臣：《陈止止〈东山法语〉序》，《清白堂稿》卷四。

③ 蔡献臣：《丙寅八日同张尚宰过牛皮山僧舍》，《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④ 蔡献臣：《寿张尚宰廷尉六十》，《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汝家矣。然道之云远，或岁一再归，或再岁一归，见汝之孝于姑嫜，而姑嫜爱之，和于家室，而家室宜之，祖母、汝母则甚喜。见佳婿之笃学好修，而荣贵可卜。又见汝之知书识理，而一言一动，咸有轨则，祖母、汝母则又喜。惟是汝之屡身而未子也，两家盖深念之，犹曰汝年才三十，有待也。庸讵知日者之举女耶？庸讵知汝之遽止于此耶？汝既以举女不怡，又免身未弥月，而遭慈姑之大变，汝实力疾以视含敛、躬哭奠，故屡感屡发。未几，遂一寒而不可救……汝有三女，夫君必能抚之、教之，如汝在时。^①

蔡献臣这一辈，有兄弟，无姐妹，故献臣此女，祖父母、父母疼爱有加。长女从小知书识礼。所适丁氏又是泉州大族，本来应当一帆风顺，没想到长女年刚三十（或不到三十），偶感风寒，一卧不直，过早凋零。

丁亨中（1584-1628）为启浚同母弟；亨中母，王慎中之女。亨中卒，年仅四十五，蔡献臣为作祭文，云：“亨中之约婚，予长息也，予未既其文而貌之曰，秀而文，必才士也。遂采媒言，许委命焉。既而吾女果能修妇顺、警鸡鸣，甚当姑庄太淑人意，称之曰贤。而亨中肄业郡庠，亦遂屡占高等，第恨吾女数奇名薄，举雄不育，仅遗三女，以厘亨中海育而婚聘名门。今亨中再续得庄，而举丈夫子二，一则五龄，露头角矣；一则汤饼会，才旬月也。盖予甚为亨中喜之。”^②亨中为蔡家快婿，郡试高等，数奇，未能博取科名。亨中娶蔡家长女，育有三女，无男。蔡氏卒，继室庄氏，举二男；亨中早卒，长者刚刚五岁。

万历四十二年（1614）深秋，丁亨中远道前来同安探视岳翁，蔡献臣有诗纪其事：“相思命驾向铜城，如玉仙郎秋水清。宝瑟重更初在御，瑶琴欲鼓未成声。文章识子垂髫日，丘壑宜予避世情。万里青云看直上，篱花泛酒泪同倾。”^③早年献臣读亨中文章，那是亨中不过是垂髫少年，有如秋水。而亨中此行来访，前此两年，献臣长女已经化为异物。秋风中，献臣忆女，亨中悼妇，相顾凄凄，同倾泪水。

七、蔡献臣次女适金门陈基虞子元鏞

蔡献臣《诰封中宪大夫知府仰台陈公暨配封恭人许氏墓志铭》：“献臣与陈志华宪副，束发为文字交，已同举。戊巳，又获缔姻好。盖相视莫逆也……元鏞，庠生，娶子女。”^④诰封中宪大夫知府陈公，即陈基虞父廷佐。陈志华，即陈基虞。基虞（1565-1642），字志华，号宾门，同安县浯洲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次年成进士，与蔡献臣同榜。官南雄司理、广东按察司副使、南刑部郎中。《清白堂稿》卷一卷端署名：“婿陈元鏞季和、外孙丁榘幼宰、陈涑同校阅。”献臣婿陈元鏞，字季和。

基虞家多藏书，不乏稀见本。万历三十五年（1607），闽县徐渤客金陵，其题《程氏演繁露》云：“见谢在杭案上有此本（《程氏演繁露》），乃曹能始得之山阴张浙门，张得之焦漪园，盖钞之密阁者也。未几能始索归，在杭不无怏怏。余适主能始署中，遂以授余，余举以质陈宾门大理，陈云其家有刻本，于中讹舛，可藉而校也。丁未秋日。”^⑤徐渤为明代东南藏书一大家；谢在杭，即谢肇

① 蔡献臣：《祭丁室亡女文》，《清白堂稿》卷十六。

② 蔡献臣：《祭长婿丁亨中文》，《清白堂稿》卷十六。

③ 蔡献臣：《丁亨中贤坦深秋远顾情见乎词》，《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④ 《清白堂稿》卷十六。

⑤ 徐渤：《程氏演繁露》，马泰来：《新辑红雨楼题记》正编〇五七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澗；曹能始，即曹学佺；漪园，即焦竑，都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这几位为一部《程氏演繁露》钞本费了很多心力，无奈讹舛太多，无可参校。没想到出生在海上的陈基虞却藏有《程氏演繁露》刻本，解决了曹、谢、焦、徐的难题。这个刻本，当是明代早期刻本，也可能是宋元本。基虞亦能诗，曾与曹学佺等酬倡。

万历四十一年（1613），同安铜鱼亭落成，蔡献臣与姻亲陈基虞、张廷拱等往游，有诗纪其事：“神鱼迎水跃，天马护亭斜。奇迹何年隐，胜游此日夸。午风催急雨，夜月坐平沙。隔堞堪呼取，如澗不用除。”^①万历四十二年（1614），蔡献臣同陈基虞、洪有助登同安梵天寺罗汉峰，亦有诗纪其事：“罗汉峰头共浊醪，翻疑五日是登高。四围树杪云山合，一望江门雪浪号。老衲犹传当日事，通家何惜片时豪。招魂愧我负心在，知己难挥宋玉毫。”^②洪春寰，即洪有助（？-1637），字春寰，福建同安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蔡献臣与陈基虞，三世之交，有通家之好。

崇祯四年（1631），蔡献臣与陈基虞及蔡复一弟蔡仁夫倡修太武山海印岩寺：“太武者，浯洲之宗也。海印岩所以庄严神居，而浯人时攀跻而游憩焉。巍巍乎、奕奕乎，宏规也哉！夫岩宇之废兴，亦吾浯文事所关隆替也。万历初，金令公及先肖兼公倡修之。天启丙寅，陈宾门、蔡仁夫与予复倡修之。”^③太武山为浯洲最高峰，连绵十数里；海印岩寺在北部半山。万历初，此寺蔡献臣祖蔡标曾倡修过，半个世纪后二蔡一陈，再次倡修。

崇祯七年（1634），陈基虞年七十，蔡献臣有诗寿之：“一从弱冠托交心，五十年余气谊深。踈踈畏途同拙宦，归来三径快披襟。世情静里看应破，诗思醉醒时一吟。希岁欣逢介寿日，羨君绕膝尽璆琳。”^④蔡献臣与陈基虞既是同乡，举人、进士又是同年，结交五十年。除了寿诗，蔡献臣还为陈基虞作了一篇寿序，略云：

白头而能新，则又难。忆予与宾门翁初倾盖也，翁甫十八，予长二龄。其意气联，其坝篋合，其试督学也共后先，其上公车也共朝夕，其掇科第也共子丑。今五十年余矣，头白矣，赋归来矣。其在宦途也，无数月不通书问；其家居也，无数日不相晤语。且予之女结褵于翁子，翁之孙女许聘于予孙。两人交亲若此，情谊若此，不谓如新，可乎？翁七秩诞辰为今甲戌仲冬廿五，而东床张子于荆偕诸亲知，问祝言焉。予惟己丑之役，闽同升者三十一人，今独两人在耳。即三百五十人中，亦不乏大拜三独，而今在朝者，仅一程司空肖莪也。予两人又如苍生何？

顾予揣所不及翁者多矣……令子克鸾、季和，俱负青云器，而内外儿女诸孙，济济已二十人^⑤这篇寿文记载陈基虞某些情况，很具体：一，陈比蔡献臣少两岁，献臣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陈则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二十五日，至今两人结约五十年；二，蔡、陈相识在基虞十八岁之时，即万历十年（1582）；掇科第同一年，蔡献臣成举人在万历十六年（1588）、成进士在万历十七年（1589），陈基虞同；三、基虞二子，克鸾、季和（元鎔）。蔡、陈万历己丑科进士，同榜闽人三十一人，包括林尧俞、黄华秀、蔡懋宾、柯凤翔、将孟育、王志远等，如今健在的只剩下他俩，也都到了七十、甚至过了七十。寿文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一个事实，即蔡献臣嫁女基虞之子，后来献臣之孙还娶了基虞的孙女，亲上加亲，可见两姓契合之密。

① 蔡献臣：《铜鱼亭成邀林负苍陈宾门张辅吾三君夜坐上》，《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② 蔡献臣：《五日同洪春寰陈宾门邀兰溪赵玄枢世兄于梵天寺晚登罗汉峰》，《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③ 蔡献臣：《辛未太武岩门堂僧舍募疏》，《清白堂稿》卷八。

④ 蔡献臣：《寿陈宾门完副七十》，《清白堂稿》卷十二卷下。

⑤ 蔡献臣：《寿完副陈宾门亲翁七十序》，《清白堂稿》卷六。

结论

以上我们简要考察了蔡献臣自己及其三子（除二子蔡甘岳翁存疑）二女的婚姻状况，两代六人的姻亲都是进士（五位姻翁，一位姻兄），这一状况，在蔡献臣父辈以上是见不到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蔡献臣自其祖蔡标成举人，到献臣父贵易已经有两世科名，到献臣已经有三世。婚姻是双方的，你要挑选人家，人家也会挑选你，假如你没有两世三世科举功名，开口便要娶人家进士女为妇，或者把己女配适进士之公子，恐怕自己也没有很足的底气。可见科举功名、世宦之家也得靠积累，仅仅一代成就功名，似乎还是不完全的可靠。

从十七郎迁入平林（琼林）至蔡标凡十五世，琼林蔡才有第一位读书人乡试中式，紧随着有蔡贵易、蔡守愚和蔡献臣接连成进士。一个科举家族的兴起已经不容易，瓜瓞连绵，延续数代更难。尚未登上科榜的，除了个人的刻苦努力之外，有时还得倾其一家一族之力去支持其中某一位去“冲刺”，科考看似个人之事，其实也是家庭甚至家族的行为。一个人中举、特别是中进士之后，他和他的家族总是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继承科第的香火，而科第香火的承继，靠的是繁衍子孙后代。子孙后代是否优秀，又不能不和婚配有关系。于是，科举成功的年长者，对子孙的择偶往往非常慎重、甚至严苛。蔡献臣同乡、辛丑科会元、廷试二甲一名的许灏，进入翰林院后写信给伯父说：许家八代人都有文化，能写诗，到了我好不容易才有科名，你看有多难；咱们许家的科举功名不能断，如果侄儿尚无婚约，一定要找一个读书有文化人家的女子，不能着急。蔡贵易想法也差不多，到了蔡献臣已经三世科名（到了献臣次子蔡甘，天启贡生，已经四世），在一郡一邑的地位已经高过许灏家族，因此在为子孙择偶的过程中，要求也就更高，其姻亲是清一色的进士人家，这在浯洲小岛恐怕是唯一的，在泉郡、同安城恐怕也不多见。

女子适何家何族，也不能小觑。献臣二女所适也都是进士之家。浯洲另一名进士蔡复一，官至少司马，卒赠大司马，无子，其女适晋江林欲栋子文昌；欲栋，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与蔡复一同榜，官至工部尚书。复一卒，其集由弟仁夫整理，未竣，仁夫卒，最终由婿林文昌完成并刊刻。我们现在看到的崇祯刻本《清白堂稿》，由献臣子学光、孙大壮等编，而校阅者则有婿陈元鎔、外孙陈涑；另一丁姓外孙丁榘。蔡复一也好，蔡献臣也好，其集的刊刻流传，外家科举文化家族的传承也起了重要的重要作用。

蔡贵易、蔡献臣父子，为子孙择偶，除了门第之外，还有两条标准，一是尽可能找同乡。蔡献臣岳翁，同安县嘉禾屿人，嘉禾与浯洲仅隔一水；蔡献臣姻亲陈基虞是浯洲人；张廷拱，同安大嶝岛（民初属金门县）人。丁启浚是同郡泉州晋江人。只有林士章是漳州漳浦人。蔡献臣移居同安城，从同安到泉州、漳州一两天的路程。献臣长女适晋江丁启浚弟丁亨中，长女病疾，献臣前往探视，一两天路程，他还嫌路途遥远。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婚是嫁，姻亲都是闽南人，讲闽南话，用闽南习俗，彼此生活习惯基本上没有差别，蔡贵易父子的考虑不可不谓周详。其次，蔡贵易、蔡献臣为子女择偶，姻亲大多也是“熟人”。蔡贵易与池浴德是同年进士，蔡献臣与丁启浚是同年举人，与陈基虞是同年举人、同年进士，与林士章、张廷拱是前后科进士。蔡贵易、蔡献臣并无刻意寻觅门第更高的家庭家族，而是尽可能选择知根知底的同年朋友为姻亲，以确保婚后子女婚姻的相对和谐。蔡献臣次子学光娶丁启浚女，蔡丁两家犹如一家，献臣又把女儿嫁给启浚之弟亨中；献臣次女已经嫁给陈基虞子元鎔，过后，其孙又娶陈氏孙为妇。这两点，却都很现实，也很在理。蔡献臣生活年代离明清易代的时间点已经很近了，蔡氏子孙经历改朝换代及清初严酷的迁界，琼林蔡氏作为一个科举世家，总体上仍然傲然雄视浯洲一岛。

蔡复一与金门同乡交游诗歌考释

蔡振念

(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 台湾 高雄 80424)

摘要: 蔡复一是明朝万历年间金门籍诗人, 与晚明同时代的许多重要诗人多有往来, 名籍可考者共 104 位, 不可考者 20 位。他和湖北竟陵钟惺和谭元春二人过从甚密, 最为人知, 他和当时八闽文人, 也几乎都有交情, 八闽友人占了诗中名籍可考友人的一半, 共 52 人, 可见他对同乡情谊的重视。至于和他同为同安浯州(金门)的友人, 则有 9 位, 其中除陈如松和张日益二人为举人外, 其他七位皆有进士头衔。金门同乡中, 和他诗文往来最多的, 是与蔡复一同被称为“同安二蔡”之一的蔡献臣, 蔡复一共寄给蔡献臣 16 首诗, 两人除了诗才相当之外, 又有同宗之谊, 在北京为官或回归故里都有往来。当然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陈基虞, 陈基虞娶蔡献臣表姐王氏, 蔡献臣女嫁与陈基虞三男元鏞(季和), 因此陈基虞不仅是蔡复一的表姐夫, 两人也是儿女亲家, 蔡复一寄给陈基虞六首诗。其他如张继桂四首, 张廷拱三首, 陈如松两首, 张日益、蒋孟育、苏寅宾皆为一首。从往来诗文的多寡, 似乎也可看出蔡复一与他们交情的深浅。

关键词: 蔡复一; 金门; 同乡; 情谊

一、叙论

中国人重视乡谊, 所谓人不亲土亲, 因此旅居在外, 每有同乡会及同乡会馆之设立, 以连络同乡情谊。文人以诗文会友, 同乡之间, 总会诗文酬答, 或增进感情, 或叙乡思。蔡复一(1576-1625), 字敬夫, 号元履, 是明朝万历年间金门籍诗人, 与晚明许多同时重要诗人多有往来。例如他和湖北竟陵钟惺(1574-1625)和谭元春(1586-1637)二人皆有诗文互赠, 过从甚密。蔡复一和竟陵派的关系, 始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 35 岁时在北京结识钟惺, 随即他便从京师郎职转任湖广参政, 两人在京师诗文酬唱不多。万历三十九年蔡复一入楚任湖广参知政事之后, 钟惺引介了谭元春, 他始与竟陵二友有较密切的往来, 并谈文论诗。前人多以为蔡复一景从竟陵, 如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闽人有蔡复一字敬夫者, 宦游楚中, 召友夏致门下, 尽弃所学而学焉。”^①其后朱彝尊(1629-1709)也说:“《诗归》出, 而一时纸贵, 闽人蔡复一等, 既降心以相从, 吴人张泽、华淑等, 复闻声而遥应。”^②清陈田(1885-?)辑《明诗纪事》则载蔡复一“醉心钟、谭, 摩拟酷肖。”^③其实蔡复一成名较钟、谭为早, 不可能去学晚辈的诗, 笔者另有论文详述, 此处不赘。

本文所欲细论者, 为蔡复一和金门同乡间的诗文往来, 从附录蔡复一交游人名考中可见, 在蔡复一诗集中人名可考的一百余人中, 八闽诗人占了 52 位, 和其他省份总计的 52 人相同, 可见蔡复一对同乡情谊的看重, 在八闽诗人中, 金门籍共有 9 位, 几乎可以说当时金门有科举功名的诗人,

作者简介: 蔡振念, 男, 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绛云楼本, 中国哲学书: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91958>。

②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七,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502 页。又此书蔡复一条下断句误为“蔡复, 一字敬夫”, 第 438 页。

③ 陈田辑:《明诗纪事》庚签卷十, 台北:明文书局, 1991 年, 第 154 页。

蔡复一皆与其有诗文赠答。以下试析论这些诗人生平及蔡复一之赠诗。

二、蔡复一与金门同乡之往来

(一) 陈志华

陈基虞(1565-1643),字志华,号宾门,泉州同安金门阳翟人,万历十六年(1588)与蔡献臣、黄华瑞、黄华秀、张继桂、吕大楠、蒋孟育等金门乡亲同科举人;越岁又与蔡懋贤、蔡献臣、蒋孟育、黄华秀等金门人同榜进士。陈基虞为人重孝友,性耿直。蔡献臣《寿陈宾门亲翁七十序》云:“翁令浙理粤,历南曹副臬宪,守廉守顺守章者三载,所在着声。”已可知其仕历。中进士后初任浙江萧山县令,因逆忤权势左迁,左迁为徽州国学教授,再转任广东南雄府推官,征收桥税,岁入万金,一分不染。调任新会税监,救活百名受冤士民,升南京刑部曹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2)出守廉州(今广西北海市),转任柳州同知,再转广东顺德县令,万历四十七年,已升任四品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分守岭东道。崇祯元年之前,又转任河南彰德知府,任彰德(今河南安阳县)刺史时,京畿猝警,大中丞范景文披星入援,陈基虞措置军需,有条不紊。陈基虞著有《客斋诗话》六卷,现存明钞本、明刻本,存国家图书馆。^①生平见《同安县志》卷十五选举、卷二八《陈基虞传》、《金门志》卷十宦绩、《泉州府志》卷三十五选举三、《神宗实录》卷五七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辛未、《万历十七年进士履历便览》。其墓在同安县十二都山后郑感化古坑。又蔡复一撰《皇明洪见泉公郑太孺人合葬墓志铭》,为其丹书者陈基虞,其职衔有“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奉敕整飭山防、分守岭东道”^②。陈基虞娶蔡献臣表姐王氏,蔡献臣女嫁与陈基虞三男元鏞(季和),陈基虞女则适同年张继桂子龙溪太学生乔楠,生子火奋、火昌。蔡献臣与陈基虞父陈仰台为忘年之交,曾为其撰《寿封廷评陈仰台翁开八秩序》。献臣崇祯六年(1634)有《寿宪副陈宾门亲翁七十序》、另有诗《寿陈宾门宪副六十》《铜鱼亭成邀林负苍、陈宾门、张辅吾三君夜坐》《五日同洪春寰陈宾门邀兰溪赵玄枢世兄于梵天寺晚登罗汉峰》《寿陈宾门宪副七十》,并在天启三年(1623)为其父母撰《诰封中宪大夫知府仰台陈公暨配封恭人许氏墓志铭》^③,铭文云:“献臣与陈志华宪副束发为文字交,已同举戊巳,又获缔姻好,相视莫逆也,因以年家子,事其尊人仰台翁者四十年……翁卒,志华问地于参藩洪公纤若……”(《清白堂稿》,第1396页)曹学佺《石仓诗稿》卷二上中有《雨中别旧署呈陈志华寮长》,徐火勃《鳌峰集》卷五、十九有与陈志华诗二首。是陈志华与当时八闽诗人都有往来,与蔡献臣为同年,又是儿女亲家。

蔡复一有《送陈志华之官南都》寄陈基虞,诗约写于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间(1603-1606),时陈志华由广东南雄司李(即司理)改官南京刑部曹郎,赴南京履新。诗共三首,其一云:

忆昔燕市月,鸟鹊照南飞。罗浮入我梦,梅花起徘徊。言笑乍云展,瞬间行及之。浮云立马首,仆夫策其绥。胡为乎八载,梦多见面稀。一见不可抚,醒梦是耶非。酒尽花无色,天风吹别衣。送子自今日,我梦昨留畿。寸心谅匪隔,形影岂云违。明月随去住,处处托幽辉。

首句燕市指北京,应是蔡复一在北京曾与陈志华共事,后陈志华调职广东。第二联中罗浮乃山名,在广东,陈基虞曾任广东南雄府推官,南雄地近罗浮山。按清道光武念祖修《广东通志》卷二

^① 参考陈长庆:《道范颜馨·五桂联芳》,金门:金门文化局,2018年,第115-120页。

^② 见何丙仲、吴鹤立:《厦门墓志铭汇粹》,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见蔡献臣:《清白堂稿》,金门:金门民政局,1999年,第443、1063、1089、1152、1197、1396页。

四八载陈基虞由进士授南雄府推官。又清道光胡德琳修《直隶南雄州志》卷三载则其任南雄推官在万历二十八年。又《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一二九载其由南雄司李（推官）晋南刑曹郎。但由蔡复一寄陈志华第三诗中“棘署”一词，推知陈基虞恐非任刑部郎，而是大理寺。另由第二诗“太姥”一词可知蔡复一时在同安故里居丧，则陈志华任南京大理寺当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到三十四年间。蔡复一万历二十四年始任北京比部郎，两人当时同在北京，由诗中八载推知，陈基虞转官南京，最可能在万历三十二、三十三年间。第二首诗云：

谢公有遗尚，谪仙振其狂。我欲寄一杯，酌之洗齐梁。惜别兼怀古，斟酌意何长。行矣无以赠，赠子钟山苍。钟山青莲色，千载棠相望。我立太姥巔，揽接灏气光。燕子矶下水，入海归茫茫。

首句谢公指谢安，曾隐居南京钟山。谪仙则指李白，唐开元十四年（726），李白首次来到南京，写下《长干行》《金陵城西楼月下吟》《金陵酒肆留别》；天宝七年（748），李白第二次来到南京，一直住到天宝九年（750），这一期间，李白写下许多诗作，其中以《登金陵凤凰台》《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为著名；天宝十三年（754）春天，李白和朋友魏颢又一次来到金陵，一直到秋天才离开。这一次，他留下《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等诗作。上元二年（761），李白在流放夜郎归来后，最后一次来到南京。第二联中齐梁是说南朝齐、梁皆以南京为都。第三、四联写惜别之意，第五联中太姥为山名，在今福建福鼎市，位于福州北250公里。参见蔡复一年谱，可知万历三十至三十四年间，蔡复一在福建同安居丧，诗正作于此时。

第三首诗云：

河洛昭禹功，丰镐壮周京。汉臣初上日，衣冠拜孝陵。双阙标牛首，王气朝太清。棘署丰休暇，挾藻于天庭。堤柳太平绿，湖光玄武青。游人惜烟景，志士眷令名。鸿鹄思千里，助子以遐征。

首联用周京代指南京。第二联汉臣指陈志华，孝陵乃明太祖陵墓，在南京。第三联写南京景物，牛首乃山名，在南京市郊。第四联棘署乃大理寺之另称，以大理寺多种棘故。清厉荃《事物异名录·宫室·贡院》：“历代沿革，大理寺曰棘署，又曰北寺。”陈基虞曾任职刑部，文献不见其任大理寺职，此诗可补文献之缺。挾藻谓舒发文藻，天庭指朝廷，此处也是代指南京。第五联以下以景作结，终以陈志华远从广东入南京之意。

蔡复一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秋居丧期满，北上北京复职，有《濠梁寄陈志华社丈》三首七绝寄在南京大理寺任职之陈志华，第一首中秣陵即今南京市。诗题中之濠指濠水，一名石梁水，由今安徽凤阳县境东北流至临淮入淮河。诗云：

送君去岁自西风，此日西风叹转蓬。遥想秣陵清夜月，一尊秋色与谁同。（其一）

寒鸦落照满江阴，南去江声共此心。客里题书销夜漏，风林如雨一灯深。（其二）

衣带年来暗自知，黄花何日共东篱。依然濠上观鱼地，不是惠庄交语时。（其三）

蔡复一此三诗写在濠梁旅次，思陈志华而不得相见，只能遥想南京清夜，对月怀人。第三首“衣带年来暗自知”盖指因居丧而消瘦，结以他日若得濠上相见，则应共语交情，非若庄子、惠施为鱼乐之辩。

（二）蔡献臣

蔡献臣，字体国，号虚台，同安金门平林人，与蔡复一被誉为同安二蔡，官至南京光禄寺少卿，

《金门县志·人物志·人物列传·乡贤》、《同安县志》卷一五选举、《泉州府志》卷三五选举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①著有《清白堂稿》，存天启六年《祭司马总督蔡元履文》《邑绅会奠蔡元履总督文》《司马总督蔡元履公正气祠引》三文，卷四有崇祯二年己巳《清宪蔡公通庵全集序》，诗有《送蔡敬夫大参入楚》《酌茶怀蔡敬夫》《哀蔡敬夫大葬》《喜蔡敬夫比部入都兼读新诗》《步韵送蔡敬夫方伯赴召之易州》《挽蔡敬夫总督三首》。^②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七十有蔡献臣传，言王世贞赞其为不世出之才，而献臣受学于同里苏紫溪君禹先生。

蔡复一为蔡献臣母亲写有《寿蔡母黄太淑人八秩叙》，文中言自己兄事献臣。蔡献臣在崇祯二年《廿不林止岩存稿序》中，回忆万历三十八年到四十三年间因楚事辞官家居，与蔡复一相过从，云：“自予镌秩澄江，而君（林止岩）拂衣五羊，林间过从，臭味相投，盖蔡清宪敬夫，亦归自楚，二三兄弟，无旬日不会，无会不醉，无世事心事不谈，无谈不尽。”（《清白堂稿》，第291页）可见二人交谊之洽。又在《四书肤证序》云：“予功暇于四子之书，偶有所窥，辄识之……持就正于敬夫先生，敬夫亦时出卓诣，以启予蒙也。”（《清白堂稿》，第265页）

蔡献臣《清宪蔡公通庵全集序》称蔡复一：“公博学才高，下笔千言，弱冠尤工四六，其诸著作皆崇论宏议，涵古茹今，至书牒、奏议之文，慷慨谈天下事，切劘豪贵，披吐肝胆，无所避忌，而诗则出入汉魏、盛晚唐之间，盖居然一代名家。”又蔡献臣在天启二年上书叶向高，向时为内阁宰辅的叶向高推荐蔡复一出任辽东经略、巡抚，当时辽东广宁失守、黔蜀多事，蔡献臣《上叶台山阁老书》云：“夫奴酋之所以猖獗至此者，由吾封疆无人也，所以无人者，无实心任事之人也。以饷则但知加编请帑，而不知清查，以兵则但知闽浙楚蜀，而不知训练。抚辽者言战而不求所以战，经略求守而不知所以守。且战则不足，守或有余，何至抱头鼠窜而尽弃河西之地以与奴哉？愚见山海设经略，必添巡抚，元履方伯倘亦其选乎？”其后蔡复一虽未出任辽东巡抚，但其抚黔，或许与蔡献臣之推荐不无关系。另今人蔡主宾编有《蔡献臣年谱》，张建腾撰硕士论文《金门蔡献臣研究》。^③

蔡复一在万历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间（1605-1606）有《寄蔡体国》诗云：

榴火湿犹燃，荷规柔竟吐。是时祖帐人，车马即前路。感此河梁心，转诵停云句。命爵影自凄，沉吟不能御。匹练何茫茫，吴门隔烟雾。出为威风姿，处安泽雉步。翔沈理则然，勗哉保贞素。嘉树各怀新，嚶禽恍念故。

万历三十三年夏，蔡复一尚在同安居丧，蔡献臣则赴常镇兵备大参，蔡复一有《送蔡体国参藩吴中》四首，本诗或许是送蔡献臣赴吴中后再寄之作。首联中榴火指榴花五月开花，花红似火。荷规，荷叶圆形，故云荷规。万历三十二年（1604）十月，蔡献臣自北京仪制司升任常州镇江兵备大参兼湖广参政，从北京移官吴中，在吴中六年。蔡献臣赴吴中之前，回到同安老家，隔年万历三十三年夏始上任。首联两句是追忆万历三十三年夏天祖饯蔡献臣赴吴中之辞。第三联河梁用李陵诗典故，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后人因用为离别之代称。停云句指陶渊明有《停云诗》，此用来赞美蔡献臣诗比陶潜。第四联命爵指饮酒，由“影自凄”三字可推知蔡复一时尚在服丧中。第五联吴门指蔡献臣所在的吴地。

蔡复一另有一首同名《寄蔡体国》诗云：

未了百年事，浮生愧半残。魂犹恋鸟鸟，影敢傍鹓鸾。尔劝出山蚤，吾歌行路难。有天堪

① 蔡献臣生平详见蔡主宾：《蔡献臣年谱》，金门：金门文化局，2005年。

② 蔡献臣：《清白堂稿》，第744、746、1085、1094、1104、1135、1169、1184页。

③ 张建腾：《金门蔡献臣研究》，硕士论文，台北：铭传大学中文所，2004年。

洒泪，何地可弹冠。

首联中半残指蔡复一体弱，又病眼，故云。第二联中“恋乌乌”指思念慈亲，或可推知同为居丧时所作。末联弹冠用《汉书·王吉传》典故：“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比喻好友进退相同，仕隐一致。

蔡复一在万历三十年（1602）秋有《入都门蔡体国仪部移榼夜饮》，万历二十九年秋，蔡复一疏养南归同安，万历三十年秋返北京，而据蔡主宾《蔡献臣年谱》，蔡献臣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补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则蔡复一入都门必在万历三十年九月之后，由诗中“残花怅夏”可知。同年十月蔡复一丁忧，又回到同安守丧，蔡献臣又在万历三十二年出任常镇大参，从此未再到北京，两人已无缘再聚北京。诗云：

赋别残花怅夏园，寒云燕市共青樽。故人除目薪犹积，久客尘容剑已昏。倦后抛书因病肺，愁中听曲亦销魂。双珠夜动随侯色，未信暗投能报恩。

首联写北京都门共饮，次联除目谓授官之文书，盖其时蔡献臣新任仪制司郎中。积薪用贾谊《新书·数宁》典故：“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久客者，时蔡复一在北京郎官职已有七载，故云。末联随侯典乃传说古代随国姬姓诸侯见一大蛇伤断，以药敷之而愈；后蛇于江中衔明月珠以报德，因曰随侯珠，又称灵蛇珠，见《淮南子·览冥训》。万历三十年，神宗皇帝已久不上朝，朝政腐败，因以明珠暗投喻蔡献臣之入京。

据蔡主宾编《蔡献臣年谱》，献臣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月由浙江提学副使升光禄寺少卿，但不赴任，而是告假返乡侍亲，此时蔡复一正辞官在同安东山壶隐草房杜门读书，有《送蔡体国光禄》五首寄之，由第四首诗中斑衣娱亲可知，此组诗是送蔡献臣告假返同安侍亲之作。第一首诗如下：

倾阳久矣托丹葵，吟到堂萱日亦迟。自古治朝犹外戩，岂今王事可家辞。主恩难报同乌哺，边计何方折马捶。寄语安危凭将相，忧天莫厌杞人痴。

首联出句指忠君，落句指孝亲。堂萱，《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传：“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陆德明释文：“谖，本又作萱。谓北堂树萱，可以令人忘忧。古制，北堂为主妇之居室。”后因以萱堂指母亲的居室，并借以指母亲。第二联中戩字古同惧。第三联折马捶，折字原作拆，误。捶，马鞭、马杖。《后汉书·邓禹传》：“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言用短杖即可制敌。万历四十六年，北方金人已日益强大，屡次犯边，故诗末蔡复一有忧国之思。第二首云：

鸿臚交持竟未休，谁于沧海拯横流。湍劳怯问安鳞影，荷弱虚将作柱谋。汲黯淮南曾见惮，夷吾江左赖蠲忧。丁宁造化待吹律，老我春光私一丘。

万历晚年，国事已不可问，蔡献臣于此时升光禄寺少卿，蔡复一有以国事托献臣之意，故首联有拯横流之说。第三联汲黯句指淮南王刘安欲反，惮于汲黯之正直，见《史记》汲黯本传，是用汲黯比喻献臣。夷吾江左用王导典，东晋南渡，温峤忧心国事，及见王导，欣然以为江左之管夷吾，不复忧，见《晋书·温峤传》，是以王导期待于献臣也。第三首云：

剑气怀中动斗文，奇人合使四夷闻。众思时集铜龙阙，昌议首观光禄勋。当食为君聊借箸，孤臣有母每瞻云。梧桐丹穴俱关念，却羡闲江鸥鸟群。

此诗首联用张华典，《晋书·张华传》载“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伟象，乃要焕宿，因登楼仰观。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大耳。’华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

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遣使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也是以龙泉宝剑寄望献臣之意。第三联借箸即借箸代筹，按光禄寺主皇宫中膳食，喻蔡体国在饮食中亦可为国筹谋。末联丹穴典出《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名曰凤凰。”凤凰非梧桐不栖，故以凤凰丹穴代指朝廷。全诗以忠孝难以两全，仕隐不能俱得寄意。第四首云：

虚席金华已两春，徘徊天地为君亲。由来忠孝无歧路，其奈行藏只一身。客里莺深花作伴，梦回钟半月关人。彤弓过里斑衣好，恍肯烟萝访旧邻。

首联指蔡献臣万历四十五年升任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万历四十六年补升光禄寺少卿，在金华、杭州一带任官两年，故云“已两春”。第二联乃是忠孝不能两全之意。末联彤弓见《诗经·小雅·彤弓之什序》：“天子赐有功诸侯也。”斑衣典出《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孝子传》载老莱子斑衣娱亲事，烟萝，喻隐居。此首写蔡献臣赴光禄寺卿前返乡侍亲也。第五首云：

经年劝驾语依依，及此河梁意有违。虎鼠总应吾道是，笠车忍说故情非。归时履倒为开酒，送后琴孤当掩扉。但使苍生酬一出，野夫小隐亦光辉。

首联写二人交情及分别，河梁典出李陵《与苏武诗》别诗：“携手上河梁。”第二联虎鼠喻二人才气有若云泥，他日前程亦自不同，笠车典出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后用“笠车之交”喻不因富贵而改变贫贱时的交情。末联苍生用谢安典故，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小隐典出晋王康琚《反招隐》：“大隐隐朝市，小隐隐藪泽。”白居易有《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为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前句以谢安喻献臣，后句以小隐自喻。

万历三十二年（1604）冬，蔡复一服丧家居，蔡献臣则由北京礼部仪制司升任常镇兵备大参，守镇江、常州。蔡复一有《送蔡体国参藩吴中》四首送之：

寒梅如雪送君行，到日宾鸿已此征。铃阁昼闲回首处，一声离恨过江城。（其一）

勾吴遗迹水烟凝，揽輿千山爽气澄。见说让王风渐杳，下车先为表延陵。（其二）

民力东南望岁频，甘霖急洗万家春。九阍莫道天难问，终藉兴云四岳臣。（其三）

生来自许骨嵯峨，纁紫宁教意气磨。半壁障天推砥柱，金焦无恙锁沧波。（其四）

第一首先点送别之时节，第二联中“铃阁”典出《晋书·羊祜传》：“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后以铃阁指翰林院以及将帅或州郡长官办事的地方。第二首中，勾吴即吴国，明杨慎《升庵经说》云：“越曰于越，吴曰勾吴，邾曰邾娄，本一字而为二字，古声双迭也。”让王者，公元前六世纪中，吴王寿梦欲传位幼子季札，季札让于兄诸樊而避居乡野。诸樊死后，寿梦次子余祭再让季札，季札仍不受。余祭于是封季札于延陵。第三首则以官箴比甘霖，地方官若能爱民如子，则如山岳之臣之兴云雨而致甘霖。第四首中，纁紫即官员身上佩带之紫色印绶，喻地位显贵。《文选·扬雄·解嘲》：“青拖紫，朱丹其毂。”金焦指镇江之金山、焦山，二山与北固山合为“京口三山”，旧时三山均在江中，约百年前，北固与金山相继与陆地接壤，独焦山仍在江中。北固山为长江之中流砥柱，此有以山喻蔡献臣之意。

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秋间蔡复一奉使返故里，此后居故里两年，直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

秋补武库郎，始上北京。过姑苏时，闻蔡献臣被劾，有《姑苏闻蔡体国被言投劾寄讯》四首寄之，按万历三十七年，蔡献臣在樵李，仇家沈一贯等借万历三十一年楚藩事件及万历二十六年妖书事件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蔡献臣因与郭正域立场一致而受牵连，被降调。所谓楚藩事件指楚恭王亡故，有遗腹宫人胡氏生孛生朱华璧与朱华奎，万历三十一年，楚宗人朱华越上书称二子非胡氏生，蔡献臣认为事以同小可，宜派相关官员会勘。所谓妖书事件万历二十六年郑贵妃刻《闰范图说》一书，被指为想藉此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皇太子。蔡献臣被降，于是辞官回乡，蔡复一以四首诗慰之，诗云：

朔风吹雁过江湄，病里闻君闭阁时。无限浮云遮去日，今宵求梦月明知。（其一）

出门不是受怜人，犹恐功名妒叶身。圣主如闻能计吏，先开谤篋慰劳臣。（其二）

飞云长忆御潘舆，一疏翻成赋遂初。乞得闲身归傍母，斑衣应谢铄金书。（其三）

五年甘雨洒吴关，容易清风拂袖还。别有泪波涨江水，归无愧色上东山。（其四）

第一首写过姑苏，诗中浮云遮去日乃奸臣遮蔽君听之常用典故，李白诗：“总谓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愁”是也。第二首暗讽神宗为昏君，不能分辨谤言。第三首潘舆用潘岳《闲居赋》典：“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后以潘舆为养亲，蔡献臣以亲老辞官，故云。次句写蔡复一被劾，因得以返初服，按晋孙绰（314-371）有《遂初赋》，写隐居之乐。第四首吴关指万历三十四年秋，蔡复一服满回京补驾部郎，过吴地时和曾蔡献臣相会，时献臣为常镇兵备大参。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献臣受谤降调，辞官返乡养亲，前后五年。句末东山在蔡复一和蔡献臣故里同安城外。

（三）陈如松

陈如松，字白南，同安金门人，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顺天举人，初授萧山令，以忤上官，调信宜令，今广东茂名县辖，后升任江苏太仓知州，天启四年告老还乡。传见《金门县志·人物志·宦绩》《同安县志》《泉州府志》《太仓州志》《浙江府志》。陈如松著有《莲山堂集》二卷，成书于崇祯甲申（1644），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一二下有《送陈白南太仓赴京谒补》，作于崇祯三年辛未（1631）。蔡复一有《送陈白南之信宜县》诗，应作于万历四十四年自辰州自解前后，诗云：

受命有冬青，雪霜神吐翕。独活小草耳，耿然风中立。沈疴久罢藩，强项亦改邑。各以疵吝招，敢言网罗急。妻孥谪薄装，朋友念煦湿。君真古人意，此事我不及。茶酒相往旋，微言冷冷入。颇觉吹万中，别有磁针吸。古之通识人，于时顺动蛰。三径既无资，荷衣容遽辑。烹鲜理不苟，匪徇雁鹜粒。曼容游亦漫，尚平言可执。当出订归盟，送君多一揖。云暖不为霜，幽花静被湿。壮士厉别怀，强诃儿女涩。犹有千古梦，与君关汲汲。勾漏舟晚成，烟波共钓笠。

诗首以冬青比喻陈如松之经寒不凋之本性，再以强项说明陈如松之刚正不屈，按《后汉书·杨震传》：“帝尝从容问（杨）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第四联言陈如松小过失招致网罗。陈白南改官信宜，应是贬谪。蔡复一亦在万历四十四年自辰州自解归。谭元春《少司马蔡公抚黔文》云：“乙卯丙辰间，公在辰阳……有欲用民力于苗者，公执不可，因自解归去。”第八联吹万出《庄子·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玄英疏：“风唯一体，窍则万殊。”指两人在万殊中，个性如磁针相吸。第十联三径、荷衣，皆隐居之代语。第十二联曼容指汉朝邴曼容，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见《汉

书·两龚传》。尚平，典出《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向长》：“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李贤注引《高士传》向字作尚。盖此时蔡复一已有归意，故诗中与陈如松共订归计。末句勾漏在今广西北流县，道书中第22洞天，晋葛洪曾求为令，在此隐居。

此外，蔡复一尚有《寄太仓州守陈白南》诗，应是作于万历末天启初年间，诗云：

坐惜梅未花，寒庭雁声长。了了娄江月，风吹下沧浪。拜书海云色，言笑故人旁。筮易不改井，廉直以自将。医民躬如病，格格暝眩方。斯义不予然，尽室归耕桑。吏牍颺扫叶，孤影袅炉香。静心理研聿，墨气发奇光。笑彼胠篋愚，暗火照空囊。暇辰或幽往，步履弃园荒。吁嗟凉踣性，顾我如雁行。书画娱我独，儿女讯我详。身外事何有，野马烟苍茫。同病互相药，养此百炼刚。奇服易媒指，就阴智所藏。可贫亦可老，古道暗而章。岭松多望雪，崖草亦依阳。枯荣何足言，各保岁寒芳。

首联点出时节，次联娄江则为陈如松所在之太仓，按娄江流经江苏昆山、太仓，由浏河镇入长江。第四至第六联写陈如松为官清廉自持，爱民如子，第七至第九联写陈如松吏事清简，盗贼只能望空囊而叹，胠篋原意是撬開箱子，喻盗贼。第十联至十二联以两人如兄弟之情，以书画自娱，第十三联至十六联言身外无物，隐遁自养。末三联则以松雪暗喻两人之人格，不在意世间枯荣，唯自保性命之清香。

（四）张继桂

张继桂，字廷高，福建同安金门青屿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与蔡复一同榜进士，其父张凤征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张继桂登第后授华亭知县，调松阳，在官清廉，卒官后家中萧然。传见《金门县志·人物志·宦绩》《福建通志》《同安县志》《闽书》。张继桂与陈基虞为乡试同年兼儿女亲家，万历十六年（1588）张继桂与蔡献臣、黄华瑞、黄华秀、吕大楠、蒋孟育等金门乡亲同科举人，而陈基虞女适张继桂子庠生张乔楠。蔡复一有《江上寄华亭张廷高》，诗云：

一作剡溪想，飞扬梦已知。扁舟轻夜发，踪迹恐人疑。渔火鳞鳞乱，荷风淡淡迟。吴江秋未冷，冷在忆君时。

按华亭今属上海市，此诗写作时间不详。剡溪，位于浙江省嵊县南，为曹娥江的上游。有二源，一出天台县，一出武义县，晋时王徽之尝雪夜访戴逵于此。见《世说·任诞》，后用以指朋友相访之典。由诗句推知，应是蔡复一在旅途中有意访时任华亭令之同年张廷高。

蔡复一又有《嘉兴寄同年张廷高》三首，诗云：

秋气由来如远客，天涯远客况兼秋。一声砧杵三江水，何处推蓬不解愁。（其一）

江风瑟瑟片帆孤，远水涵天直到吴。明月兼葭千里色，怀人吾岂为莼鲈。（其二）

白苹报冷万枫丹，准拟离肠诗酒宽。醉减罗衿依旧怯，秋江霜露不胜寒。（其三）

明代嘉兴府在太湖南，太湖水经三江而出海，三江者，北为娄江，流经昆山一带，中为吴淞江，即今苏州河，南为东江，流经平湖一带。第一首以两人皆为同安同乡，却如秋蓬之转宦。第二首用晋张翰典，张翰，吴郡人，一日思吴中莼菜鲈鱼而辞官归里，见《晋书·文苑列传》。诗意表明自己

怀人与张翰之怀莼鲈有异。第三首写秋景，以景见情，景中寓情，明自己薄宦之心境。

(五) 张廷拱

张廷拱(1567-1633)，字尚宰，号辅吾，同安县金门大嶝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安徽怀宁知县，革除官员挟带私船征用民工之弊，据康熙二十五年刊本《怀宁县志》所载张廷拱小传，谓其“少贫，铅槩外间涉猎治生事，至九九会(‘九九会’是旧时营造工程者必习之数学)亦经肆习，以故民间疾痛、公家利病无不洞悉”。转丰城县令，捐奉筑堤以利民，改任迁安县令。天启年间，任祠祭司郎中，转大理丞，因中谗致被削职。崇祯皇帝即位，复官金都御史，巡抚大同，修堡垒，制枪炮，边境以安。因积劳卒，年65岁。《明史·阉党》卷三六〇石三畏传云：“石三畏力诋李三才等十五人，于是三才等人皆落籍”，又“劾礼部侍郎周炳谟、南京尚书沈傲烝、大理丞张廷拱，三人亦获谴。”石三畏是魏忠贤党，张廷拱在那一年被削官不见载籍，但《明史·熹宗本纪》载天启五年(1625)三月，魏忠贤逮杨涟、左光斗等，五年七月，东林党人李三才、顾宪成等削籍，则张廷拱被解职应该也在天启五年秋冬，天启六年他就回到同安的家了。蔡献臣有《寿张尚宰廷尉六十》诗云：“使出公亦中谗口，归来相视心莫逆。探奇三山访休老，世事羊肠何足云。”天启六年，蔡献臣也因为阉党之故不愿赴光禄少卿职，闲居在同安。蔡献臣这首诗应作于天启六年丙寅，若是，则天启六年(1626)张廷拱六十岁，可推知张廷拱生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卒于明思宗崇祯五年(1633)。其仕宦可见《福建通志》卷四五、《泉州府志》《大嶝阳塘张氏族谱》。张燮《群玉楼集》附载了张廷拱书信三封，另他尚撰有《皇明太学生印石洪公暨孺人王氏合葬墓志铭》。^①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五有写于万历二十七年之《题张尚宰就正草》，可知其尚有文集《就正草》，今佚，同一年另有为张廷拱父所撰之《贺张南阳荣寿序》及崇祯十一年为张廷拱夫人撰《张中丞达宜人七秩寿序》、崇祯五年有《祭张辅吾中丞亲翁文》，另有诗《送张尚宰进士令怀宁，怀宁隋名同安》《寿张尚宰廷尉六十》《丙寅八日同张尚宰过牛皮山僧舍》《送张尚宰理寺丞还朝》。^②蔡献臣四男毓光(孚光)，字中卿，号净虎，授恩贡，娶张廷拱之女。

蔡复一有《赋得丰城剑送张尚宰之官》二首，诗云：

匣鸣何太急，神物故相依。风雨群山动，蛟龙一夜归。离心春感激，壮色雪翻飞。试拭华阴土，方知舍日晖。(其一)

一官又雷令，千载自张公。能使沈津气，依然射斗中。伴琴将化水，映鸟果凌虹。莫发牛刀笑，昆吾切玉同。(其二)

诗题目丰城剑已见前《送蔡体国光禄》诗。第一首中所谓华阴土者，清许鏊撰《南昌府志》卷五三《雷焕传》载张华使雷焕掘地太阿、龙泉剑，张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土，以华阴土一斤致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第二首盖以张华喻张尚宰，张华能使雷焕得龙泉宝剑，如张尚宰为官能用人唯才。

蔡复一又有《张尚宰仪部好佛而不肯称诗，用伯起旧韵挑之，时同坐者张先辈，故有末句》诗，应写于天启初年，时张尚宰任礼部仪部司郎中。诗题中伯起者，秦震钟，字伯起，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进士，工古文词，官至知府。传见《福建通志》卷五一。徐火勃《鳌峰集》卷一四有《秦伯起滕惟远招饮避暑》、卷二一有《铁柱宫访秦伯起比部》《谷日坚白王孙招同秦伯起比部邓玉笈别驾彭云征黄洁之文学幼晋景叔景周诸昆仲集自性庵》七律二首。张燮有《词盟纪咏·秦

^① 见何丙仲、吴鹤立：《厦门墓志铭汇粹》，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蔡献臣：《清白堂稿》，第319、485、506、756、1022、1064、1186、1190页。

比部伯起》可知其曾任比部郎。蔡复一诗云：

炎蒸不到地居天，觅句还同演偈年。斋树日微风弄影，佛香午散鸟吞烟。共分石乳蠲朝醉，谁抱骊珠守夜眠。剑气张华今自合，可无光怪吐龙泉。

第一联中演偈者，谓谈禅演偈，指谈论佛学。前四句写张尚宰之好佛，后四句中骊珠典出《庄子》卷十《列御寇》：“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庄子。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齏粉夫！”盖以张尚宰有才而不为诗，如抱骊珠夜眠，龙泉在鞘也。

（六）苏寅宾

苏寅宾，字初仲，号日门，金门金沙蔡店人，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举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进士，初受昆山令，以执法失权贵意，贬宁波府教授，秩满，升国子监助教，累迁海南兵备道，转湖广粮储布政司参议，以不谒督粮权珰，夺职归。传见《金门县志·人物志·宦绩》《泉州府志》《同安县志》。蔡复一有《送苏日门孝廉领赈》，孝廉者，明、清对举人的雅称，可知诗作于万历四十七年苏寅宾登进士前。诗云：

一雨来无择，谁分良牧勤。坐谭良愧我，跋涉乃烦君。岛外皆心气，村边即见闻。恩波何以继，春好麦如云。

观诗意，此或当时年荒，苏日门不能自活，因而赴官府受赈济，以史料阙如，疑不能明。

（七）张日益

张日益，号春斗，又号斗南，同安县阳田保青屿人，进士张凤征之从弟。万历十年（1582）中举人，任安徽灵璧县知县。为官严谨，体恤百姓，因疏导河道征民工，致该县百姓离乡，十室九空。建请改用招募，未被采用，具《灵壁饥穷状》乞宽限，百姓受惠。万历三十四年（1606），因田税未征足被调任王官。时蔡复一服满返京，走安徽梁濠道，过灵璧访张日益。离任时，灵璧百姓为之立碑。见《金门县志·人物列传·宦绩》。王官，王府之属官。张日益撰有《治壁瑟言》，蔡复一为其作序云：“杜甫得元结春陵二诗，而感激有作，余今读斗南张公《治壁瑟言》，叹焉……丙午（万历三十四年）北行走濠上道，时公新有长沙之命邦之旅。”所谓长沙之命邦盖用贾谊典故，可知张春斗被左迁为王府教授。

万历三十四年（1606），蔡复一服满返京，走安徽梁濠道，过灵璧访张日益，时张日益正被调王官，蔡复一有《过固镇、灵璧，张春斗枉驾八十里出会，时君中谗左迁王官》诗云：

浮萍踪迹任乾坤，肯对西风湿袖痕。总为怀人轻远道，相将问旧倒芳樽。劳心忍上催科考，销骨柰深萋斐言。太守似闻嫌密令，微官何意傍梁园。薄游彭泽今差久，遗爱桐乡昔共论。鸿雁渐还因罢役，桑麻新垦欲成村。行渠尚忆负薪苦，吹律全留挟纩温。仙舄未容近元会，长裾又曳向何门。宦无中产田庐挫，归有旧装书剑存。谩说过湘穷贾谊，已传伏阙雪王尊。清淮流尽衔恩泪，高月寒消惜别魂。使者护堤方入奏，乘槎犹可问河源。河上方叙功，君有牵复之望

此诗前四句点出访旧之意，第三联萋斐典出《诗经·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郑玄笺：“喻谮人集作已过以成于罪，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后用以比喻谗言。第四联梁园指汉梁孝王园，在河南开封。张春斗此时官王府，故借梁孝王园指代王府。春斗为

官清正，故第五联以桐乡典比之，按《汉书》卷八九《循吏列传·朱邑》：“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迁补太守卒史，举贤良为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为人醇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僊鳥典出《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上》：“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鳧从东南飞来。于是候鳧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鳧焉。乃诏尚方詠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召我邪？’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吏人祈祷，无不如其言。若有违犯，亦立能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乔也。”长裾典出《汉书》卷五一《邹阳传》：“臣闻交龙襄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今臣尽智毕议，易精极虑，则无国不可奸；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然臣所以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恶臣国而乐吴民也，窃高下风之行，尤说大王之义。故愿大王之无忽，察听其志。”二句言只要自己修德向善，则自有知音者来。漫说一句中贾谊曾被贬长沙王太傅，而张春斗此时也遭贬，故以贾谊喻之。又汉王尊贬高陵令，帝舅王凤召为谏大夫，见《汉书》卷七六。是此句以王尊贬而又召安慰春斗也。乘槎句用张骞乘槎上天河之典，以天河代天朝，谓有望再回朝廷也。

（八）洪纤若

洪纤若，字春寰，别名时育，同安金门青屿人，万历二十八年举于乡，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曾历任副按察史，江西佥事，万历四十四年任衢州知府，万历四十八年任广东布政司左参议，刑部职官，朝中有欲为魏忠贤立生祠者，洪纤若反对，因于天启初辞官归，不久卒于家。参见《江西通志》卷四十七、《福建通志》卷三十八、《广东通志》卷二十七、《洪氏迁徙录》等。洪纤若曾为青屿同宗庠生张志淳夫妇撰墓志铭。^①天启元年十月蔡复一自山西左布政使南归同安，而洪春寰也在同时去职，天启二年元月、二月间，蔡复一寄居曹学佺福州之石仓园，有《洪春寰访予石仓，因与水游，君方解官而谈笑甚暇，予愧作旅人也，赋赠兼贻轮山社诸君子》诗云：

岂易逃虚接履声，篮舆独怪往来轻。开眉冷向游边见，携手还同梦里迎。寒影经旬多伴鹤，暖言此目始闻莺。避人磴道穿花入，共我江尊放棹行。山逐水回皆好好，官辞身去只平平。津窥姤妇姑云命，谷字愚公别有情。桃下寻源踪偶似，橘中固蒂计难成。安危固步真相倚，去住乡心转自惊。欲尾君归归不得，应嘲昔出出名。西门残雨垂杨暗，南浦斜阳芳草明。十亩闲吟堪短榻，二方急矣孰长纒。沧浪从古分清浊，一片鸥机未敢争。

首联中篮舆指竹轿。明代士大夫的观念中，低阶人员骑马，高级官员乘轿，在社交的场合中必须乘轿才显出身分^②，可见其时二人皆已为平民百姓。接下来数联写二人同游共赏山水之情景，江尊者沿江而行也，尊同遵。妒妇津典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上》，传说晋代刘伯玉妻子段氏善妒，

^① 见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

^② 见利玛窦：《中国游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194页。

刘伯玉因诵《洛神赋》慨道：“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段氏听闻后，怒道：“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轻我？吾死，何愁不为水神？”因投水自溺。其后，美貌妇人渡河前，须将衣饰弄乱，不然必会遭到风浪。愚公典故出刘向《说苑·政理》：“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第七联出句用桃花源典，下句橘中固蒂，出宋韩彦直《橘录》卷中引牛僧孺《幽怪录》云：橘中乐趣，不减商山，但不得根深蒂固，由是有橘隐之名。两句谓欲隐居而计无所出。下面一联则以家有薄田可耕，但此时北方及西南方有清兵及苗夷之乱，又何能坐视不管。末联则以洪春寰解官而谈笑甚暇，如《列子》中鸥鸟无与无机心者同游也。

（九）蒋孟育

蒋孟育（1558-1619），字道力，号恬庵，谥文介，祖籍福建同安金门浦边人，祖父蒋玉山、父蒋相，迁漳州龙溪，蒋孟育万历十六年举于乡，十七年己酉（1589）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南吏部侍郎等职。为官廉洁，卒后朝廷赠与尚书衔，著有《恬庵遗稿》三十八卷，现存日本内阁文库，国图汉学中心影存；另有《台阁文宪选粹》《文选崇正篇》《文选采奇篇》《骆丞文钞评林》等已佚。^①蒋孟育为张燮霞中诗社诗友之一。

蔡复一有《榜出，过徐务滋、陈元朋、张绍和，适蒋太史道力，徐武部鸣卿移榼在焉，留饮，醉作此歌》，诗云：

放榜之日天欲雪，青帝牢愁云眉结。眼看失职尽知名，令人气踊心未平。命与才仇空绝叫，燕山惨淡闽山笑。入门安慰解衣裳，蒋史徐郎过壶觞。功名小物何草草，天公弄人苦颠倒。诋河深浅亦太痴，不妨归去食荔枝。醉余出此送将归，只恐尊前雪又飞。

按诗题中张绍和（1573-1640），名燮，字绍和，号汰沃，福建龙溪人，父张廷榜万历二年进士，官至吴江令，张燮万历二十二年与蔡复一乡试同年，多次会试不中。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在漳州订盟霞中诗社，有林茂桂（德芬）、戴燦（享融）、蒋孟育（道力）、郑怀槐（辂思）、高克正（朝宪）、汪宗苏、徐銓（鸣卿）、陈翼飞（元朋）、陈范（伯畴）、郑爵魁（瓚思）、吴采（亮恭）等十一人，张燮有《霞中十一子诗》^②，若加计张燮父子计13人。

隋唐科举取试以来，例在春天放榜，故此诗第二句以青帝代指春天。接着言科举考试多少有些运气，有些人有才无命，试途坎坷，屡试不第，有人却无才而有命。第六句“燕山惨淡闽山笑”应是福建中式人多而燕地人少，故云。诗的后半以功名草草，勉人勿太在意得第与否作结。

三、结论

蔡复一在万历诗坛应该是最为著名的金门诗人，诗作也最多，共计一千多首。诗中往来交游，皆当时官场中人，可考者一百多人，不可考者才二十人，在姓名里籍可考中者，八闽同乡占过半。而同安金门籍者九人，皆为出身举人以上之仕宦学者，本文初步考释蔡复一与诸人往来诗作，以就教于方家焉。

^① 蒋孟郁生平，详见王振汉：《晚明吏部尚书蒋孟郁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第46-84页。

^② 张燮：《张燮集》第一册，陈正统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25页。

附录一:

蔡复一交游人名表

甲、八闽一金门籍（依姓氏笔划排序）

1. 洪纤若，字春寰，别名时育，金门青屿人。
2. 陈如松，字白南，金门人。
3. 陈基虞（1565 - 1643），字志华，号宾门，金门阳翟人。
4. 张日益，号春斗，又号斗南，金门青屿人。
5. 张廷拱（1567 - 1633），字尚宰，号辅吾，金门大嶝人。
6. 张继桂，字廷高，金门青屿人。
7. 蔡献臣（1563 - 1642），字体国，号虚台，金门平林人。
8. 蒋孟育（1558 - 1619），字道力，号恬庵，籍福建金门浦边人，迁漳州龙溪。
9. 苏寅宾，字初仲，号日门，金门金沙蔡店人。

乙、八闽一非金门籍

1. 王命璇，字君衡，福建龙岩人。
2. 包一甫，福州人。
3. 李孟筴，同安嘉禾（今厦门）人，蔡复一妻李夫人之兄。
4. 李叔元，字赞宇，号端和，晋江人。
5. 汪有洵，字宗苏，漳州龙溪人。
6. 林文昌（长旻），字观曾，晋江人。
7. 林欲栋，字仕隆，号翀汉，晋江人。
8. 林欲楫，字仕济，号平庵，晋江人。
9. 林宗载，字允坤，号亨万，同安人。
10. 周伯瑾，应即蔡复一乙未（万历二十三年）科同年周维京，晋江人。
11. 周仲瑜，晋江人。
12. 周家椿（1583 - 1624），号爱日，同安县人。
13. 俞维宇，字宪乔，莆田人。乙未同年。
14. 翁正春（1553 - 1626），字兆震，号青阳，福建福州府侯官县人。
15. 徐缙芳，字奕开，晋江人。
16. 徐遵宗，字务滋，号念生，福建龙溪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17. 徐銮，字鸣卿，漳州人。
18. 秦震钟，字伯起，晋江人。
19. 郭中丞，郭惟贤（1574 - 1598），字哲卿，号希所、愚庵，晋江人。
20. 曹子兴，福州人。
21. 曹学佺（1574 - 1646），字能始，一字尊生，号雁泽、石仓居士，福建侯官人。
22. 陈一元，字太始，号四游，侯官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23. 陈士英，号兢来，福建同安举人。
24. 陈玉辉（?—1622），字达乡，号荆碧，福建惠安人。

- 25.陈吁谟，字以弼，一字莲湖，福建长乐江田人。
- 26.陈宏己，字振狂，福建闽县人。
- 27.陈亮采，字惠甫，号希塘，晋江人，乙未同年。
- 28.陈昂，字云仲，莆田人。
- 29.陈范，字伯畴，福建海澄人。
- 30.陈翼飞，字少翮，号元朋，漳州平和县人。
- 31.陈鸿，字叔度，福建闽县人。
- 32.陈勋，字元凯，闽县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
- 33.商家梅，字孟和，闽县人。
- 34.张元善，福建惠安人。
- 35.张绍和（1573-1640），张燮，字绍和，号汰沃，福建龙溪人。
- 36.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一字果亭，号二水。福建晋江人。
- 37.张迎，字礼卿，泉州惠安人，蔡复一同年进士，嘉靖太子少保张岳之孙。
- 38.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晚号福庐山人，福州府福清县人。
- 39.黄克瓚，字绍夫，号钟梅，晋江人。
- 40.黄起龙，字应兴，莆田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进士。
- 41.赵世征，字钤冈，泉州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 42.蔡启昌，福建南安人。
- 43.刘梦潮，字国壮，号海若，同安人。
- 44.谢武林，福州人。

丙、其他省籍交游

- 1.文翔凤，字天瑞，陕西三水人。
- 2.王世德，字回溪，又字长民，浙江永康人。
- 3.王贞吉，江西泰和人。
- 4.王家植（？-1611），字木仲，山东济南府滨州人。
- 5.王辂，字以明，湖北公安人。为袁宏道举业师。
- 6.丘兆麟，字毛伯，号太丘，江西临川人。
- 7.朱光祚，字世其，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人。
- 8.朱崇一，明太祖朱元璋孙。
- 9.朱敬一，明太祖朱元璋孙。
- 10.朱翊𦘒，樊山王，明皇室裔孙。
- 11.米万钟（1570-1628），字仲诏，号友石，书画家。顺天宛平人。
- 12.沈有则，字士范，号逸少，安徽宣城人。
- 13.沈朝焕，字伯含，浙江仁和人。
- 14.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
- 15.李应征，字伯远，浙江嘉兴人。
- 16.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号蓼洲，江苏吴县人。
- 17.胡宗仁，字彭举，江宁上元人。
- 18.胡瓚，字伯玉，号心泽，安徽桐城人。

- 19.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湖北公安人。
- 20.袁茂英(164-1634),字君学,号文海,浙江慈溪人。
- 21.徐元甫,字仁峰,江西瑞昌人。
- 22.徐即登,字献和,又字德峻,号匡岳。江西丰城人。
- 23.徐应秋,字君义,或作居义,号云林,浙江衢州西安人。
- 24.马天锦,字褰生,湖北蒲圻县人,乙未同年。
- 25.曾可前,字退如,号长石,湖北石首县人。
- 26.毕懋康(?-1640),字孟侯,号东郊,南直隶歙县人。
- 27.陆梦龙,字君启,浙江会稽人。
- 28.许成器,字道父,号鳌宇,江苏宁国人。
- 29.曹学程,字称明,号心洛,广西全州人。
- 30.晏朝寅,字鸿野,四川名山人。
- 31.陈之龙,字士燮,浙江鄞县人,乙未同年。
- 32.陈季琳,江西弋阳人。
- 33.陈所志,号遙庵,江西抚州广昌人。
- 34.程相如,安徽休宁人。
- 35.冯元成,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松江华亭人。
- 36.汤宾尹(1567-?),字嘉宾,安徽宣城人。
- 37.黄汝亨,字贞父,号寓庸,浙江仁和人。
- 38.黄建衷,字季主,号取吾,湖北麻城人。
- 39.黄辉(1559-1612),字平倩,一字昭素,号慎轩,四川南充人。
- 40.张长孺,江苏人。
- 41.张萱,字孟奇,广东博罗县人。
- 42.贾允,字方莛,江苏无锡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 43.杨文弱,即杨鹤子杨嗣昌,湖北武陵人。
- 44.杨鹤(1567-1635),字修龄,湖北武陵人。
- 45.邓云霄,字虚舟,号玄度,广东东莞人。
- 46.龙国祿,字廉孺,广西桂平人,乙未同年。
- 47.钟惺(1574-1625),字伯敬,湖广竟陵人。
- 48.谢廷瓚,字曰可,江西金溪人,万历进士。
- 49.萧基,字如城,江西泰和县南溪柳塘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 50.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湖广竟陵人。
- 51.韩上桂,字孟郁,号月峰,广东番禺人。
- 52.魏广微,字道冲,一字显伯,直隶大名府南乐人。

丁、里籍不详

- 1.王道修 2.李猗卿 3.洪尔蕃 4.徐宗孔 5.俞清甫 6.周联贞 7.庄毓壺 8.舒尚孺 9.叶鸿高 10.张桓孺 11.张我畴 12.张景山 13.闵逸之 14.杨昆林 15.蔡季承 16.蔡尔度 17.蔡桓卿 18.赵伯诚 19.刘百世

附录二：

蔡复一年谱新编

蔡复一，字敬夫，号元履。生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阴历11月24日。

其先自唐季徙同安，二十余传至高大父彝舒，为永春县掾，曾大父环碧举明经，不仕。大父秀钟，生四子，其次即复一父用明（名霁），万历七年己卯举人，长泰武安教谕，官至四川乐至县令。复一有弟一人名复心，字仁夫。以下系年多参考池显方《蔡敬夫先生传》及蔡复一《府君泊配封安人陈氏行实》。

史传不载蔡复一生卒年，然吾人实可从其诗作及其他资料中考知。今人黄振良、陈炳容著《前人的足迹——金门的古迹与先贤》记其生卒日期为1576年12月9日—1625年11月3日，蔡清风著《蔡复一之遗作研究》也采此说。这其中的生日是错的，因为据《浯洲青阳蔡厝族谱》，蔡复一生日为“万历丙子年庚子月壬子日”，也就是1576年阴历的11月24日，我们用万年历推算，则应为阳历12月13日，不是12月9日。至于其卒日，则无疑义，盖卒于熹宗天启五年丁亥月戊卯日，也就是阴历10月4日，阳历则为11月3日。

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18岁

就试，为福建提学徐匡岳所赏识，擢为第一。

公《答李缉敬侍郎》：“不肖愚菟人也，惟知耻认真，禀自胎骨，而癖颇喜读书，因与世味稍不相入，十八岁为贵省（江西）徐匡岳先生首肯，示以止修之学。”（《遁庵全集》，第353页。下同，不再标示书名）

万历二十二年（1594）甲午，19岁

举乡试。座主为徐匡岳。

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20岁

成进士，给假还娶。

夫人父李璋，同安人，初授上林苑监录事，后为江苏吴江主簿。祖父李春芳，字实夫，号东明，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年十二食笈，十六岁领乡荐，师事罗达夫。初官户部，升刑部主事，后守潮州，以母丧归，著《白鹤遗集》，年四十二卒。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21岁

拜比部郎。冬，游楚，至醴陵，县令晏朝寅在文昌阁设宴送别。

《发黄梅遇雨》诗云：“丙申游楚冬皆雪”，或是因公顺游。

按蔡复一为朱之藩榜二甲赐进士出身第27名，成绩在上等，拜比部郎也算符合明末任官标准，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邑令轻重”条云：“罗一峰之言曰：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则忻。其视州县守令，若鹬鹗之视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哀以求免。”如袁宏道万历二十年成进士，后官吴县，一再以苦为言，不久即辞官，可知过半矣。

万历二十七年（1599）己亥，24岁

奉母南归。

公有《己亥奉先慈南归，憩新嘉驿，爰其清胜，今八年矣，追旧增怆》诗。

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26岁

疏请归养南还。七月抵家，秋游长泰，访故友。

《府君泊配封安人陈氏行实》云：“辛丑，孤心怍怍，请急归侍，府君尚无恙，秋游长泰。”

万历三十年（1602）壬寅，27岁

秋北返北京，入都门会蔡献臣。十月，父母相继亡故，返里服丧，在里居丧五年。张燮《清宪蔡公行状》：“明年寒孟，丁赠公艰，母夫人亦继没。”

公有《入都门蔡体国仪部移榼夜饮》诗有“故人除目薪犹积”，按万历二十九年秋，蔡复一疏养南归同安，万历三十年秋返北京，而据蔡主宾《蔡献臣年谱》，蔡献臣于万历三十年九月补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则蔡复一入都门必在万历三十年九月之后。同年十月蔡复一丁忧，又回到同安守丧，蔡献臣又在万历三十二年出任常镇大参，从此未再到北京，两人已无缘再聚北京。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31岁

立秋日北上补驾部郎。

《对月忆舍弟》诗下自注云立秋日离家。张燮《清宪蔡公行状》：“阅丙午然后赴阙，补驾部郎。”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32岁

春，张燮在北京落第，送张燮游易州，张燮又自易州寄诗，有诗答之。

按张燮万历三十二年、三十五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四十七年、天启二年六度落第，唯万历三十五年落第时蔡复一在北京，有《送张绍和》诗。

万历三十六年（1608）戊申，33岁

奉使过里。

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35岁

春，钟惺举进士，与蔡复一在北京结识。秋，转兵部武库郎，参与武闱试务。

公《武闱秋雪》第一首诗中自注“时辽有虏警”，查蔡复一在万历三十四年服满返北京任驾部到三十八年夏之间，辽阳未有边警，三十八年秋始有大清入犯，三十九年春蔡复一已启程南返，故诗应在三十八年（1610）秋作，在此之前蔡复一应已由驾部司移官武库司，因在武库司，故参与武闱试务。又蔡复一有《湖广武举录序》：“故事武闱继文而辟，辟在孟冬……圣天子威灵变化，三赐剑而三功，武节纷纭，庚戌竣，会武役，特采部科议，必用所兴士，其隽科三者，亦予秩而渐试之。”可知万历三十八年武举考试有一变革，而蔡复一因参与试务，故有《武闱秋雪》之作。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36岁

春，在北京别钟惺，奉使归。筑壶隐山房。秋，擢湖广参知，一家八口经福州、建溪、九江、武昌、黄梅，冬至澧州。在江州晤曹学佺。

公在北京有《别钟伯敬，时伯敬有蜀行，将晤曹能始，故未及之》。钟惺使蜀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月，而蔡复一在此之前已动身归里，故诗云：“密意未能申，各为将行客。遵途我先，春云暗离色。”

公《上叶台山相公一》：“辛亥过里，遂分澧藩。”（第190页）

《与何匪莪先生》：“辛亥入楚，承赠诗。”（第198页）

公九月抵武昌，有《武昌寄钟伯敬》云：“世法成憔悴，九月枯荷柄。安得接清言，洗我尘中兴。”

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37岁

年初抵澧州任所。四月因公过襄阳，上岳阳楼。六月，长江水患，公多方赈恤。十二月，因公事赴襄阳，顺游蓼山。著有《蓼游草》，今已不存。此年座师黄辉卒于四川自宅。

《答别钟伯敬兼及谭友夏》诗云：“壬子登参山”。《上郑鸣岷冢宰》：“壬子春，某以公事赴襄阳。”（第192页）

公游参山诸作中有《立春》一诗，诗自注十二月十六日立春，而万历四十年立春正是十二月十六日，西历已是1613年2月5日，可知游参山在万历四十年十二月无误。又赴澧州途中所作《出澧州》其二云：“虽云赴公府，而得历溪山”，可知此行因公而顺游参山。据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二四《答蔡观察元履》第一信云：“往读《参游草》，觉岚霞生毫楮间，今游刃之余，蜡屐所至，必有挥洒，不知何时得一寓目，参山自南崖至五龙一路，初不晓其奇，读佳记方知竹筴、青羊、桃源，怪石多姿，流泉如语，为参中奇观，竟失之，良可笑也。”

陈庆元《金门蔡复一年表稿》云：“是岁与钟惺登参山。”据陈广宏《钟惺年谱》，钟惺是年居家竟陵，12月17日至北京，与王象春、张慎言、谢兆申诸人社集，不可能与蔡复一同登参山。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38岁

二月，擢观察使分镇湖北，筑边墙七十余里。夏，长江水患，在澧州赈灾。夏秋间，移官沅陵、辰州，仍摄湖北兵篆。在此前后，为座师黄辉哀集诗文遗稿。

公《上叶台山相公一》：“癸丑代庖，就畀辰节。”（第190页）据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七有《蔡元履廉访驻节辰沅率尔寄怀》二首之一云：“卿云珠雨仁神州，炎塞邀天使节留。逸典从来穷西室，清时不忍话壶头。”按壶头山位于今沅陵县东北高坪乡水田村，袁中道诗中言“炎塞”，则蔡复一移官沅、辰应在万历癸丑四十一年（1613）夏秋间。

《上王霁字司马》：“湖北镇算卒七千缺三年饷，去岁二月……某十九日接代庖之印……多方剡补，仅足一岁额，今尚负其四十、四十一两年也。”（第193页），张燮有《寄蔡敬夫时擢楚观察使分镇湖北》，诗中有：“自有高歌回郢雪，岂无耆旧访襄阳。”（第二册，第298页），可知分镇湖北者，郢阳也。池显方《蔡敬夫先生传》：“时湖北三道并缺主者，檄公署篆……公摄兵篆十月，三度报捷，复筑边墙七十余里。”

万历四十二年（1614）甲寅，39岁

十月在辰州见早梅，作《行园见蚤梅一花》三首。

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卯，40岁

闰八月，钟惺典贵州试毕返北京，路过辰州，与蔡复一相会三日。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41岁

初春，谭元春自竟陵赴辰州晤蔡复一，随后蔡复一自辰州自解归，秋过福州曹学佺石仓园。秋冬间还里，在同安城筑贞素堂。往来东山壶隐山房，杜门读书，家居五年。

池显方《蔡敬夫先生传》：“会黔抚有大征红苗之议，檄湖北永顺、保靖二土司兵助蜀二土司攻之……大拂黔抚意，遂引疾归。”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当万历乙卯、丙辰间，公在辰阳，辰与黔兵食相及，有欲用民力于苗者，公执不可，因自解归去。”

有《春发辰州》诗。

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44岁

九月钟惺《史怀》，并寄给蔡复一。

万历四十八年（1620），泰昌元年庚申，45岁

春典清玩以嫁女，女婿为同年林欲栋子林观曾。是年起为易州兵备。

天启一年（1621）辛酉，46岁

春赴易州。道出武夷顺游。10月南归，道出建溪。

公有《重游武夷》诗，春赴易州作，有《建溪道中即事》，冬归同安作。

曹学佺《石仓诗稿》卷二八有《送蔡敬夫方伯之晋》。

十月，因受谤南归。《与陈自公侍郎》：“易水无根之谤，郟阳意外之推，莫非命也。”（第352页）

天启二年（1622）壬戌，47岁

春在石仓园，三月上已在石仓园修禊，正月间明朝失河西地，清明节公闻之河西之陷，三月随即赴山西右布政使任。12月擢副都御史，抚治郟阳，赴郟阳任。

起山西右布政使，请辞不果。闻河西陷，勉力之官。《与陈自公侍郎》：“晋阳以辞节相托，而台翁有按粤之行，熊坛公祖、林亨万社兄莫肯为言，遂冒鹤梁之谗。”（第352页）《与商等轩抚台》：“从燕徙晋，而决为闽行，山志可知也，不意为师命所驱，以此心迹双负。”（第377页）

是春蔡复一从元月到三月初修禊一直住在曹能始石仓园，在石仓园作《戏简》诗云：“舟泛已愆旬，况君言禊辰。急携花下酒，去作水边人。移节虽知蚤，寻烟亦惜春。解嘲凭逸少，适我莫非新。”是年正月二十一日河西陷于大清，消息传到南方福建已是清明之后，蔡复一石仓园有《清明闻奔河西之报》诗云：“柳枝何意与门齐，况报军声死鼓鼙。海屿荒烟寒岭外，辽人落日哭河西。九陵王气龙还守，三户春光莺乱啼。垄树难攀辰极远，愁魂欲去路俱迷。”是年清明当二月二十七日，则蔡复一赴山西当在三月修禊之后。

七月在山西。《上叶相公》：“某易水负罪，宜去决矣，至三山闻河西陷而兼程以北，七月旬宣，秋毫无补。”

中秋在山西布政使任，有《中秋文天瑞置酒荒园用来韵》七律五首，诗中用山西常山黄贺典故，知在山西作。文天瑞即文翔凤。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九《胡永叔诗序》云：“景（竟）陵钟氏谭氏专以空疏浅薄是尚……于时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闽有蔡敬夫争相效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文少卿翔凤条下云：“翔凤，字天瑞，三水人，万历庚戌（三八年）进士，除莱阳知县，调伊县，迁南京吏部主事，以副使提学山西，入为光禄少卿，不赴，卒于家。”可推知天启二年文天瑞正任山西提学副使。第三首云：“有当日筮天孤，窃药曾闻忆故夫。纵就大还蟾独捣，应怜小雅鹿相呼。”有黄，唐朝人黄贺。《太平广记·卜筮二》：“唐昭宗时，有黄贺者，自云巩洛人也。因避地来，涉河游赵，家于常山，以卜筮为业。而言吉凶必效……时人谓之易圣公。刘岩曾诣之。生谓曰：君他日必成伟器，然勿以春日为恨。初不晓意，及老悟。盖迟迟之谓也。出《耳目记》。”常山在山西，用山西典故，可知是诗作于山西。

张燮《清宪蔡公行状》：“壬戌冬，擢副都御史，巡抚郟阳。”公《上叶相公》之三：“不肖自腊初离晋阳。”（第283页）又《上叶相公》之二：“郟节简畀，事出梦表……卜正月杪入境。”（第281页）

天启三年（1623）癸亥，48岁

正月在郟阳。七月，杨鹤父子登蓼山。秋，邀内兄李孟策过蓼山，随送之赴南京。

公《上董谊台大司马》：“不肖某廿八日入疆，春二日接印卷受事矣。”（第301页）

杨鹤《蓼话》云：“癸亥秋七月，余将北上，蔡敬夫贻书谓，道出襄阳，宜为蓼山之游，游毕约会沧浪亭下，余闻之心动，至襄阳，遣人再申前约，余乃戒行，以八月初八宿柴店，九日宿界山，十日宿遇真宫，十一日游紫霄，十二日游五龙，十三日登顶，十四日游琼台，晚宿玉虚，至十五日会敬夫于沧浪亭，话山中游事，抵掌达旦，明日复会，十七日解缆别。”见吴士秋编《天下名山记》，《道藏辑要》本，第251页。是复一中秋会杨鹤于沧浪亭，作《中秋会杨修龄先生于沧浪亭，是夕

不月》二首。

公《送内兄李孟策太学之金陵》诗云：“荔枝香风送游子，吹到菊花霜色里。仙人掣断秣陵云，邀过寥山亦偶尔。鸿雁辞人意太忙，茱萸扶病伴重阳。”知在此年秋在郟阳邀内兄来游寥山。

天启四年（1624）甲子，49岁

元旦在郟阳官邸。

公有《甲子元旦试笔郟阳署中》二首。

三月尚在郟阳。二月以兵部侍郎代王三善为贵州巡抚。《与内阁》疏云：“不肖闻推在二月二十五日，闻命下在二十七日，部咨到在三月初四日。”（第381页）《与毛丘伯饷台》：“弟三月望离郟，自揣五月初可达贵阳，岂知濡滞至是哉。”（第399页）《与杨衡毓》之一五：“不肖三月望离郟，月尽入荆道。”（第393页）

四月入川，驻夔。五月自荆入常德、武陵、沅州。《与丘毛伯饷台》：“不肖则荆澧阻水，平陆成河道绝，乃就船行。五月初六发荆，至廿三日始达常、武。”（第395页）《与杨衡毓》之一三：“五月十三日始克入沅州。”（第392页）《与杨衡毓》之六：“坐沅束手，寸筹莫展，病暑形神俱惫。”（第389页）

六月发沅陵。《与丘毛伯饷台》：“刘（监军）自常、武舍车而骑，六月初三至辰州，闻不肖初六发，即鞭马夜驰。”（第395页）

七月入黔，以黔抚节制都督诸省。《与朱恒岳》：“以七月十八进黔省，而逆彦纠众十六，过三岔、思腊河，攻围普定。”（第412页）《与丘毛伯》：“弟忝拜督命……七月廿一日敕始到，恭读之，虽以不肖制诸省，而实则勒不肖受诸省抚臣约束也。”（第402页）

秋冬间在病中处理军务。《与阁部》：“九月初旬，黔二司始送计册，而某床蓐线息，二月人鬼交争，惟有度置之耳。使台庇十一月朔稍能强起，而逆彦又借邻纠党，悉索数万之贼，渡河送死。”（第403页）《与杨衡毓》：“弟，笃疴不知人事。”（第414页）《与薛正亭中丞》：“不肖至七月始克入黔，旬余染病奇危，几与司命为邻，九月廿五已将草遗疏。”（第415页）《与闵曾泉》：“弟一入黔而咳嗽月余，至今遂成呕逆痿弱。”（第417页）

弟蔡复心至贵州探病。《与李碧海祭酒》：“恩生蔡复心，不肖胞弟也，贱昆弟两人旅春，家弟始举一子，闻不肖有黔役，即入常武护贱眷，因之金陵秋试，完其恩生入监之事，事竣矣，闻不肖病危，不遑拨历重茧，赴黔视医药。”（第477页）

向袁宏道举业师王辂问学，辂著《师卦解》一卷以报之。王辂传见《荆州府志》《公安县志》、高世泰《三楚文献录》。清丁宿章《湖北诗征传略》载王辂年二十即契无生之旨，一时如李卓吾、陶石簒（望龄）、袁伯修（宗道）俱为性命交。袁宏道也为其《竹林集》作序。

天启五年（1625）乙丑，50岁

正月，诸营溃，死者数千人。3月，以兵败自劾，朝命回籍听勘，以朱燮元代。4月后病转剧。10月4日卒。赠大司马，谥清宪。

公《与傅元献直指》：“弟一病自觉精神昏愤，重听健忘，盖心血从四月来枯耗已尽。”（第434页）张燮《清宪蔡公行状》：“薨于天启乙丑寒孟四日，春秋五十耳。”

论近代金石学宗师金门书法家 吕世宜的文化影响

吕成发

(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清代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吕世宜, 祖籍金门, 幼年迁居厦门, 自少即嗜学好古, 其书斋爱吾庐中, 收藏金石甚富, 见有古物即倾资以求之, 后赴台讲授金石学与书法, 不仅为台湾的金石学奠定了初步基础, 也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士大夫学风的更新, 有“台湾金石学导师”之称。吕世宜的书法艺术也在金门书坛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迹, 其身受当时学术气氛所感染, 流传后世的作品大多以金石和书法方面为主, 在古文、文字学的领域水平颇高, 各体书法兼长, 不难看出吕世宜的书法艺术实践, 为清代中期台湾文化的发展, 以及台湾、大陆之间的文化融合,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清代道光、咸丰以后的金门书家, 受吕世宜书艺影响的亦不在少数, 对于台湾清末和日据时期的书坛皆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吕世宜; 金石学; 书法; 金门

一、前言

吕世宜(1784-1855), 字可合, 号西村, 晚号不翁, 别号一瓢道人、百花瓢主、种花道人、顽皮汉子等。祖籍同安县翔凤里十八都西村(今金门县东南部), 故居在今西村旁的新塘。幼年随父迁居厦门。^①道光二年(1822), 吕世宜乡试中式, 未入仕, 以教读终身, 先后设帐于漳州芝山书院、泉州浯江书院及厦门玉屏书院。后赴台, 受聘为台湾板桥林氏之西席。至咸丰初, 返回厦门终老。^②卒葬厦门大厝山。^③吕世宜一生博学多闻, 精于《说文》及金石学, 著有《爱吾庐文钞》《爱吾庐题跋》《爱吾庐笔记》《古今文字通释》等, 尤以书法擅一时胜场。吕世宜之书艺, 先后师从郭尚先与周凯, 各体兼长而篆、隶特妙, 其书法得力于秦汉金石碑版, 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个人的独特风格, 古拙中带有逸气, 其墨宝于今之闽南、金门, 台湾地区及日本等国家犹然可见。在台期间, 吕世宜大力搜集金石文物与古籍, 购得书籍数万卷及金石拓本千余种, 为台湾的金石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其碑学书法更是对台湾晚清与日据时期的书坛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因而有“台湾金石学导师”的美誉。

作者简介: 吕成发, 男, 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

^① 《爱吾庐汇刻》,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214页。

^② 今厦门市盐溪街98号即为吕世宜在厦门的故居旧址。详见黄秋苇:《盐溪街98号失落的书法大师传奇》,《厦门晚报》网站, 2007.01.05。

^③ 2006年12月, 厦门书法爱好者张文杰于大厝山旅游景区发现吕世宜的墓葬。详见龔小莞:《书法爱好者无意发现书法大师吕世宜墓》,《厦门晚报》网站, 2006.12.14。

二、吕世宜的生平与师承

《金门县志》卷十二《人物志》对吕世宜的生平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文曰：“吕世宜，字可合，其先金门之西村人。父仲诰，始移居厦门，以孝称。世宜道光壬午举人，性好古，通许氏《说文》及金石之学，最工篆隶，尝摹拟汉书四十九石，厦门林墨香刻之。时巡道周凯、山长高澍然俱能古文，世宜时相谈论，其为文，笔意警峭，颇似王半山。尝游台湾，执教板桥林氏，台人奉为宗师。晚年援例捐翰林院典簿。尝自为墓志，刻于砚背，令家人即以砚殉，其标格崖岸如此。著有《爱吾庐文集》三卷、笔记二卷等。子登元，补邑诸生。”^①稍可补充的是，吕世宜自少即嗜学好古，其书斋爱吾庐中，收藏金石甚富，见有古物即倾资以求之。道光十年（1830），周凯任福建兴泉永道，驻厦门，因而与吕世宜相见，对吕之人品才学大为赏识，吕世宜遂师事周凯。周凯（1779-1837），字仲礼，号芸皋，浙江富阳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②，尝从阳湖派张惠言、恽敬学古文，并曾与林则徐、龚自珍等结宣南诗社，又精擅绘事，以山水花鸟独步一时。周凯的到来，对吕世宜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吕世宜在《爱吾庐文钞自叙》中说：

少从敬堂周夫子学，间有古语法，未习也，自是溺于八比廿余载。壬辰间，游芸皋师之门，传以义法，复得刘五山、高雨农二先生绪论，偶有作，亦不多。洎芸皋师、五山、雨农相继谢世，益寥寥寡党，间与东谷诚甫质证一二，复秘而不宣，谀而少实，可悲也。^③

从这段文字可知，正是在阳湖文派的传人周凯的引导之下，吕世宜开始抛弃科举时文，而转向古文与经术之研究。周凯对吕世宜极为倚重。他就任兴泉永道之初，就认识到“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实闽之保障，海疆之要区也”^④，而金门又是厦门之外围屏障，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为供守备参考，他在政事之暇，先后主持纂修了《厦门志》与《金门志》。

除了周凯以外，吕世宜另一良师益友，是莆田郭尚先。郭尚先（1785-1833），字符开，一字伯抑，号石兰，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光禄寺卿、大理寺卿，享寿48岁。^⑤郭尚先的书法由欧阳询入手，后兼学颜真卿与褚遂良而能自成一派，蜚声海外；绘画于山水之外，独精于兰石，至以“兰石”自号；其治印则尤为嘉道间之巨擘，篆刻古朴浑厚，法度精严，直入汉人之室。道光二年（1822），郭尚先丁父忧在籍，应时任建兴泉永兵备道的倪琇之邀，主讲厦门玉屏书院。是时吕世宜正在玉屏书院就读，从而与郭尚先结缘。郭尚先对厦门的书法风气有重要影响。据《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俗尚记》载：“自编修郭尚先主讲玉屏书院，楷法为之一变，篆、隶推吕孝廉世宜。”^⑥吕世宜年长郭尚

① 金门县立社会教育馆编：《金门县志》，金门：金门县政府，1992年，第1497页。

② 周凯：《芸皋先生自纂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75-76页。（嘉庆）十六年辛未，年三十三……中朱壬林榜二百三十六名，改名凯，册年三十岁……四月二十一日保和殿殿试二甲七十名进士。”

③ 吕世宜：《爱吾庐汇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④ 周凯修、凌翰等：《厦门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页。

⑤ 郭嗣蕃：《兰石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第480页。“公讳尚先，字符开，号兰石，一字伯抑父，行一。仲伊公长子，嘉庆丁卯解元，己巳进士，改翰林院庶起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左赞善、洗马、侍读右庶子、侍讲学士、光禄寺卿转大理寺卿。历充国史馆、文颖馆《治河方略》《大清一统志》《明鉴》纂修官，文渊阁校理，本衙门撰文，教习庶起士，贵州、云南、广东、山东大主考，四川提督学政，稽察右翼觉罗官，学武殿试读卷官，恩监考试官。谥授通议大夫，入祀四川名宦祠。著有《进奉文》一卷、《日讲讲义》一卷、《使蜀日记》一卷、《芳坚馆题跋》三卷、《增默庵文集》八卷、《增默庵诗集》二卷、《芳坚馆印存》二卷。《清史》入《文苑传》，《重纂福建通志》《福建新通志》俱入列传。”据昆仑堂美术馆馆长俞建良先生《书法家郭尚先》一文详细考证，关于郭尚先的字、号、生卒年及享寿几何目前学术界说法纷纭不一。本文系采俞建良先生之说：“郭尚先生于清乾隆五十年秋（1785），卒于道光十二年岁末（1833），享年48岁。字符开、号兰石，一字伯抑。福建莆田人。”

网站：<http://www.10000xing.cn/x144/2012/0906144748.html>，2015.06.02。

⑥ 周凯修、凌翰等：《厦门志·风俗记·俗尚》，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324页。

先一岁而师事之，其篆、隶二体之书法，深受郭氏之熏陶；并且吕世宜对历代碑帖之酷嗜，也与郭尚先不谋而合。郭尚先对吕世宜之书法推崇备至，可谓奖掖不余遗力。据邱炜菱《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五所云，郭尚先初至玉屏书院，“见吕西村孝廉篆隶，便作少陵语曰‘伯仲之间见伊吕’，伊谓墨卿太守也，他日复见孝廉樵《曹娥碑》《内景玉经小楷》，大惊以为远出己上，厦人有求书者必曰：‘现放着吕某不求，而乃某之是问耶？’告以‘已得吕书，惟须先生’，乃许俚之，则复歉然不敢落墨，或强之始可。吁！先辈服善之诚，不亦可见哉！”^①郭尚先将吕世宜与前辈名家伊秉绶相提并论，显然是期望吕世宜向前辈书家看齐，用意颇深。

三、吕世宜与台湾文艺

关于吕世宜之赴台，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四《吕世宜传》有如下记载：

当是时，淡水林氏以豪富闻里，而国华与弟国芳皆壮年，锐意文事。见世宜书慕之，具币聘，且告之曰：“先生之志诚可嘉，先生之能亦不可及。今吾家幸颇足，如欲求古之金石，敢不唯命是从。”世宜遂主林氏，日益搜拾三代鼎彝、汉唐碑刻，手摹神会，悠然不倦。林氏建枋桥亭园，楹联楣额多其书也。^②

吕世宜何时应林本源聘请至台湾，并无明确记载。不过，周凯在道光十三年（1833）以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在台期间，与林国华有所来往；道光十六年（1836），周凯又再度至台任台湾道^③，他将自己极为欣赏的门人吕世宜推荐给林家当教席，正在情理之中。吕世宜在道光十七年（1837）周凯逝世之后，曾撰《祭芸皋夫子文》致悼，文中说道：

去冬将别，神王如昔时。今年三月，知世宜将赴督门，示书曰：“吾与汝年相近，吾将解组，汝乃出山，非策也。”又言：“陈扶雅先生已弃世，故交零落使人悲。”世宜伏读其书，决意年杪泛舟东瀛，朝夕奉侍左右，得以增益其所未足，岂意一旦山颓木坏至此耶？^④

据此可知，周凯生前嘱望吕世宜能渡台，而吕世宜亦决意前往，但直到周凯歿后，吕世宜才达成此愿，当时他已接近五十五岁。

吕世宜至台湾后，应板桥林氏兄弟林国华与林国芳的聘请，担任林家的教席，林家花园的汲古书屋与方鉴斋就是当时吕世宜藏书与教书的所在。在林家任教期间，吕世宜大量搜集古代的鼎彝、图画、金石和名砚印，藏品之多，当时即称台湾之冠，后尽归林氏所有。

清代台湾士子读书求学，大半视之为科举羔雁，因而学风恶劣，读书人大都狭隘鄙陋。吕世宜在台期间，主持风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尊为一代宗师。他为林家所购置的数万卷书籍和千余种金石拓本，不仅为台湾的金石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也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士大夫学风的更新。庄伯和在《台湾金石学导师——吕世宜》文中，曾引日本学者尾崎秀真之语曰：“台湾流寓名士，于文余推周凯，诗推杨雪沧，书推吕世宜，画推谢官樵。”^⑤另一日本学者山中樵也曾说过：“台民喜习

① 邱炜菱：《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② 连横：《流寓吕世宜》，《台湾通史》卷三十四列传六，《台湾文献史料丛刊》01:19，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第957页。

③ 周凯：《芸皋先生自纂年谱》，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6册，第89、94页。

“（道光十三年癸巳）十二月初一日抵厦，初四日任兴泉永道事，即赴省面陈事宜，年终乃返，上《台地应行兴革事宜十条》。”“（道光十六年丙申）十二月……十九日奉上谕：魏元娘奏揀调要缺道员一折，福建台湾道准其以周凯调补所遗兴泉永道员缺，着周日炳补授。欽此。”

④ 吕世宜：《爱吾庐汇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⑤ 庄伯和：《台湾金石学导师——吕世宜》，《明清时代台湾书画作品》，台北：文化建设委员会，1984年，第287页。

汉隶，吕西村所影响也。”^①可见吕世宜书法对于台湾书坛浸润之深。

四、吕世宜之艺术成就与影响

吕世宜流传于后世的作品，大多以金石和书法方面为主，由于吕世宜一生的成就，在古文、文字学的领域水平颇高，博涉多能，各体书法兼长，篆、隶、行、楷，乃至草书皆善。其中篆遵循古法，结字匀称；隶书有两个路线，一是师法汉隶，二是采集古碑而成的自成新意的形态，十分博才。

与吕世宜的乡试同年、道光年间被誉为天下三大御史之一的陈庆镛，曾为吕氏之《爱吾庐文钞》撰序，序中对吕氏的学术、书法与金石学成就，作了扼要精当的说明：

吾友西村，嗜学好古读书，自束发识字，寝馈凡四五十年。其勤于始也能入，其眇于终也能出，出入之际，殚以精心果力。而又识足以达时事之宜，明足以破千古之论，论足以剪繁芜之失，辩足以息群喙之鸣，然后驰骤纵横，必求于是而后止。

西村治经，先之以声音训诂，其于一辞一字，古注有异同者，必明辨而缕分之，崖略已见于笔记中刊行。而读史则博综上下，判黑白、别是非，故其摇笔纚纚数千言，其简处则又一语不苟下。余观其论渑池、论与夷，及拟昌黎《伯夷颂》，答李翊、卫中行、吕医山人诸作，识见高卓，即起唐宋诸贤亦无不鏖。至所撰碑志及传记，动与古会，出入经史而不自知，岂非韩公所谓“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欤？尤善金石、凡商周吉金，下暨秦汉北魏石刻拓本，靡不搜罗袭什，珍如拱璧。每有奇字，稽撰不遗余力，务合于祭酒六书之旨。尤精古籀篆隶，兀然危坐，墨一升、楮一捆，随缮随弃，颇不自爱惜，而门外求书者屡已满。^②

这既是陈庆镛对吕世宜一生成就的介绍，也是对其学养与艺术造诣的极高赞誉。

吕世宜的书法特色可分为三种：隶书风格、篆书风格、型书风格，其中各有精髓之处。隶书风格是他最擅长、最有特色的一种字体，以篆笔入隶、方劲古朴、浑厚和穆、郁拔纵横，因此传世的作品比较多，其中代表性的有：吕世宜祖居古厝中的“文魁”匾、《褒斜道碑》扇面、南普陀寺“都放下”石刻等。而篆书作品数量虽不多，却结字工整、排列均匀，笔藏中锋，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厦门志》中题签“厦门图”三字、林平侯画像题字、摹《石鼓文》、临《秦权铭》等。行书的作品数量则最少，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学习郑板桥（郑燮，1693-1766）风格和学习王右军（王羲之，303-361）风格。

而现在这些作品散见于台湾地区出版的图录、吕世宜研究学者的文章、著作、海峡两岸碑文、楹联、石刻、匾额等书法作品及私人收藏中。近年来，吕世宜书法作品的价值越来越被两岸学者、书法家所认可，其市场价值也节节攀升，从20世纪末开始，吕世宜的作品便作为台湾清朝书法的代表，被台湾各大文化机构、美术馆收录于图录中。而吕世宜既是书法家也是书法理论家，对金石学研究也十分突出，他将研究成果应用与书法艺术的创作领域，并进一步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加以总结，完善为书法理论，更指导了后代书法家的创作实践。

现随着两岸艺文交流的盛行，金石学研究者对金石研究的逐步深入，众多碑刻文字所蕴含的艺术特质，渐渐被各地文史工作者及学界重视，自然就会对研究者的书学产生影响。吕世宜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品格，使其作品与品格合而为一，而著作《爱吾庐论书》中的评价论述，

^① 吴守礼、林宗毅：《吕世宜西村先生研究资料·附吕世宜年谱》，东京：东京定静堂，1976年，第477页。

^② 吕世宜：《爱吾庐汇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则可印证他对书法风格和作品的理解。

吕世宜祖籍金门，成年后也常往来于厦、金之间。虽然他一生留居金门的时间并不长，但其自号“西村”，即可见其对故土的眷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吕世宜的书法艺术也在金门书坛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迹。清代道光、咸丰以后的金门书家，受其书艺溉泽的，不在少数。

清道光年间，金石学大行其道，形成盛况，许多文人，特别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朝臣，都投入金石学研究领域。在此影响下，民间对于金石学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在此不断的开发下，金石学的研究也渐渐深入，从作品本身开始进入对金石载体的研究。金石学的发展逐渐扩大，给清代书法带来了新的风气，书法审美的力度不断扩大，纷纷成为书法家模仿的对象，同时，金石学的研究也进入精深的专门领域，除了目录学、考据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外，对汉字本身的流变研究也成为金石学的重要内容。

吕世宜除了金石实践外，也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并有留下著作，具有一定影响力。《爱吾庐题跋》收录吕世宜鼎铭、碑帖、砖瓦等题跋共八篇，是吕世宜在金石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品。林维源对吕世宜在金石学方面的研究与成就十分推崇，他在《爱吾庐汇刻》中说道：

先生以八股法负盛名，每得一墨本，辄能辨其刻之真贋、拓之后先，间细论断，率从心得而出。唯得知之也深，用能言之也确，盖视欧阳诸公若合符券焉。生平所书《四十九石山房石刻》，得者比只瓊琥，零缣断素亦往往尚多。读是编者，可以知先生笔法之妙之有自来矣。^①

从林维源的描述可见，吕世宜对金石的热爱之深、研究之深。吕世宜接触金石学研究资料经验丰富到可以对拓片的真伪、拓印的先后顺序、风格等都第一时间判断。

在雍正乾隆年间，闽籍士人在台湾书院执教、讲学，促进了台湾教育与学术创立。到同治光绪年间，台湾书院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规制日渐完善，许多福建名士名儒纷纷跨海东渡台湾担任书院山长或主讲，进一步扩大了台湾文化的影响，吕世宜就是在这段时间来到台湾，当时板桥的林本源家族第三代林维让、林维源兄弟为了家族子弟兴办大观义学，特聘吕世宜渡台，这些私塾经常聘请著名的闽籍儒士担任教师，以督促家族子弟学术。这个决定不仅为台湾带来了书法与金石学，还开辟了台湾学子除了科举之外的又一个“艺”的文化领域——将金石学书法导入台湾。台湾名士连横在其《雅堂文集》中就曾谈到，清朝中后期，台湾谈艺之士“辄宗吕西村、谢瑄樵”，可见吕世宜除了在林氏家族任教之外，还进行了长期的鼎彝碑刻收藏，吕世宜成为将金石学书法导入台湾的第一人。

而板桥林家可说是吕世宜在台湾进行学术活动的重要舞台，他在那里培养弟子，传播金石学说、收藏金石作品，后世对台湾金石学的研究，不能避开板桥林家这个发源地，板桥城后来渐成新北市的文化教育中心，和吕世宜的贡献也有一定关系，而他的收藏品留在台湾，也间接地带动了台湾的文化一步步更加昌盛，在此之前虽偶有发现零星金石书法作品，但是学习金石书法的人数少，在这个方面，吕世宜可谓展现了一个十分生动而具体的例子。他东渡赴台后，带去的收藏品以及在台湾时期由林氏家族赞助所收藏的学术资料，数量颇巨。在他结束台湾的执教生涯回到厦门后，留在台湾的这一批资料，通过林氏家族又流散到台湾民间，打开了台湾学子对金石学书法的爱好之风，可以说，如果没有吕世宜赴台这一因缘，台湾本土金石书法的开端可还要往后推移。

吕世宜等文人来台后，台湾的书法界开始重视金石作品书法文字的第一手资料，改变了过去研

^① 吕世宜：《爱吾庐汇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究拓片摹本等间接材料的方法，拓展了台湾文人对于隶书的理解的深度、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并且在吕世宜等文人的影响下，台湾本土书法家也开始思索新的书法之路，尝试通过金石来启迪自己的灵感，将金石审美纳入自己的书法审美范畴。台湾的金石书法在这两个阶段的推演下，慢慢酝酿成自己的流派，这才使台湾诞生金石风格的书法。

当然，当时除了书法家的贡献与努力之外，金石书法能在台湾逐渐发展也有其必然原因。当时的台湾文化环境已经具备了金石书法传播和发展的条件，与清前期相比，在吕世宜赴台的时代，从大陆前往台湾的学士名家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多是担任官职或者教职，容易对台湾的士子产生影响，也因此台湾本土的学者及文人越来越多。还有一点为当时的学术传播方式，流行以家族为中心传播，如板桥林家就是台湾书法与文化传播中心，通过家族私塾将大陆地区的新的学术之风，慢慢吹向了整个台湾岛。

在吕世宜打开台湾金石书法的大门后，沈葆楨和何绍基是继续在台湾发扬壮大的贡献者，沈葆楨提升了台湾碑派书法的审美领域，何绍基的碑体行草书则在台湾书法界产生巨大影响。郑鸿猷、黄彦鸿、陈夔、吴子光、杨浚、林占梅、林士传这些台湾本土书法家直接受到吕世宜金石书法的许多启发，积极接续吕世宜的隶书风格，并且进行了创新发展。随着金石书法在台湾传播开来，台湾本土书法家中学习金石书法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金石书法在台湾书坛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

而在金门，吕世宜之后影响最大的书法家，首推洪作舟，洪作舟现今流传于金门的墨迹甚多。今人许乃鑫所编《金门民间古字画珍藏集》中，对洪作舟的生平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洪作舟（1826—1898），生于道光六年；卒于光绪二十四年，享寿七十有三。号晴川，后浦北门人，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举人，郑孝胥解元榜。精书法，篆、隶、行书俱工，隶法有吕西村之风。又擅绘艺，花卉翎毛栩栩如活，饮誉当时，惜今尚未见其画作真迹。^①

洪作舟与同为晚清书坛大家的郑孝胥是乡试同年，但他文战不利，中举时已56岁，仕途前景黯淡，于是索性终日以书画笔墨为乐。洪作舟的书法有没有得到吕世宜的亲自指点，目前尚无文献可资考证；但正如上文所言，洪作舟的隶书刻意模仿吕世宜，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稍后于洪作舟，金门书家学吕世宜而有成者，则为吕调阳。吕氏生平不详，或为吕世宜之族人。他的隶书笔法波尾较为尖锐，出峰有力，是继承吕世宜的精神但又能发扬光大的。

五、结论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士大夫普遍热衷于金石碑学，并往往以金石之考据、碑版风格之鉴定作为书法创作的源泉。吕世宜之书法，承嘉道间碑学书法之古文金石风潮，学理与实践并重，既注意发掘传统，又能革新创作观念，化陈旧为新奇，将隶书与篆笔相结合，确立了其篆书与隶书的兼具独特性与开创性的艺术风格，其于书学之贡献，桃李满门，影响后世甚巨。吕世宜祖居金门而随家内渡居厦门，又入台执教，在台期间，广为搜集金石，对于他的金石收藏和研究来说，台湾是十分重要的时期。流寓在台的十一、二年间，倾其所学，非惟传其书法与古文之术业，更使得台湾之风为之一新。他的赴台及留下的收藏，深深影响了台湾金石学发展的轨迹，使台湾的金石书法发生两大巨变：一、开始重视金石作品上书法文字的第一手资料，二、台湾本土书法家开始思索新的书法之路，这才带动台湾文化由此一步步更加昌盛。在吕世宜的金石学在台湾落地生根之前，台湾拥

^① 许乃鑫：《金门民间古字画珍藏集》，金门：金门县文化中心，2002年，第226页。

有的金石书法作品仅有零星，可以说，倘若没有吕世宜在台湾进行艺术、学术活动，台湾本土金石书法的开端也许会更往后推迟。

吕世宜几乎可以说是金门唯一闻名的书法家，是许多乡贤与族人的骄傲，他一生于闽南、台湾地区执教的经历、广泛的学术交游圈，也可说是其所处时代文人儒士学术活动的见证。故在台湾的学术贡献上，吕世宜既是书法家，同时也是金石学研究者，还是书法理论家，金石学研究成果集中于《爱吾庐题跋》《四十九石山砚背初刻》《四十九石山房刻石拓本》《爱吾庐论书》与《爱吾庐文钞》，在文字方面的其他成就还有《古今文字通释》和《千字文通译》两部著作，另还有参与编撰《厦门志》和《金门志》，此两本志书至今仍是研究厦门、金门不可或缺入门志书，其贡献被誉为“金石学导师”，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被誉为“金门一千七百年有史以来唯一的书法家”，是名副其实。从他身上，也可以以小见大，看到清代至今的厦、金、台三地闽南文化传播的特点，以及现今他对于台湾、金门和厦门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吕世宜不仅深深影响文化推演进程，艺术成就更是弥足珍贵之宝，直至现今依然值得重视与发掘。

（上接第24页）

在这个架构中却存在四个理论问题：一是性体无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二是心成了没有主脑的盲动；三是心对情进行宰制没有内在必然的合法性；四是道德责任难以落实。冯兵则以朱熹《家训》中“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一句为中心，认为其中的“仇”与“怨”分属人际关系矛盾的两个不同层面。“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义”也是“直”的深化与升华。“以直报怨”历来都被儒家视为解决怨恚心理的最合理方式，而“以义解仇”相比公羊春秋学与礼学的“大复仇”主张以及以张载“仇必和而解”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当今社会，朱熹的这一告诫仍有借鉴价值。

在闭幕式上，朱杰人教授总结认为，在即将过去的2017年里，我国朱子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朱子学与阳明学、道统问题、朱子与书院、朱子的经学等。2018年为朱子诞辰888周年，在这一对中国人而言颇具特殊意义的时间点中，我国朱子学界将举办一系列盛大的学术活动予以纪念，朱杰人教授将其所知的活动讯息做了通报，令在座学者颇受鼓舞。

罗丰禄年表

戚庆雨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罗丰禄 (1850—1903), 新梅公支系六世孙, 福建闽县 (今福州) 人, 字稷臣, 昵称汾。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 晚清著名的外交家、驻外使节。译著有《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录》。本年表简要勾勒罗丰禄家世、生平, 不作繁琐考证和称引。罗丰禄生平多涉及家国大事, 故本表于时事亦摘其要着而记之。

关键词: 罗丰禄; 郭嵩焘; 李鸿章; 年表

罗丰禄 (1850—1903), 福建闽县 (今福州) 人, 字稷臣, 昵称汾。

祖父罗必达 (1784—1837), 号剑门, 19 岁入伍, 26 岁升经制外委, 后调台湾北路中营右哨千总, 署理台湾镇标中营守备。翌年, 调署理北路右营守备。道光十二年 (1836) 十月, 由厦门赴台剿匪, 旋被派往凤山搜捕余匪。道光十三年 (1837) 二月, 因劳顿致疾, 感染风寒, 三月卒于凤山军营, 享年 54 岁。生有两子, 长子绍祖 14 岁夭折, 次子绍宗。

父罗绍宗 (1812—?) 字次仲, 必达次子, 少小聪慧, 7 岁能背诗经, 随父必达成台。16 岁, 弃举业, 习骑射, 入营伍, 升抚标右营外委。随父入台, 曾任抚辕武巡捕、抚标右营把总、左营千总。生母陈氏。

兄弟九人, 丰禄行七。兄, 天禄; 兄, 雍禄; 兄, 谦禄; 兄, 锡禄; 兄, 臻禄; 兄, 康禄; 弟, 熙禄; 弟, 君禄。

妻魏夫人。

清道光三十年庚戌 (1850), 一岁

十月, 生。

是岁, 清宣宗道光帝旻卒, 享年 69 岁。

是岁, 道光四子奕訢继位。

是岁, 沙俄侵占黑龙江。

是岁, 林则徐卒, 享年 67 岁。

清咸丰元年辛亥 (1851), 二岁

一月, 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是岁, 道光四子奕訢继位一年, 年号咸丰, 以该年为咸丰元年。

是岁，河南、安徽等地爆发捻军起义。

咸丰六年丙辰（1856），七岁

是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是岁，咸丰长子载淳生。

咸丰十年庚申（1860），十一岁

是岁，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十二岁

八月，清文宗咸丰帝^{奕詝}卒，享年31岁。

十一月，慈禧发动祺祥政变，改年号为同治，咸丰长子载淳继位。

同治元年壬戌（1862），十三岁

是岁，载淳继位一年，年号同治，以该年为同治元年。

同治三年甲子（1864），十五岁

是岁，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同治五年丙寅（1866），十七岁

六月，左宗棠奏请在福州设立船政局，获准。

是岁，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

同治六年丁卯（1867），十八岁

是岁，沈葆楨接办福州船政。

是岁，罗丰禄考入福州船政“求是堂艺局”，入后学堂学习英文、驾驶专业。罗丰禄五兄罗臻禄一同考入福州船政局，入前学堂，学习制造专业。

同治七年戊辰（1868），十九岁

是岁，报捐监生理问銜。

同治十年辛未（1871），二十二岁

是岁，担任福州船政后学堂驾驶班教习。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二十五岁

三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后学堂驾驶班，拟上舰实习。

六月，因监造“船工告成，案内奏保以县丞进用”。

是岁，日本借口台湾生番屠杀琉球渔民派兵侵略台湾，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率船政学堂船只、学生赴台督办军务。

十二月，同治皇帝卒，享年19岁。

光绪元年乙亥（1875），二十六岁

是岁，载湉继位，年号光绪。

光绪二年丙子（1876），二十七岁

十二月，郭嵩焘因“马嘉理事件”赴英道歉，自上海赴伦敦，于次年一月抵达伦敦，是清政府第一位驻外使节。

光绪三年丁丑（1877），二十八岁

一月，李鸿章、沈葆楨奏请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留学，获准。

罗丰禄以翻译身份经“船政大臣吴赞成派带出洋肄业学生前赴英、法、德各国襄办肄业局事宜”，罗母诫曰：“必无坠尔父志！其惟学历数年，学成归里。”

三月，乘“济安”号开赴香港。

四月五日，由香港出发。

五月，抵达伦敦，入英国琴士官学（皇家理论学院），学习气学、化学、格致。罗丰禄随出使德国公使李凤苞拜见驻英公使郭嵩焘。

光绪四年戊寅（1878），二十九岁

二月，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

五月，与郭嵩焘同游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

七月，与严复一道至驻法使馆拜见郭嵩焘。

十月，受邀出席新任驻德公使李凤苞饯行会。

是岁，担任郭嵩焘英文秘书，亦兼任驻德、英公使馆翻译。

是岁，回复郭嵩焘信件，谈论优秀留学生，将留学生分为交涉之才和绩学之才两类。

光绪五年己卯（1879），三十岁

一月，严复回复郭嵩焘信件，谈及罗丰禄为优秀留学生。

一月，郭嵩焘离任回国，曾纪泽抵达伦敦接任。

光绪六年庚辰（1880），三十一岁

二月，学习期满回国，入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府充当李鸿章外交顾问兼翻译。

是岁，李鸿章奏请于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获准。

十二月，担任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总办。

是岁，严复调任北洋水师学堂充教习。

光绪七年辛巳（1881），三十二岁

二月，由候选主事升任同知，赏加四品衔。

六月，调任北洋水师学堂营务处。

光绪八年壬午（1882），三十三岁

是岁，兼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

光绪九年癸未（1883），三十四岁

五月，升任水师营务处道员。

光绪十年甲申（1884），三十五岁

是岁，中法战争爆发。

八月二日，于天津晤见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

八月四日，总理衙门因英人赫德于上海拨弄是非连电催罗丰禄返京。

是岁，春、秋，两次邀同英、俄两国水师官兵至北洋水师学堂参与学堂首届驾驶班毕业会考。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三十六岁

六月，中法新约在天津订立。

是岁，升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之职。

是岁，因出洋肄业暨天津招募学生学业有成及中西教习出力以知府分省补用。

是岁，因历年防务出力教习保加二品衔。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三十七岁

是岁，严复代理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之职。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三十八岁

八月，奉派赴广东协助吴仲翔整改广东水师学堂事宜。

是岁，罗母七十寿，严复为罗母作《罗母陈太淑人七十寿序》。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三十九岁

五月，奉命协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及林泰曾、刘步蟾等起草《北洋海军章程》。

是岁，经海军衙门以北洋水师学堂出力教习保加三品衔。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四十岁

是岁，严复升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之职。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四十一岁

四月，因北洋随办洋务出力届满三年保加二品顶戴。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四十二岁

是岁，因历年办理海军出力奏保随带加三级。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四十四岁

是岁，经李鸿章奏保堪胜关道人员奉旨著以关道记名简放。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四十五岁

是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四十六岁

三月，以头等参赞衔随李鸿章自天津赴日本议和。

六月，于天津晤见日使木樨。

七月，接李鸿章令赴京。

十月，拜会翁同龢，翁同龢称赞罗丰禄为李鸿章手下“著名能员，貌伟而语滑，闻读书颇多。”

是岁，广东康有为率数千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议和，史称“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四十七岁

三月，随李鸿章自上海出使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四月，抵达俄都圣彼得堡。

六月，李鸿章率罗丰禄等与沙俄签订中俄同盟条约。罗丰禄会见德国前宰相俾斯麦，俾斯麦赠送罗丰禄一帧亲笔签名照片。

八月，随李鸿章谒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赐赠罗丰禄“罗稷臣丰禄爵士”爵位。

八月二十八日，随李鸿章抵达纽约，罗丰禄在美结识著名作家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赠送罗丰禄其作品。

十月，在外游历7个月后，返回天津。

十一月，以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赏四品京卿出任驻英公使兼驻意大利、比利时公使。任内，罗丰禄积极寻求改变中国外交形象，协助安排留学生事宜，为各省引进人才。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四十八岁

是岁，英国占据旅顺、大连、威海，意大利提出租用三门湾，罗丰禄赴罗马激辩，挫败罗马阴谋。

是岁，被授三品京堂銜。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四十九岁

是岁，电告总理衙门，报告与英谈威海卫租借事宜。

是岁，光绪帝下诏更定国是，变法图强，戊戌变法开始。

是岁，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捕杀变法人士，变法人士逃亡。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五十岁

十月，奉命探查康有为过英、美等地有无潜图勾结情事。

十二月，主持条款俱乐部聚餐会并发表讲话。

是岁，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之职。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五十一岁

是岁，奉命饬查康有为等行迹。

是岁，北方地区爆发义和团运动。

是岁，八国联军侵华。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五十二岁

一月，访问英国伯明翰造币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其特制“罗丰禄纪念章”以资纪念。

八月，受命任驻俄公使，授一品顶戴太仆寺卿，以与俄交涉归还东三省事宜，因病未能成行。

是岁，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五十三岁

四月，沙俄政府代表雷萨尔与清政府代表王文韶在北京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五十四岁

是岁，因鼻癌卒于福州，享年五十四岁。译著有《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录》，严复作挽联“能事闻重译，传经固绝伦”。陈宝琛书“清罗太仆墓”碑。清廷诰授“荣禄大夫”。

参考文献：

- [1]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 [2]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 [3] 林公武、黄国盛：《近现代福州名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 [4] 杜志明：《罗丰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
- [5] 杜志明：《重新解读严复所送罗丰禄的挽联——能事闻重译，传经固绝伦》，《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 [6] 贾熟村：《晚清著名外交官罗丰禄》，《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 [7] 秦艳霞：《近代外交家罗丰禄的翻译成就》，《兰台世界》2014年第2期。

清代金门作家许琰家世考辨

刘晓青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许琰, 字保生, 号瑶洲, 金门人, 雍正五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顺天应试同考官。他是清代金门乃至闽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文人。根据《珠浦许氏族谱》, 许琰为金门珠浦许氏派下子孙。珠浦许氏以儒业传家。自明以来, 不乏以科举中试者, 许琰所在六房西宅房, 九世许福至十六世许琰, 历代均有功名在身。

关键词: 清代文学; 金门作家; 许琰; 家世考

一、《珠浦许氏族谱》与《桐山家谱》辨析

许琰是清代金门地区的重要作家, 雍正五年丁未科(1727)中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顺天应试同考官。许琰一生官场失意, 寄情山水间, 留下许多优秀作品, 保存至今有《宁我草堂集》十二卷, 为诗词合刻本。清代帝师梁邨先生蔡世远曾评价许琰诗“保生之诗以雅贍胜”^①。许琰出自金门许氏, 许氏为金门之大姓, 关于许琰的记载散见于两本族谱中, 分别为《金门珠浦许氏族谱》《桐山家谱》。《桐山家谱》乃今同安县大田镇桐屿村许氏家谱, 是谱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手抄复印本。珠浦许氏与桐屿许氏都出自金门, 但始祖分别为五十郎和四十九郎, 根据《桐山家谱》记载, 桐屿许氏系出金门安岐许氏, 始祖为五十郎公兄长四十九郎公。金门许氏先世居于漳州诏安, 始祖四十九郎与五十郎兄弟宋时迁入金门丹诏(山灶), 后五十郎移居金门后浦。传至八世时, 八世祖肇建公嘉靖二十二年(1543)因家贫入赘桐屿张氏, 自此在桐屿繁衍开来, 至许琰时, 已在桐屿传至八世, 自丹诏以来已十五世。^②

《金门珠浦许氏族谱》载:“依据旧谱所载:系宋末元初自丹诏(今诏安)迁来, 为纪念水源木本之义, 故名初居之村为丹诏(后讹音为山灶), 而后支分数系, 今金门之许姓, 有九大支派: 山灶许氏、安岐许氏、珠浦许氏、后沙许氏, 而后迁来的盐埕尾许氏、庵前许氏、烈屿乡东林许氏、湖井头许氏、同安许氏。”^③

珠浦许氏原有旧谱, 后六房八世祖许重华经数年完成家谱一部, 外出求序路上遭遇盗贼丢失, 九世许福、十世许大用叔侄于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重编家谱。^④

金门许氏九支, 其中山灶、安岐、珠浦三支, 始祖为三兄弟, 山灶许氏始祖居长, 为四十八郎赋远公, 安岐许氏始祖为四十九郎贻远公, 珠浦许氏始祖五十郎忠辅公。

作者简介: 刘晓青, 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6 硕士研究生。

^① [清]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二,《陈峻侯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5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61 页。

^② 《桐山家谱》手抄复印本,1935 年。

^③ 许嘉立:《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 年,第 54 页。

^④ [明]许福:《珠浦许氏族谱序》,《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 年,第 142 页。

(五十郎)为陈姓赘婿,遂居后塗山(今后浦),为珠浦许姓始祖,再世而二子:有东西菊圃之号,并有大小教谕之称,传之四世,始分为六房:长房深井头、二房东厝房、三房大前厅、四房小前厅、五房后翰房、六房西宅房,其族繁衍滋大,昭穆分明,至明嘉靖年间,人丁达四千余。^①

两份族谱虽都有记录许琰,但因属不同分支,其中一份当是制谱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误将许琰抄录在内。手抄版《桐山家谱》中辑录一条许琰信息:

六房,翰林许琰,字保生,号瑶洲,居同安感化里古屿保仁宅后徙居埔尾、石狮。所刊刻有《宁我草堂诗》四卷,《许同安制义》一集、二集。^②

其中,“六房”与《桐谱》世系表中房号不相符,此谱将许琰列为桐屿许氏长房,前后不相符。许琰刊刻的《许同安制义》,作者为许懈,是书于2010年同安区图书馆搬迁新址时,整理旧馆图书发现,为海内孤本,现存三册。其目录有“太史长洲汪武曹、漳浦蔡梁邨两先生论定,三侄孙琰保生抄评”^③一行。

序篇言:“得手只在学,为君子一句,眼快耳,挈处融串处松,而轻重仍分,眉目仍清,则巧便又复纯正矣。——曾侄孙曰琰,识。”^④

《珠浦许氏家谱》世系表中,许琰之父为许琰,字汝奇。《桐山家谱》中,许琰之父为许元潮,字嘉堂,与许琰,两者名、字皆不可对照,且这份家谱中,许琰“名永保,字琰。”与包括许琰本人作品及其他史料所著录的许琰信息都不相符;其中载许琰属安岐许氏派下十五世孙,而许琰属忠辅公派下十五世孙,算是平辈,《许同安制义》中曾侄孙、三侄孙,应是双方辈分的差别,许懈为忠辅公派下十二世孙,其曾侄孙应为十五世,三侄孙为十六世。《珠浦许氏族谱》中许琰属六房西宅房十六世孙,所以许琰和许琰的辈分差是合理的,或可证明二者的父子关系。

《桐山家谱》中记录许琰“名永保,字琰”,乾隆四年(1739)许琰编撰的《普陀山志》中亦保留有许琰题名及印章。许琰印如图1,“琰字保生”“阙号瑶洲”字样。^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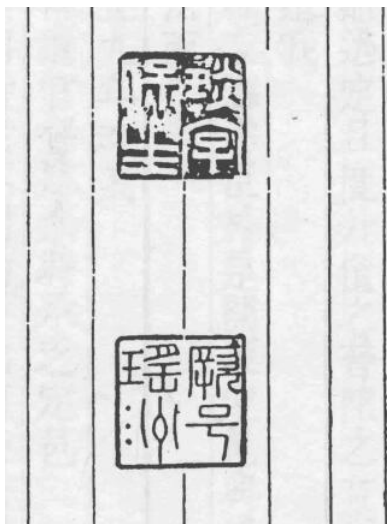


图1 《普陀山志》中许琰印章

① 许嘉立:《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82页。

② 《桐山家谱》手抄复印本,1935年。

③ 许懈:《许同安制义》,许琰刊刻,同安县图书馆藏。

④ 许懈著、许琰刊刻,《许同安制义》,同安县图书馆藏。

⑤ 见[清]许琰:《普陀山志》,乾隆四年版,普陀山风景名胜管理委员会藏。

辑录清代科举人士姓名的专书《清朝进士题名录》《词林辑略》中，也统一将其姓名记为“许琰”。《清朝进士题名录》载：“雍正五年丁未科，三甲五十四名，许琰，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①《词林辑录》载：“许琰，字保生，号瑶洲。”^②《词林辑略》记载翰林姓名、籍贯、科年、甲第等情况，其中翰林是翰林院各种职位以及翰林院庶吉士的总称。许琰与先生蔡世远关系密切，《宁我堂集》中就有不少篇目提及其在鳌峰书院师从蔡世远的情况，蔡世远去世后，许琰参与编校了老师的《二希堂文集》，编校姓氏就有他的名字，其中《陈峻侯诗序》一文也提到他：“峻侯在书院时，与同安许保生道相同，志相合。”^③

与许琰关系密切的座师蔡世远在提到他时，也言“保生”，综上所述，许琰，姓许名琰字保生，而非《桐山家谱》所提“名永保，字琰”。

除此以外，金门地区一直有科举中式者或在朝为官者回家乡祭祖晋匾的传统仪式，所晋之匾额有“文魁”“进士”“解元”“翰林”等，这一习俗传袭至今，金门地区有获博士学位者，也可举行晋匾仪式，将“博士”匾额悬于祠堂房梁或左右两侧壁上。廖庆六《略论金门家庙之祭祖礼仪》一文中提到：

金门地区在晋匾方面，过去仅限已得到科举功名之举人、进士或在朝高官，但现在则改以得到博士学位或已晋升将军之官阶者，就能享受家庙晋匾之殊荣。^④

今金门珠浦许氏家庙仍悬有明清之际子孙所晋之匾额，其中许琰有“进士”“经魁”“翰林”等匾。如图2。



图2 珠浦许氏家庙进士匾

许琰为珠浦许氏派下子孙，才会晋匾于珠浦许氏家庙，而安岐许氏家庙中无许琰之匾额。另清代珠浦许观海《珠浦许氏重兴祠堂序》一文中提到：

越明年清圣祖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年），观海（许观海，字伯仲，六房）忝列乡榜；清世宗雍正元年癸卯（1723年）基浦兄（许履坦，五房，十五世），又列甲榜。清世宗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瑶洲侄（许琰）、德之叔（许秉文，六房），一列乡榜，一中副车；至清世宗雍正五年丁未（1727年），瑶洲侄又发甲，而入词林，以是观之，不可谓非重兴祠宇之明验也。^⑤

许观海为珠浦许氏六房十五世孙，为许琰族叔，清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中式。其文写于雍正九年辛亥（1731）三月，提到珠浦许氏族中四人接连中式，以之为重兴祠堂祖宗保佑的灵验，许琰应属珠浦许氏一脉，此文为许琰乃忠辅公后世子孙之有力佐证之一，《桐山家谱》中关于许琰属于安岐许氏后人的书写或属讹误，许琰始祖为五十郎忠辅公，系出珠浦许氏一脉，根据《珠浦许氏

① 江庆柏编校，《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74页。

② 朱汝珍：《词林辑略》，《清代传记丛刊》第1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③ [清]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二，《陈峻侯诗序》，出自《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④ 廖庆六：《略论金门家庙之祭祖礼仪》，《谱牒学论丛》第3辑，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第124页。

⑤ 许嘉立：《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48页。

族谱》，许琰一支属六房西宅房。

二、许琰的家族渊源与世系

关于金门珠浦许氏何时入金，《金门珠浦许氏族谱》《迁次鸠祭》一文提到：

始祖从元末间关海岛自丹诏而赘于陈，迄今三百载，后浦其桑梓里也。^①

此文由十三世许云举作于清康熙九年庚戌（1670）二月，根据《中国历史纪年表》，元世祖忽必烈建元于1281年，至明太宗朱元璋1368年灭元，历经90余载，至是文所作之年康熙九年（1670），约三百载。十五世许伯协《族谱序十引》载：“始祖五十郎，忠辅公，于元朝年间，自丹诏来赘……”^②由是可证，其族大抵发于元末。

金门崛起于海中，四面环水，“浦”乃水滨之谓也，金门以浦为地名者不在少数，如田浦、后浦、浦边等。珠浦许氏所聚居之后浦，又称珠浦、后塗山、后徒，乃今日之金城镇，金门县如今仍有“姓许，住后浦”“陈厝坡、许厝墓”等俗谚流传，始祖许忠辅墓在今金门县金城镇，当地人称之为“许厝墓”，如图3。



图3 始祖五十郎许忠辅之墓

后浦旧时是种植稻谷之地，明卢若腾《留庵诗文集》《修筑后浦埭议》一文提到：“内埭坚固，岁岁禾稻丰熟，冠于浯上。”^③又有《筑埭》一诗提到：“梁相不壅潮汐道（浯洲后浦埭始于宋相梁克家），桑田丰熟四百载。”^④金门地处岛屿，土地较为贫瘠，而在金门人卢若腾笔下后浦不仅有种稻的传统，而且年年丰收，应该是浯岛人口较为密集的富庶之地。

明代许福（九世）《珠浦许氏族谱序》载：

余世家沧浯之珠浦，珠浦望族陈氏也。余始祖五十郎公，自丹诏赘其家，后以陈艰于嗣，因隶其籍。再世而二子，有东西菊圃之号，时有大小教谕之称。自是至今才十世，其间名讳事实，或已而不纪，而自始祖而上，其所自出，亦已而不可考？呜呼！十世之间，三百余年上下事之湮没已若此，矧继吾数世之后哉！^⑤

根据《珠浦许氏族谱》记载，始祖许忠辅，生二子，长为东菊圃，号大教谕；次为西菊圃，号小教谕。长子生四子，次子生二子，传至四世时，分为六房，分别为深井头（长房）、东厝房（二房）、大前厅（三房）、小前厅（四房）、后翰房（五房）、西宅房（六房）。

许琰所属六房西宅房昭穆如下：

珠浦许氏开基始祖五十郎许忠辅（第一世）、次子西菊圃（第二世）、次子坪搜（第三世）、次子

① 许嘉立：《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44页。

② 许嘉立：《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51页。

③ [明]卢若腾：《修筑后浦埭议》，《台湾古籍丛编》第2辑《留庵诗文集·文辑·杂文》，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41页。

④ [明]卢若腾：《筑埭》，《台湾古籍丛编》第2辑《留庵诗文集·七言古·补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63页。

⑤ [明]许福：《珠浦许氏族谱序》，《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42页。

绍祖（第四世，西宅房祖）、长子正孙，字光尹（第五世）、长子日章，字时嘉（第六世）、长子启明，字纯阳，号靖斋（第七世）、长子重华，字良绚，号贞乾（第八世）、三子许宫，字尧中，号本轩（第九世）、长子大来，字惟明，号南峰（第十世）、长子思缵，字从厚；次子思续，字丛锐（第十一世）、长子光卿，字用实，号宾明；次受卿，字用采，号衷白，承思续公（第十二世）、三子台壇，字尔建（第十三世，用采公三子）、长子莫之，字而京（第十四世）、次子许璉，字汝奇（第十五世）、长子许琰，字保生，号瑶洲（第十六世）、长许兰、次许芽、三许第（第十七世），后无记载。为更直观的展示六房世系，特附表于下。

表 1 金门珠浦许氏族谱，始祖至十世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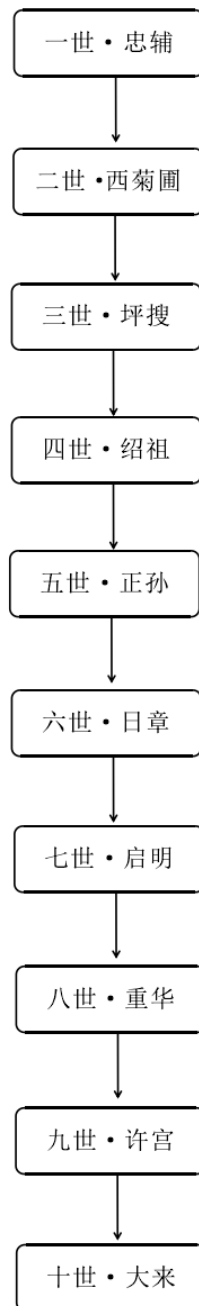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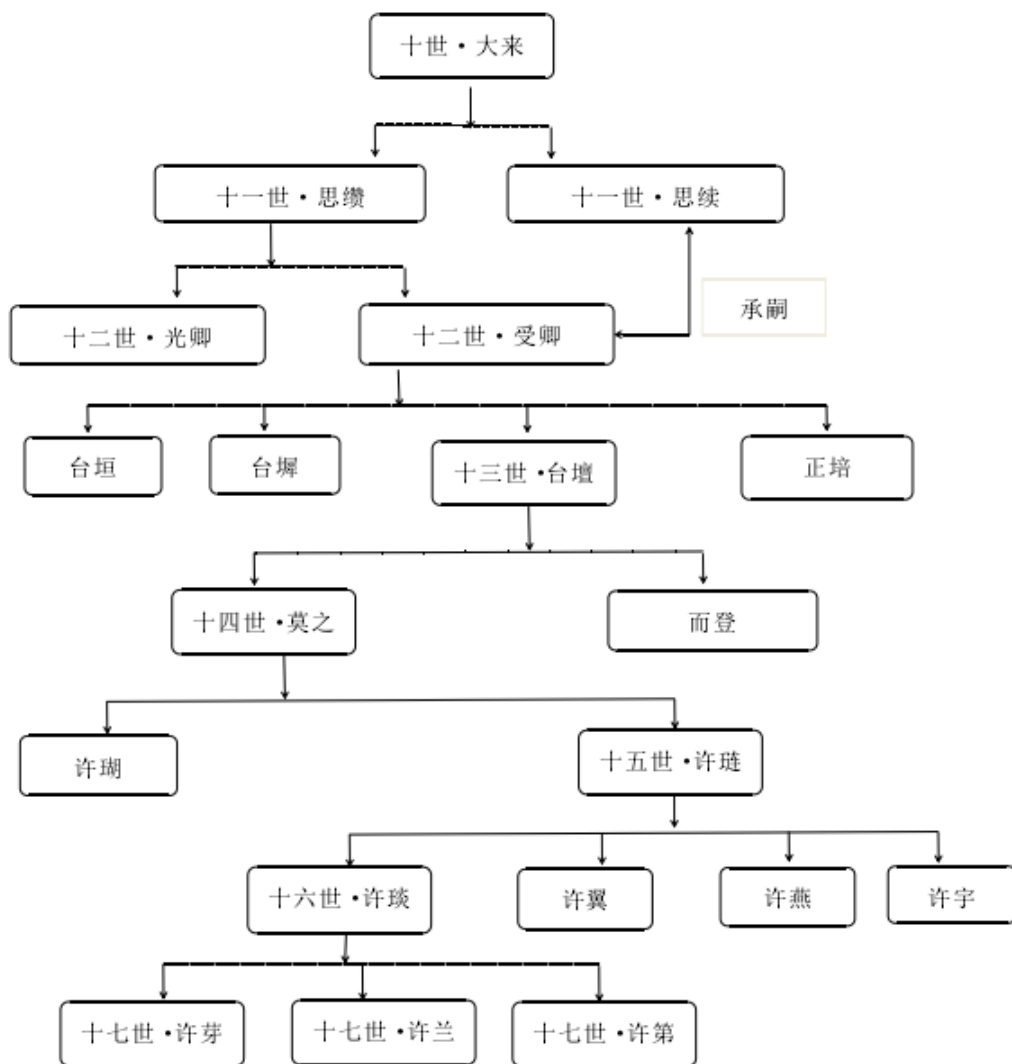


表2 金门珠浦许氏六房西宅房，十世至十七世世系表



三、家族特色与传统

明清之际，正值金门科举之风鼎盛之时。珠浦许氏以儒业传家，自明以来，不乏以科举中式者。许琰所在六房西宅房，三百年来，科举不衰，九世许福至十六世许琰，历代均有功名在身。

九世许福，重华第五子，字尧锡，号西浦，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登进士第。十世祖许大来，字惟明，号南峰；于明嘉靖七年戊子（1528），补邑庠生，习《易经》；嘉靖十年辛卯（1531）乡试，以廪生中式，第十七名，授河南南确山知县；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擢升广西梧州通判；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升广东万州知州。十一世祖许思续，字从锐，“幼负夙悟力学能文，娶三年而天歿”^①；思续之兄，思缜，字从厚，生员。十二世祖许用卿之兄许光卿（思续长子），字用实，号宾明，万历二年甲午（1594），补邑庠生，以儒士应乡试，中式第七十六名举人，除河南西平教谕，

^① 许嘉立：《许门节妇行实》《许从锐》，《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99页。

升广东新宁知县；十二世祖许受卿，字用采，号衷白（又作白衷），生员，思缵次子，承思续之嗣。十四世祖莫之，字而京，生员，许琰祖父。十五世许瑚，字汝还，号夏器，生员，许琰伯父；许琰，字汝奇，为乡饮宾。十六世许琰，清雍正二年甲辰（1724）中式；清雍正五年丁未（1727），登进士第，三甲，翰林院庶吉士，历任顺天府应试同考官。

为更直观展示西宅房科举成绩，根据《金门珠浦许氏族谱》，将明清之际有功名在身的西宅房子孙，按姓名、辈分、科举成绩、历任官职分别列于下，见表3。

表3 珠浦许氏西宅房功名表

姓名	字、号	世系	生员	举人	进士	历任	备注
许福	尧锡、西浦	九世	√	√	√	授江南监察御史	
许鼎	尧器、珠浦	九世	√				
许复还	大用、东湖	十世	√				
许大来	惟明、南峰	十世	√	√		河南南确山知县、 广西梧州通判、 广东万州知州	
许复德	大修、少峰	十世	√				
许成材	大任、肖浦	十世	√			光禄寺监事，迁署丞、 南京凤阳府通判	例贡
许思齐	从贤、浯阳	十一世	√				
许思及	从学	十一世	√				
许思缵	从厚	十一世	√				
许思谨	从潜、心远	十一世	√				
许国祯	从珍、瑞龙	十一世				兵马指挥	
许国光	从观	十一世	√				例贡
许国炳	从贲	十一世	√				例贡
许国鼎	从新	十一世	√				岁贡
许国钦	从安、翼轩	十一世	√				
许逵翼	用卿、搏翥	十二世	√	√		长汀教谕、会试同考官、 广西南宁府宣化县尹	
许光卿	用实、宾明	十二世	√	√		河南西平教谕、广东新宁知县	
许延升	尔阶	十三世	√				监生
许晋声	尔兰	十三世	√				
许壬	尔由	十三世				广东顺德镇左营把总，候补本 营千户、守备；江南省守备； 苏松镇右营守备	
许岳	尔胤	十三世	√				拔贡
许正培	尔恒、孝生	十三世	√				
许霞举	尔济	十三世	√				
许秉文	德之、袁文	十四世	√	√			副榜

姓名	字、号	世系	生员	举人	进士	历任	备注
许永忠	而贞、同人	十四世				四川遵义府通判	
许莫之	而京	十四世	√				
许华袞	而缓、予之		√				
许汝舟	济之、寿宁	十四世	√			建宁府寿宁县儒学训导	岁贡
许长清	和之	十四世	√			国学州司马	监生
许瑚	汝还、夏器	十五世	√				
许庶	伯上、养浩	十五世	√				
许观海	伯仲、	十五世	√	√			
许振遐	伯光、思谦	十五世	√				庠生
许进	号必捷	十六世	√				监生
许宁	号志刚	十六世	√				
许琰	保生、瑶洲	十六世	√	√	√	翰林院庶吉士、 顺天乡试同考官	
许诚	源时、苍燦	十六世	√				庠生
许榜	源登、景修	十六世	√				太学生
许监	克视	十七世	√				
许越	公拨	十八世	√				
许文壹	公贤	十八世	√				太学生
许耀焜	公儒、藹生	十八世	√	√	√		进士
许榜	公标	十八世	√			教谕	拔贡

是表根据《金门珠浦许氏族谱》整理，从中可以看出西宅房以儒业传家的家族特点。其祖先的文学创作可追溯至六世祖许日章。日章，字时嘉，号晦德，《族谱》记载其生于明建文元年己卯（1399）^①，其有联云：“山海清平贫亦乐，家室和好老无忧。”又有：“家和贫亦好，不义富如何。但存一子孝，不用积金多”^②之句。

八世祖许重华，字良绚，号贞幹。慷慨好义，客多至其门，尝修族谱，征序于外遇贼而谱失，明正德十八年癸未（1523），第五子许福、孙许大用，继承其志续修家谱。尝以非罪罹于狱当道诗云：

塞马年来过我家，穿墉谁谓鼠无牙。饰非意苙多谗谤，待罪甘棠敢怨嗟。屈处须从伸处屈，邪人还指正人雅。这回不向东风诉，谁信寒梅结白花。^③

虽然先祖只有留存寥寥几首诗歌作品，但仍能从一窥西宅房先祖的人品作风，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家庭风气，以及乐观阔达的处世姿态。或者正是这种良好的家庭风气，引导西宅房后世子孙潜心儒业，发扬先贤之正气，为人为官颇有贤名。

（下转第93页）

①《金门珠浦许氏族谱》原载：“日章……生于明洪武三十二年己卯（1399）”，当误，明无洪武三十二年，己卯年为明建文元年（1399），据改。

②许嘉立：《许氏隐逸》，《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91页。

③许嘉立：《许氏隐逸》，《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91页。

韩偓《香奁集序》真伪考辨

吴在庆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在其《〈香奁集〉的一篇假序》一文中, 针对韩偓《香奁集序》提出了不少于七大方面的疑问, 从多方面、多角度对《香奁集序》为韩偓所作进行了否定, 并以自己所认为的“铁证”, 判定《香奁集序》乃非韩偓所作, 是“一篇假序”。然而, 徐先生的“铁证”不铁, 均存疑点。《香奁集序》确系韩偓所撰。

关键词:韩偓;《香奁集序》;假序;考辨

唐末著名诗人韩偓有《韩偓诗》《金銮密记》和宋以来颇富争论的《香奁集》《香奁集序》等诗文。其《香奁集序》云:

余溺于章句, 信有年矣。诚知非士大夫所为, 不能忘情, 天所赋也。自庚辰辛巳之际, 迄己亥庚子之间, 所著歌诗, 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 亦数百篇, 往往在士大夫口, 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 斜行小字, 窃咏者不可胜纪。大盗入关, 绡帙都坠。迁徙流转, 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 岂复以吟咏为意。或天涯逢旧识, 或避地遇故人, 醉咏之暇, 时及拙唱。自尔鸠集, 复得百篇, 不忍弃捐, 随即编录。遐思官体, 未解称庾信工文; 却谓《玉台》, 何必使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态, 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 未尝糠粃; 金闺绣户, 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 香生九窍; 咽三危之瑞露, 美动七情。若有责其不经, 亦望以功掩过。玉山樵人韩致尧序。^①

对于这篇序, 清末民初的学者震钧先生在其《香奁集发微》中有所解读, 尽管某些解读并不准确, 但对于这篇序, 他坚信乃韩偓“自有深旨, 非仓卒所可解”之作, 并谓此序“大抵云‘粗得捧心之态, 幸无折齿之惭。柳街青楼, 未尝糠粃; 金闺绣户, 始与风流’均致尧自况语也。夫以《香奁》艳语连篇, 而云‘得捧心之态, 无折齿之惭, 金闺绣户’, 始足与此, 此岂论诗之优劣乎! 直是自叙其身世耳。明眼人自能辨之。”^②然而, 震钧先生的这一见解, 至 20 世纪 60 年代, 遂为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所颠覆。徐复观先生在其《〈香奁集〉的一篇假序》一文中, 一开头即揭出: “现在我要进一步说明《香奁集》的自序, 不是韩偓的作品, 甚至也不是和凝的作品, 乃是和凝以后的人冒名伪作。”^③为了说明这一观点, 他提出了不少于七大方面的问题, 从多方面、多角度对《香奁集序》为韩偓所作提出质疑, 并以自己所认为的“铁证”, 判定《香奁集序》乃是“一篇假序”, 自言

作者简介: 吴在庆, 男,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① 韩偓:《韩偓集系年校注》, 吴在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年, 第 1054 页。

② 震钧:《香奁集发微》, 扫叶山房石印本, 1914 年, 第 1 页。

③ 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 见《中国文学论集》,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76 年, 第 269 页。

这是“铁案如山”的结论。多年前，当我初读素所心仪的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时，对于他的某些质疑心存怀疑，对他另外的一些质疑则难辨是非，对他的一些结论甚至觉得不无道理。然而，随着我对韩偓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整理校注《韩偓集系年校注》一书的过程中，我对徐先生所提出的种种质疑有了新的认识，觉得他通过种种质疑、进而分析辨析而得出的《香奁集序》为“假序”的结论，并非如他所言，是“铁案如山”之论，而是可以冰释化解的误解。以下即对徐先生的种种质疑与其辨析，逐条将我的想法写出。所见不敢自必，提请学界同好共同斟酌而已。

—

徐先生首先引录《香奁集序》，后谓“按上面序中所说，则《香奁集》里的诗，是韩偓自己所追录编集的……在他所辑缀的诗中，本有由他人以旧稿见授，因而加以纪录的；现《香奁集》中有‘无题’四首者即是。兹将此诗前面小序简录如下……从上面的短序看，除《无题》诗外，见授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诗。”由此，徐先生提出疑问云：“不过，韩偓在暮年把由追忆、见授，及当时所作的诗，手写成集的时候，是否除了他的四世孙所保存的手写卷，及叶梦得所保存的，也即是《唐书·艺文志》上所著录，而未确定一个特定名称的‘《韩偓诗》一卷’以外，还另外亲自编了一部集子，并特给以一个《香奁集》的名称呢？若是如此，则北宋人所看到的手写本，何以皆不是《香奁集》呢？同时，假定他把自己的诗分成两种性质，编成两个集子，但是否只为《香奁集》作序，而不为另一真正代表他晚年生活的集作序呢？我想，在常情上，已经是不大可能的。”^①

徐先生所说的上述情况，诚如所说“在常情上，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世间的事情，有不少是出于常情之外的。更何况，有时还会有后人觉得异常而实际上古人乃觉其为常情之事。还如徐先生所云：“按上面序中所说，则《香奁集》里的诗，是韩偓自己所追录编集的。不仅从北宋人所看到的韩偓手写本及其原注，可以证明韩偓到福建后，曾追录自己的篇什，而篇什大约为百余篇。且现时《香奁集》中，即有‘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的诗，兹录于下：辑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一作动）心头。自吟自泣（一作泪）无人会，肠断巫山第一流。”^②从现存《香奁集》中的这首诗，我们不难知道，韩偓在福建时，是曾“辑缀”抄录“旧诗于卷上”的。所谓的“辑缀”，也就是将一些诗作编辑缀集之意；而“钞卷里”则明言，曾将这些编辑缀集的旧诗作亲手抄录于卷中。那么，此处所说的诗人所辑缀钞卷里的诗作，又是哪些诗呢？是不是《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韩偓诗》一卷”中的诗呢？我以为：绝不是。要说明这些诗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诗，还得从细读上文所引的韩偓这首诗入手。韩偓称这些辑缀钞录的诗为“小诗”，又说，因这些“小诗”而引起他“寻思”的旧事为“闲事”，并因之而“自吟自泣”。那么，什么“闲事”能使他如此“凄然有感”而“自吟自泣”呢？从他称这些诗为“小诗”，旧事为“闲事”，以及此诗末句的“肠断巫山第一流”之表述，我们可以断定：这些他辑缀钞录的旧作，乃涉及男女恋情的香艳之作。因此，在我看来，此诗乃诗人晚年编录《香奁集》诗时的有感之作。诗中所谓“寻思闲事到心头”之“闲事”，乃指其年轻时所曾经历之与一女子刻骨铭心相恋之事。^③所谓“肠断巫山（一作“蓬山”）第

^①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第269—271页。

^② 《中国文学论集》，第270页。

^③ 关于韩偓年轻时与一女子相恋事，参见黄世中：《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韩偓其人及“香奁诗”本事考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6—192页。

一流”，乃谓所恋之女子宛如仙山中第一等之绝色仙姝（即如此序所谓“金闺绣户，始预风流”者），此段未果之恋情，乃最是令人伤心欲绝之事。所谓“自吟自泣”，即是“凄然有感”之意；“无人会”，则谓此情事虽令自己“自吟自泣”，万般凄楚，然他人则不能深切知晓其情、领会其意矣。据此，我可以肯定地说：诗人这首诗中所谓的辑缀钞录的旧诗，就是后来编辑成的包括这首诗在内的《香奁集》中的诗，因此可以说，诗人曾编辑成《香奁集》是无可怀疑的。

徐先生所质疑的如韩偓亲自编成《香奁集》，“则北宋人所看到的手写本，何以皆不是《香奁集》呢？”按，此处所谓手写本，乃韩偓亲手所书之本，这样的本子，即便不是孤本，其数量也必然是极少的。又，当时韩偓乃寓居于偏僻且文化颇为荒芜闭塞的乡村；《香奁集》中诗又多属个人私情隐秘之闲情诗，作者年老时，恐怕也不会轻易示人。到了北宋时，尽管作者已逝，这些手抄卷子还由他的后代保留，但能见到的人也肯定是极少的。而有幸见到手写本又能将之记载下来者，则当更为稀少；甚至也可能出现尽管见到了某一手写本，然而目睹者却没有留下有关此事之记载。换言之，我们之所以知道北宋人见过韩偓的手写本《韩偓诗》一卷中诗，乃是因这些见过者中的极少数人能将此事记载下来，故可流传至今；而韩偓手写本《香奁集》也可能出现过这种情况，即：设使有人见过此集，但没有留下记载；或有所记载，但又因湮没，而未流传于后。因此，我们不能以“北宋人所看到的手写本，何以皆不是《香奁集》”，而断定韩偓没有手写本《香奁集》，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二

上文徐先生所言“北宋人所看到的手写本，何以皆不是《香奁集》”，对此我更有说者。据我上文所述，韩偓确实曾辑缀钞录过香奁诗，乃至编成《香奁集》。这一手写本《香奁集》中诗，是否真未曾为北宋人所见？对此，我不以为然。考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七一四，其在韩偓《香奁集·咏灯》诗下，引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云：“石林叶氏曰：‘世传《香奁集》，江南韩熙载所为，误。沈存中《笔谈》又谓汉相和凝所为，后贵，恶其侧艳，嫁名于偓，亦非也。余家有唐吴融诗一集，其中有和韩致尧《无题》三首，与《香奁集》中《无题》韵正同，而偓序中亦具载其事。又余曾在温陵于偓裔孙垆处，见偓亲书所作诗一卷，虽纸墨昏淡而字画宛然，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卷中，此可验矣。偓富于才情，词致婉丽，能道人意外事，固非凝所及。’”^①又，叶梦得所说见偓亲书所作诗一卷，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卷中之事，又见于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遯斋闲览》：“《笔谈》谓《香奁集》乃和凝所为，后人嫁其名于韩偓，误矣……又尝见偓亲书诗一卷，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卷中。偓词致婉丽，非凝言‘余有《香奁集》，不行于世’……安得便以今《香奁集》为凝作也？”^②此事还见于宋曾慥《类说》卷四十七《香奁集》所载：“《笔谈》谓《香奁集》乃和凝所为，后人嫁其名于韩偓，误矣……又尝见偓亲书诗一卷，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卷中。偓词致婉丽，非凝能及……安得便以今《香奁集》为凝作也！”^③上述几则，均记叶梦得曾在温陵于偓裔孙垆处，见偓亲书所作诗一卷事，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手书卷中，并以此三诗验证《香奁集》乃韩偓所作之事。由此，我们不难知道：叶梦得曾见过韩偓所亲书的“诗一卷”；这一卷诗中的《袅

① 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七一四，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第12页。

②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57-158页。

③ 引自《韩偓集系年校注》，第1275页。

娜》《多情》《春尽》等诗，即《香奁集》中诗。

这里，我们有必要联系徐先生在《在韩集著录及版本的情况中找问题的线索》一节中所引《逊斋闲览》所记的“偓亲书诗卷中，内有《多情》《袅娜》《春尽》三诗”，认为“《春尽》诗未在《香奁集》中重见；《袅娜》《多情》两诗，则皆在《香奁集》中重见……都是他晚年的诗。而《春尽》一首……也应当是他在南安县时之作……更是晚年之作……若如《香奁集自序》所说，里面的诗都是少作（见后），则此三诗只能归入《翰林集》，而不能归入《香奁集》。但事实上，此三诗正在韩偓手写本中。其中有两诗在《香奁集》中，乃是‘重见’的性质。”^①按，徐先生所说的这段话，其意主要在于驳斥“《香奁集自序》所说，里面的诗都是少作”，从而证明《香奁集序》乃伪作。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徐先生乃误解《香奁集序》之意，此处暂不论，留待下文再辨析。这里，我先要辨析的是，除上述徐先生所要表明的意图之外的其他相关疑问。徐先生以为“此三诗正在韩偓手写本中。其中有两诗在《香奁集》中，乃是‘重见’的性质”，从而以此说明，此三首韩偓亲书的诗，本是属于《翰林集》（即《韩偓诗》），而原非《香奁集》诗的看法。我以为，徐先生的这一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原因在于，他也完全相信前人所引用的叶梦得关于“偓亲书诗卷中，内有《多情》《袅娜》《春尽》三诗”的记载。如前述诸家所转引叶梦得之说的三诗皆作《多情》《袅娜》《春尽》，我认为其中的《春尽》诗乃《春昼》诗之误。其理由为：一、叶梦得是要以见到韩偓亲书的这三首诗来表明这是《香奁集》中的诗作，因为他当时是见到过已经在世间流传的《香奁集》的。这从《文献通考》卷二四三《经籍考》七十所载的这段话即可知道：“石林叶氏曰：‘偓在闽所为诗，皆手写成卷。嘉祐间，裔孙突出其数卷示人……吾家仅有其诗百余篇。世传别本有名《香奁集》者，《唐书·艺文志》亦载，其辞皆闺房不雅驯。’”^②既然如此，那么他所举证的这三首诗应该都是《香奁集》中诗，而不是《翰林集》中诗。那么《春尽》诗是否是《香奁集》中诗呢？检此诗为：“惜春连日醉昏昏，醒后衣裳见酒痕。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人闲易有芳时恨，地迥难招自古魂。惭愧流莺相厚意，清晨犹为到西园。”从此诗所咏，可见其正如徐先生所说“这首诗正是他最高的代表作；因为这是他把亡国之恨，及一去不返的难尽春情，融化在一起的作品”。^③又考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二十已选了韩偓这首《春尽》诗^④，而此《唐百家诗选》只收《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录的《韩偓诗》一卷中诗，而未收《香奁集》中诗^⑤，可见，它不是香艳的《香奁集》中诗，叶梦得是不会以这首诗来证明韩偓有《香奁集》的。

第二，我以为叶梦得所见到的这首“《春尽》”诗有两种可能：1.他所见到并记下的这首诗的诗题本就是《春昼》，其记载此事的《诗话》也未误刻，但后人转引此诗话时，则将此诗诗题误读为《春尽》，并以讹传讹（庆按，叶梦得记载此事的原《诗话》今已不见，今所见只是后人诗话所转述）。2.叶梦得在将记载此事之《诗话》付梓后，刻工将《春昼》误刻为《春尽》，故后人转引此《诗话》时，遂有诗题作《春尽》之误。上述两种情况之误，是颇有可能的，这缘本于“昼”与“尽”的繁体字为“晝”“盡”，其字形相似，容易相混（其例可参下说）。假设叶梦得本人所记乃《春昼》无误，则他人在转引或刻书时，是颇有可能误读误刻为《春尽》的。又检《春昼》诗为：“春融艳艳，大醉陶陶。漏添迟日，箭减良宵。藤垂戟户，柳拂河桥。帘幕燕子，池塘伯劳。肤清

① 《中国文学论集》，第267—268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23页。

③ 《中国文学论集》，第268页。

④ 王安石：《王荆公唐百家诗选》，黄永年、陈枫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288页。

⑤ 此事我有未刊稿《韩偓编撰成〈香奁集〉和〈香奁集序〉时间探赜》一文论之。

臂瘦，衫薄香销。楚殿衣窄，南朝髻高。河阳县远，清波地遥，丝缠露泣，各自无憀。”在我看来，此诗乃写春日融融，风光旖旎；女子当此之际，感时光韶华之流逝，叹良人之在远方，故伤离怨别，无憀已极，愁绪难释之情景。其中“帘幕燕子”，乃写所见帘幕间双双栖燕，以寄托男女双双团聚之意，因此而引发离别之伤情。故下文即有“池塘伯劳”句，以诉劳燕分飞之离苦。“河阳县远”两句，乃谓两人隔离遥远，故下文即有“丝缠露泣，各自无憀”以承之。可见这是一首典型的香奁诗，叶梦得所见者即是此诗。再检这首收于《全唐诗》本韩偓《香奁集》中的《春昼》诗，于诗题《春昼》下有“一作春尽”校语；又此诗亦见于吴汝纶《关中丛书》本《韩翰林集·香奁集》，其诗题《春昼》下有校语云：“一作四言。昼，一作尽。”^①可见《春昼》诗题也曾有被误作《春尽》，这可以证明，我们上面所说《春昼》被误读、误刻成《春尽》，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据我所作《韩偓编撰成〈香奁集〉和〈香奁集序〉时间探赜》一文的考察，我认为现存的《全唐诗》中韩偓诗和《香奁集》诗是最接近最早的原《韩偓诗》和《香奁集》诗的，它远优于明代毛氏汲古阁本的《韩内翰别集》《香奁集》或《玉山樵人集》等其他本所录的韩偓诗和《香奁集》诗。从《全唐诗》本来考察，“惜春连日醉昏昏”首之《春尽》诗乃在《韩偓诗》集中，而不重见于《香奁集》里；而“春融艳艳，大醉陶陶”首《春昼》诗以及《袅娜》《多情》三诗也仅见于其《香奁集》里。由此也可证明，叶梦得所见韩偓亲书的这三首诗确实均是《香奁集》中诗。那么，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北宋人叶梦得所见到的韩偓亲书的一卷诗就是《香奁集》的全部手稿，但起码可以说，他是见过韩偓亲书的《香奁集》手稿的一部分的。

至于徐先生所提出的“假定他把自己的诗分成两种性质，编成两个集子，但是否只为《香奁集》作序，而不为另一真正代表他晚年生活的集作序呢”之疑问，我以为，这也是不难解释的。严格来讲，这本来就不足成为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说唐代作家，现在所能见到的其诗文集，除了少数集子有作家本人所撰序外，大多数集子是缺乏自序的，而人们却不以为怪。至于何以如此，其原因有多种，人们自可理解，这里无需细说。我们不能以韩偓没为自己看重的《韩偓诗》集作序，就有理由否定他曾为《香奁集》作序。就以晚唐杜牧来说，尽管他颇为注重自己的诗文集，但他的《樊川文集》也没能亲手编成，而是由他的外甥裴延翰遵嘱编成、并为作《樊川文集序》的。又如稍后的皮日休，他尽管先在唐懿宗咸通中编成诗文集《文薮》，并为之撰序，但他最后的文集却没能亲手编成，更不要说为自己的这一文集作序了。那么，我们能否因皮日休未为自己最后的总文集作序，就否定他的这篇《文薮序》为亲作呢？从韩偓来说，其《香奁集》中写作年份最迟的诗之一是“庚午年在桃林场作”的《多情》诗，也即是后梁开平四年（910）之作。因此可以推测，韩偓编成《香奁集》以及撰写《香奁集序》，最早也是在是年^②，此时他年六十九。而韩偓之卒年，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韩偓传》所载“龙德三年，卒于南安龙兴寺，葬葵山之麓”^③，也就是在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八十二。又据我对韩偓生平和创作的考察，韩偓开平四年（910）后尚创作了不少诗作，如乾化元年（911）就有《清兴》《信笔》《喜凉》《凄凄》《火蛾》《雷公》《船头》《天鉴》《手简第十一帖》等诗文。及至后梁贞明二年（916）尚有最迟诗作《雨》《幽独》诗。^④从贞明二年到龙德三年，尚有七、八年，此期间，未见其有诗文之作。那么韩偓在他这七、八年间，是否亲自编成《香奁集》外

① 韩偓：《韩翰林集·香奁集》卷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127页。

② 关于此事我有未刊稿《韩偓编撰成〈香奁集〉和〈香奁集序〉时间探赜》一文。

③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71页。

④ 见吴在庆：《韩偓论稿·韩偓生平系年汇纂》，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15-329页。

的《韩偓诗》集，并为之作序呢？这就难说了，因为我们见不到确切的相关记载。但有编成和未编成两种可能。如果未编成，则亲自撰写此集的序言无从谈起；如果编成，则是否撰成序言也有两种可能，即未撰和撰成。就以撰成序言来说，其能否流传于后也是难于保证的（私以为韩偓未撰或未撰成《韩偓诗》的序的可能性较大，否则此集序当会和他的这部分手抄诗一起保存流传到其裔孙手中，并被后人编入《韩偓诗》一卷中）。如上所述，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因见不到韩偓为“真正代表他晚年生活的”《韩偓诗》集所作的序，就翻转来怀疑他确实为《香奁集》撰写了《香奁集序》。

三

徐先生还从不同版本的《香奁集序》后署名之异，论证此序为伪作。他指出吴校本（指《关中丛书》所收吴汝纶《吴评韩翰林集》本）和甲旧钞本（指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翰林集》钞本）均署为“玉山樵人韩致尧序”，而影印旧钞本（指《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玉山樵人集》所附《香奁集》）则署为“翰林学士承旨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韩偓序”。以此，他认为“若此序为韩偓所自作，则其所自署的尾款自无不同；而钞者、印者，亦当因之而不得有异。现就我所能看到的，分明是两种不同的自署的尾款”^①；且认为“唐人为书作序，常以其官其名，署款在标题之下或其次行。其署款于末尾者，除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不署己‘名’而署己‘字’称‘微之序’，以示亲昵外，则多只署名而不署字。至宋始多先名而后字……所以从吴校本及甲旧钞本的尾款看，只称别号及字，而不称名，与常规不合；益信此序出于妄人之手。”^②

今按，徐先生以《香奁集序》后署名“玉山樵人韩致尧序”“与常规不合”，而“益信此序出于妄人之手”的理由并不充分。我认为，即使韩偓撰毕《香奁集序》后真的有此署名，那么，这一署名即使“与常规不合”，但也未能否认韩偓之署名有在常规之外的可能。因为这样的署名尽管“与常规不合”，但当时也还是有这样“与常规不合”的署名，比如徐先生所举的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署“微之序”，我们总不能以这署名“与常规不合”而否认其为元稹之作。再说韩偓撰毕《香奁集序》后是否真有署名，也是于文献无征的。在我看来，他未署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一、尽管韩偓当时编成了《香奁集》，并撰写了《香奁集序》，但这只是作为手稿本自己留存而已，并非即要付梓，没有一定要随即署名之必需。二、诚如徐先生所说：“若此序为韩偓所自作，则其所自署的尾款自无不同；而钞者、印者，亦当因之而不得有异。”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署名，却至少有上述互异的两款，这一事实确实能表明，韩偓原本就没有在《香奁集序》后署名，这两款署名是后人按照自己对韩偓身份的认同而添加的。三、据我考察，韩偓确实自己编成《香奁集》，并撰写《香奁集序》；也留下了他亲书的并有所编集的《香奁集》外诗的大多手稿，但无论是后来我们在书录中所见到的《香奁集》或《韩偓诗》《韩内翰别集》《韩翰林集》等，皆非诗人所亲自付梓过，乃是后人再加整理后付梓，而且就是书录中较早载录的《韩偓诗》，恐怕最后也非韩偓所亲手编成。因此，这些集子的署名，当非韩偓所亲署。比如我们现在所见到《韩翰林集》及其《香奁集》，其署名皆为“翰林学士承旨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万年韩偓致尧撰”，而其《香奁集序》后署名则为“玉山樵（原作“玉樵山”，或误倒所致）人韩致尧序”；《韩翰林诗集》署名为“翰林承旨行户部侍郎知制诰万年韩偓致尧”，其《香奁集序》后署名“玉山樵人韩致尧序”；《玉山樵人集》之《香奁集序》后署名为

① 《中国文学论集》，第271页。

② 《中国文学论集》，第275页。

“翰林学士承旨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韩渥叙”；汲古阁本《韩内翰别集》署为“翰林学士承旨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万年韩偓”，其《香奁集序》后署为“玉山樵人韩致尧序”；清嘉庆十五年（1810）王遐春麟后山房刻本《翰林集》则署为“唐翰林学士承旨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万年韩偓著”；明胡震亨《唐音统签》本《香奁集》前所录《香奁集序》后署名为“翰林学士承旨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韩偓序”。可见各本之署名其实不止有两种之异，严格说，乃有多种。也就是说有相同者，也有不尽相同或有异者。其中以署名为“翰林学士承旨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各本所署文字或稍有增减，但大致有以上字眼）云云者，必是后人所署，盖假设韩偓真有为自己的集子或《香奁集序》署名，是不可能如此署名的，因为他当时早已被罢官，流离各地后隐居于闽中，成为草民、隐士了。就是署名为“玉山樵人韩致尧序”来说，确实比较符合他当时的身份，但我认为，这也是后人据他的身份而代为署名的，其理由，上文我们已经说明，他当时没有必要在《香奁集序》后署名，即便有署名，也不可能出现后人两种以上的不同样式的署名。

四

上引徐先生文认为“偓亲书诗卷中，内有《多情》《袅娜》《春尽》三诗”，其中“《袅娜》《多情》两诗，则皆在《香奁集》中重见……都是他晚年的诗。”“若如《香奁集自序》所说，里面的诗都是少作，则此三诗只能归入《翰林集》，而不能归入《香奁集》。但事实上，此三诗正在韩偓手写本中。其中有两诗在《香奁集》中，乃是‘重见’的性质。”徐先生此说乃在于驳斥“《香奁集自序》所说，里面的诗都是少作”，从而证明《香奁集序》乃伪作。

按，据我们上文所考，《春尽》诗其实乃《春昼》诗之误；而《袅娜》《多情》两诗也确实在今传的如明代毛氏汲古阁本、韩集旧钞本、吴校本等《韩偓集》《香奁集》中重见。但我认为，现传的《全唐诗》所保存的《韩偓诗》和《香奁集》中诗，是最接近韩偓这两集诗的祖本的，故《袅娜》《多情》《春昼》三首诗在《全唐诗》这两集诗中未出现重见现象，而是仅在《香奁集》中，最为可靠；而其他如上述各版韩偓诗则逊于《全唐诗》本，多有重见诗或误补诗现象。比如《袅娜》《多情》《春昼》三诗仅在《全唐诗》本《香奁集》中，而《春尽》诗也确实仅在《韩偓诗》中。如此我认为上述重见《袅娜》《多情》诗的韩偓诗各版本，是不如《全唐诗》中的《韩偓诗》《香奁集》诗可靠的。以此，徐先生所说的《袅娜》《多情》两诗为重见，这是有违于《全唐诗》本所录韩偓诗状况的。

又，至于徐先生认为《袅娜》《多情》诗乃作于韩偓晚年，以此驳斥“《香奁集自序》所说，里面的诗都是少作”，从而证明《香奁集序》乃伪作的观点，他在《〈香奁集〉的一篇假序》中说得更明确。他因《香奁集序》中“自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大盗入关，绡帙都坠。迁徙流转，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这段话，提出疑问说：“序中说‘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按韩偓自天复三年（903）贬谪，便经汉口转湖南经江西而入福建，皆在求生草莽之中。不仅在今日可证明为韩偓自己手写的百余篇的诗中，多是求生草莽之中的作品；而尤以在福州、沙县、南安县、桃林场者为多。且在《香奁集》中，可断定为韩偓的作品里面，亦多为求生草莽之中的作品。此序若假定是韩偓暮年所作，当然也是在福建时求生草莽之中所作的。在求生草莽之中作序，却忘记了自己在求生草莽之中也在作诗，这如何加以

解释呢？”^①我认为徐先生的这一疑问是出于他误读、误解《香奁集序》的某些话而造成的。其实这一错会乃肇自震钧先生。震均先生在《香奁集发微》中先引《香奁集序》，随后云：“序中所书甲子，大都迷谬其词，未可信也……又谓大盗入关者，似指黄巢矣，而云迁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则益可疑。考巢贼乱后，致尧始贵，并无避地之举，直至梁移唐祚，致尧始不常厥居。所谓天涯逢故旧，辟地遇故人者，正此时也。然则大盗，盖指朱温，而辟地则贬濮州，贬荣懿，徙邓州，南依王审知，均是也。”^②震钧先生的这一解读，实际上是有错误的，大盗并非指朱温，乃指黄巢。而《香奁集序》所说的“求生草莽之中”，乃是指韩偓在“大盗入关，绡帙都坠。迁徙流转，不常厥居”时，也就是指远在诗人科举及第前的广明元年（880）末黄巢攻入长安后，诗人逃出长安外出躲避的“迁徙流转”时，而不是指他贬官后直至流寓湖南、江西、福建诸地，乃至如沙县、南安县、桃林场等“天涯”“避地”时。再者，他“经汉口转湖南经江西而入福建”，虽可称“迁徙流转”，但却不能说是“求生草莽之中”。特别是入福建后，尽管他此后在较偏僻的沙县、桃林场、南安县等地的生活也较贫寒，但此一时期，他也还受到王审知、黄滔等人的敬重礼遇，甚至想邀请他入幕府任职而被他婉拒，因此这一时期，怎么说也不能称为“求生草莽之中”。了解了徐先生的误读、误解，我们也就明白诗人并不是在“求生草莽之中”作诗撰序，这里是没有徐先生所说的矛盾的。

徐先生还提出：“序中说‘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则是在千首诗中，两种性质的诗都有。但何以他从‘旧识’‘故人’所得的百篇，只是属于绮丽性质的诗呢？从他的《无题诗》的短序看，苏纬（庆按：“纬”，原文作“暉”，此处仍依徐先生原文）端公所授给他的沦落了的诗，《无题》仅其中之一。而他在此序中所说的‘旧识’‘故人’却只授他以‘绮丽得意’的诗，岂不可怪？”按，徐先生此疑问，也是误会了韩偓这两篇序的意思。确实，在韩偓曾有的“千首诗中，两种性质的诗都有”。但是，他《香奁集序》所说的百篇，是特指《香奁集》诗而言的，也就是就他最后所辑集成的《香奁集》诗的篇数而言的，所以，当然这百篇也就都是“绮丽得意”的诗，而不包含“绮丽性质”之外的那些诗作了。这百篇诗，绝大部分是他早年所作，而在黄巢攻入长安后失落，最后，在他从朝中贬谪后“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的诗；当然也还包括《无题》诗序所说的“苏暉端公挈余沦落诗稿见授”^③的《无题》等诗在内的某些诗篇。因此不能理解为“他从‘旧识’‘故人’所得的百篇，只是属于绮丽性质的诗”。其实“他从‘旧识’‘故人’所得的”，包括从“苏暉端公挈余沦落诗稿见授”的诗，不仅有辑集入《香奁集》内诗，还有些非艳情的诗篇，他是放在后人为他所编成的《韩偓诗》集中的。

徐先生还就《香奁集序》的文体不同于韩偓的其他几则手简和几篇散文、骈文现象质疑道：“《谏夺制还位疏》及《论宦官不必尽诛》两文是散文；《御试檄状》是骈文。惟有《香奁集自序》，则前半段是散文，后半段是骈文；骈散兼行，与韩偓的文体为不类”，从而做为《香奁集自序》非韩偓所作之证据。按，以一位作家某篇文章的文体有异于他其他文章，来论证某文章为伪作，这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更何况，就韩偓来说，除了《手简十一帖》的短篇书信、《金銮密记》的记述短什均以散文成文，《黄蜀葵赋》《红芭蕉赋》的赋体必须骈对外，他现存的比较可能以不同文体撰成的文章，

① 《中国文学论集》，第272-273页。

② 震钧：《香奁集发微》，扫叶山房石印本，1914年，第1页。

③ 《韩偓集系年校注》，第943页。

只有四篇。那么以数量这么少的文章来得出他采用文体的习惯，这是难于归纳出科学的结论的。因此，以“惟有《香奁集自序》……骈散兼行，与韩偓的文体为不类”为由，而论证《香奁集序》为伪作也是不科学的，实在缺乏说服力。此外，我认为一位作家的文章是可能出现相异的不同文体的，这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是常见的，不必以为怪，更不必以此否定某篇文体有异的文章非其所作。再说《谏夺制还位疏》也非仅是散文体，它也如《香奁集自序》一样“前半段是散文，后半段是骈文”的“骈散兼行”的文体。谓予不信，可看此文：“贻范处丧未数月，遽使视事，伤孝子心。今中书事一相可办，陛下诚惜贻范才，俟变纒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枢侧；毁瘠则废务，勤恪则忘哀。此非人情可处也。”^①既然如此，那么徐先生的论证更是一时失察之说了。

五

徐先生还提出《香奁集序》“他一开始便‘余溺于章句，信有年矣，诚知非士大夫所为’；‘章句’何以非士大夫所为？已不合当时情实。而下面又说自己的诗是‘往往在士大夫口’，这岂不是自相矛盾？”^②按，徐先生以《香奁集序》中对“章句”态度的前后矛盾，以及序中所说的章句“诚知非士大夫所为”“不合当时情实”为由，否定《香奁集序》为韩偓所作。这一理由假定均如徐先生所认为的那样，那也是难于成立的，最多只能说韩偓所说的自我矛盾，不符合当时情实而已，而未必能说明他此后所说的：“这篇序是由对韩偓的情形，并不十分清楚的人所伪托的。并且这个伪托的人……不是出于编定《香奁集》的和凝；因为他无伪托此序的必要，而是出于和凝以外以后的人。”^③在我看来，其实这篇序是不存在徐先生所以为的“自相矛盾”和“不合当时情实”的。就我的理解，在古代有些正统士大夫心中，“章句”会被看作是壮夫耻而不为的雕虫小技。这一观念就是在唐代的一些士大夫脑中也仍然存在。韩偓《香奁集序》所说的“余溺于章句”“诚知非士大夫所为”，也是就这种观念而发的。但是即是在古代，比如韩偓所处的唐代来说，“章句”实际上却又被许多士大夫所爱好，并身体力行的，比如张说、张九龄、高适、王维、韩愈，甚至唐太宗等等所喜好。因此从这一情实上来说，徐先生上述所指出的“自相矛盾”，其实是不矛盾的。再者，《香奁集序》所说的“章句”，除了上述的含义外，就其为《香奁集》诗歌作序的语境来说，它也有包含风情的香奁诗歌的内涵，故此句后他又接着说“不能忘情，天所赋也”，并又特地强调揭出“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就因为这章句也包含风情诗歌，所以也才说出“诚知非士大夫所为”。那么这是否“不合当时情实”呢？我认为是基本符合的。在韩偓之前的白居易、杜牧时代，杜牧就在《李戡墓志铭》中借李戡之口激烈批评白居易和元稹所作的艳情诗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语，冬寒夏热，人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④而在韩偓稍后五代时的士大夫和凝也是以作艳情诗词为有损脸面的，此诚如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五中所记：“韩偓《香奁集》百篇，皆艳词也。沈存中《笔谈》云：‘乃和凝所作，凝后贵，悔其少作，故嫁名于韩偓尔。’^⑤和凝之所以“悔其少作”，乃在于他贵为宰相后，认为他少作的“艳词”是士大夫所不该作的，这有损

①《韩偓集系年校注》，第1044页。

②《中国文学论集》，第272页。

③《中国文学论集》，第274页。

④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44页。

⑤葛立方：《韵语阳秋》，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6页。

于他的身份。可见时代处于杜牧与和凝间的韩偓，当时的不少士大夫起码在表面上认为艳情诗词是“非士大夫所为”的，故这话总体上说并不违背“当时情实”。

至于徐先生所说的《香奁集序》既然说“溺章句”“诚知非士大夫所为”，但又说“自己的诗是‘往往在士大夫口’，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的问题，浅见以为这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矛盾的。我们知道自古中国就有诗教传统，其中文人士大夫们多信奉诗言志传统，不少人对风情诗持有偏见，甚者则取排斥态度，尤其对于艳情诗更是多有斥责之言。这种现象起码主宰着冠冕堂皇的诗教舆论阵地。萧统不是对于节气颇高的隐逸诗人陶渊明因作《闲情赋》，而有“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①之遗憾吗？以此在《文选》中不收此赋。然而这只是文人士大夫对《闲情赋》态度的一面，不可否认这《闲情赋》不是也获得了后代不少文人士大夫如苏轼的“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②的评价与欣赏吗？这种在文人士大夫中对如《闲情赋》一类风情甚而艳情诗文评价的两极现象，实在并不少见。这就表明对于如《闲情赋》一类的风情之作，在文人士大夫间，实际上是既有排斥者，但也不乏吟咏欣赏者。就以唐代来说，尽管李戡、杜牧等人对于元白那些“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的所谓“淫言媠语”的艳情诗深恶痛绝，甚至有“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③之遗憾，但这些他所斥责的诗作实际上不仅为民间“子父女母”所喜爱，而且也为身为文人士大夫的元、白所喜爱，可以推想，这些诗歌如此风行一时，当时喜爱这些诗歌的文人士大夫当也不少。就拿《香奁集》中诗来说，在唐代之后的历代皇朝中，也多赢得文人士大夫的乐于吟诵甚至仿作。如元代杨维桢在《续奁集并序》谓：“陶元亮赋《闲情》……不害其为处士节也。余赋韩偓《续奁》，亦作媠语，又何损吾铁石心也哉！法云道人劝鲁直勿作艳歌小辞，鲁直曰：‘空中语耳，不致坐此堕落恶道。’余于《续奁》亦曰空中语耳，不料为万口播传。”他即有《续奁二十首》，我们选其中几首如下，以见他喜好《香奁集》诗，并热心效学之况。

拣得金针出象筒，鸳鸯双刺扇罗中。却嗔昨夜狸奴恶，抓乱金床五色绒。（《理绣》）

酥凝背甲玉搓肩，只讶红绡覆白莲。底事太阴藏火性，狂夫夜夜为君然。（《相见》）

深情长是暗相随，月白风清苦苦思。不是东姑痴醉酒，幕天席地了无知。（《相思》）

月落花阴夜漏长，相逢疑是梦高唐。夜深偷把银缸照，犹恐憨奴瞰隙光。（《私会》）

曾向金盆弄化生，宝珠亲见掌中擎。从今不带宜男草，豈蔻含胎恐太并。（《洗儿》）^④

其他如宋人陈允平有《香奁体》诗，张至龙有《拟韩偓体》诗，叶茵有《香奁体》五首，何应龙、谢无竞有《效香奁体》等等。其中何应龙《效香奁体》云：“云幙重重雨未收，嫩寒先到玉帘钩。一杯晚酒无人共，羞带双花下小楼。”甚至僧人释绍嵩也有《分得春禽效香奁体》诗：“数声应寄春消息，才转花梢浓绿隔。早知襟韵倦逢迎，莫遣临风情脉脉。”^⑤可见韩偓《香奁集》诗为人所喜爱，甚至模仿之盛况，其流传与影响之广亦于此可见。那么韩偓所言，当时其“绮丽”诗“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之情景当非虚言。

徐先生又提出“如若序中所说，这类的诗，被人以‘斜行小字’，写在‘粉墙椒壁’之上，所以他的‘旧识’‘故人’，偏偏只记得这一类的诗。但‘粉墙椒壁’题诗，乃唐代比较太平时的景象，与韩偓公私板荡残破的时代背景不合。”按，韩偓序中所说的“乐工配入声律”，题诗“粉墙椒壁”

① 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页。

② 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七《题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2-2093页。

③ 《杜牧集系年校注》，第744页。

④ 《韩偓集系年校注》，第1352-1353页。

⑤ 《韩偓集系年校注》，第1350-1352页。

等情景是指他序中所说的“自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也就是指唐懿宗咸通元年至广明元年（860—880）之间，而不是指徐先生所误以为的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之后，至韩偓入仕唐昭宗朝，乃至天祐四年（907）唐亡的那一“公私板荡残破的时代”。也就是说，韩偓所指的是整个咸通年间（860—874，共15年）至乾符时期（874—879，共6年）。那么这一年代尽管也不乏局部的战争和动荡，但相对而言，就不好说是“公私板荡残破的时代”了，相反的这一时代却是相对平定繁荣，甚至繁华奢侈的时代。诗人韦庄就有《咸通》诗概述这一时代气氛云：“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华。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①在这样的时代，出现文人士夫们艳游取乐，题诗唱酬；或游山逛水，集会唱酬之事，也就不足为怪了。唐孙棨在中和四年（884）为其所著《北里志》所写序中，就说起自唐宣宗大中以来，至刚过去的唐懿宗咸通、唐僖宗乾符年代的士绅、进士们宴聚游乐，甚至艳游北里平康巷，与乐伎交游唱酬之情景云：“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於赏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伎，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②今略选此书所载故事两则，以见当时情景。《王团儿》记“福娘，字宜之，丰约合度，谈论风雅，且有体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尝于筵上与诗曰……次曰小福，字能之……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谈雅饮，尤见风态。予尝赠宜之诗曰……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惬。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以未满壁，请更作一两篇，且见戒无艳。予因题三绝句，如其自述。”^③《俞洛真》记“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郑右史（仁表）常与诗曰……乱离前两日，与进士李文远（渭），渥之弟，今改名（澣）。其年初举，乘醉同诣之。文远一见，不胜爱慕。时日已抵晚，新月初生，因戏文远题诗曰：‘引君来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取桂，便从陵谷一时迁。’予题于楣间讫，先回。间两日文选，因同诣南院。文远言前者醉中题姓字于所诣，非宜也，回将撤去之。及安上门，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关失守矣……及亲仁之里，已夺马纷纭矣，乃遂奔窜。”^④这两则均记及于墙上题诗事，前则云“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后则谓“因戏文远题诗曰：……予题于楣间讫”事，可见，当时文士题诗于“粉墙椒壁”等情景。后则《俞洛真》所记之事，乃发生在“潼关失守矣”之际，故《北里志序》末云“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崑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业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无为子序”^⑤。可见《北里志》所记述之事多发生在大中（847—860）、咸通迄乾符、广明之间，由此可见，此年代间士绅文士与乐伎交游咏唱，题诗于“粉墙椒壁”之情景。再即就这一年代士大夫文士间之集会交游唱和来说，也颇为流行。如唐宣宗大中后期在襄阳幕府，唐懿宗咸通中后期在淮南、毗陵常州以及苏州幕府等地，均有诸多士夫文士们之集会交游唱酬，可见此一时代之相对安定和平之世况。此情形前者《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正月记云：“段成式本年约五十六岁，在襄阳徐商幕，

① 韦庄：《韦庄集》，向迪宗校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4页。

② 孙棨：《北里志序》，见《全唐文》卷八二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00年，第3863页。

③ 孙棨：《北里志》卷二，见《香艳丛书》本，第5页。

④ 孙棨：《北里志》卷二，见《香艳丛书》本，第8页。

⑤ 孙棨：《北里志》，见《香艳丛书》本，第1页。

时温庭皓、韦蟾均在幕。上元时三人均有咏山灯唱和诗。”（其酬唱具体情形可见本书相关条目下之记载。下所说同）^①又在大中十三年（859）七月条记云：“本年秋，段成式闲居汉上，应人之请撰《塑像记》。时温庭筠亦在汉上。余知古、韦蟾、元繇、温庭皓等人亦均在徐商襄阳幕。诸人赋诗唱和，文士简牍往还，颇尽幕府文士酬唱之乐。后集酬和之作为《汉上题襟集》。”^②后者可在皮日休为他与陆龟蒙，以及苏州刺史崔璞，乃至诸文士在苏州唱酬的诗集《松陵集》所撰序中见到：“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员外在淮南，今中书舍人弘农公守毗陵，日休皆以词获幸，悉蒙以所制命之和……十年，大司谏清河公出牧于吴，日休为郡从事，居一月，有进士陆龟蒙字鲁望者，以其业见造，凡数编……余遂以词诱之……苟其词之来，食则辍之而自饫；寝则闻之而必惊。凡一年，为往体各九十三首，今体各一百九十三首，杂体各三十八首，联句问答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南阳广文润卿、陇西侍御德师，或旅泊之际，善其所为，皆以词致，师词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谏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余则吴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诗外，有序十九首，总录之得十通，载诗六百八十五首……由是为之序。”^③凡上所述可见，大中、咸通至广明之乱前，是相对安定和平繁华时期，故处于此时期可出现如韩偓《香奁集序》所说的“乐工配入声律”，题诗“粉墙椒壁”等情景。因此韩偓《香奁集序》所说此情景足以相信，毋庸置疑。

六

韩偓《香奁集》中有《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诗，云：“辑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徐先生据此诗而质疑《香奁集序》非韩偓作有云：“可知他追录旧诗时的精神状态是‘凄然有感’，是‘自吟自泣’；这与他所经历的平生，及当时的心境，是很恰合的。此绝句今日正在《香奁集》中。但他在为《香奁集》作序时，却是‘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的轻薄色情状态，这不仅与上引绝句中所流露出的感情相矛盾，并且像这种老色情狂，实有点近于毫无心肝了。”^④

按，对韩《香奁集序》中“咀五色之灵芝”数句的理解批评是否允当，自是见仁见智，因不甚关此文主旨，我无意多加辨析。不过如以此数句与前“凄然有感”“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乃“感情相矛盾”为由，从而否定《香奁集序》为韩偓所作，则需为之一辩。

我以为，韩偓《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诗与《香奁集序》上所言前后两种感情之抒发，是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对象而前后抒发的，因此，尽管两种“感情相矛盾”，但也不存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逻辑关系。具体来说，“凄然有感”“自吟自泣”乃是在诗人“思录旧诗于卷上”时；而“咀五色之灵芝”等情感是在编定《香奁集》之后，为其作序时所抒发。那么，我们怎能要求韩偓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对象，而一定要发出同样的情感呢？又怎能以在前后两种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对象而抒发的“相矛盾”的感情，来否定《香奁集序》为韩偓所撰呢？在我看来，韩偓的上述两种情感是他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对象而抒发的真实且可以理解的情感，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存在。在此，有必要稍作申述。韩偓为何在《思录旧诗于卷上……》会“凄然有感”“自吟自泣”？我以为这些“旧诗”当是现存《香奁集》中诗，其中有不少如明胡震亨所言：“韩致尧

① 傅璇琮：《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沈阳：辽海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② 《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第292-294页。

③ 皮日休：《皮子文数》，萧涤非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36-237页。

④ 《中国文学论集》，第273页。

偃冶游情篇，艳夺温、李，自是少年时笔。”^①而这些“少年时笔”的“冶游情篇”，有一部分是他曾与一女子刻骨铭心相恋，然而最终无奈睽别的情感经历的记载。^②因此，当他年老时将这些“旧诗”钞于卷上时，回首那曾相恋而今“无人会”的“蓬山第一流”的绝色女子，以及他们所曾经的难于忘怀的风情往事时，他自然就“凄然有感”“自吟自泣”了。而当他后来为编定的《香奁集》写《序》时，他对着这些“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之恋爱经历而留存的往事与诗篇时，便油然生发出“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之自矜自赏情怀。这种在追忆自己往昔所刻骨铭心爱恋过的女子时所抒发的“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的内心感受是真纯暖心的，实在不宜以“老色情狂”“轻薄色情状态”轻诋之。

最引起徐先生“注意的是”《香奁集序》中“自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这“几句话”。他认为“上面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自十七岁时起，到三十七岁时止，二十年间，有诗千首。并照序中‘大盗入关（按当指黄巢于僖宗乾符七年庚子入侵长安而言，时西纪八八〇，韩偓三十八岁）……岂复以吟咏为意’的一段文气来看，韩偓自三十七岁以后，便没有作诗；最低限度，也是极少作诗。这不仅与情实不合；并且在《香奁集》中，除了一部分可以推定是少年之作以外，其中可以断定为韩偓的诗里面，有的分明是五十七岁以后之作，乃至是到了福建以后之作。为什么他在自序中，却肯定的说都是十七、八岁到三十七岁时的作品呢？若是把现时《翰林集》中的诗，及《香奁集》中的诗，加以统计……最晚为癸酉，即西纪九一三年，时韩偓七十岁……自七十岁到八十岁的十年间（他死时八十岁），当然还有若干诗在里面……为什么当他编定《香奁集》而作序时，却止说到十七岁到三十七岁时的诗呢？”以此徐先生认为上述序中所述“与情实不合”的矛盾，乃“铁案如山”，可断定此序为他人所伪托。^③

按，上述徐先生所论乃建立在误读《香奁集序》某些语句的基础上，故得出错会《香奁集序》真意的结论。具体来说，一、《香奁集序》中所说的“岂复以吟咏为意”的时间，是指诗人在“大盗入关”之后“迁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那一逃乱的阶段，而不包括大乱平定之后诗人返回故居、其入仕乃至被贬后寓居福建，直至年八十多时。因此，徐先生所指出的现存《香奁集》或《翰林集》中都有他三十七岁后乃至晚年的诗作，这尽管合符“情实”，但却不能以此作为与《香奁集序》所言“岂复以吟咏为意”相“矛盾”的“铁案如山”之证据。二、徐先生质疑：“为什么当他编定《香奁集》而作序时，却止说到十七岁到三十七岁时的诗呢？”其实这也是徐先生有所误读之疑。《香奁集序》中明明说“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所谓“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云云，乃指他从朝廷贬官后在“天涯”、在“避地”，从“旧识”“故人”所获得的旧诗作，如也包括“丙寅年九月在福建寓止”，从“苏纬端公挈余沦落诗稿见授，中得《无题》一首”，以及他由此回忆“辛酉年戏作《无题》十四韵”之情景，并“因追味旧作，缺忘甚多，唯第二、第四首仿佛可记，其第三首才得数句而已。今亦依次编之”的四首《无题》诗在内的诗作。^④因此，韩偓在“编定《香奁集》而作序时”，所说的是不止“十七岁到三十七岁时的诗”的，很明显，也起码包括其辛酉年，即唐昭宗天复元年（901）他年六十时所作的《无题》诗在内。三、至于徐先生根据《翰林集》及《香奁集》中的诗统计，认为其诗作“最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0页。

② 关于韩偓年轻时与一女子相恋事，参见黄世中：《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韩偓其人及“香奁诗”本事考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6-192页。

③ 《中国文学论集》，第273-274页。

④ 韩偓：《无题并序》，《韩偓集系年校注》，第942-943页。

晚为癸酉，即西纪九一三年，时韩偓七十岁……自七十岁到八十岁的十年间（他死时八十岁），当然还有若干诗在里面”，而《香奁集序》却没有说起，从而引起他对《香奁集序》真实性的怀疑问题，我以为，这怀疑也是出于误解。首先，《香奁集序》是为已经编定的《香奁集》而发的，因此韩偓在此序中乃围绕《香奁集》而言，没有非说及《香奁集》中诗外的《翰林集》中诗的的必要。因此《香奁集序》不仅没有非得说及七十岁以前《香奁集》外诗的的必要，也没必要非得说及其七、八十岁间的《翰林集》中诗的的必要。再者，据我所作《韩偓编撰成〈香奁集〉和〈香奁集序〉时间探赜》及《韩偓生平诗文系年汇纂》^①所考，《香奁集》中可考定最迟作年的是《多情》一诗，《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诗也和《多情》诗一样约同作于后梁开平四年（910）。故《香奁集》的编成以及《香奁集序》之撰，大致最早在后梁开平四年，时韩偓年六十九。倘我所考大致可信，那么《香奁集序》未提及诗人七十岁之后的诗作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综上所述甄辨，徐先生所提出的《香奁集序》为他人伪托韩偓所作的“一篇假序”的“铁案如山”的所有证据，实际上并非“铁证”，其疑点均可通过对《香奁集序》的准确解读与对相关问题、资料的细致审慎深入的全面考察，而获得合情合理的释疑解惑。我以为，《香奁集序》并非“一篇假序”，它确实为韩偓晚年在福建所撰成的一篇真序。

（上接第79页）

九世许福，重华第五子，于明嘉靖十四年乙未科（1535）登进士第。随乞归养，在浯岛兴建始祖祠堂，《金门珠浦许氏族谱》载其：“拓祭田以充岁祀，颁胙肉以优高年，结乡社平斛，俱得闾里欢。”^②林焜熿《金门志》：“泉州大饥，巡按李元阳延福与黄伟及大猷分主赈事，民收实惠。倭寇内乱，团结乡社，边方恃以无虞。”^③服罢父孝，许福被授予江南监察御史，本将一展抱负，但死于赴任途中。

十世祖许大来，字惟明，号南峰，举人。历任河南南确山知县、广西梧州通判、广东万州知州。《康熙万州志》载其为官“清严慈简，士民德之。”^④为官有便民之政。

十二世祖许光卿，许琰高祖父受卿兄长，受卿出继十一世许从锐；光卿，字用实，号宾明，举人，历任河南西平教谕、广东新宁知县。《金门珠浦许氏族谱》载：“（光卿）为人言不忘发，朴心笃行。”^⑤蔡复一赞美他：“门第孝弟，德宇深纯，貌无脂缁，言必脊伦，五党挹之，如渴酌醇。”^⑥

《金门珠浦许氏族谱》记载：许琰祖父许莫之、伯父许瑚都是生员，而他的父亲许琏是浯洲的乡饮宾。^⑦可惜的是记载寥寥无几，而许琰流传下来的作品几乎都是诗词，对家世提及的不多，对于许琰家世的考辨、探析只能从《县志》《族谱》等少量材料中提取信息，暂时罗列一个大致的世系框架。

① 吴在庆：《韩偓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09-315页。

② 许嘉立：《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83页。

③ [清]林焜熿：《金门志》卷九《人物列传》，光绪本。

④ [清]李 球：《[康熙]万州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⑤ 许嘉立：《续修金门县珠浦许氏族谱》，金门县珠浦许氏家庙，2007年，第183页。

⑥ [清]林焜熿：《金门志》卷九《人物列传》，光绪本。

⑦ 金门县文献委员会：《金门先贤录》，金门：金门日报社，1972年，第145页。

萨都刺咏闽诗

——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佳例

游友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元代的文化语境促成了萨都刺等色目诗人群的崛起。萨都刺融入中华文化: 学习、写作汉诗, 尊奉孝道文化, 认同闽北山水文化, 融入并参与共建闽都文化。其敏锐的艺术触角, 新奇的心灵感受, 对闽都风光的真心喜爱, 努力发掘其深厚底蕴, 深深浸染于闽都民俗文化, 深入了解闽都历史、传说等, 是其咏闽诗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 文化语境; 萨都刺; 中华文化; 闽北山水文化; 闽都文化

一、萨都刺诗歌创作的文化语境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 各少数民族共同参与、建设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在元朝、清朝这两个少数民族执掌国家政权的朝代, 多民族共建中华传统文化, 显得特别突出。其总的趋势是少数民族主动、自觉的“汉化”, 汉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元代是民族压迫最严酷的朝代。但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促进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耶律楚材这个契丹后裔, 曾为金臣, 后受成吉思汗、窝阔台重用。他主张“以儒治国, 以佛治心”。汉族降元者(主要是金朝故臣)亦用开放的眼光促进元统治者往“汉化”的道路前行。宪宗二年(1252), 忽必烈欣然接受“儒教大宗师”的尊号, 当他夺取大位后, 便采纳刘秉忠等人建议, 按照原来中原封建王朝传统, 称皇帝、立年号, 改国号“大蒙古”为“大元”。1279年, 南宋覆灭, 忽必烈基本上完成了从奴隶制政治制度向封建制政治制度的转变过程。统一中国后, 忽必烈采纳程钜夫建议, 起用南方儒士为朝臣, 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重用赵孟頫。元朝迟迟不开科举, 开了后又时断时续, 汉人、南人的进士名额大大受限, 但重开科举毕竟让儒士有了进身之阶。

按社会地位而言, 人分四等: 蒙古人居首, 色目人次之, 汉人又次之, 南人最下。法律严苛, 如: “诸妄撰词曲, 诬人以犯上恶言者, 处死。”^① “诸民间子弟, 不务生业, 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 教习杂戏, 聚众淫谑, 并禁治之”, “诸乱制词曲, 为讥议者, 流。”^② 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但蒙古人马上打天下, 也相信马上可治天下, 所以并不太把文人、文化当回事。也许正由于此, 元朝对文学、教育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 文网较松弛,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文字狱的朝代。这就给儒教的传播、发展, 给文学的发展, 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元朝以佛教为国教, 但并不排斥道教、基督

作者简介: 游友基, 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三》。

②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四》。

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这对于宗教文化的共存与交流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元时，东西交流加强，这有利于东西文化的相互吸收。

与南宋的汉族统治者相比，元朝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要技高一筹，元廷认同理学为代表的汉文化，将理学立为法定的官学，程、朱著作被定为科举试士程式，从而确立了理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元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推行孝道。这是继承汉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大德十一年（1307），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将《孝经》译为“国书”（蒙古文）。诏“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至大元年（1308）二月，贯云石《孝经直解》问世。

元代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它疆域广阔，横跨亚欧大陆。元代文学家的籍贯中出现了“白野”“拂林”“北庭”“高易”“于阇”“龟兹”“唐兀”等地域。诗文作家中有以“大食”“康里”为复姓。大食，在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康里，故地在乌拉尔河到咸海东北。民族大融合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文化大融合。“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从金流传到新疆且末，除了在大一统的元，其他朝代绝无可能。”^①

南北一统，有利于诗人融汇南北之长处，而避其短。杨维桢发起唱和“两湖竹枝词”，这是元代后期一次规模空前的“同题集咏”。参与者数百人，编入《西湖竹枝集》的有120人的同题作品。顾瑛开始在新建的“玉山佳处”（“玉山草堂”）定期举办觞咏之会。有几位蒙古人、色目人参与了“玉山文会”。著名蒙古族诗人泰不华，为玉山草堂延誉，起了不小作用。蒙古族聂镛，元末长期滞留江南，多与江南名士交往。他曾为顾瑛构筑的“碧梧翠竹堂”赋诗，谓“翠竹罗堂前，碧梧置堂侧”“仙人援琴鼓月下，枝上栖鸟弦上语”。还为“可诗斋”题诗，称颂顾瑛有如唐代诗人顾况。唐兀（西夏）人昂吉，至正八年（1348）进士，至正末，为福建行省检校官，卒于任上。他曾作过多首玉山燕集诗。元代民间往来、私人交往中，民族文化交融、各族人士和谐相处。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以宁的师友中，不少是蒙古人、色目人。如座师马祖常，色目雍古人；同年进士、诗友萨都刺，蒙古人或回回人；同年纳璘木花（纲斋），北庭畏吾人；同年燮理普仁，蒙古人；诗友迺贤，突厥葛逻禄氏；诗友拜明善，色目人；草根挚友杨崇喜（唐兀崇喜），西夏遗民……张以宁与他们诗酒酬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至正九年（1349）八月，福建宪使僧家奴与申屠颙、赫德尔、奥鲁赤等在福州乌石山联句赋诗，并将所作《道山亭联句》刊于摩崖。联句云：“追陪偶上道山亭，叠嶂层峦绕郡青。”（金事申屠颙，字子迪，汉人）、“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帷屏”（廉访使僧家奴，字元卿，蒙古人）、“波摇海月添诗兴，坐引天风吹酒醒”（金事赫德尔，字本初，色目人）、“久立危栏凭北望，天边秋色杳冥冥”（奥鲁赤，字文卿，蒙古人）。这是元诗史上仅见的以蒙古人为主的联句活动。关于这次联句活动的目的，联句后有廉访司经历赵谭的跋说得十分清楚：“暇日燕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隔数千里，同仕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佳会……”^②此例也可看出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情况。

元代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是元代社会与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诗人萨都刺的生活、创作，有着更直接、更紧密的关系。

元诗相当繁荣，元诗人有5000人，有诗12万首以上，是《全唐诗》四倍，《全宋诗》的二分之一。诗社普及，诗人集吟活动频繁。元中期诗歌是延祐前后的“盛世之音”，元诗臻于鼎盛。元诗重

^① 杨 铤：《元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② 《福建金石志》卷一三。

要诗人如赵孟頫、袁桷、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萨都刺、马祖常、贯云石等大都集聚于此时期。他们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是“雅正”。所谓“雅正”，就是尊奉“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雅正”就是要体现和谐，表达“治世之音”。还要发挥“兴、观、群、怨”作用，发扬“美刺”传统。元诗宗唐，但未能真正学到唐诗的精神，缺少旷世之音。这便是元中期诗歌的主潮。元后期诗风丕变。杨维桢创“铁崖体”“标新领异”，“而元诗之变极矣”。^①多地域形成各具特色的诗派，如吴中诗派、浙东诗派、江右诗派等。

元中、后期，色目诗人群崛起，成绩斐然，为其他朝代所未见。其中萨都刺、马祖常、余阙、泰不华、迺贤、丁鹤年最著名，并有诗集流传。色目诗人不囿于传统儒家诗教的拘限，而偏重抒写个人情性，且富有少数民族或西域的色彩，成为中华诗歌绚丽的花朵。其中，萨都刺不仅在这个诗群中熠熠闪光，而且在整个元代诗歌史上也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以上便是对萨都刺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与文化语境的简略描述。萨都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入中华文化、闽文化并参与中华文化、闽文化共建的。福建文学史著名研究专家陈庆元教授指出：“元代宦闽诗人、作家，最重要的有范梈、马祖常和萨都刺。”^②萨都刺“其诗成就不在‘元四大家’之下”。“这些诗人和作家，对元代福建的文学发展，都起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萨都刺的一些诗“脍炙人口”。^③言简意赅，对萨都刺的成就与贡献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萨都刺对汉诗的学习与实践

萨都刺（1272—1355），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一说蒙古族）人。元代后期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出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故自名其诗词集为《雁门集》。生活创作道路可大略分为四个时期：吴楚经商、居家耕读、出仕为官、致仕归隐。泰定四年（1324）46岁进士及第。中进士前诗作保留至今者计48首。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南台御史，以弹劾权贵，于天历元年（1328），左迁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至顺二年（1331），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元统二年（1334），调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至元元年（1335），调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知事，至元二年（1336），入闽任职。至元三年（1337）调任河北肃政廉访司经历，升入从七品，离闽赴任。《雁门集》中大多数作品创作于仕宦时期。晚年致仕，寓居杭州。《四库全书》集部五、别集类四收《雁门集》。

萨都刺任闽海道廉访司知事前三年，写下80余首吟咏闽中风物的诗（以诗题计）。萨都刺对汉文化的接受、学习十分广泛，而对诗歌等文学艺术的接受、学习尤其深入。他积极实践古代汉诗写作，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萨都刺诗题材广泛，诗体齐备，风格多样，用字清圆，表达深细，以擅写宫词著称。学晚唐温李，秾丽细腻之中，时得自然之趣。杨维桢《竹枝词序》云：“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苑，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

萨都刺善于抒情。虞集曰：“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游历甚广，纵情山水，绝少羁旅乡愁之作，留下大量纪游诗、山水诗。如《芙蓉曲》《游西湖六首》等清新可爱。《芙蓉曲》：“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似无情而有情，有所思而不怨，隐

① 《元诗选·辛集》。

② 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③ 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

约透露诗人怀才不遇，飘泊江湖的心绪。写民情习俗，生活气息浓厚。如《初夏淮安道中》：“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满树嫩晴春雨歇，行人四月过准时。”形象生动，有乡土气息。咏史诗如《杨妃病齿图》等别有新意。七律《纪事》直接反映元明宗、文宗兄弟之间的纠葛、争斗。感时诗如《鬻女谣》等现实性甚强。

其词作艺术性较高，《百字令·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气象高远，情调苍凉而不失豪迈旷达，是历来传诵之作。”^①被后人列为有元一代之冠。试看其《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繁华，春色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新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红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蛩泣。到如今，惟有蒋山青，秦淮碧。”此词作于至顺三年或四年任江南诸道行台侍御史时期。古往今来，人事代谢，但青山永在，绿水长存，全词苍凉豪迈，磊落旷达。

元代干文传序其诗曰：“天锡陟官闽宪幕，往还吴中，出所作《雁门集》见示。其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门，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嫵媚也。”清代顾嗣立《元诗选》：“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窳，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

在闽期间，萨都刺写有题画诗。题画诗需兼有诗与画两方面的知识与表达技巧，难度颇大。但萨都刺的题画诗却显得颇为得心应手，说明萨都刺对汉文化的学习、接受已达到相当高的层次。《题汀州丁三溪知事卷》：“三溪会汀州，上有仙人居。乃是丁令威，玉珮摇双裾。高秋下风露，水清映芙蓉。华表惯闻鸡，小船闲钓鱼。鉴湖分半曲，贺老竟何如？”元汀州路领县六：长汀、宁化、清流、连城、上杭、武平。五州之水多东流，而汀水却南流。此诗充分展现了画意。《织女图》借画意加以发挥，诗的后半部分写道：“佳人自古多命薄，风里杨花随处落。岂知丑妇嫁田家，生则同衾死同椁。君不闻长安市上花满枝，东家蝴蝶西家飞。笼中鸚鵡唤新主，门里侍儿更故衣。又不闻田家妇，日扫春蚕宵织布，催租县吏夜敲门，荆钗布裙夫短袴。我题此画三叹吁，百年丑好俱虚无。排云便欲叫阊阖，为我献上幽风图。”对女性的不命运寄予深切同情，那种无论富与贫，女性皆苦命的认识十分深刻。《题喜寿里客厅雪山壁图》面对客厅雪山壁图不言画本身，却由画引起回忆，“良工画出雪山壁，过眼令人忆南北。”叙述自己近年的经历：“一年在京口”“一年在建业”“一年在镇阳”“今年入闽关”。抚今追昔，真是世路坎坷，往事沧桑。其写入闽情景曰：“今年入闽关，马蹄山没千万山。瘴烟朝暮气霏霏，石泉日夜声潺潺。雪花半落不到地，但见晴空涌流翠。海头鼓角动边城，木末楼台出僧寺。何人蹇驴踏软沙，出门无处不梅花。江潮入市海船集，水暖游鱼不用叉。”这俨然是诗人用诗的语言描画闽都的风景长卷。构图、色彩都很鲜明、生动。

《题画马图》歌咏骏马的雄姿：“汉水扬波洗龙骨，房星堕地天马出。四蹄蹀躞若流星，两耳尖修如削竹。”暗示自己才华出众，不与凡马同。表明自己的人生抱负：“天闲十二连青云，成长出入黄金门。鼓鬃振毛恣偃仰，食粟何以酬主恩。岂堪碌碌同凡马，长鸣喷沫奚官怕。人为君王驾鼓车，出为将军净边野。”寄寓了诗人的社会理想：“要令四海无战争，千古万古歌太平。”《题瘦马图》赞颂瘦马自由无羁，不慕富贵：“沙场日暖春草肥，瘦马不受黄金羁。天生神骏天所爱，岂容过市人无知。”写喜见瘦马图感喟“人生相遇贵相知，孰谓世间无伯乐。”《马翰林寒江钓雪图》由寒江钓雪的

^①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

画面，联想到社会的不公不平：“歌楼酒香金帐暖，岂知篷底鱼羹饭。”体悟出“人间富贵草头露，桐江何处觅羊裘”的人生哲理，认为“如此江湖归不得”，所以“还君此画三叹息”。那么，什么是美好的生存状态呢？那便是回归自然：“洗鱼煮酒卷孤篷，江上云山好晴色。”元人喜作题画诗，且取得较高思想、艺术成就。从萨都刺在闽都所写的题画诗，可窥见元诗的这一特色。

萨都刺把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带进了诗坛。《上京即事》：“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剑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剽悍刚健之气扑面而来。又：“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游牧文化的鲜明特色出之于少数民族诗人之手，何等潇洒自如！

三、萨都刺对孝道文化的尊奉

至元三年（1337），萨都刺66岁，八月迁官出闽。接到调令，萨都刺于农历八月八日动身，离开福州。

舟至延平府南平县茶阳驿，作《题茶阳驿飞亭》：“白云飞出山，怒擘苍峡裂。幽谷湿晴云，绝壁洒飞雪。万折入沧溟，龙宫水晶阙。簸扬弄珠人，冰常挂寒月。”

萨都刺事母至孝。这显然受到汉族孝文化的影响。官员携妻挈子赴任，是常态，萨都刺不仅携妻挈子，而且奉母赴任。这是颇为奇特的。《溪行中秋玩月并序》称自己赴任“皆奉其母而行，以禄养也”。“至正三年八月望，舟泊延平津”，“是夕星河灿然”，“奉母坐船上，与其妇具酒肴盘饌，奉觞上寿。继而若妹、若婿、若婢、若仆，以次而进”，“母欢甚”，“今夕何夕，不知奉亲之在异乡也。嗟夫！昔人所谓宦游之乐不如奉亲之乐，实天乐也。”长诗末尾云：“人生此乐更有无，异乡到处同里间。唯期母寿庄椿踰，有子愿效返哺乌。”这首诗堪称“孝”之歌。

《溪行中秋玩月并序》：

余乃萨氏子，家无田，囊无储，始以进士为京口录事长南行台辟为椽，继而御史台奏为燕南架阁官。岁余，迁闽海廉访知事，又岁余，诏近河北廉访经历，皆奉母而行，以禄养也。后至元三年八月望，舟泊延平津，是夕，星河灿然，天无翳云，月如白日，溪声潺湲若奏乐。四山环抱，如拱如立，如侍左右奔走执事者。萨氏子奉母坐船上，与其妇具酒肴盘饌，奉觞上寿，继而若妹若婿若婢若仆，以次而进，和而不褻，谨而怡怡。月色荡酒，而溪韵杂笑谈，母欢甚。至舟人醉饮，亦相与鼓柁作南歌而乐。今夕何夕不知奉亲之在异乡也。嗟夫，昔人所谓宦游之乐，不如奉亲之乐，实天乐也。萨氏子于是命妇盥爵，满以酒再拜母寿而作歌曰：

龙津秋水涵太虚，今夕何夕光敬殊。皓月当镜星贯珠，河韩倒影垂平芜。微波漾漾风徐徐，新凉拂拂飘裙裾。阿母今年八十余，清晨理发云满梳。起居俨重天人如，有子在官名在儒。奉母禄养南北区，晨昏不忍离斯须。荆楚燕赵闽粤吴，今年去官南海隅。北上咫尺天子都，官船轧轧如安车。阿母坐卧襟怀舒，清晨夜泊不知挈。母在船上重褥铺，芙蓉映水摇氍毹。开瓮酒熟浮新蛆，秋园摘菜雨剪蔬。船尾曲突通行厨，家鸡水鸭美且腴。鲤鲫鲜大如江鲈，奉觞酌酒前拜趋。月波荡酒如浮酥，子为母寿妇寿姑。阿梅次进偕婿夫，酌献亦及婢与奴。熙熙春盎无亲疏，行礼有节俱欢娱。阿母笑语情愉愉，有妇右策儿左扶。舟人醉饱从欢呼，鼓柁节歌声呜呜。四山叠翠开画图，溪濑漱石如笙竽。双壶酒尽村可沽，盘饌狼藉溪可渔。人生此乐更有无，异乡到处同里间。惟期母寿庄椿踰，有子愿效返哺乌。作诗记实无浮誉，至元丁丑仲秋书。

元代，因取消了职田制度，官员的正式收入很低，贪腐严重。后在江南各省恢复了职田制度，各级官员把职田租给农民，农民按期给官员交租，故官员生活颇富足，萨都刺才能带着老母、妻儿，以禄养也。《溪行中秋望月》：“去岁南闽客，今年此日还。中秋八月半，一水万山间。皓月飞圆镜，迴流转玉环。携家共清赏，何异在乡关。”写出其阖家中秋赏月的欢乐。

四、萨都刺对闽北山水文化的认同

元统三年，亦即至元元年（1335），萨都刺64岁，由燕南架阁官调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使。福建道肃政廉访司官员有廉访使、副使、僉事等，这是个执掌监察各路地方官，平反冤案官吏的官职，权力很大，级别很低，仅正八品。未行，收到友人赠茶，他赋诗致谢，《元统乙亥余除闽宪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参政许可用惠茶赋谢》称：“清风两腋归何处，直上三山看海霞。”对闽都盛景，心已向往之。有友人求题舆地图，他作《将入闽赵郡崔好德求题舆地图》云：“月轮西转日生东，四海车书总会同。骑马出门天万里，山川长在别离中。”认识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民族融合的重要性。虽已是六旬老翁，却仍有“骑马出门天万里”的豪迈之情。

赞赏闽北山水，诗人与闽之山河同在。他看惯了北方平原的浩瀚，北方山体的光秃裸露；四月入闽，总能发现闽山闽水独特的美，对祖国山河的喜爱与赞叹，几与汉族诗人同，不过多了几分惊奇。他首先领略到闽山的高峻、险要。《度闽关》二首极写闽关之险峻，诗云：

晓度分水岭，身在云雾中。手扣天上关，声落山下风。雷霆走涧壑，神人过虚空。既讶奔丰隆，亦可招祝融。顷刻开万象，赤鸟飞岭东。

白云下千峰，尽入怀袖里。振衣度闽关，洒作山下水。仰登天无梯，俯视井无底。古来守关人，豪杰存有几。寒食百草青，春风吹不起。

目睹闽水的湍急奔流，他作《过岭至崇安方命棹之建溪》。此诗以议论开篇，首六句谈人生哲理：人要在天地间驰骋，及时行乐，不为功名羁绊。次四句赞叹东南雄伟、闽粤奇险、车书统一、风气各异。再次四十八句具体描绘过岭登山、行舟所见景色、人物活动，展示建溪数十里长廊奇雄之景，表达诗人新奇的体验。后十二句抒写船过建溪的感慨、理悟：应接千万态，一览宇宙大，少吐胸中豪，神游八方外。

到崇安后，改乘木船沿建溪而下。夜宿崇安黄亭驿，晓起，听到鹧鸪啼声，想到时光流转，未免有些惆怅，“急雨莓苔上壁清，晓寒山馆梦初醒。鹧鸪声里流年度，自是行人不愿听。”（《黄亭驿晓起》）写出了当时的心境。《过浦城》：“人家鸡犬隔痴岚，城郭微茫见塔尖。一片轻云笼马首，熟梅时节雨纤纤。”寥寥数语概括外物的特点，传景物之神。萨都刺乃丹青高手。

丹青阁在瓯宁县开门寺侧，宋元丰初太守石禹勋建。《临丹青阁》写出了丹青阁周遭翠壁丹崖、乱山无数的风景和丹青阁“凌烟欲飞”的气势：“飘然身在紫芝峰，翠壁丹崖有路通。杰阁凌烟欲飞去，乱山无数夕阳中。”诗人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萨都刺，这个长期生活于北方之少数民族诗人，初入闽地，却酿造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意象，用白描手法将之化为形象画面，传达出独特的感受。《道中漫兴二首》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云气千峰暝，溪流水拍桥。竹鸡泥滑滑，榕树雨潇潇。曲栈钩崖角，垂云挂岭腰。山家酒初熟，或事借椰瓢。”（其一）“绿树莺啼尽，山云映碧萝。一年春事了，四月雨声多。闽海夏无暑，山田晚种禾。远人千里别，归思欲如何？”（其二）“榕树雨潇潇”“闽海夏无暑”云云，这是闽地的特点，也是萨都

刺特有的感受。

延平府诸滩以黯淡滩为最难，过该滩，舟多覆溺，此下直指剑津。唐大顺二年，僧无示结庵于此，曾募工疏凿，湍势稍平，宋天圣中，郡守刘滋复开港口。萨都刺过此滩，已无当年危险。但仍“性命斯须薄如纸”。《黯淡滩歌》长达32句，通过“上滩之难难于上绝壁”“下滩之易易如盘走珠”的鲜明对比，凸显黯淡滩的湍急与风险，表达了“人间顺逆俱偶尔，且得山水从遨游”的人生态度，诗融叙述、描写、议论于一体，有较强的叙事性。与《过岭至崇安方命棹之建溪》一样，展示了萨都刺诗歌雄浑奔放的一面。《黯淡滩歌》云：

长滩乱石如叠齿，前后行船如附蚁。逆湍冲激若登天，性命斯须薄如纸。篙者倒挂牵者劳，攀崖仆石如猿猱，十步欲进九步落，后滩未上前滩遭。上滩之难难于上绝壁，虽有孟贲难致力。滩名况复呼黯淡，过客攒眉增叹息。下滩之舟如箭飞，左旋右折若破围。欢呼踏浪棹歌去，晴雪洒面风吹衣。飞流宛转乱石隘，奔走千峰如马快。贾客思家一夕还，传语滩神明日赛。下滩之易易如盘走珠，瞬目何可停斯须。长风破浪快人意，朝可走越暮可吴。乃知顺逆有如此，逆者悲愁顺者喜。请君听我黯淡歌，顺则流行逆须止。顺者不必喜，逆者不必愁。人间顺逆俱偶尔，且得山水从遨游。

认同武夷文化还体现在他对武夷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厚重意蕴有较深了解。《过延平津》三首：“神物在天地，变化须有时。踊跃一入水，风云波浪随。志士昔未遇，常人安得知。一朝忽奋迅，儿女惊且疑。”（其一）“万山二水合，汇之为深渊。剑化亦已矣，过者尤凛然。神物岂常处，入地忽上天。所以磊落士，岂为愚者怜。”（其二）“当时二龙剑，乃是山川精。埋没于狱础，异气腾丰城。神光射霄汉，牛斗为不明。一入壮士手，长鸣除不明。”（其三）他感受着剑津宝剑传说的神奇。剑津在建宁、邵武二水合流之所。传说，晋雷焕得二剑于丰城，以一与张华，以一自佩。张华死，失剑所在。其后雷焕之子佩剑渡延平津，其佩剑跃入水中，化为龙，因名剑津，亦名剑潭。萨都刺对于剑津的传说故事不仅熟悉，而且发掘了它的历史内涵、注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一朝忽奋迅，儿女惊且疑。”“所以磊落士，岂为愚者怜。”“一入壮士手，长鸣除不明。”表露诗人铲除“不明”的雄心壮志。

他只是入闽、离闽路过闽北而已，但对闽北文化却有认同感。如上所述，这不仅表现在对闽北山山水水的欣赏、赞叹，而且表现在对闽北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的津津乐道，乐于探讨。如果说入闽行色匆匆，那么，出闽的时间较为充裕，他一路浏览、沉吟不绝，流连忘返。

以下这些诗均写于离闽途中，走的是水路。南平至浦城，有：大横驿（今南平市东北）、太平驿（今建瓯县南太平）、建溪驿（今建阳县城西）、兴田驿（今崇安县东南）、崇安驿（今武夷山）、长平水驿（今崇安县城内）、大安驿（今崇安县西北）。这些水驿是驿站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时，驿站功能日益完善，已发展成军事、钱粮、急务等综合性的运输站。萨都刺《将至大横驿舍舟乘舆暮行二首》表现大横驿：

山行日已暮，肩舆度林薄。凉飏凄以清，松子当面落。千山月崔嵬，万叶雨萧索。昨夕棹歌行，颇忆江上乐。

月轮转头上，溪濑鸣脚底。人行山色中，叶落雨声里。虚名为一官，游子在万里。行行重行行，日夕聊复止。

将至建宁府建安县太平驿，作《将至太平驿即兴》写到达驿站如到家，虽欢欣鼓舞，但仍然有着“何日归种淮南田”的企盼。《太平驿即事》道出驿站的冷清，旅人的寂寞。到了瓯宁县紫云里，约

定偕游西峰（又名鸞峰）的友人没来，诗人作《约友游西峰不至》。诗人前往瓯宁县的云际山游览，写了好几首诗。云际山，在今建瓯市城区南面5里，因“时有云雾罩无际”而得名。“云际山在铁狮山之左，自顶分岗而下。下有永庆寺，寺后有陆羽泉。”^①萨都刺作《云际感兴》：“昨日登芝峰，兹晨陟云岭。俯视城中居，万瓦落深井。风露洒洒生秋寒，飞泉落涧声潺湲。笋舆轧轧度修竹，石阑曲曲踞层峦。层峦绝顶天尺五，我欲排云击天鼓。九关虎豹不须惊，吐胆开心见天语。天鼓不可击，天门何日开？请君听我紫芝曲，手招白云归去来。”此外，还写有《昼卧云际寺》《登云际题壁》等诗。

《赠白云》：“白云抑何闲，竟日不下山。时从修竹里，相伴一僧还。悠悠覆松顶，渺渺归岫间。奔走尘俗客，视君多厚颜。”《白云答》：“使君抑何忙，宁不思故山。苍茫天壤间，鸟倦犹知还。石田紫芝老，茶甃碧藓斑。胡不赋归来，分子屋半间。”通过使君与白云的赠答，描绘白云的悠闲与坚持，“竟日不下山”的坚守是为了坚守其悠闲的立场。白云劝告使君（即诗人）“胡不赋归来”，表达了归隐的思想。

《闻秋蚤有感》写出行子思念故园的心情；“行子在远道，岂不思故园。”表露归隐的愿望：“田园可终老，轩冕何足言。”

《梅仙山行》：

山在建城之南，乃汉末南昌尉梅福避地也。一日，偕政和簿会稽胡允文、晋宁李士瞻、古汴杨大年者肩舆登览，出入榛莽间，直至绝顶。有破屋两椽中设子真遗像，傍有药炉尚存。去屋数里许，山之凹有丹井。道士周姓者，汲水煎茶为客献。四顾林峦，追想竟日，因赋《山行》以寓怀古之意云。

赤星落色汉祚微，端门日日边风吹。咸阳秋色压官树，金人夜泣铜驼悲。先生袖疏探虎窟，汉鼎犹堪支一足。九重烟露似海深，门外何人知恸哭。贼莽白日升高台，玉玺堕地声如雷。周官揖让孺子戏，绛袍将军何日来。尘飞沧海风掷瓦，白鹤身轻快如马。一声铁笛度闽关，山月溪风共潇洒。龙争虎斗耳不闻，长啸袖拂松枝云。夜镗白日煮秋雨，玉佩赤锦飘霞裙。先生一去几千载，尚有当年遗迹在。题诗绝壁寄先生，顿使林峦颜色改。药炉寂寞秋草深，丹井水落莓苔侵。至今火灰化为土，犹有丹光穿树林。

怀念汉末南昌尉梅福避祸梅仙山，抨击王莽篡政，感慨“先生一去几千载，尚有当年遗迹在”。歌颂南昌尉梅福“龙争虎斗耳不闻，长啸袖拂松枝云”的超脱人生态度，认为其精神品质长存：“至今火灰化为土，犹有丹光穿树林。”

《游梅仙山和唐人韵四首》写出诗人绝顶寻仙迹，仙人不可见，只能汲泉煮新茶的情景，发出“归隐知何日”的慨叹，产生“烟霞晚更亲”的感受。诗人是食人间烟火味的。

《赠别鸞峰上人并引》，诗前小序曰：“予迁官出关，过建阳，会同年契世文，邀予至其家，因登溪阁，俄闻茂林修竹，间发弦诵之声，询世文，乃灵山上人也。顷之相会阁上，矍然如鹤，悠然如踏云，出所作诗一帙，萧然有林下风也。予南出闽，世文亦将赴官编修，鸞峰送予溪上，徘徊顾望，有不忍别意。鸞峰湖南人，本姓欧阳，灵山其释名，鸞峰其自号，乃座主翰林侍读欧阳之族，虽缙流，而其家学有白云。”诗云：“建溪秋高山水清，溪边偶识衡阳僧。临水洗钵挂溪阁，夜访校书天禄灯。圣经佛偈通宵读，苜蓿堆盘胜食肉。回雁峰南难寄书，武夷洞前堪煮粥。西风猎猎吹水寒，相送郎官南出关。校书公子玉京去，衡阳上人何日还。手中玉杖春雨绿，毋乃湘君庙前竹。胡

^① 1929年《建瓯县志》。

不截作双凤箫，吹作来仪舜庭曲。古曲雅以淡，天高难上闻，不如且挂杖头月，归卧祝融峰畔云。”透露了萨都刺的行踪与交往情况。

闽北山水文化的精华在于武夷，萨都刺十分赞赏武夷山水，他的咏闽诗中，歌赞武夷山的诗最多。《望武夷》：“溪行望武夷，峭壁何斩绝。赤霞乱不收，大化元气泄。下有万年松，上有太古雪。只恐月明中，铁笛吹石裂。”《武夷山》：“三十六峰飞翠寒，手携玉杖叩玄关。神仙曾到有遗迹，天地黄来无此山。木杪楼台浮海上，月中笙乐奏云间。天宫借得宁王笛，骑取萧郎赤凤来。”《换骨岩》：“千丈丹梯万丈岩，天开地辟鬼神劓。夜光玉气横溪过，多是神仙换骨函。注：换骨岩在幔亭峰北。”《武夷馆方池》：“武夷之镜多神仙，我亦驻此临风轩。方池清叶堕碧月，重帘白日垂洞门。暗泉涌地紫波动，微雨在藻金鱼翻。倚阑照影清见底，拄杖卓石寻无源。洗头玉女去不返，遗此丈八芙蓉盆。溪头明日泛九曲，出入紫翠听潺湲。便从此地觅真隐，何必离山寻绮园。”《宿武夷》：“舫舟山水间，借问武夷观。月挂水晶帘，风吹紫霞幔。鸡犬过云间，笙乐度天半。传语武夷君，酒熟幸相唤。”《武夷漫题二首》：“幔亭峰顶秋无价，红白芙蓉满洞开。唤取渔歌游九曲，载将白鹤渡溪来。”“大隐屏前小隐居，竹房松屋听猿呼。丹光出谷明如月，夜读离骚拥地炉。”《会杜清碧二首》：“夜宿武夷山，乃是杜清叟。清谈道人间，语险山鬼走。出门视河汉，危梯挂星斗。白露满芙蓉，清寒夜深久。”（其一）“我识杜清碧，深居武夷山。采药紫芝岭，行歌白云间。天根深可蹶，月窟高可攀。天子召不起，道人闲往还。”（其二）《赠道士陈华隐》：“早年濯足东海水，去卧华峰顶上云。收得九秋仙掌露，归来酌献武夷君。”武夷组诗从各个侧面热情讴歌了武夷山水文化和人文景观。

闽北文化的精粹集中在朱子理学、严羽诗论、建本图书。朱子理学的理论本身博大精深，不仅是闽北文化、闽文化，而且是中华文化的理论范本，其影响深广、深远；严羽诗论的传承，不仅在宋代，而且久至元明清乃至民初，流布所及不仅在福建，而且泽被九州；建本图书盛极一时，保存了大量珍贵典籍，普及了中华文化。对于汉族士人来说，要想全面深入地掌握之，尚且不易，对于少数民族诗人而言，更是艰难的挑战。来去匆匆的萨都刺停留于闽北山水文化的浅表层面，而对朱子理学、严羽诗论、建本图书未能触及，更未能深究，是十分正常的。它表明，少数民族诗人要融入、传承中华文化，只能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五、萨都刺融入并共建闽都文化

萨都刺对闽都略有耳闻，其泰定四年（1327）的同年进士张以宁便是闽都古田县人，他们有诗互赠。萨都刺调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使，咏闽都的诗36首（以诗题计）。

四月入闽，一路行程一路诗，终于到了闽都。洪塘是进入福州的门户。面对孤塔、百船、灯火、村烟、芳渚、渔歌、旅客……他吟咏道：“胜地标孤塔，遥津集百船。岸回孤屿火，风度隔村烟。树色迷芳渚，渔歌起暮天。客愁无处写，相对未成眠。”（《夜泊洪塘》）一幅多么明丽的水墨画图！富有江口码头的鲜明特征。

闽都让这个“白头才到荔支乡”的北方异族诗人着迷，他入乡随俗，很快就融入了闽都文化，并以其诗作参与了闽都文化的建设。他以诗融入并共建闽都文化，有几个特点：

其一，敏锐的艺术触角，新奇的心灵感受。也许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故，闽都诗人对福州城市建筑与海鲜物产习以为常，萨都刺却以敏锐的艺术触角，捕捉到福州这个闽中郡城的城池特征：“潮水通城蚬蛤肥，万株红荔艳清晖。守臣只恐山飞去，高筑闾闾锁翠微。”（《到闽二首》之二）

寥寥数语道出闽都潮水通城、城墙围山的城池格局，以及蚬蛤肥、红荔艳的风物特色。《初到闽》云：“片云山对户，一雨水平墀。”依然关注于城市风貌。“绿袖持蕉叶，丹林压荔支”，点赞闽都的特有物产。他真切感受到台江、南台跃动着城市的脉搏，“城闾南有市，灯火夜眠迟。”生动展现其市集的繁荣。对闽都气候，他有北方人特别的感受。闽中雨水充沛，北人多不习惯，故有“苦雨”的感觉。《闽中苦雨》写出了福州春季的气候特点：“三山一夜雨，四月满城秋”，气温凉爽；“江潮入市流”，随时可登船钓鱼，内河与江海相通。与北方城市迥然有别。《雪米》：“万斛珠玑散大荒，六丁谁为发天仓。云孙捧出南箕簸，月姐舂米北斗量。狼戾也知逢稔岁，贮藏元不济饥肠。风流灞上寻诗客，千古无人说秕糠。”写出了福州雪米润物无声与北方雪花纷飞的区别，并借榕城下雪米之景，寄寓期望丰收连年，千古无饥荒的美好愿望。

其二，真心喜爱闽都风光，努力发掘其深厚底蕴。在闽都，他写的最多的是风景诗。乌山是福州名胜古迹荟萃之地，他多次登乌山。《同杨子承李伯贞避暑乌石山饮天章台二首》：“晚凉上乌石，置酒天章台。夕日下山去，海风吹月来。豪气吐千丈，朗吟动三台。白露洒仙掌，银河泻金杯。谁识芙蓉仙，飞身在蓬莱。”（其一）“高台在云霄，肩舆上绝壁。露下酒樽凉，月出海门白。坐拂衣上云，醉卧林下石。西风吹鬓毛，南斗在肘腋。题诗向天阍，奎光射瑶席。”（其二）杨子承时为廉访经历，李伯贞时为廉访照磨。该诗勾画出闽都夕阳西下的美好情景，抒写了诗人“豪气吐千丈”“飞身在蓬莱”“题诗向天阍，奎光射瑶席”的豪情。《立秋登乌石山和幕府》展露了乌山风光的另一面——“海国山四围，繁华坐消歇”的冷落、凄清。《登乌石山仁王寺横山阁》：“千尺青莲座，烟霞拥地灵。山川几緉屐，日月两浮萍。鸟没天垂海，龙归水在瓶。深堂说法夜，应有石头听。”描写出乌山浓厚的佛教气息。《题浴鸦池》：“天池霹雳斧斤余，天风万劫吹不枯。白云石间化青雨，落日海眼翻赤乌。银河灵鹊夜度影，月窟老兔时濡须。太平海上银袍客，跨鹤来看浴凤池。”充满神话传说的幻想色彩。登临乌山的诗丰富多彩，色调多样。

鼓山留下了多少文人墨客的足迹与诗文！“鼓山起千仞，乃是东海垠。蛟龙穴其下，霹雳翻海门。砥柱俨不动，日夜雪浪奔。何当临绝顶，俯视浴日盆。”他这首《望鼓山》在描写鼓山高峻千仞，屹立海滨的景物特征，融化鼓山传说典故之余，突出赞颂其“砥柱俨不动，日夜雪浪奔”的鼓山精神，诗末表达登上绝顶俯瞰福州城的心愿。在众多吟咏鼓山的诗篇中，亦堪称翘楚之一。

其三，深深浸染于闽都民俗文化，深入了解闽都历史、传说。《题屏风》描写“海国夜凉”的感受。《闽城岁暮》：“岭南春早不见雪，腊月街头听卖花。海国人家除夕近，满城欲雨湿山茶。”展现福州靓丽的风景画、风俗画。腊月满街卖花，欲雨满城山茶，冬日榕城飘荡着花香，简直就是一个花的海洋。《虾助》：“层涛濡沫缀虾行，水母含秋孕地灵。海气冻成红玉脆，天风寒结紫云腥。霞义褪色脂流滑，琼缕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实老，误随潮汐落沧溟。”虾助，即水母、海蜇。萨都刺视福州常见的海蜇是美食美味，还显得那么神奇。饮食文化、日常起居具有浓浓的闽都文化氛围。这些诗都透露了诗人对福州的喜爱之情。怀古诗以景观为中介，把怀古与感时结合起来。《越台怀古》中的越王山，又称越山，即屏山。首联“越王故国四围山，云气犹屯虎豹关”，勾勒闽都形胜，虎虎有生气。颌联“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背夕阳还”，流露沧桑之悲慨。颈联“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表达对历史的一种认知，颇为中肯。尾联“日暮鹧鸪啼更急，荒台丛竹雨斑斑”，渲染荒台悲凉氛围，使思古之幽情更悠远、更幽深。《南台月》在“金蛇翻动三江白，冰轮碾出碧玻璃”的映衬下，推出了抒情主人公“钓龙台上客”的形象，他怀抱古道之心，阅历丰富，黄河、秦

山、华山都曾登临，今年，登上了钓龙台。在此闽越国遗址，他想象昔日之繁华，“无诸城里人如海”，而今，“龙去台空三千载”，“无诸故冢埋残霭，无诸台上草离离”，残破沦落。怀古之余，感慨现实，“昔龙已去江悠悠，今龙虽在人未求”，针对新罢科举而发，抨击朝廷摧残人才。诗人认为：“怀珠岂立此台下，要上黄金台上钩。乾坤四顾渺空阔，诗书元气行勃勃。”道出了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追求：“合沙古讖此其时，天下英雄求一决。”福州古讖云：“南台沙合，河口路通；献出状元，后出相公。”据说，历史上有过四次“沙合”，福州先后有章得象、余深、朱汉章、叶子昂四人拜相。然而，现今科举滞选，读书人有何出路？“南台月照男儿面，不照男儿心与肝。”男儿的心与肝，即雄心壮志是什么？“燕山买骏金万斛，万里西风一剑寒”，要为国家建功立业！此诗写南台对月而寄寓飘零之感。

其四，欢快与忧虑并存，融入与不适杂糅。尽管已融入闽都文化，但他仍有不适应处。一是对于元代文人命运的忧虑与同情。咏物诗《枯荷》：“红云一梦何茫然，绿紫瘦骨擎欲僵。愁多有魂吊秋水，故池日夜凄新霜。鸳鸯相顾魂已泣，白鱼起身银尺立。堂中书客感秋风，一片青衫和泪湿。”有人说此诗写罢科举之感，前六句借池中物为比，末二句则明白点出。其实，旨意远超于此，诗以枯荷象征天下之文人，慨叹文人命运多舛。二是透露身在异地的孤寂。感怀诗《夜兴》谓：“山深日未暝，孤馆孰宾主”“独立谁与亲，厨人夜深语”。三是为离乡背井而痛苦。《北人冢上》写萨都刺在福州城见南人清明节祭奠亲人，而北人流落于闽地，只能望北痛哭，“儿身有禄亲不待，亲坟无主儿义辜。”朔客虽有铁心肠，仍然情惨伤。受此触动，遂生去意：“宦游既知离别苦，何如拂衣归故乡！”一方面，他爱这片土地；另一方面，他又有羁旅之愁，内心充满矛盾。

其五，依恋不舍，情真意切。至元三年（1337），萨都刺66岁，八月迁官出闽，官阶升至从七品。接到调令，萨都刺于农历八月八日动身，离开福州。《西楼别寄闽宪诸公》记录了他与同僚（闽宪诸公）分别的情景。诗中云：“丈夫有泪不须洒，去客挂帆君上马。悠悠回首各东西，惟见西溪捕鱼者。闽关一片月，太行一片云。雁书远寄隔山岳，云飞月明多忆君。”离情依依，他还留诗友人。《留别同年索士岩经历》是赠与同年进士索士岩的，诗云：“欲落不落天上雪，欲去不去闽中人。红尘香爇荔支国，白日醉卧芙蓉裯。功名富贵倘来物，政事文章奚足珍。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在知己，宁论千里复万里？志士鸡鸣中夜起，秋雨粼粼剑光紫。”表达了友谊高于功名富贵、政事文章的理念。《次韵与德明小友二首》：“烟雨短篷水口，人家乱石山前。送别莫忘今日，相逢知在何年？”（其一）“莫笑风餐水宿，暂离马足车尘。两岸好山送客，一江细雨归人。”（其二）写船过水口的情景。《名胜志》：古田县水口驿西侧有坑，坑上为桥。其坑水自县南流入江，与嵩溪汇，故名水口。宋太平兴国中，尝迁县治于此，后废为驿。过了水口不远，便离开闽都之境了。这些诗抒写了送别、相逢的感慨。

萨都刺离闽，虽离情依依，但并不感伤。离情还表现在他对闽山闽水的依恋不舍。离闽途中写的《舟中题画卷》云：“两岸好山如画，丹崖翠壁楼台。爱煞南闽风景，小官何日归来。”“爱煞南闽风景”是他心情的真实表露。人未离去就想着何时归来，对这方水土已深有感情。

一个真实的北方少数民族诗人形象跃然纸上，他的诗把闽都诗歌百花园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萨都刺吟咏闽都的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在多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少数民族精英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传承，他们积极参与了灿烂中华文化的创造。

黄景昉佚诗《开元寺中避暑诗》

于 婧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 黄景昉是崇祯“五十相”中少数能够“克保令名”者, 崇祯十六年致仕后居住泉州, 直至过世。后人咏开元寺, 总要提及他的《开元寺中避暑诗》。此诗不见于黄景昉的《欧安馆诗集》, 当作于明亡之后。诗并不着重描绘开元寺风物, 而是抒发作者进退两难, 无所适从的心情。

关键词: 明遗民诗; 黄景昉; 开元寺避暑诗

泉州开元寺是声名远播的千年古刹, 始建于唐垂拱年间, 初名“莲花寺”, 于唐开元年间更名为“开元寺”。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游览于此, 创作了大量与开元寺有关的文学作品。其中, 常被人提及的便有明末黄景昉的《开元寺中避暑诗》。

黄景昉字太樾, 号东崖, 福建晋江人, 万历四十三年(1615)中举人, 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 时年 30 岁。崇祯十六年(1643), 黄景昉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在阁时间前后约十个月。致仕后, 黄景昉奉旨驰驿行, 由北京入闽, 于除夕前五日回到故乡泉州, 时年 48 岁。次年, 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 明亡。清顺治二年(1645)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监国, 称隆武帝, 是年即隆武元年。此年召景昉入直, 景昉未久告归。此后直至康熙元年(1662)67 岁时去世, 黄景昉近 20 年的时间都在泉州度过。

道光《晋江县志》卷之六十九《寺观志》, 载有黄景昉《开元寺中避暑诗》一首:

自缘性僻动幽襟, 不为炎蒸逼入林。画壁龙蛇多异相, 禅房瓶钵有哀音。倦除襪襪差人热, 饥去伊蒲损佛金。遂使群真妨结夏, 问师何法最安心?^①

此诗常被后世引为唱诵开元寺的典范。但仔细看来, 此诗是否描写了开元寺的典型特征, 作者在诗中抒发了怎样的情感? 还值得细细探讨。

黄景昉著有《欧安馆诗集》《馆阁旧事》《读史唯疑》《宦梦录》《经史要论》《经史汇对》《双声迭韵谱》《古今明堂记》《制词》《东崖诗稿》《鹿鸣咏》《燕楚游咏》《国史唯疑》《馆寮十志》《读诸家诗评》《御览备边录》等诗文集十多种。明刻本的《欧安馆诗集》三十卷(日本内阁文库藏)中未见此诗。除《晋江县志》中记载, 亦未见于释元贤崇祯十五年(1642)编的《温陵开元寺志》(崇祯四年黄景昉丧父, 回家守制三年, 此间有机会游开元寺)。据笔者推断, 本诗应写就于黄景昉退居泉州之后, 很可能作于明亡之后。黄景昉做此诗是否意在歌咏开元寺的独特景致呢? 逐句读来, 便会发现这首诗抒发胸臆的成分要大于写景。

作者简介: 于婧, 女,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① [清]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 福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地方志丛刊》,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首联“自缘性僻动幽襟，不为炎蒸逼入林”，写作者入寺避暑的原因，并非因天气炎热。据《晋江县志》记载，大学士黄景昉宅在宽仁辅（今涂门街清静寺对面），灵慈宫沟有欧安馆，故黄景昉的诗集称为《欧安馆诗集》。黄景昉住所距离开元寺不远不近，步行约三十分钟。一路上可以路过铜佛寺（始建年代不详，明万历四十七年扩建）、承天寺（南唐保大末年至中兴初年建寺，经多次重修，在崇祯末年已经颇具规模）。如果是单纯纳凉避暑，离家较近的地方更为适宜，不必舍近求远，所以“不为炎蒸逼入林”。由此看来，此诗被定义为“避暑诗”，但赏景避暑恐怕不是诗人真正的写作目的。

“自缘性僻”是黄景昉的自我评价。他是敢于坚持己见，仗义直言之人，从以下几件事情可以观其人品：天启五年（1625），御史吴裕中因忤逆魏忠贤被阉党杖毙，无人敢临其丧，只有黄景昉“割俸金数镲贖之”。崇祯三年（1630）典试湖广，黄将试卷中涉及朝政者带往北京，借以表达意见。朝臣见之莫不感叹，却得罪了权贵温体仁。崇祯八年（1635）典顺天，温有意刁难，黄景昉依然行事如素。崇祯十一年（1638），上疏为四朝元老郑三俊请命，求朝廷释放。思宗宠信宦官，任命其监军。黄景昉无所畏惧，仗义执言。黄道周后下狱，在黄景昉奋力营救下，远戍广西的黄道周才得以归还。崇祯十六年（1643），黄景昉因为多次上书进言触怒了皇帝，只好提前退休还乡。

在朝时坚守正道、仗义执言，致仕后退隐屏居不问世事，是黄景昉所言的“自缘性僻”。但在纷乱的时局中保身已难，他退居泉州后的生活危机四伏，常处于惶惶之中。作为泉州名人，任何一个政权的更替，他必或多或少牵连其中。所以哪怕他“自缘性僻”，欲退守静心著书，也不能如愿。

颌联“画壁龙蛇多异相，禅房瓶钵有哀音”，描写了寺中的景象。寺庙的墙壁上有绘有龙蛇图样，呈现出奇异的形象；禅房里的瓶钵响动，听起来带有悲哀的感觉。据万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中寺观宫庙类中所记，开元寺东西二塔始建于唐五代，明代曾历经多次修缮。崇祯十七年（1644）黄景昉退居泉州时，开元寺已颇具规模，除了正殿法堂外，两座石塔已是远近闻名的地标。

黄景昉在诗中并没有描写开元寺标志性的建筑，只写到了寺院的景物画壁、龙蛇、禅房、瓶钵等每一个寺院都有的“标配”。在典型意象的选择上，画壁上图样繁多，作者唯独提及“龙蛇”。“龙蛇”征着帝王政权，暗合黄景昉前半生宦海沉浮，致仕后仍被动卷入政治斗争的无奈处境。

这一联的重点更在“异相”“哀音”二词上。开元寺建筑中有诸多元素可以“异象”来形容，如大雄宝殿中上方的伎乐飞天，宝殿后的印度教石柱及密宗风格的佛像。这些风格迥异的景物，都可称为开元寺独有的“异相”。寺中印度教的石刻，出现的历史年代很早。泉州学者吴文良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中考证古印度婆罗门教石刻，原是泉州婆罗门教寺之物，该寺于元末被毁。明洪武年间重修开元寺时，这些婆罗门教寺石刻被移到开元寺来了。所以黄景昉造访开元寺时，是可以观赏到这些“异相”的。所谓“相由心生”，开元寺的“异相”分明展示了天上世界鼓乐升平、皆大欢喜的景象。见之不为之欣喜，却与“哀音”（让人觉得哀愁的声音）相联，说明这里的“异相”指的并不是开元寺与众不同的景致。

自黄景昉致仕以后，明王朝走向穷途末路。隆武元年（1645），唐王朱聿键征召旧臣，黄景昉亦在列。黄力疏辞，不愿入朝为官。年底，唐王遣陈翔以原官再请，黄始赴任。次年七月，郑芝龙暗通洪承畴撤兵，清军长驱入闽，黄景昉知南明败局已定，再次致仕。黄景昉自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从他在崇祯一朝的表现便可知。但南明朝廷在清军、流寇和郑氏势力的夹缝中生存艰难，就算再努力也无力回天，是他致仕的最大原因。

九月，唐王被擒，隆武政权倒台，好友蒋德璟去世令他悲痛不已。清顺治四年（1647），黄景昉的外孙郭显谋作为郑成功的内应助其围攻泉州而遭灭门，黄亦被牵连入狱。泉州解围后，他被释放。从崇祯一朝，到南明小朝廷，再与郑氏政权纠葛缠绕，“龙蛇”的频繁更迭令他心力憔悴。黄景昉空有才华和抱负，却举步维艰，稍有不慎就要丢掉自己及家人性命，怎能不觉得四处“哀音”？

颈联“倦除襤褸差人热，饥去伊蒲损佛金。”襤褸，意为衣服粗重宽大，不合身，比喻不晓事，无能。程晓《嘲热客》中写道，“今世襤褸子，触热到人家。”伊蒲，泛指素食，或素食贡品。明代屠隆的《昙花记·法眷聚会》中有“大人云游远去，久缺甘旨之欢，证道归来，止享伊蒲之供，抱愧无地，不孝通天”之句。疲劳的时候想脱掉身上的襤褸，这样宽大粗重的衣服在炎炎夏日中显得累赘、不合时宜；饥饿的时候吃了佛前的贡果，削减了佛祖殿前的金光。这里的“倦”“饥”指的是时下无奈的窘境。“倦”意为疲于应付来自外界的压力，“饥”代指内心的煎熬。诗人断然不会因为炎热和饥饿在殿前脱衣、吃供果，此联运用了借代的手法，暗示了黄景昉当下内外交困。

尾联“遂使群真妨结夏，问师何法最安心”，“结夏”意为佛教僧尼自农历四月十五日起静居寺院九十日，不出门行动。妨结夏，暗指隐居被妨碍、打扰。

黄景昉在《屏居十二课》描述了退休后的生活：一晨斋、二晚酌、三独宿、四深居、五庄内、六颌儿、七弟过、八朋来、九鸟梦、十鸡灯、十一著书、十二惜福。^①黄景昉退守一隅，著书明志，但深居简出、平静质朴的生活一再被打破，让他纠结、无奈，所以只好“问师何法最安心”。如《屏居十二课》中所述：“余晨起持蔬素者，十载于兹，非有所慕于释者也。”^②他并不是一个佛教徒，但是能借鉴佛教的修行方式关照自身。他在开元寺写下此诗，正是抒发心中的苦闷，期待回归宁静的生活。同时也反映出，黄景昉渴望独善其身，积极退守的心态。

“问师何法最安心”中之“师”或许便是本诗唱酬之人。但由于黄景昉的文集零落，暂不可查——他是否为友人所邀，与人唱和；亦或独自前往，自抒胸臆。但可以肯定的是，本诗虽然被记载在府志、县志寺观志中开元寺的部分，但并没有描绘出开元寺的典型特征，抒发的是作者愤懑焦灼的心情。黄景昉在盛夏时节来到开元寺避暑，躲避烦扰的俗世纠纷，求得安心之法。诗中暗示了在动荡的时局中，政权不断更迭，作为明朝旧臣，周旋于晚明朝廷、南明小朝廷、郑氏与清朝新政权中的黄景昉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愤懑心情。

康熙元年（1662），黄景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来纸笔，在膝上疾书二诗：“国亡身合殉，家破弟先归。伤心陵北望，松柏未成围。”“嬉游皆假合，啼笑亦随缘。耿耿孤明处，佯狂二十年。”随后掷笔而逝。诗中流露对大明的眷恋之情，也抒写了自己晚年生活的无奈和遗憾。在他退隐泉州的二十年间，只能“佯狂”而求保全。作为曾经位列“崇祯朝五十相”的要员，在历史的洪流中壮志难酬，风雨来时也只能随波逐流，不免令人唏嘘。

晋江文库版《国史唯疑》前言中这样评述：黄景昉的近体取法于“中晚唐”，为清初朱彝尊所欣赏，诗作“务去陈言，专尚新警”。清末陈田也说他的诗“轻俊鲜妍，于闽人成派别开生面”^③。黄景昉致仕泉州之后，创作了许多以泉州风物为题材的诗歌。作为明代晚期泉州籍的重要文人，黄景昉的诗文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记载了颇多历史事件，是正史的重要补充。

① 黄景昉：《屏间居十二课》，罗振玉辑：《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9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② 黄景昉：《屏间居十二课》，罗振玉辑：《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9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③ [明]黄景昉：《国史唯疑》，陈士楷、熊德基校注，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黄虞稷与《征刻唐宋秘本书目》

宾莹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黄虞稷, 原籍福建晋江, 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学者, 更是一位十分有成就的目录学家和历史学家。黄虞稷与周公亮之子周在浚共同编写了《征刻唐宋秘本书目》。此书目不仅是黄周两家近百种唐宋秘本的编目, 更是旨在倡导藏书家刊印流通珍藏秘本的倡议书, 在当时获得众多知名人士响应, 为唐宋珍本的保存与传播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黄虞稷; 藏书; 《征刻唐宋秘本书目》; 周在浚

中国明代的藏书盛极一时, 不论是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其规模都大大超过前代。但经过了明末清初的战乱, 许多藏书都被损毁, 而晋江籍的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斋藏书却奇迹般地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当时黄氏父子的藏书可以说是福建人藏书中最多的, 黄居中一生致力于藏书, 收书六万多卷, 而其死后, 其子黄虞稷继承父志, 精心保存千顷斋藏书的同时继续努力搜求图书, 又得书二万余卷, 使千顷斋的藏书增至八万余卷。

且黄氏父子的藏书中收藏明人著作最为得力, 几乎收尽明一代的著述, 因此黄虞稷后来据千顷斋藏书并补入其他书目资料编撰而成的《千顷堂书目》成为考明一代著作的最可依据之书。而本文要讲的不是《千顷堂书目》, 而是在《昭代丛书》中有一本上题“晋江黄虞稷俞邵, 祥符周在浚雪客编次”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

这本书目和以往的其他书目不同之处在于, 它是黄、周二人将自家所藏的珍贵的唐宋罕传本选了近一百种(目内仅有九十六种), 校定了文字, 希望有财力、物力的人, 可以刊刻一二或数种, 使这些没有刻本的古书能继续流传下去, 流通开来。虽然现在看来这只是一本普通的书目, 但是, 在当时却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书目出现, 其中还包含着黄、周二人对古书的一种态度, 一种对文献保存、文化传承的倡议。

这个倡议, 在当时就有许多学者、士人响应, 且纷纷发表文章表达他们的看法。如纪映钟、钱陆灿、朱彝尊、魏禧、汪楫等五人联名发表了一篇《征刻唐宋秘本书启》, 张芳作了一篇《征刻唐宋秘本书论略》, 倪灿和周铭联名写了一篇《征刻唐宋秘本书论例》(《昭代丛书》本和观古堂刻本均不题倪、周二人之名, 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琴川张氏抄本有之)。这个以列出一个书目为形式的倡议, 对当时以及后来几年的社会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学者发表文章进行响应外, 更有许多藏书家响应了这项运动, 刊刻了书目中所列的书籍, 使之以刻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光绪三十四年(1908)叶德辉《重刊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序》云:“此目所列大都两家旧藏, 当时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 几举经部全刻之, 其后《武英殿聚珍板丛书》《知不足斋丛书》, 又陆续刊行。其史子各种按目求之, 所未刻者仅杂史小帙及宋元人集部数种已耳, 然杂史一二种

作者简介: 宾莹, 女,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讲师。

藏书家多有抄本，集部亦多明人校刻，虽未刊行而二人之心亦可慰矣。”由此可见，这一倡议是十分成功的，影响力也很大。

一、《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版本源流考证

很可惜，虽然这本书目面世之后，有许多学者、藏书家写文章响应，但是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倡议或是这本书目是什么时候正式出现的。鉴于这一倡议对当时的藏书刻书的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倡议的提出是什么时候，即这本书目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纪映钟等人的《征刻唐宋秘本书启》云：“黄子俞邵、周子雪客，藏书累叶，手泽犹新。”而倪灿、周铭的《征刻唐宋秘本书例》在介绍周在浚的家世背景时提到：“司农（即周亮工）两遭患难，数世所积化为乌有。独此缮写本二百余种，梨庄（应指周在浚）极力珍护岿然独存大抵皆今世所不数见者。”前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手泽犹新”说明这篇文章应该是写在周亮工死后不久的，而后一篇中提到的“两遭患难”，也说明此文应写于周亮工第二次遭难之后。而在历史上周亮工第二次遭难的时间是在康熙十年十一年的时候，在事白之后，也就是在康熙十一年年的时候，周亮工卒。所以黄虞稷、周在浚的这个书目成书的时间或是说他们的这个倡议提出的时间，大概就在康熙十一年之后不久。具体的时间由于史料的不足无法推测了。

现存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版本有以下几种：

1. 《昭代丛书》（道光本）
2. 《观古堂书目丛刊》刊本
3. 《观古堂汇刻书》本
4. 《郎园先生全书》本
5. 民国北平图书馆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6. 琴川张氏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注：2~6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附有考证1卷、征刻书启五先生事略1卷。

全书不分部类，但总体上按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每书下均或详或略地注有作者的简略经历及书籍的主要内容，为阅读者提供了便利。

二、《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征刻唐宋秘本书目》是一次藏书无私行为的证物

《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价值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它载有多少秘本书，也不是在于它的目录分类有什么重要成就，而是在于黄虞稷和周在浚二人编撰这一书目的初始目的。他们编撰这个书目并不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其家藏的丰富，有如此之多的秘本书籍。而是将这些书籍列出并贡献出来，希望有精力有财力的人能将这书一一校勘并印行于世，希望这些秘本不再仅是私人藏书中的秘本，而是能够大量地流传于世，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这些书，并且在百年之后都不会失传，能够更好地保存这些书。

古代书籍的流传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在明朝以前印刷术还不十分成熟的时代。虽然唐代雕版印刷已经开始应用于书籍的印刷，但是当时所印刷的种类较少，而且大多是用在佛经和百姓日常使

用的年历等物件上,经史子集的流传主要还是依靠人手抄录,因此每本书在世上流通的数量就十分有限,而这其中有许多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就因为天灾人祸等种种原因亡佚了。到了明清时期,唐宋时的书已经是十分罕有的珍本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明清时期的许多藏书家都十分注重唐宋秘本的搜集与收藏,从他们所编撰的藏书目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原来藏于其家的唐宋秘本的书名目录,但是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书却在继续流传的过程中亡佚了,有的是因为明清交替时的兵灾,有的是因为藏书保管期间的火灾或水灾,还有的则是因为藏书者子孙对藏书的不爱护,将先祖的藏书变卖或毁坏。这正是因为它们是秘本,通常都只是一两个藏书家所拥有,不为他人所知,即便是知道也无法从其藏者手中借阅或抄录,更不用说将之刊行于世。

古代的藏书家可说是世上第一好书的人,他们能为了搜寻他们所要的书,倾家荡产也再所不惜。有许多珍本就是因为他们的妥善保管而保存了下来,这对文化的传承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也存在着不少弊病。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藏书家对其藏书的占有欲特别强,当书籍成为了他们的私有物,也就成为了他们私人财产的一部分,是别人不能窥探与沾染的,甚至子孙都不能随便翻阅。在《春秋堂集》中就曾说了这样的一件关于“天一阁”的事:有一位名叫钱绣云的女子,嗜书好学,慕名范氏“天一阁”藏书盛名,听说阁中藏有《芸草》(一说芸草可避蠹虫),往借不与,不得已嫁入范家,希望可以借出。但婚后范氏以妇女不得登书楼之规辞之,该女也因此郁郁而终。家人尚且如此,外人就更不必说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样的禁例仍然存在,著名的学者、藏书家郑振铎先生专程到宁波“天一阁”看书,阁主也还是以范氏族规为由拒绝他登楼。这样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保管书籍,但是当藏书楼因为某些天灾人祸而不能再继续保存好书籍时,楼中的书籍特别是珍本、秘本就很有可能从此不传于世,就此亡佚。二是藏书家的个人力量太过单薄,大批的书籍存于一家一人之手,要长期地传承下去是不太可能的。或许一代可以,两代也可以,但是到了三代四代,这些书已经不像在其先祖手里那样被妥善保存了。没有几个藏书楼可以像“天一阁”一样在经历了明清两代,藏书部分散失的情况下,一直沿存至今。许多书籍在传到一些不肖子孙的手中时,或是被变卖,或是被拿去抵债,有的流向海外,有的被下人拿来画鞋样,甚至如毛晋的一个孙子,有一次得到洞庭的碧螺春茶和玉蟹泉水,为了煮茶有好的木材,竟然拿出家藏的书版煮茶,认为这样煮出的茶能更香。而就是他的这一随性而为,在当时已是善本的一部《四唐人集》就在“毕剥”声中灰飞烟灭了!

不过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也有藏书家并不是那么自私,他们认为藏书就必须物尽其用,一方面将藏书作为自己的治学修身的工具,另一方面还应该将自己的个人藏书向他人开放,从而嘉惠学林。如在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中所提到的他的朋友李常,藏书有九千余卷,但是其并不将这些书都占为私有,而是“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①。而到了明末清初时,徐爌、潘曾紘、曹溶等人也都主张藏书贵流传,藏书应该公诸同好。曹溶就著有一篇十分有名的《流通古书约》,针对藏书家借书难的情况,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其办法为“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斋所钞互换”。这样就可以“好书不出户庭,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②这一流通约正是为了解决当时藏书家对书籍,你不借我,我不借你,大家都有许多

^①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苏州文集》卷十一,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

^② 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续记》卷五。

书，可谁都借不到书，藏书事业因此而几陷于停滞的状况而产生的。但是《流通古书约》所提出的方法其实还带有很多局限，如要求“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要符合这三个条件就已经是十分困难，而且“流通”是建立在绝对对等的条件下的，因此只会使藏书富有的藏书家更加富有，而对藏书贫瘠而又渴望有更多好书的藏书家来说，这样的流通是无法得到其所要的书的。不过这个方法还是给当时和后来的藏书流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最著名的就是黄虞稷同丁雄飞的“古欢社约”，其开放度已经大过《流通古书约》所说方法的流通程度。但是藏书仅用手抄，在明清这个印刷术已经十分普遍的时代是不够的。过去是因为技术所限，因此书籍几乎都是靠人手抄录流传。在明清，刊印书籍无疑能够更好地促进书籍的流通与保存到后代。如果要一本书真正能够流传于世，并且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亡佚，这不仅需要藏书者妥善的保存，更需要能有更多相同的书进行流通，这样就算某个藏书家手中的这一本书被毁损了，但是在其他人手中的书还是可以传世。特别是被视为秘本的唐宋时期的善本书，由于其本身的传本就已经十分稀少，如果只是让它们以秘本的形式保管于某个或某几个少数的藏书者手中，那么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很有可能秘本就成为孤本，甚至从此消失在世间了。只有将这些秘本刊刻出来，使它的传本增加到几十本、几百本甚至几千本，就算是经过几百年还是有可能有本传世。这就是以传代存，用刊刻更多的书来防止书的散佚。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在清代以前，也已经有一部分的藏书家刊印了自己的藏书，目的虽各不相同，但都进一步促进了书籍的流通与传承。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晋刻书，虽然他所刊刻的书籍也有经营出售，但是还是和专门以盈利为目的的坊贾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以高价收购宋元善本书，又高薪聘请名士高手校勘书稿，书写上版。并且从千里之外的江西订做毛边纸、毛太纸，尽量保证并提高刻书的质量。他家藏书，允许别人抄写阅读，一获善本便雕版刻印，广为流传。他的这一举动可谓嘉惠学林良多。这为后来许多宋元善本的流传后世创造了条件。

黄虞稷和周在浚编撰《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就是深知书籍流通的重要性，虽然他们没有自己写一篇文章或是在《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前将编撰这一书目的目的写成一篇文章，但是他们编撰这《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目的在其将自己家藏的唐宋秘本书贡献出来的同时，也就证明了他们藏书无私的一面。清代藏书家的人数增多，书少而人多，而且当时由于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以及清代考据学的渐渐兴起，藏书家中佞古、佞宋的情绪空前高涨，许多藏书家为了能得到一本宋版书均不惜代价，黄丕烈与陈鱣就曾经为汲古阁流出的旧抄《周易集解》鸡争鹅斗，黄宗羲和吕留良也因抢购澹生堂散出的宋版书而反目绝交。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他们并没有像大多数的藏书家一样，将唐宋秘本视为私有之物，外人不可窥视和沾染，而是将藏书家们都视为有钱难买珍宝般的秘本书籍贡献出来，公示众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书如果能够在世上流传，会比只是放在家中自己独享有价值地多，而且自己一两个人的力量太过微弱，很有可能不能将这些秘本一直无恙地保存下去。所以为了使家藏的珍本、秘本的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及不会亡佚，情愿将自家的秘本拿出，让有能力的人进行校勘和刻印，让其书更加广泛地传播于世上，以传代藏。这种做法在他们之前几乎是没的，特别是在极度崇尚宋元版本的清代，更是体现了他们的无私！他们的这种做法是真正的爱书者的做法，是明智的选择。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可，引起了众多学者和藏书家的响应，也影响着后世的藏书家们。后来清代的许多藏书家刊刻丛书，也都是靠大家的帮助，或是出钱助其刊刻，或是多个藏书家一起帮助校勘，有的还拿出自家的善本供其精

勘细校。不再是像明代时藏书家刻书仅为其私人的行为，不论在材料、人工等方面都只有刻书的藏书家一家承担。如著名的鲍廷博刻的《知不足斋丛书》就是得到同人与藏书家朋友们校勘及底本方面的无私援助，才成为丛书中的翘楚。这些可以说也是受到了黄、周二人倡议的唐宋秘本刊刻行动的影响。

（二）《征刻唐宋秘本书目》所引起的反响

《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面世，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著名学者与藏书家还直接写了文章以支持这一行为。它就像是一个倡议书，在当时以及后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直接对这一倡议进行响应的几篇文章。

一篇名为《征刻唐宋秘本书启》，作者是纪映钟、钱陆灿、朱彝尊、魏禧、汪楫等五人。这几位联名的作者，生活的区域主要以江苏南京为中心，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和当时还未被召入明史馆的黄虞稷也一定有所交往。而且他们其中不乏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藏书家朱彝尊，而其他如钱陆灿也有自己的藏书楼，另外的几位也在史学等学术方面有着一定的名气，可以说都是清初知名的学者，虽然在藏书史上或许不是十分有名，但是由于他们的学术需要，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藏书，并且对于难得一见的珍本秘本书的流传都会持支持的态度，所以他们在知道了黄虞稷和周在浚的这个将自家秘本贡献出来嘉惠学林的举动后，都十分赞同。故此联名写了这一篇《征刻唐宋秘本书启》，来响应这一倡议。

在这篇文章一开篇就讲到了，秘本的流通是十分必要的：“窃惟访西阳之逸典遥集，怀搜芸室之遗编，流通是急，虽帐中鸿宝独乐，孰若与人。即世守家珍名山，应存副墨。”因为唐宋或是宋元版本的书在明清均以成善本、珍本，数量十分少，所以“流通是急”，藏书家如果藏有这样的秘本就“应存副墨”。并且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提到了前代书籍大量亡佚，“尤氏之书目空存”，而原因就是“后人不知爱鼎，同事罕为扶轮”。在文章的中间部分，还介绍了黄虞稷和周在浚二人的藏书如何之丰富，但是因为黄虞稷“家徒四壁”，而周在浚由于其父周亮工的两次遭难，家境也不是十分富裕。所以“出校讎既定之书，先行百种。所冀博奥多闻之彦，共赏春秋”。希望有能力的同好可以将其刊刻印行。在文章的最后更是呼吁同好能够象黄、周二人一样，将家藏的秘本流传，嘉惠学林：“今吾党不乏英喆，嗜书颇越前人，将数百年秘而未传薄海内闻而未睹者，幽光发于四部，寿世脱于三灾，能损费于居诸便增华于竹素翘。”

在文章的最后，更是称黄、周二人的这次的行为为“盛举”，给这本以书目形式的倡议和贡献出秘本的举动以极高地评价。

另一篇名为《征刻唐宋秘本书例》，作者是倪灿和周铭。他们二人也是生活在南京附近，和黄、周二人以及前面一篇文章的五位作者有着同样的学术、生活圈。因此对《书目》的出现，都给予了强烈的响应，并且进一步倡导这种行动，希望更多的藏书家能在贡献秘本和刻印秘本上多出力。这篇文章较前面的《征刻唐宋秘本书启》篇幅更长，内容更为详细。特别在篇首介绍了黄、周二人的家世渊源以及其藏书之富，秘本珍本之多：“黄子俞郃为温陵海鹤先生令嗣，先生闽海大儒，宦游白下。俸钱所入悉以市书，藏书不下六万卷。俞郃能读能守，又时增益所未备。虞山钱宗伯（按：即钱谦益）藏书甲天下，采诗之役犹不能不假俞郃，其富可知矣。”“大梁周子黎庄，栢园司农长公。司农世以藏书为业。嘉隆以来，雕版行世，周氏实始其事，游宦所至，访求不遗余力。闽谢在杭先生万历中抄书秘阁，后尽归司农。两遭患难，数世所记化为乌有，独此缮写秘本二百余种，黎庄极力珍护，岿然独

存，大抵皆今世所不数见者。”其中说到周在浚的家藏原是十分丰富的，但由于后来其父周亮工的“两遭患难”，家中的许多珍藏都已流失了，也许也正是因为这样，周在浚不仅极力珍护着这些仅存的珍本秘本，而且也因其家的遭遇更加了解到，如果让这些秘本能够更好地流传于世，就应该将之刊行于世，与世人共同分享，这样才不会让秘本书就此失传。

倪灿和周铭之文在介绍完二者的家学渊源与藏书后，又提到了明末几位著名的藏书家的家藏，如焦竑的澹园藏书、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等，这些明末著名的藏书家的家藏却因为兵灾、火劫等人为与非人为的原因而散失，亡佚了。也因为看到了前代藏书的遭遇，故而就更加支持黄、周二征刻唐宋秘书目的活动：“故知天地菁英有聚必有散，况诸本半系宋锲元钞，即在斯世亦无多藏本，倘不及时流传，恐古人慧命由此而绝。此吾党急于成全其志也。”此外，在支持黄、周二人的行为的同时，还对同代的藏书家们提出了倡议，希望他们能像黄、周二一样“共出所藏”，以“饱嗜痂之目”。

文章的后一段更是向大家提出倡议，希望有能力的人可以将这些书刊刻行世，因为秘本不下百种，要将这些全都刊行流传并不是靠一家或一人可以完成的，作者也同样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然七级浮图原非一力可以合尖，而百代表扬亦岂数人便勤独任。”因此对有能力的人提出这样的倡议：“凡我同人，或任一种，或任数卷，或留意经传，或专心史学说部之书，可乐闲情诗文之集，亦广闻见，各随所好，共集大成。”并且在还对刊刻提出了要求：“至刻本务期古雅，存宋元久刻，遗意其字画，皆校定无伪，或有缺文，悉仍其旧，不敢妄为增减以失其真。”

这篇《征刻唐宋秘书例》较前一篇文章的《征刻唐宋秘书启》更加详细地介绍了黄、周二人的家世与藏书，特别是对刊刻这些秘书目提出了要求，使这篇文章不仅具有倡议的性质，而且还为刻书活动提了一个更加细致的要求。

还有一篇名为《征刻唐宋秘书论略》，其文后题为“仁累山人张芳漫稿”。其文为这三篇响应《征刻唐宋秘书目》中最长的一篇，其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论藏书宜刻”“论读藏书宜崇经史”“论刻藏书宜先经史而后子集”“论藏书宜同心校刻”几个方面对征刻唐宋秘书目的活动表示了赞赏之意，并且对读书和刻书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与要求。

第一部分“论藏书宜刻”，张芳批评那些家藏珍本秘本的藏书家不将之贡献出来，使之广为传播，刻印行世的行为是“有罪”的：“唐宋以来名儒之经、神史奥幸而存什一于千百，竟未能发其絨膝，咀其精蕴者，非求之不力也，求之既力，而藏书家曾未肯举其贵且美者以相授，则藏者诚有罪矣。”同时称赞了黄、周二人的行为是有功的：“今黄周二子胪列所藏唐宋秘本告天下，共勉盛事。公其贵且美者于世，以厌服海内好奇嗜异之心，可谓有功矣，是仆之所欢喜赞颂也。”

第二部分“论读藏书宜崇经史”，张芳阐述了经史在传承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藏书时较之子集的收集，应该更加注重经史的收藏。所以在刊刻藏书时，他又提出了第三部分“论刻藏书宜先经史而后子集”。在第三部分中，他继续阐述了他对经史和子集之书的看法：“仆尝谓天地间之所以不朽者，五经为天地间有数文章，廿一史为天地间有数人物。无人物则光岳何以孳生，无文章则伦物何以昭著。惟是经史赖有儒者通流，遂可纲维古今，子集以润色经史，特文章中一种。”他认为经史才是文章中的主流，而子集不过是经史的点缀，因此在刊刻藏书的时候应该先刊刻经史，再刊刻子集之书。在《征刻唐宋秘书目》的近百种书中，只有三十八种为子集之书，其余的均为经史，所以张芳在读完这一书目后，叹到：“洋洋观止，有喟然兴起于汲古得修绠之言者乎，仆引颈俟之矣。”

最后,他还提出了“藏书宜同心校刻”,他先阐述了明代刻书的情况:“有明之中叶,功令严明,士习纯一,坊肆雕本多出礼部颁行,惟王府宦邸时翻刻旧本古书,王府本不传人间。高参政叔嗣刻行宋郑伯谦《太平经国书》,马太守金刻行齐褚澄《石经》,自非大官较刻,坊贾不敢妄有。”正是因为刻书在明代有着如此的形势,所以在珍本秘本的刊刻上还是十分缺乏的。再加上:“宦邸犹存好名之见,坊贾犹挟谋利之私。”因此不可能同心校刻。张芳认为:“惟吾党有心,则以前人为空谷,而寻声唤应以遗烬为寒香,而当春发起一时好古之心与力,则自我作古之心与力。是也远壑有声尚可响答,孤根不变尚发香光。矧同时应求,岂无赴龙之云叶、律之吕乎。然则征刻二子之藏书,仆知其必有合矣。”他倡导当世同道能一起尽心尽力地刊刻这些藏书,并认为只要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完成着这一创举。

从以上的这三篇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社会,特别是学者、藏书家对黄、周二人的这一以书目为发起形式的刻书运动是十分支持的,并且都持赞赏的态度。

也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后来有许多藏书家、学者都纷纷校刻这些藏书,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珍贵文献。

(三)《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书籍后世刊刻情况考略

在黄虞稷、周在浚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面世之后,又经过多位著名的学者、藏书家的倡议,书目中的大部分都被刊刻出来,流传至今。

在这些刊刻者中,最早的应该就是龚翔麟家的玉玲珑馆。其刊刻《书目》中的书籍的时间约在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七年(1678)之间,^①也就是《书目》面世后不久。据王重民先生考证,由于《玉玲珑馆丛刻》传本不多,根据诸家所载,《玉玲珑馆丛刻》中就有:[唐]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元]赵汭《左传补注》十卷、[明]朱睦㮮《授经图义例》四卷。^②

而《通志堂经解》对之经部的刊刻也紧随其后。徐乾学《通志堂经解序》云:“予感竹垞之言,因悉予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岳、无锡秦对岩、常熟钱遵王毛斧季、温陵黄俞邵及竹垞家藏旧版若钞本,厘择是正,总若干种,谋雕版行世。门人纳兰容若,尤恣惠是举,捐金倡始,次第开雕。经始于康熙癸丑(按:即康熙十二年,1673),逾二年完工。”正像叶德辉所说的《通志堂经解》几举《书目》的经部全刻之。^③但是,《玉玲珑馆丛刻》已有的唐代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以及《授经图》四本却不再在《通志堂经解》中出现,由此可知,《玉玲珑馆丛刻》对《书目》书籍的刊刻要早于或和《通志堂经解》同时,而其间黄虞稷很有可能都为之校勘、定夺。

其他书籍的刊刻情况,可以参看叶德辉在观古堂汇刻本《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之后附录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考证》(后简称《考证》)。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其所知的清光绪三十四年之前的每本书的刊刻情况,都列了出来。从叶德辉的这篇《考证》中,我们可以得知,自从《征刻唐宋秘本书目》面世后,有许多藏书刻书家以及学者个人响应这一倡议,纷纷刊刻这些秘本,使之更加广泛地流传于世。

① 详宾莹:《黄虞稷生平著述交游考》,《闽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② 详见王重民先生《〈千顷堂书目〉考》一文。另,其中“[元]赵汭《左传补注》十卷”,未见于《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因不知王重民先生所据何文。

③ 叶德辉《重刊〈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序》。

首先从书籍被刊刻的情况来看：

据叶德辉的《考证》一文，《书目》中有19种书未被刊刻。此十九种书分别为：宋吕祖谦《系辞精义》二卷、明陆燾《左传附注》五卷、宋陈祥道《论语解》二十卷、元许衡《大学直说要略》一卷、宋蔡條《北狩行录》一卷、《窃愤录一卷续录一卷南烬纪闻一卷》、金张师颜《金国南迁录》一卷、元王恽《中堂事纪》三卷、《革除编年》三卷、《广孤树哀谈》二十五卷、元王恽《玉堂佳话》八卷、《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一卷、明张献翼《舞志》十二卷、《律吕正论》四卷、高儒《百川书志》二十卷、《岁时杂咏》四十卷、金赵秉文《滏水集》二十卷、元周霆震《石初集》十卷、明张孟兼《注西台痛哭记》一卷。

而其中有七种在《中国丛书综录》中又有所记载，已被刊刻入某种丛书。这七种分别为：明陆燾《左传附注》五卷、宋蔡條《北狩行录》一卷、《窃愤录一卷续录一卷南烬纪闻一卷》、元王恽《玉堂佳话》八卷、《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一卷、金赵秉文《滏水集》二十卷、元周霆震《石初集》十卷。^①

而在叶德辉《考证》中所载的被刊刻书籍里，有一部分是在明代就已经以刻本的形式流传了，如宋曾巩《隆平集》二十卷，有明董氏万卷堂仿宋刻本；宋宋次道《长安志》二十卷，有明嘉靖辛卯李经刻本；宋僧赞蜜《物类相感志》十八卷，有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笈刻本（不全）；明姚福《青溪暇笔》二十卷，明已有刻本；宋寇准《莱公诗集》三卷，有明宏治庚申王承裕序刻本；元郝经《陵川文集》三十九卷，有明正德丁卯李瀚刻本；元赵秉忠《藏春诗集》六卷，有明天顺辛巳马伟序刻本；元张宪《玉笥集》，有明成化己丑黄玉辉刻本、明宏治戊午王伯仁刻本。

因此从书籍的刊刻情况来看，大部分《书目》中的书都已经被刊刻出来，流传于世了，直至清朝后期仍然有人不断地将其中的部分书籍重新刊行，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经学、史学以及子集等情况提供了可依靠的历史凭证，传承了我国的传统文化。

其次，从书籍刊刻者的情况来看：

叶德辉所写的《重刊〈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序》有云：“当时，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几举经部全刻之。其后《武英殿聚珍板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有陆续刊行其史子各种，按目求之，所未刻者，仅杂史小帙及宋元人集部数种已耳。然杂史一二种，藏书家多有抄本，集部亦多明人校刻，虽未刊行，而二人之心亦可慰矣。”这就是《征刻唐宋秘本书目》著录的书籍在光绪三十四年以前刊刻的大体情况。

据叶德辉《考证》所载，《书目》出现之后，包括上文所提到的玉玲珑馆及通志堂，共有44个团体或个人对《书目》中的书籍进行了刊刻。^②其中，刊刻书籍较多的为《通志堂经解》《武英殿聚珍版》《知不足斋丛书》三家，分别刻有22种、9种、9种。其余大多分别选了一二种刊刻，其中包括张海鹏的《学津讨源》、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等著名的多家书馆。还有部分书籍由私人个别刻印，未以丛书的形式传世。

由此可见，《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不仅对于清代学者、藏书家的书籍流通观有影响，而且受到清代刻书家的热烈响应，在清代刻书业中的影响范围很大。不论是大型的丛书，还是一些中小型的丛书，以及一些私人刻书家都对其著录的书籍进行了刊刻。且书目中的大部分书籍都被刊行于世，可算是为黄虞稷、周在浚他们完成了流通秘本、传承文化的心愿，为我国的古典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① 其中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因资料有限，无法考证其他12种书是否有刻本传世。

^② 不包括明代的刻书者。

评《台湾古籍丛编》

——兼谈古籍整理的几个要素

翟 勇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台湾古籍丛编》是福建师范大学陈庆元教授主编的一套大型古籍丛书。出版一年多来,学界赞誉颇多。究其原因,主编陈庆元教授是当今闽台文学与文献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再加上两岸著名学者共同参与,为丛书提供了可靠智力支持。同时,诗文集与底本选择的慎重保证了丛书的学界需求与学术质量。另外,国家多个项目的经济支持与出版社的精心策划保证了丛书的出版品质。

关键词:《台湾古籍丛编》; 陈庆元教授; 古籍整理

2017 年 3 月福建教育出版社重磅推出陈庆元教授主编的大型丛书《台湾古籍丛编》,出版一年来颇受学界瞩目与赞誉。《台湾古籍丛编》共 10 辑,收录元明清入台、在台文人诗文集 36 种,近 600 万字。相信部分学者乍看到《台湾古籍丛编》题目会有这样的疑问,该丛编与《台湾文献丛刊》《台湾文献汇刊》《台湾历史文献丛刊》等已经为广大学者熟知的大型台湾文献丛书有何不同? 有哪些超越的地方?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理由可以部分解答这些问题。

一、大家掌舵,两岸共举

众所周知,决定大型古籍丛书质量的要素之一就是主编的站位高度与参编者的学术水平。《台湾古籍丛编》主编陈庆元教授,金门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学院院长、古籍研究所所长。陈庆元教授曾受聘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福州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同时长年在台湾东吴大学、中央大学、金门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荣誉讲座教授。陈庆元教授在福建区域文学和闽台文献研究方面是国内权威专家之一,《福建文学发展史》《文学:地域的观照》等专著已经成为研究福建地方文学的必备参考书。近年来陈教授致力于闽台籍作家作品的整理与研究,相继出版与发表《谢章铤集》《金门许獬年谱》《徐燧年表》《张燮年表》等十余种古籍整理著作与论文,并且作为《福建丛书》编委之一。副主编肖庆伟教授,多年来担任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对闽台文献与文化有深入研究。二位专家对《台湾古籍丛编》的整理研究工作十分严格,对团队成员的选择也十分严谨。

丛书 30 多位担任点校工作的学者中,有数位台湾专家,如台湾铭传大学的陈德昭教授、成功大学中文系的陈益源教授、台北大学的王国良教授、东吴大学的许青云教授、中山大学的郭秋显教授与金门学者杨诗传、杨天厚先生等,他们都是台湾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文献学专家。另外还有数

作者简介: 翟勇,男,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位在大陆攻读博士学位的台籍学生，他们大多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已经在台湾从事文化保护工作多年，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很有心得。大陆学者大多来自福建各大高校与科研院所，如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福建社科院等单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事闽台文学与文献整理的教授、副教授或博士。闽台两岸高水平学者的共同参与，是这部丛书学术质量的保障。

二、珍本首现，全面整理

诗文集的选择是决定古籍丛书价值的另一重要因素。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杨忠教授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古籍整理成果中有过多重复，浪费了人力财力，不仅有项目的过多重复，还有一些大型丛书引用资料大量重复，或将古籍资料不断地排列组合。”^①《台湾古籍丛编》的取舍标准，据主编陈庆元教授介绍：“本书所收各集的原作者，以台湾作家为主，还有若干宦台的大陆作家。我们这部古籍丛书，所收的是流传至今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诗文集；丛书不收当时虽然有集，但在流传过程中大部分已经散失、仅存零星散篇的作品。”^②翻开《台湾古籍丛编》，邱葵、郑经、王忠孝、蓝鼎元、郑用锡、林树梅等风云人物映入眼帘，他们是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台湾本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织者与参与者，其作品亦是当时文学或史实的重要反映。因此，整理出版这些诗文集，对于增强两岸在文化情感上的认同感，意义十分重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多数没有在大陆点校出版过，如蒋孟育《恬庵遗稿》、郑经《东壁楼集》、林豪《诵清堂诗集》等。尤其是蒋孟育《恬庵遗稿》在两岸都是首次出版。蒋孟育（1558—1619），字道力，号恬庵，金门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南吏部侍郎等职。他为官廉洁，卒后，朝廷赠与尚书衔，谥“文介”，祀乡贤。蒋孟育曾与张燮等结社芝山之麓，称霞中社，名在霞中十二子之列，漳南文学称一时之盛。其诗文集《恬庵遗稿》可作窥探万历金门文人生活与诗文水平的一面镜子，在文化研究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外有的诗文集在台湾已经出版，但是一方面大陆学者较难获得，更重要的是一些文集已非全貌。如郑经《东壁楼集》，该集虽然收在施懿琳主编的《全台诗》中，但是原书中的序被删掉，并加入了《延平二王遗集》中署名“元之”的十余首诗。另外部分著作虽已在大陆出版，但有点无校。《台湾古籍丛编》主编要求每部诗文集的整理包括相关诗文辑佚及作者个人史料，诸家序跋、倡和与题咏，生平考、著述考，各家传记、年谱年表，为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三、慎选底本，博采众长

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中云：“一种古籍如果有几个不同的本子，其中总会有优劣之分。影印固然要用优舍劣，而在校勘、标点、注释、今译、做索引时也应避免用劣、尽量选优作为底本。”

“由于没有选择好底本，或者由于不讲究选择底本，甚至不懂得版本，不会选择底本，以致在整理古籍中出现失误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③因此底本的选择也是决定古籍整理质量的要素之一。《台湾古籍丛编》版本以最大程度地保存和恢复各文献原貌为基本原则。根据各文献实际遗留情形，基

① 杨忠：《古文献专业与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60年》，《中华读书报》2018年9月19号13版。

② 陈庆元：《台湾古籍丛编·弁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③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2、29页。

本选以现存最早的稿本、钞本、刻本之复印件、复件为底本，并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整理研究成果作为参校。如郑经的诗集《东壁楼集》就是以1994年发现的明永历二十八年（1674）泉州刻本为底本。再如朱景英《海东札记》最早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光绪《湖南通志》著录此书，称《海东日札》。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由朱景英幕僚谢曦亲手写刻。谢曦，字发川，闽县人。以书法闻名宇内，尤善草书，写、雕兼善。因此孙殿起以“精刊”视之。除此本之外，目前所能见到的版本至少有八种。例如学者最常用的《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中除个别字词与谢曦写刻本有异外，还漏掉了“台湾土番敬官长……独念蚩蚩者氓亦何苦入林而甘遭其毒啮也哉！”这数百字的一段。点校者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不仅指出一些版本中明显的错误，并且补齐所缺，最大程度保证了点校本的完整与价值。

四、精心策划，项目护航

一部大型古籍丛书的顺利出版，离不开出版方的精心策划与支持。据该丛书责任编辑祝玲凤女士介绍：“早在2008年前后，我们就开始酝酿这个项目。2010年的时候，我们最初申报的是一个以清史文献整理为重点的古籍项目。但是后来由于项目完成时间的限制，不了了之。不过此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付之东流，为《台湾古籍丛编》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如二者都属于文献整理范畴，内容都是以明清文献史料为主。2010年前后，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新时期之际，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①换句话说，这套丛书是七年辛苦的智慧结晶，七年时间也为丛书质量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另外，该丛书还获批2011年度教育部古籍委员会重点项目、2011年至2020年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获得2015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也是福建省的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福建“闽台缘工程”出版资助项目。上述项目的获批为古籍整理提供了经济上的巨大支持，也为顺利出版提供了极大帮助。当我们手捧印刷精美、装潢上乘的《台湾古籍丛编》时，荣新江教授所说的话我们有所直观感悟：“与西方、日本的出版物相比，我们的书精装本不多，纸张、油墨档次不够。日本的学术书和史料书都是精装的，美国的公立图书馆不能入藏非精装本的书。所以我们也应当考虑把最好的古籍整理图书用最好的纸张印刷，精装加函套，这样才可以传世。”^②相信《台湾古籍丛编》必能传世。

^① 朱海波：《历时7年，两岸学者联手打磨〈台湾古籍丛编〉》，<http://www.bookdao.com/article/403166>

^② 荣新江：《期待〈史记〉三家注那样的传世之作》，《中华读书报》2018年9月19号13版。

《曹学佺全集》点校后记^①

陈庆元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本书整理的底本用的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实际上，曹学佺生前并未用过这一书名，只有《石仓文稿》及《石仓三稿》《石仓四稿》《石仓五稿》《石仓六稿》^②，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五著录，始见《石仓全集》之名。黄虞稷，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其父黄居中为曹学佺友，喜藏书，其家所藏曹学佺诸集当非常完整。黄虞稷著录没有卷数，可能诸集卷数的统计比较困难，例如《雪桂轩草》（不分卷）附有《戊己江上诗》，算一卷还是两卷？如果把《雪桂轩草》看作一卷，而所附《戊己江上诗》之名可能被淹没。《戊己江上诗》收录万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1608-1609）戊申、己酉跨越两年逆江前往西蜀诗，曹学佺借刊梓《雪桂轩草》的机会，把戊、己两年未梓诗，趁便也刻出来，以免散失，实际上《戊己江上诗》也是可以独立成卷的，也就是说《雪桂轩草》一卷，《戊己江上诗》也是一卷；类似情况，他集还有。一般认为，《明史·艺文志》颇参考《千顷堂书目》，然而《明史》著录则为《石仓诗文集》一百卷。《明史·艺文志》编者，不取黄虞稷“全集”之名，而用比较含混的“诗文集”，可能比较符合曹学佺诸集的实际。曹学佺诸集最晚一集是《古希集》，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编刻于次年，即甲申年，是年明亡。甲申及其后，曹学佺又活了三年，亦多有作，可能未刻。清兵入福州，曹学佺自缢死，清兵籍没其家产，图籍散失，后人多方搜集，亦可成集。《明史·艺文志》著录为“诗文集”，可能比较谨慎。“一百卷”，应当经过统计，是取其成数的一个数字，大体可信。我们这次整理，出版社建议采用《曹学佺全集》之名，我们也觉得有道理，一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是曹学佺诸集流传至今最全的诗文集；二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另外搜集到曹学佺诸集未收的诗文数十篇，我们把这些诗和文各编为一卷，作为《石仓诗集拾遗》《石仓文集拾遗》附在诗部和文部之末。《曹学佺全集》计诗五十八卷，文五十六卷，合计一一四卷。

《曹学佺全集》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

2003年，我们从日本影印《石仓全集》回来，共六十一册。自己先编一个目录，逐册阅读。

2004年，撰写《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曹学佺〈石仓全集〉初探》一文，参加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2004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文后来收入会议论文集，由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文主要讨论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看《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两部书目对曹学佺诸集的著录情况、曹学佺诗文集的卷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度藏六十一册的编排得失等问题。

作者简介：陈庆元，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曹学佺全集》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石仓诸稿，缺二稿，缘由见《曹学佺全集》附录九《日本内阁文库藏曹学佺〈石仓全集〉编年考证》。

2005-2015年,继续阅读曹学佺诸集并作文字输入,对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的编排再作思考,同时对曹学佺裔孙曹岱华在乾隆间所编的《石仓诗稿》一书的得失也作了思考,完成《日本内阁文库藏曹学佺〈石仓全集〉编年考证》长编论文(国家图书馆《文献》2013年第2期)。其间进行的工作还有:一、对石仓诸集作初步的点校;二、搜集曹学佺佚诗、佚文;三、搜集曹学佺传记,搜集诸家序,搜集诸家与曹学佺酬倡诗,搜集诸家致曹学佺书牘,搜集诸家集评和友朋的祭吊诗文,辑编《石仓诗话》;四、撰写《曹学佺年谱长编》。

2014年,将第三次打印稿交出版社。出版社将此书定名为《曹学佺全集》。经由出版社申请,此书获2015年国家古籍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2016年6月至12月,一校。

2018年3月至09月,二校。

连同之前的三次打印稿及两次校稿清样,此书先后已经打印过五次,也校过五次。这两次清样的校对,又陆续发现一些新材料,附录部分也都略有增饰,不断改易;不过,这也给责编带来更大的工作量,甚感歉意。

十五年前,开始着手曹学佺诗文集的整理,师友问及“现在在做什么”,我的回答很明确;十年前,师友问及,我也是这样回答,五年前再问及,已经有些不好意思回答了,毕竟一部书拖得太久。一部书做了十五年,固可以说做得很用心,也可以说很拖拉。整理曹学佺诸集,还得追溯到二十年前为福建文史馆编《福建丛书》,我承担若干种,其中一种是《谢肇淛集》,另一种是《徐燧集》。撰写前言,通读两部书,趁便做些笔记,动手作年谱。其实,作年谱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谢、徐与曹学佺生活在同一时代,作他们的年谱,至少两个人的生平活动及创作是绕不过去的,一位徐燧的之弟徐焯(二徐之姐为谢肇淛父谢汝韶继室),一位就是曹学佺,不得不费尽心力去寻找这两位著作,徐焯的《红雨楼集》稿本藏上海图书馆,曹学佺的《石仓全集》藏日本内阁文库。因为做《谢肇淛集》《徐燧集》,就不得不“分心”关心徐焯的《鳌峰集》和曹学佺诸集,甚至也为他们作个年谱或年表,不然研究谢肇淛和徐燧心里不踏实。等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和《红雨楼集》稿本先后获得,爱不释手,索性徐、谢、曹一起作。近代谢章铤论历代闽诗,有句云“当年鼎立徐曹谢”,这四位正好代表了闽诗的一个时代,在晚明诗歌史的地位也足以与中原争旗鼓,特别是曹学佺除诗文诸集外,还编有千余卷的《石仓十二代诗选》,琳琅宝库,非常难得。徐曹谢四家集,分量最重的要数曹学佺集了。

我的学生江中柱点校的谢肇淛《小草斋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我整理的徐焯《鳌峰集》(广陵书社,2012年)相继出版,徐燧的《幔亭集编年校笺》,《徐焯尺牘编年校笺》也已经基本完成,而分量最大的曹学佺集进展就显得比较慢了。整理古人别集,近年出现“伪整理”的不正常现象,即从网上或硬盘下载已经输入、甚至已经断句的本子,“整理者”稍作编排、标点,仓促间便可成书。此种最下。其次,稍为好一点的是只点不校。网上找不到输入的本子,自己输入或在原件的复印件上进行标点,交出版社输入排印,没有一处出校,往往只有一篇简短的出版说明,书后没有附人物传记,没有附集评,也没有附年谱或年表。《曹学佺全集》整理之所以十分费劲,很多的功夫花在附录上。附录四《诸家倡酬赠答》,辑录近百位诗友的诗上千首,急不得、快不得。附录八《曹学佺年谱简编》,年谱的功能一是逐年、甚至逐月逐日记述谱主的活动;二是作品系年;三是描述谱主何时何地何因交集了什么人,有何互动和作品;四是简短的评论。年谱长编和年谱简编的区

别只是所记所述的繁与简而已，根本的时、地、人、事和作品系年不会因繁简的不同而不同。曹学佺一生交游有姓名可考者约 2500 人，重要的有数十人，要了解曹学佺和他们的交游情况，最好要读这数十人、甚至更多人的文集、作品；搜集、阅读有作品传世的友人之作也相当的费时费事，至于搜集过程的甘苦更不待言了。《曹学佺全集》没有笺注，《曹学佺年谱简编》无疑能起到编年笺注的部分功用，将来《曹学佺年谱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曹学佺全集》来说，是最好的注释本或诠释本。

研究工作往往环环相扣，古籍整理也如此。在为福建省文史馆编《谢肇淛集》《徐燧集》的过程，引出点校整理《鳌峰集》《曹学佺全集》这两部书的想法，然而《曹学佺全集》这一部书的分量之重却和上述三种相当。《曹学佺全集》反而成了我这十几年工作的重心，所以亲朋问及最近你在做些什么，我都会说整理曹集。

在整理《曹学佺全集》的过程中，我们还关注和他同一时代的许许多多诗人，仅闽中诗人其集见存的还有：赵世显、陈益祥、陈鸣鹤、周仕阶、袁表、谢杰、谢汝韶、陈第、叶向高、邓原岳、董应举、陈一元、陈勋、陈价夫、陈荐夫、邵捷春、林子真、陈鸿、王宇、林古度、邓庆棠、商梅、周之夔、韩廷锡、李时成、陈衍、曾异撰、林崇孚、徐钟震、徐延寿、林日光、林咨、林之番、许友等；福建其他郡有集传世的与曹学佺关系较密的诗人有泉州的何乔远、蔡复一、黄景昉、漳州的张燮、郑怀魁、宁德的崔世召等。福建之外，钟惺、谭元春等也非常重要，其他不一一胪列了。我们附带完成待刊的还有《林古度集附年谱》、商梅的《那庵全集附年谱》，完成大半的有《蔡复一集附年谱》《崔世召集附年谱》及《张燮年谱长编》等，这些成果既可以视为曹学佺诸集整理的副产品，也可以看作完成《曹学佺全集》整理的基础性工作。我个人认为，对古籍整理基本的阅读面宽广一些、对整理对象的相关作家了解多一些、深入一些，关系到古籍整理者的修养，也关系到古籍整理的质量。

《曹学佺全集》连同前言、目录约 5000 页，校对一遍都得花半年的时间，特别是附录部分，有的是十几年前钞录的，有的是近期补上的；有的自己有藏书或复印件，有的只能从图书馆靠手钞或计算机输入，复核十分麻烦。2016 年夏，一校时正好在前往台湾金门大学任讲座教席前夕，只好背上一箱《石仓全集》复印件渡海。暑期中的金门大学，空山清寂，和内人温惠爱相对校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内人毕业于北大东语系，见识甚高，而且比我细心，纠正了许多错讹；后来二校亦如是。这部书如果没有内人参与，不知得校到何时何日，也可能留下许多遗憾。内人回陆后，又日夜逐句逐字而校，听风听雨听涛，大学综合楼五楼数十间研究室的灯光，往往是我这一间最后熄灭。跨出大楼的东北门，东北季风扫将过来，赶紧护着电脑包，三步并成两步赶紧躲进学人宿舍。2016 年最后一天，女儿女婿从厦门来金门看我，顺便也将一箱校稿带回寄往北京。

一部书孜孜矻矻做了十五年。台湾东海大学许建昆教授，也是最早注意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的学者之一，1997 年，我到东海大学参加魏晋南北朝学术会议，到机场接机的就是许教授。许教授研究李攀龙，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出版专书了。不期许教授也专注于曹学佺的研究，我在台三度客座，常与许教授碰面，还一起徒步环行日月潭。与许教授互通研究之有无，他为我印了不少资料，我则把未刊稿《曹学佺年谱长编》发送给他。2014 年，他的《曹学佺与晚明文学史》问世，再三说期待我的整理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是现存最全的曹学佺诗文集，个别卷有缺页，如《林亭文稿》

缺了三页，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曹学佺部分文集，恰好有此集，经由友人钱志熙教授协助，他让学生拍下书影发给我，使得这部书得以璧完。谢谢！

转眼已经秋仲，南方的暑热慢慢退去。《曹学佺全集》二校终于校完，感慨良多。希望这部书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曹学佺诗文集读本。曹学佺家被籍没时，好友徐燏已经过世四年，徐燏子孙徐延寿、徐钟震家没有受到牵连，藏书保存完好，但是过了十来年，耿精忠之乱，徐氏藏书楼散为炮架，徐氏藏书陆续流散。清乾隆间曹学佺裔孙曹岱华搜集曹学佺诗集，益以自家所藏，自称已经完备，而所刻《石仓诗稿》比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缺少十多卷。道光间梁章钜撰著《东南峤外诗话》，光绪间汪端编《明三十家诗选》、郭柏苍编《全闽明诗传》，民初沈瑜庆、陈衍纂辑《福建通志·艺文志》，都以未见到比较完整的曹学佺诗文诸集为憾。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有硕博士生以曹学佺为对象作硕博士论文，即使是在我和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已经把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石仓全集》介绍到国内之后，仍然有博士生只依靠《石仓诗稿》和很少的几卷曹学佺文稿，便作出《曹学佺研究》论文，并以专著的形式出版；2012年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出版内地学者所辑《曹学佺诗文集》，辑者花费很大力气搜集曹学佺家乡福州所能见到的曹氏著作数种，精神可佳，但所辑只是曹学佺诸集的一小部分。我们无意贬低这些研究者的劳动，只是为他们未能见到《石仓全集》感到遗憾，当然也为此集流失海外而遗憾。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完整的曹学佺诸集外流到日本，并且得以完整保存下来，还是好事。在中国国家古籍办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石仓全集》得以面世，与读者见面，从曹岱华到梁章钜、汪端、郭柏苍、沈瑜庆、陈衍，如果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社长的督促、感谢责编胡文骏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感谢在这部书从整理到出版的过程中提供支持的所有朋友，包括两岸图书馆的管理人员。

《福建历代私家藏书》序言

陈支平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在现今的福建学界,当然也可以说在中国学界,对于福建古籍的了解和研究之深,莫过于我的老友方宝川先生。方宝川先生曾长期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数十年来一直潜心从事搜集、整理、保护福建现存的各种古籍,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福建古籍发展演变历史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我虽然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但是毕竟学有侧重,对于古籍的了解,往往畸重畸轻,各有偏依。一遇到跨界的问题以及珍稀的古籍,就不得不请教于此道的方家。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沿承原福建协和大学的血脉,图书馆之设及其收藏之富,至今仍执福建省内各高校图书馆之牛耳。这样一来,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就不能不经常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去寻求解决之道。而作为福建省内最著名的古籍专家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方宝川先生,自然是我所要征询请教的首选人物。久而久之,方宝川先生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老友。现在,老友方宝川先生的大著《福建历代私家藏书》即将出版,老友顾念老友同道之情,希望我为他的大著写篇序言,我实在找不到推却的理由,干脆满口答应了下来。

这百余年来,大概是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吧,中国人把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人称呼为“知识分子”。然而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十分坎坷。每当“知识分子”走大运的时候,官员、议员乃至富商们,纷纷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当“知识分子”倒霉的时候,官员、议员和富商则对此避之唯恐不及;“知识分子”只剩下那班靠教书和做学问为生的所谓“臭老九”了。因此之故,害得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弄不明白“知识分子”到底属于那些人!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就简单得多了。举凡从下层秀才生员直至公卿大学士,统称为“读书人”。大家都为自己是“读书人”为荣,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为了当不当得成“读书人”而争得脸红耳赤来的。可见在中国古代,“读书人”这一名号是很吃香的。即使是有一些读书人因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而惨遭横祸,但是读书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依然是响当当的“读书人”。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名号之所以吃香,关键就在于“书”之上。没有了“书”,“读书人”是断断做不成的。而中国古代之所以以“读书人”为荣,是因为“书”承载了我们历代祖先的文化精髓和道德规范,“书”承载了化成天下的自然使命。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语来讲,就是承载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有了“书”,就有了文明的开拓,才有了社会与文化的生生不息。

福建是华夏文明开发较晚的一个边陲区域。汉唐时期,这里的土著居民散居于闽中各地,虽然已经陆续有少量北方汉民迁移至此,但是数量有限。尽管如此,这些少量的北方汉民入居闽中之后,带来了中原良好的读书风气,中唐之后,福建的读书人开始在中原的核心读书群体中崭露头角。五代、宋代以来,福建的社会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福建的读书人更是奋起直追,在短短的两百年时

间内,福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读书科举成就,就已经进入到全国的先进行列。南宋之后,随着“闽学”的兴起和科举的繁盛,福建的读书著述之学,逐渐向国内其他省区扩展,并且影响到海外各地。正因为如此,福建人往往把自己的家乡称之为“海滨邹鲁”,意为以福建的读书人之多和在学问方面的贡献,可以与儒学的发源地山东邹鲁一带相为媲美。

然而可惜的是,可能是“海滨邹鲁”这一美名太过于吸引人,致使现在中国沿海一代的名士们,出于热爱家乡的情怀,几乎都把自己的家乡称之为“海滨邹鲁”,“海滨邹鲁”由此遍布中国东南各地。“海滨邹鲁”一词既然已经不稀奇了,怎么办?好在还有一词,目前的流传尚为不广,这就是“文献名邦”。福建兴化府一带被古人誉为“文献名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据载,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府门口大街两端各建造一座木坊,匾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万历十六年(1588),莆田知县孙继有改题为“壶兰雄邑”“文献名邦”。这大概是中国境内誉称地方人文为“文献名邦”最早的记录了。到了清代,在浙江余姚县,才有文人为余姚县题写了“文献名邦”的横匾。时至今日,把自己家乡誉为“文献名邦”的地方,也不过聊聊数个县市吧。除了福建莆田和浙江余姚是源于明清两代,其余的地方,基本上是现当代才冒出来的名词。

所谓“文献名邦”,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里的书特别多。书特别多,读书人自然也就特别多。读书人越多,所需的书随着越多。因此自宋代以迄明清时期,福建地方从官学到民间私家,收藏书籍的风气十分盛行,连带着刻书、印书、贩书的行当也相当发达。南宋至明代,著名的建阳麻沙刻书,风靡全国,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清代中后期,汀州的四堡雕版印刷,也影响甚大。可以说,从宋代至明清时期,福建是中国收藏和印刷书籍最为繁盛的区域之一,一点也不为过。

我不是从事古代藏书、刻书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士,以上所述,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老友方宝川先生的《福建历代私家藏书》一书,才是这一专业的扛鼎之作。这部大著,洋洋70万字,介绍了自唐至民国时期福建著名的藏书家482位。全书深入地探究了福建历代私家藏书兴衰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原因,系统阐论福建历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与群体特征,全面总结福建私家藏书的社会功能及其历史贡献等等。有了这部书,我们对于福建历史上的“书”与“读书人”的演化历程,以及书与人之间的复杂交织情怀,可以了然矣!

21世纪以来,有不少善于开风气之先的高明人士,曾经欣然高呼新时代已经进入到数字网络时代,书籍和读书的地位将日益削弱,甚至沦落消亡。我和老友方宝川先生,自然是属于落后时代的老朽性人物。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是对有形的书籍,带有淡淡墨香的书籍,眷念沉迷不已。总是相信书籍的作用是永恒的,是跨越时空的。不论对与错,有了我这种固执的想法,中国的“读书种子”还是不会中断的。老友方宝川先生的这部大著,在这其间所发挥的作用,就当无可限量了!